目次

第二篇　中國人的特性

民族特性與民族衞生

第一篇　緒論

一　不踏實地的『民族』議論

三四年來出版界討論『民族前途』的文字眞是不一而足。新中國建設學會的復興月刊屢屢以民族復興為言，即就其創刊的一兩期而言，前既有趙正平先生的中華民族復興問題的史的觀察，後又有旭初先生的中華民族復興與吾人心理的建設（復興第一卷第一二兩期）。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先生演講中大的使命，一再申說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必要（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與二十四日大公報）。在同時期以內，新出版的一種旬刊叫作旁觀的也登着何浩若先生的一篇民族的出路。這都是犖犖大者，其餘散見報章雜誌的筆墨還很多。

觀察民族已往的歷史或推測民族未來的發展總不脫幾個立足點。一是文化的，二是經濟的，三是自由意志的，四是生物的。一個圓滿的觀察或推測自應面面顧到，更應分別各立足點的本末輕重，庶幾提出改革方案的時候不至於犯偏激或抹殺的弊病。作者始終認定這許多立足點中間，最基本的是生物的。一個民族先得有比較穩固的生物基礎或種族基礎，而後堅強的意志、豐滿的物質生活、繁變與醇厚的文化事業，才有發展的張本。

這個生物或種族的基礎，實在是很顯而易見的，普通不學生物學或種族學的人也未始不能見到。最近十年間，遇到吃了敗仗，或國際運動會裏成績瞠乎後人的時候，誰都至少會感覺到民族的體力不如人，有澈底改造的必要。但是說也奇怪，大家做起文章來，卻往往會把這常識的事實完全擱置不問。即就上文所引的各篇文字而論。復興月刊的兩篇中，第一篇的立足點幾乎完全是政治與經濟的，其所謂『史的觀察』的史，似乎只包含政治與經濟一類的事實；著者歷數了歷史期內各個復興時代裏『撙節財用，愛護民生』的例，以為只要當今執政者能如法泡製，民族便不難復興。至於民族在生理與心理的品性上是否容許這節用厚生的政策，著者並沒有過

問。第二篇的題目既以『心理建設』做中心，我們料想它的立足點是不出自由意志與態度的。果然著者在末尾說：『所說的心理建設，就是要根據這個內省自愧的一點不安之念「托庇於租界西洋人勢力下的中國士大夫階級對於民衆的一點自愧不安之念」來爲我們改造生活，改造環境，改造國家的發端。』 至於這種種改造所需要的實力如何，民族在生理與心理的品性上是否已有適當的準備，著者似乎已經默作正面的答復，即有實力的，有準備的。 不過因爲『一般人雖然存心向善，而往往爲環境所拘束，所牽制，而不能如願進行，』所以著者又以爲『必須大家結合團體，以團體的力量，改變環境，』即、個人的意志雖或不足，團體的意志是一定有成效的。 但我們不知著者旭初先生也曾問過民族的團結能力又是怎樣。 近來好像有人講起民族分子的所以像一盤散沙也是有生物的原因的例。

何浩若先生在旁觀裏的那篇文字可以說是完全以經濟做立場的。 他以爲經濟侵略與經濟恐慌是『造成世界紛亂的癥結；』世界多一次大紛亂，如大戰，各民族的地位便多一次大變動，有的由強而弱終於淪亡，有的轉弱爲強終於復興；他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來到，那時便是中

華民族復興的一大機會，不可錯過；他一面果然說『一個民族的命運，仍舊決於一個民族的本身，』並且希望大家能從農村經濟與地方自治兩方面着手做去；但是全文的語氣始終不脫『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的舊話，而所謂時與勢自然以經濟生活爲中心的。至於『民族本身』的實力如何，是不是有了機會便抓得住，拿得穩，能够盡量的利用，何先生並沒有告訴我們。何先生很可惜的說：『一九一四年曾經給我們一個機會，但是我們因循的放棄了。』何先生可並沒有問：當初我們爲甚麼因循放棄，好好的一個民族爲甚麼要『因循，』既可因循於一九一四年，又何嘗不會因循於一九三二年，既錯過了第一次大戰的機會，近來又有甚麼生理心理的保障教我們不錯過第二次大戰的機會。這些，何先生都沒有問，更沒有答復。

羅家倫先生的那篇演說，是站在文化的與意志的混合立足點發出的。他說國立大學——尤其是中央大學——的最大使命，是在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有機體的』四個字很像是富有生物學的意味了。其實不是，他不過借用這四個字來表示『有組織的』的意思罷了。這篇演講的第一部分解釋民族文化的意義與其重要，引證了日耳曼民族復興的舊例，眞是說得頭

頭是道。 但是在我們極注重民族的生物基礎的人看來，他這番話不免有本末倒置，以因爲果的地方。 例如他說：『如果缺乏這種文化，其國家必定無生命的質素，其民族必須要被淘汰……。』又說：『今日中國的危機，不僅是政治社會的腐敗，而最要者却在於沒有一種整個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個的民族精神。』 我們却以爲若用生物的眼光，甚至於比較常識的眼光去看，一個民族因爲缺乏『生命的質素，』才不容易產生『有機體的民族文化；』因爲振作不起整個的民族精神，或竟沒有這種精神可以振作，整個的民族文化才末由產生。

羅先生固然也說過『民族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結晶，』『民族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表現』一類因果不倒置的話，但他似乎假定這種精神是現存的，只要加以提撕警覺，它自然會出來。 講到這裏，羅先生的立脚點便一變而爲自由意志的了。 他因爲討論到創造新的民族文化與喚起新的民族精神的方法，便不能不提到改革學風，因爲要改革學風，又不能不提出所謂『誠、樸、雄、偉』四個大字來諄諄告誡中央大學的學生。 但是說來說去我們只聽見『我們要……』『我們應當……』一類的話：

『必須大家具有……』

『今後我們便要趕快……』

『我們每個人都應當……』

『我們必定要……』

『我們以後應當一本誠心去做……』

『我們以後要……』

『吾人總要……男子要有……女子要有……』

『我們今後總要……』

『大家豈可不……』

『我們只要……』

『我們切不可……』

此外羅先生在講到『雄』的時候，還說過『我們非從「善養吾浩然之氣」着手不可』一

句話。我們一面承認這些都是好話，我們總要做到，都應該做到，但是羅先生可曾問過，我們做的能力在那裏。就意志論，我們總要做，不錯；就事理論，我們應該做，也不錯；但是就實力論，我們果真能夠做麼？我們都有曹交一般學做堯舜的志願，我們很希望羅先生不要學了孟子只給我們一個『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的空心湯團喫才好！

羅先生講到『雄』字的時候，中間忽然有這樣的一句驚人的話，他說自從古代以至唐代，中華民族原是富有雄偉的氣魄的，『不知如何從宋朝南渡以後，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便萎靡不振起來。』不知如何在許多文化命定的與意志命定的議論中間，羅先生居然穿插着這麼一句稍稍抓着癢處的話！我們切望羅先生和其他完全用文化的、經濟的、以及意志的立脚點來觀察民族的已往與推測民族的將來的領袖們，能夠在『不知如何』四個字上，先着實下一些工夫，找一些答復，然後再談民族復興與民族出路的話罷。中華民族的生物基礎原是很好的，『不知如何』變壞了；我們要『知』了『如何，』才有改過遷善的希望與辦法。

二 論『中國本位』與民族性

二十四年一月十日，有十位教育界與出版界的領袖發表了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一月二十一日，他們又召集了一次『文化建設座談會。』 這是第一次，後來還陸續舉行過好幾次。 我們對於這個宣言大體上很贊同；對於座談會式的公開討論方法，也認為很有價值。一個民族，好比一個個人，不能沒有它的所由『立身』的道理；一個個人不妨作相當的孤高自賞，却不能完全遺世獨立，和別的人老死不相往來；一個個人應當和社會的其它部分發生種種相互的關係，却也不宜像一滴水掉在海裏一般，完全與環境混化；——一個民族也復如此。 所以所謂『中國本位』的理論，在原則上是誰都不會不贊成的。 不過『本位』二字，究竟有甚麼意義，它的內容究屬包含些甚麼，倒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 建設宣言裏固然已經加以解釋，但似乎祇說得六七成，並且連這六七成也沒有說得很清楚。 何以見得沒有說清楚呢？ 第一次的座談會

便是證據。座談會席上的議論原是根據了宣言的內容而來的，照理應該有相當可供尋繹的總線索，但事實並不如此。例如，劉湛恩先生一面看到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一面却也提出『基督教本位』的意見；歐元懷先生提出的是『科學化、標準化、普通化』的『三化原則』；俞寰澄先生主張以農村為本位；黎照寰先生也申說『科學化』的重要；葉青先生則主現代化；黃任之先生很看重中國舊有文化因素的分析與選擇；李浩然先生注意的是城鄉的平衡發展；陶百川、何西亞、謝兪三先生都主張以三民主義為最高的原則；邰爽秋先生又以為應特別注重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吳子敬先生特別提出紀律化與脚踏實地的兩點；李麥麥先生說『我們應接受歐化，應肯定的宣示資本主義的文化』……這第一次座談會的結果，似乎教我們對於『本位』二字的意義，越看越糊塗起來。許多發言人中間，有的就壓根兒沒有顧到它；有的把它和原則、標準等事物混為一談；有的似乎於中國的大本位之外，又提出了一些小本位來；有的並且發為和『本位』觀念根本上相衝突的議論。我們不禁要問，目前文化界的領袖對於『中國本位』的見解，既若是其紛紜歧異，前途的文化建設工作又怎樣着手呢？我們唯一的安慰是座談會多舉行幾次以後，大家集

愚廣益的結果，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共通的見地。

在這共通的見地沒有得到以前，我們不妨參加一些愚見。 可以分兩部分來說。 一是『中國本位』一名詞的意義。 二是它的內容或方面。

『本位』兩個字原是不難了解的。 物有本末，事有先後，明白得這一點，古人稱爲『近道。』以中國爲本位，是以中國的治安與發展爲先務。 本末也有主客的意思，所以本位也就等於主體。也有輕重的意思，所以本位所在就等於重心所寄。 也有中心與邊緣的意思，所以以中國爲本位就無異以中國爲中心，譯成英文是 Sino-centric；『中國』的稱號原有這個意思，但同時也養成了一種妄自誇大的心理， 今而後此種自大的心理應去，而自恃、自愛、自尊的態度却不能不培植。本末也有常變的意思。 中國是一個常數 (constant)，世界文化潮流的動盪終究祗是一些變數 (variables)。 我們決不能因變數的繁多，而忘却了常數的存在。 我們更應該以變的遷就常的；常的對於變的事物，雖宜乎不斷的選擇、吸收，以自求位育，但也不宜超越相當程度，使外界對於它的個性發生懷疑、錯認、甚至於根本不認識的危險。 本末也有體用的意思。 以前提倡『洋務』

時代張之洞『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兩句話，也不能說是全無道理，

至於『本位』的內容或方面，也可以比較具體的說一說。這其間實有三個方面或三個因素。一是我們個別的地理與物質環境；二是我們個別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組織；三是我們的也是比較個別的民族性格。眞要講中國本位，這三者便全都得認識。中國的地理與物質環境自有它的特殊之點，不能和別國的完全相提並論；以前大家總以爲我們地大物博，可以舉辦任何事業，創造任何格式的文化，但近年來地質學家再三告訴我們說，中國地雖大而物不博，農業經濟家又說，就可耕的面積而論，並且連地都並不很大——這便是一些關於第一種因素的本位上的認識。中國的歷史文化更有它的特殊之點，更不便和任何別的國家混爲一談。在以前講社會與文化改革的人，動輒主張把舊的全盤推翻，把新的從根再造，眞好像創造文化是和造屋一般的簡單容易；但近年以來，這種主張已不大聽見，大家已經逐漸明白一個民族的經驗，好比一個個人的閱歷與記憶，要完全不認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相宜的。這就是關於第二種因素的一些本位上的認識。

記得梁任公先生曾經說過一句比較自負的話，他說我們鬧了好多年的維新運動，別無成績，

總算把科舉推翻了。 我們今日看來，這便是一句不大認識歷史與文化本位的話。 後來美國孟祿博士在他的中國一個演化中的國家一書裏，認爲科舉取消得太快，弄得新舊教育制度與人才所由產生的機構青黃不能啣接，實在是一件遺憾。 孟祿博士這種見地，足徵他雖然是一個外國人，但是對於『中國本位』，却很有一些認識。 說也奇怪，就我們平日聽見與讀到的議論而言，這種『中國本位』的認識，倒往往是外國人表見得充分；大約是夾江觀火，特別來得清楚罷。 例子很多，最近也是最有力的一個便是國際教育調查團的報告。 在本國思想界裏，近來很不可多得的一例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民族自救的最後覺悟一書裏所發表的議論。

至於本位的第三個因素——民族性格，歷來談的人自然是更少。 在這方面不斷的作一些寒蟬之鳴的，恐怕祇有作者這樣的極少數的人了。 但民族性格這樣東西，無論我們把它當作一種後天的習慣看或先天的遺傳性看，終究是很實在的，並且它的個別性的顯著，也不在地理與歷史兩個因素之下。 依作者的愚見，並且以爲這種民族性不能全沒有先天的根據，這種根據一部分可以推源到民族所由組合而成的各個種族的原先有的特質，一部分乃是歷史期內自然淘汰

與文化選擇的產果。這一方面的話我們在下文準備細細的說，現在不贅。沈有乾先生在第二十四卷的教育雜誌裏發表了一篇中國民族性的一斑，報告他試用美國朋路透氏品性測驗法的結果；他所得的結論也許一時還不能認為定論，但也不能說與事實完全不切。只要與事實有五六成以上的符合，那就不容我們不注意。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無論是為好為歹，我們總不能不明白承認民族性格是本位中的一大因素。

我們在上文說文化建設宣言裏對於本位二字的解釋，似乎只說得六七成，並且連這六七成也沒有說得很明白，到此我們可以更具體的說幾句了。宣言在第三節『我們怎麼辦』下面，承認中國地域的特殊性和現在的時代性，主張不復古、不妄從——這些都表示發宣言的人對於上文所提的第一第二兩因素，已經有了一部分的認識。但是對於第三個我們認為是更根本的因素，便壓根兒沒有提過隻字。他們說『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又說，吸收歐美文化的標準，是『現代中國的需要』。不錯，我們有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但需要是一事，滿足此種需要的條件與能力又是一事，條件應求諸我們的個別的地理環境與文化背景，能力應求諸於我

們的民族性格。我們要科學，我們要組織，我們要工業化……那一件近代國家所由强大的法寶我們不要？但我們的條件與能力究竟能否滿足，和滿足到若何程度，大家却沒有問。不問能力與條件而祇談需要，結果等於不談；不問能力與條件而言文化建設，即使有些微成就，也决不能算做『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三　民族復興的先決問題

一個民族的形成，實際上和一個個人或一個家族沒有多大分別。誰都離不開三個因素，生物的遺傳、地理的環境、文化的遺業。這三個因素之中，遺傳最爲基本，其次是環境，又其次是文化。有人把這三個因素繪成一個兩等邊的三角形，兩等邊就分別代表環境與文化，第三條邊，畫得長些、粗些，算做底線，就等於遺傳。人文生物學者把這個三角叫做生命的三角。但這不過是就三個因素的本末輕重而論，若就三者之間的動的關係而論，則又可以繪成兩個簡單的圖案，一個像中文的叉字正寫，一個像叉字倒寫。生物遺傳的力量，應用到地理環境上去，便產生文化；遺傳越優越，環境越良好，文化便越發達——這種因果關係就可以用正寫的叉字來代表，叉字中交叉的兩條線代表遺傳與環境，上面的一橫就代表文化；交叉的兩條線越長，交叉之點越中正，文化的長處也就越多。同時地理的環境與文化的遺業，對於生物的遺傳，又不免發生選擇或淘汰的影響；

得法，遺傳的品質越來越高，不得法，便越來越降低——這種因果關係，便可以用倒寫的叉字來代表，叉線指環境與文化，横線指遺傳，它的部位恰好和在『生命的三角』裏的遺傳的部位一樣。環境和文化，當它們在遺傳身上發生選擇或淘汰作用的時候，彼此之間，自然也有交光互影的影響，所以也不妨繪作叉的形式。 這三個單簡的圖案是這樣的：



第一圖 第二圖 第三圖

一個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既然靠這三個因素，那末，一個民族的衰敗，以至於滅亡，或在將亡未亡之際，想加以挽救，我們便不能不就同一的因素去找尋所以敗亡的解釋或可能的挽救的方法

了。我們在三方面當然都得加以充分的檢討。我們的遺傳，在史期以內，有過甚麼變遷，受過一些甚麼淘汰與選擇的影響，這種影響究屬是好的多或壞的多。在地理方面，假定本來也是很好的，我們也要看發生過甚麼變化，這種變化是進步的還是退步的。我們原有的文化也許是很有創造的力量的，也是很能隨機應變的，但在史期以內，積極的創造是不是已經變做消極的守成，甚至於連守成都還有危險，原則上雖還主張通權達變，但事實上是不是已經變做一成不變。同時，甲因素的變遷，推本尋源起來，有幾分可以歸到乙，又有幾分可以歸到丙；變遷的結果，對於乙丙又發生了些甚麼新的影響；研究乙丙二因素的變遷的因果時，當然也應如法泡製。

中華民族在這個時候，說得嚴厲一些，是正在存亡絕續之交，說得輕淡一些，至少也可以教我們對於上文所說的三種因素的健全，發生一些疑問。自海禁大開，與東西洋各民族和他們的文化發生接觸以後，發為此種疑問的，也大有人在；最近十年以來，自從『民族復興』的論調開始以後，此種疑問更一天多似一天。但說也奇怪，據我個人耳目所及，這些疑問都是偏向三因素裏的一個。根據上文的說法，我們以為一個有過幾千年的歷史的民族，不發生健康程度或生存能力

的問題，則已否則此種問題決不會限於一二因素。要是地理的環境發生變化，便勢必至於因經濟的條件而影響文化，因選擇的關係而影響遺傳。文化與遺傳要發生變化的話，亦然。三個因素的關係，既如是其密切，要動其一而不搖其二，事實上是絕對不可能的。而是現在的種種疑問恰好是舉其一而遺其二。

檢閱十年來關於民族復興的議論，幾乎全都是偏在文化因素一方面的。大家總以爲民族目前的問題是一個文化失調的問題，所以學政治的就站在政治的立場說話，以爲祇要政治一上軌道，甚麼都會迎刃而解；學經濟的、學教育的、學科學的、甚而至於習藝術的、信宗教的，也都有他們的民族復興與民族出路的一番議論，各就各的專門學問說話，也各有各的「舍我其誰」的抱負。他們未嘗不承認以前的文化有種種缺點，但他們抵死也不承認此種文化的缺點，對於我們民族的生物的遺傳已經發生甚麼不良的影響。他們也未嘗不看見西北自然環境的一天比一天惡劣，但他們以爲此種惡劣的變化最多不過轉移了文化發展的重心與方向，至於遺傳的品質，是絕對和這種變化沒有關係的。一言以蔽之，在他們的心目中，民族的品質是絲毫不成問題的，民族

先天並沒有甚麼不健全的現象或問題的，祇是一個暫時的文化的失調（說詳上文第一章）。

這一類文化的解釋，這幾年以來，很有過一些試驗的機會。試驗而無效或效力不大，主張這種解釋的人便往往因戰略關係，退守第二道防線。這第二條防線便是人的自由意志。這種戰略是極古的，在中國人的經驗裏，最遲也可以推到孟子。孟子遇到他的理論有說不明白或行不通的地方，便說『不思而已，思則得之』『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一類的話，把責任向人的自由意志上推去。目前在文化方面發爲復興議論的人，到被人逼着問的時候，或自己因爲得不到效果，心理上覺得不耐煩的時候，也就走上這埋怨大家不努力或鼓勵大家加緊努力的最後一着棋子。

專就文化方面來推求民族所以不振的原因，和尋覓復興的路徑，雖失諸偏頗，失諸舍本逐末，至少還是根據因果律的認識的一種活動。但若一味仰仗大家的決心與努力，把責任移到各個人的自由意志上去，那就犯着連因果律都不懂的嫌疑了。一個不巴圖上進的青年，你一天到晚叮嚀他，告誡他，督責他，甚至於罵他自暴自棄，而不去研究他所以不巴圖上進的原因，並且從而幫同消除這種原因，你想你會收很大的效果麼？要是此種方法在一個個人身上不生效力，試問在

一個民族身上又曾生多大的效力。

但平心而論，復興的議論，三四十年來，已經不能說沒有相當的進步。 幾次吃了敗仗以後，大家纔感覺到復興的必要，但最初大家所認為必要的方式，不過是軍事的，稍後纔是政治的，再後是經濟的與實業的；這種方式的變遷，可以在歷屆留學生所習的科目裏看出來。 到了最近的幾年，尤其是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傳播出來以後，大家纔感覺得復興是一個整個的民族的問題，而決不是一二方面的補苴罅漏所能成事。 我說這是一種進步，一則因為大家的觀察的對象，已經從局部擴大為全部，二則因為民族這個概念比『國家』『社會』一類的概念都要來得基本，無論各人的法腦如何不同，它多少包含一些生物的意味。 『民族』的『族』字，終究是一個生物學的字。

一個明明富有生物涵義的概念，而大家討論起來，總不免把這種涵義擱在一邊——又是甚麼緣故呢？ 據我的推測，大約因為是下列的幾種誤解，誤解一去，問題的癥結自見：

一、大家根本不了解生物變異、遺傳、選擇與位育的道理；簡言之，就是生物演化的種種原則。

二、即使認識演化的原則，此種認識不是錯誤，便是不完全。例如，關於變異一端，以為變異大都是後天的現象，可因環境與教育的力量使比較的歸於一致。在遺傳方面，以為僅僅限於體格結構上的品性，而與生理的以及心理的品性全不相干。在選擇方面，以為祇有天然淘汰，而沒有文化或社會的選擇。最大的錯誤是以為天演的理論只適用於其它的生物，而不適用於文明的人類。

三、以為民族的生物遺傳是一種一成不變的事物。從這種錯誤的認識又往往發生兩個錯誤的推論：一是世界的民族既屬於同一的人類，它們在生物遺傳上不會有多大的分別，甚至於可以說是完全平等；二是民族的生物遺傳不能因外力而有所增損。

四、以為民族已經老大。一個已經老大的民族，至少在生物遺傳上是不能多所增益的。返老還童的手法，在個人身上還有問題，何況整個的民族呢。

對於這幾種誤解，作者目前祇預備在後面兩種上說幾句話。前面的兩種，生物學與演化論的教科書具在，大家儘可以參考，可以不必在此多贅。

第一，民族的生物遺傳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 又好比一家的人，這一代因爲婚姻選擇得法，產生的子女比較聰明，比較多才多藝，下一代也許誤聽媒人的話，配非其偶，引進了比較庸劣的血緣關係，子女也就庸劣起來。 一個民族又何嘗不如此？ 一時代以內，要是環境的勢力與文化的勢力對於善良優異的分子，能在婚姻與生產兩種歸根是生物的作用上加以將護、培植，以至積極的獎勵，這一時代的民族分子的品質，總算起來，當然要比不能這樣做的時代爲高，而文化發揚的程度也就隨之而高。 這是在任何民族的歷史裏可以看出來的一點，希臘羅馬之盛衰與亡、歐洲中古時代的黑暗、文藝的復興、西班牙民族的一蹶不振等等，那一樁沒有生物演化的理由存乎其間？ 文化與環境的勢力，自然都有它們的推進之功或摧殘之力，但此種種勢力一定得影響到了一個民族的選擇與淘汰作用，而後盛衰與亡之機乃見。 中國民族的經驗，又何嘗不如此？幾千年以來，民族雖沒有完全滅亡過，但是時代之間的盛衰，地域之間的興廢，是很尋常的事。 中國全般的文化生活，本是變化很多的，何以秦漢以後，變化便少？ 五代以後，更有越來越清一色的趨勢；創造的力量何以越來越逼窄？ 一千年前的秦、豫、魯、晉、和現在的秦、豫、魯、晉、相較，在文化的創

造上，何以會有天壤之別？ 北宋到明初的江西和現在的江西相較，又是怎樣？ 洪羊之亂以前的蘇州和今日的蘇州，何以也有判若兩地之概？ 揚州又如何？ 在答覆這些問題的時候，除了最普通的一些經濟與政治的解釋以外，難道絲毫不引起人才品質的問題麼？

根據上文所說的見地，我們也就不能不承認民族在創造文化的能力上，是不平等的。 在一時代以內，各有各的環境與文化的勢力，在選擇或淘汰方法，推的推，挽的挽，破壞的破壞，成就的成就而主持民族前途的人；對於此種勢力，即在今日最開明的西方民族，也不能有絲毫揀選與控制之力量——試問民族之間，怎會談得上平等兩個字。 不過同時我們也承認，民族雖不平等，而各有可以提高自己地位的能力，而提高的方法，端在對於上文所說的種種勢力，要能選擇，能控制。

民族生物的遺傳既然被誤認為一種比較一成不變的東西，於是常聽見人家否認民族的復興和生物遺傳有甚麼不可須臾離的關係。 他們以為近代意大利的統一、日本的勃興、歐戰以後土耳其的再造、德意志的重振旗鼓，都是些上好的例子。 他們問，這幾個民族的遺傳品性，在復興的前後，不是完全一樣麼？ 至少不是看不出甚麼變遷麼？ 但何以前後會判若兩個民族呢？ 不

錯，但第一我們要問他們根據甚麼理由來肯定它們的品質沒有變，第二要問表面上的不變是不是足以證明一個民族沒有潛在的應付新環境的能力。 即就日本的例子而論，我們相信日本是一個極有能力、極有所謂漸進的位育力的民族，它在史期以內的經驗，例如島居的生存競爭的劇烈、尚武的精神、階級制度的足以維持領袖人才與組織能力（詳見拙著德日民族性的比較的研究），都表示它在民族實力或元氣上，沒有經歷過多大的斲喪，它的漸進的位育力沒有受過淘汰的剝削，這種實力、元氣、或位育力，在舊環境裏不足以舒展的，一經加入新的環境，接受新的刺激，便立刻可以如火如荼的奮發有為起來。 日本的所以勃興，這就是我們根據一些生物遺傳的解釋了。 其實此種勃興的現象，在人類歷史裏是常有的事。 即就滿族入主中國的一例而論，我們的解釋正復相同，不管它在入關以前的民族品性有無變動，我們只知道它是一個經歷過良好的淘汰作用的民族，它有它的強大的位育力，所以入關前後，不但在武功方面表現它的威力，在文治方面也有驚人的速成的成績（詳見下文第三篇）。 但對於千餘年來的中華民族，這一類的話，我們就不大敢說。

第二，作者不承認中華民族是一個上了年紀的民族。胡適之先生某次在武漢大學演講，把中國民族比做一個老英雄，全部中國史比做一齣五幕劇。又有一位尤符赤先生替華年週刊做一篇稿子，把中國比做一個老祖母。通常大家說話，也喜歡用『老大』兩字。假若這老字所指的是歷史、是文化、是語言文字，那還可以，假若是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作者是比較能接受澳洲地理學家泰雷（Griffith Taylor）教授的人種分類方法的，所以認爲中華民族所由形成的若干種族，是出世得比較最遲，而年歲比較最輕的。在演化的過程裏，大凡出世得比較晚的，往往是位育力比較強的，春秋戰國以前，推而至於史前期的圓顱人在文化上的種種創獲，何莫非我們祖先位育力特強的一些表示？

所以作者以爲比較準確的看法，是把我們的民族當做一個發育不甚健全的青年。以年歲而論，我們至少是和斯拉夫各民族同年，比條頓各民族要小，比拉丁各民族更小。侵略我們比較最厲害的英日民族都比我們要老朽。但事實上它們是老而不朽，我們自己卻因爲發育上受了些打擊，在種種文化的表示上，已不免有老氣橫秋之概。總之，我們最多只能承認我們是一個少

老年，而不是眞老。

所謂發育上受的打擊，指的就是史期以內地理環境與文化遺業所產生的種種淘汰的影響。淘汰的影響，從自然的眼光看來，本來無所謂好壞，但是從人類包含價値觀念的眼光來看，就可以有很大的好壞的分別，而中國民族所受的似乎恰好是壞的居多，好的居少（詳見下文第三篇及第四篇及拙著人文史觀） 所謂民族元氣的斲喪，指的是同一的現象。

要是一個民族眞是上了年紀的話，它的前途當然是不會很大。但設祇是發育不全，祇是元氣上受了些磨折，那末前途便可以大有作爲。這在理論上固然如此，在實際上，我們就在今日，也還可以舉很好的一些例子。就國外而論，剛纔不是說英國民族已經很老大了麼？但是在它中間，也有比較不老大的部分，移到好一些的地理環境以後，就可以建立起一個美國、一半以上的加拿大、整個的澳大利亞、整個的紐西蘭。猶太人是沒有一定的國家的，但祇要元氣保存一天，淘汰的力量一天不向反選擇的方面走去，它的民族與民族文化也就一天不會消滅。就國內而論，客家人在兩廣與南洋的成績，江西人的開闢湖南，山東人的發展東三省，徽州人的維持江浙的文化，

那一樁不是民族實力與元氣的一些表示。只要這種實力沒有喪盡，即所剩不過一分二分，我們要復興民族，還是一樣的有把握。目前所最可以危懼的是：大家不了解民族演化的道理，不承認淘汰作用和民族品質的關係，看不見實力或元氣有暫時不及人家與不足以應付當前危局之處，從而於不知不覺之間，繼續的加以剝蝕與斲喪。假了文化建設之名，而行斲喪民族元氣之實，禍變的推移，那就眞不知伊於胡底了。

四　優生與民族健康

這個題目裏的三個名詞，似乎都應當先解釋一下。 優生一個名詞，本來是題目中的主腦，非解釋不可的。 民族與健康兩個名詞，雖極普通，但普通的解釋與站在優生立場的解釋，頗有不同，有時候並且竟會相反，所以也有說明的必要。

先說民族。 自孫中山先生提倡民族主義以後，民族一名詞的用途，日見其廣，近二三年來，所有以前種種救國運動的呼聲，全都一變而為民族復興的呼聲。 報紙上、雜誌上、演講壇上，大約最流行、最時髦的名詞要推民族這兩個字了。 但是民族這個名詞，究屬指的是甚麼東西，恐怕除了因為要教書而不能不講究的少數大學教授以外，誰也說不很明白。

有三個名詞是很容易相混的：一是國家，二是種族，三就是民族。 『國家』容易和『民族』相混，例如西文的 nation 一字，有人譯做國家，也有人譯做民族； nationalism 一字有人譯做國

家主義，也有人譯做民族主義，更有人把舊譯的兩個名詞併合起來，改譯做『國族主義。』『民族』容易和『種族』相混，因爲一個民族總有它的種族的成分，一個民族大抵由多個種族結合而成；也因爲同種族的人，因爲氣息相像，容易聚合在一個民族之下，而不願意分散在幾個民族之內。

其實這三個名詞是不難分別的。同是一種結合，國家是有政治、經濟、法律等意味的，種族是生物學與人類學的；民族却介乎二者之間。一個結合，在種族的成分上既有相當混同劃一的性質，而在語言、信仰、以及政法、經濟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過相當持久的合作的歷史——這樣一個結合，就是一個民族。

國家（政治……的）
種族（生物……的）
民族（政治的、生物的……）

這種分法雖然和普通政治學教科書上所說的有些出入，但似乎是比較清楚、比較不含混。

所以民族一個名詞，一半實在是生物學的。其實卽就字面而論，民字與族字，又何嘗不富有

生物的意味？ 尤其是族字，種族、氏族、家族一類的名詞，所看的結合全都以生物血緣做基礎。 但是說也奇怪，年來所見所聞的民族議論，百分之九十九是絕口不提這一方面的。 甲說民族復興，所說的祇是一些文化創造；乙說民族復興，所說的祇是一些經濟建設。 至於那些專以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思想做民族復興的口頭禪的，當然是更自鄶以下了。 總之，說來說去，總說不到民族的生物基礎。 我們現在要說的卻不能這樣的隨波逐流，我們認定：要不提民族兩個字則已，一經提到，我們便不由得不想到這兩個字的生物學的涵義。 這是我們對於民族一個名詞事前應有的解釋。

其次解釋健康二字。 這健康二字當然是和民族二字一樣的耳熟。 就運用的歷史而論，它比民族二字還要來得悠久。 那一個醫生不用到它？ 那一個賣新式藥品的店鋪不拿它做幌子？ 那一種提倡體育、提倡衛生的機關不把它挂在嘴上？ 但是我敢說，健康二字在今日不但也已經成一種口頭禪語，並且事實上大家也並沒有把它認識清楚、認識完全。

我們以為我們提倡體育、來鍛鍊身體，提倡衛生、來預防疾病，提倡醫學、來治療疾病——便已

經盡了健康的能事。 這樣一個認識就很不清楚，很不完全。 何以說不完全，不清楚呢？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說。 第一是我們僅僅注意到了生理上的健康，而幾乎完全忘掉了心理上的健康——這是不完全的說法。 第二是我們所口口聲聲講的健康，始終是個人的健康，而與民族的很不相干；我們不知道個人健康的總和並不等於民族健康。 這是不清楚的說法。

我們把我們自己和西洋各民族以至於日本民族相比，我們大都以為體格上很不健全，很不如人家。 但假若有人疑心到我們的聰明智慧，我們的意志情緒，我們其它的心理上的品格，在目前也不很健全，也有不如人家之處，怕誰也不肯承認，或至少誰也不認為這種疑心是值得加以推究而或許可以證明不是一種杞人的過慮。 其實呢，誰也知道健全的精神必得寓於健全的身體，要是大多數的分子身體上不很健全，大概精神上也多少不會全無問題。 而這裏所說的精神，當然是指心理生活的全部，包括智力的賢愚、意志的強弱、情緒的穩妥與否，一概在內。 要是有人把精神二字祇是看做做事的興會、勁道、或毅力，那就根本沒有懂得精神生活的全部。 就現狀而論，這種把精神生活看小了的人就不在少數，所以他們往往以為只要把大家的身體弄好以後，目前

很普遍的那種萎靡不振的精神，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民族分子，就可以減少。 我們却不這樣看，我們所認識的精神生活是廣義的，我們認為目前的健康問題不僅僅限於體格或生理一方面而已；我們深怕民族的智力、意志、情緒、以及全部人格的其它方面根本上都有幾分不健康之處。這樣一番對於健康的認識，我們認為是比較完全的。

健康自有它的生物學的基礎。 所謂生物學的基礎，不但指一時的生理或心理狀態，並且指比較永久的遺傳根性。 一個人身體的强弱，一半固然由於營養、攝生、與鍛鍊，但至少另一半是由於從前理學家所謂先天的氣質，或現代生物學家所稱道的遺傳。 遺傳而强，則加上相當的調攝訓練，健康的狀態便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遺傳而弱，則縱有多量的調攝訓練，結果也是徒然。 智力的高下、意志的剛柔、情緒的穩健與否，也是一樣。 假若有人以為多量教育、宗教、藝術一類努力的結果，可以使『雖愚必明，雖柔必强』，遲早他會發見即使不是一個失望，至少是一個奢望。 反過來，假若先有了良好的遺傳，然後再加上適度的教育的啓發以及其他文化勢力的薰陶浸潤，那末、心理的健康、以及由此種健康中所表見的種種才能、更由此種才能所發揮的各方面的文化事

業——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

上文所說個人健康和民族健康並不是一件事，到此就容易明白了。一個人呱呱墮地以後，甚至於在成胎以後，他的遺傳是早經決定了的。既經決定的遺傳性格，當然是不能再有所左右。到此，人力所能做的無非是就營養、訓練、教育等方面儘力的替他設法，明知這種設法，對某種人固然可以收很大的健康的效果，對另一種人也許是完全徒擲虛牝。質言之，個人健康的種種設施固然要緊，固然在所必有，但是成效是沒有把握的。民族健康的設施却不然。此種設施的目的在增加遺傳本質在身心兩面全都是健康的分子，它的方法並不是個人的教養，而是健康分子的選擇，說得細一些，就是多多的使健康分子能和健康分子婚配，因而多產生一些遺傳上就有健康的基礎的兒女。一樣是一種健康的設施，這却是很有些把握的。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假若我們真懂得民族健康的意義，那末，我們關於個人健康的設施，也可以減少不少的浪費。一個天分不很高的青年，我們就不必一定責成他進高中、進大學；一個肌肉組織不很健全的青年，就不必一定要他練習百米競走；而同時我們可以把他們所留下來的機會與設備交付給其它天分高些與

肌肉組織健全些的青年，這樣一來，不就可以減少不少精神、時間、與金錢上的浪費了麼？

不了解民族健康的精義，而一意孤行的做些個人健康的設施，結果不但是徒勞無功，並且還可以減低民族健康的程度。 這話說來似乎駭人聽聞。 但確乎是一個一經指點便可以明白的事實。 記得從前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外國老師問我，你們中國人的牙齒如何，我說，還不壞，至少我的老祖母到了八十歲還能吃乾炒的硬蠶豆。 他說，那自然很好，但以後怕也要退化了，不看見大批的外國牙科醫生和各式各樣的牙粉牙膏都向貴國那邊跑麼？ 這話不免太得罪牙科醫生和賣牙膏的商人，但他的本意是這樣的：牙齒的好壞也是一種遺傳的品性。 在以前，牙齒不好的人，在生存競爭裏，比牙齒好的人，總要多吃幾分虧，因而容易失敗；牙齒壞的人因失敗而相對的減少，牙齒好的人就因勝利而相對的增加，這樣，民族健康的程度，在牙齒一方面，不就提高了麼？ 牙科與齒牙衛生的講求，就個人健康的立場說，自然是極好，但若因它的姑息包庇而牙齒根本上便不健全的民族分子一代多似一代，鬧到一個人人非請教牙科醫生不可的田地，終究也未必是民族的福利能。 牙齒的健康，在全部的健康問題中，畢竟還是一個較小的節目。 個人健康的種種設

施，因爲根本不了解民族健康的意義，而引起的養癰貽患的局面，比這大的還多着咧。 有一大部分的慈善事業與教育事業，都可以用這種眼光來加以嚴厲的批評。

這便是我們對於健康一名詞的解釋。 這樣一個解釋，我們認爲比普通流行的要清楚，要不含混。

明白了民族是甚麼，更認識了健康是甚麼，我們對於優生這個名詞，便沒有詳細解釋的必要。優生就是民族健康或民族衞生；優生學就是研究民族健康的一門學問。 在德、奧、瑞士、荷蘭、瑞典、挪威等國家，優生與優生學等名詞就不通用，通用的是種族衞生與種族衞生學或民族衞生與民族衞生學，就因爲這個道理。

從事於優生學的人有幾個基本的見解。 第一、他承認人類是不齊的。 孟子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優生學者以爲人也是如此。 第二、他認爲這種不齊的現象有血緣的基礎，就是、是遺傳的。 品質良好的人大率會產生品質良好的子女，否則、便大率會產生品質不良好的子女。 所謂『大率，』所謂『會，』當然是指這類的因果關係有很大的或然性或蓋然性，而並不是必然的。

唯其遺傳是不齊一的，所以第三，他以爲民族健康的眞正有效的促進，應當求諸遺傳良好分子的選擇，使他們的數量可以相對的增加，與遺傳不良好分子的淘汰，使他們的數量可以相對的減少。講到選擇與淘汰，優生學者便不能不仰仗環境的力量了。 他盼望，不但盼望，並且要設法，來維持或創造適當的物質與文化環境，使優良健全的分子可以受到選擇，而不至於橫遭淘汰，不但要使他們自己各個個人可以維持於不敗，並且要把他們的血統從根培植起來，前者就是以前中國治譜學的人所稱的『保世』，後者就是『滋大』。 能夠使優良健全的血統『保世滋大』，便是盡了優生學的能事。 至於運用環境的淘汰的力量，使遺傳品性惡劣的分子，逐漸減少，畢竟還是一種次要的任務。 不了解優生學的人，往往說優生學者太看輕環境，太抹殺環境的勢力，可見不過是一種求全責備之論，而並不是事實。 優生學者不相信環境可以根本的轉移一個個人的品性，那是事實，但同時他相信環境可以借選擇與淘汰的手，來改變各色人品的數量上的分配。 這種選擇與淘汰的力量實在要比轉移個人品性的力量重要得多，正因爲它所引起的，不是零星的個人健康問題，而是整個的民族健康問題。 選擇得法，健康的程度就高，不得法，健康的程度就低。

本題討論到此，似乎也儘可以告個結束。名爲解釋題目裏的三個名詞，實際上我們已經把整個題目應有的筆墨，已經做到了一個盡頭，除非我們在題目裏再添上中國兩個字，成爲『優生與中國民族的健康。』

中國民族目前的健康情形，究竟如何，自然決不是立談之間可以答覆的一個問題。普通在報章上及講壇上所見聞的，大率不外下面這幾個見地。第一、民族並沒有甚麼病，就不過是年紀大些，所以不時要表見一些龍鍾老態。這種說法，究竟是一種文學的與修辭的呢，還是有客觀事實做依據的呢，我們就不得而知。假若論者認爲確有事實做依據，那末，問題就十分嚴重，比普通的不健康要嚴重得多，因爲不健康還可因營養與調攝之力，有轉變的希望，而返老還童卻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個人的返老還童，既不可能，民族自更不必說了。我們正不知那些認民族爲衰老的人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個見地是民族確乎不健全，確乎有病，但不過是一種後天失調，並不是先天不足，所以只要調養得宜，早晚會恢復常態；就體格而論，我們根本上並不柔弱，所以祇要體育發達、衛生知識與醫學事業普遍以後，便不難與東西洋各民族並駕齊驅；在心理與智力方面，我們

的氣質上也是毫無問題，所以只要一面能普及國民教育，一面能提倡人才教育，便很容易在文化方面將東西各國『迎頭趕上。』

我們以爲這兩個見地離開事實太遠。就它們所能引起的情操而論，第一個是過於悲觀，第二個是過於樂觀。我們所認識的是，中國民族並不衰老，不但不衰老，並且是尙在青年。英美各國有一部分新興的人類學家以爲現在的人類，是好幾個種族先後演化而成的；就目下有高級文化的幾個民族而論，大約要推造成拉丁民族的主要種族爲最老，其次便是那造成條頓民族的主要種族，再其次是造成斯拉夫民族的主要種族，這些種族散布得很廣，不過在歐洲一角便分別形成了拉丁、條頓、斯拉夫等民族。形成斯拉夫民族的主要種族又可以分做前後兩派，它們的散布大部跟於歐洲的東部及亞洲中西部。這後一派演化得最遲，所以散布的區域最狹，只有少數的民族裏有它，例如俄國與德國。中國民族原是許多種族先後累積混化而成的，其中固有些很老的種族，但同時和俄德等國一樣，也有年紀極青的種族（詳見泰雷教授所著環境與種族一書。）要是我們接受這種演化的看法，可知假定條頓民族是比較壯年的話，拉丁民族便已經漸漸的由

壯而老，而斯拉夫民族以及和斯拉夫民族有同樣的種族成分的中華民族便不能不算做青年了。我們有一批朋友大家編輯的一種週刊、叫做『華年』，就是根據了這層意思辦的。『華年』二字，一半就是『促華族達成年』那一個宗旨的縮寫。尙未達成年的一種民族，如何可以算老？

我們第二個認識是中國民族雖不衰老而確乎有許多不健全之處，並且這種不健全是有先天的因素的。換言之、我們的民族，在已往幾千年的早年發育期內，確乎受過一些不良的淘汰影響的磨折，所以元氣雖旺，病態亦多。要是及今不對症下藥元氣便不免要變本加厲的受斲喪，以至於無可挽救；不然、好比一個發育困難的青年，只要調護得宜，遲早不怕不會走上正常發育的途徑。這裏所說『對症下藥，』所說『調護，』當然不指僅僅以個人健康做對象的那些努力，例如目下正流行的教育制度經濟改革之類，而是一些自覺的合乎優生原理的選擇作用。

根據上文的見地，我們相信中國民族的健康狀態是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的。就歷史而論，我們以前當然有過比較一般的健康，不過此種健康，似乎到了秦漢以後，使告一個段落，到了五代以後，更有一種江河日下的趨勢。若就現狀而論，則所有的健康，便是片段的、零碎的，只限於全國的

少數地域，如太湖流域、錢塘江流域兩廣、湖南、東北三省等處。這當然不是說別處便沒有比較健全的民族分子，不過說在這些區域裏，比較健全的人比較要多一些罷了。不過就一般而論，終究不健全的狀態是常例，而健全的狀態是例外。所謂不健全的狀態，究竟指些甚麼，我以前曾經提出過四點，一是體格的柔靭化，二是科學頭腦的缺乏，三是組織能力的薄弱，四是自私自利心的畸形發展；詳見下文第四篇，現在不預備多說。至於已往的健康何以會變做今日的不健康，比較一般的健康何以會變為零星片段，只限於少數地域，換言之，即上文所提各種不健全的狀態究竟從何而來，我們的答覆，還是不出選擇作用或淘汰作用四個字。目前不健康的狀態是種種反優生的自然淘汰與文化淘汰所醞釀出來的。目前尚還留剩的一些健全的狀態，是一些比較合乎優生原理的自然選擇與文化選擇所維持下來的。至於這些淘汰與選擇作用是甚麼，下文第三篇裏便有一部分的交代。

我們對於上文的討論，假若能大體接受的話，那末我們應該提出的應付方法，是很顯然的。我們需要一些優生的學術，來把民族的健康，重新培養起來。說得更具體些，我們第一要了解民

族的健康狀態，在身心兩方面，究竟有多麼高的一個水平？第二、要推敲這水平是怎樣造成的？有多少是自然物質環境選擇與淘汰而成？又有多少是文化與歷史勢力的產果？第三、明白了解了這兩層以後，我們要進一步的設法控制這些自然環境與文化環境中的勢力，使它們活動的結果，對於民族健康的前途，都有輔翼之功，而無斲喪之害。第四、我們對於目前所接觸的西洋文化的各種勢力，也應當同樣的加以控制；切不可因爲羨慕新奇，與貪圖一時功利的緣故，把民族健康的遠大前途輕輕斷送。

第二篇　中國人的特性

五　活易死難的中國人

活易死難的中國人，就是容易活不容易死的中國人。容易活，指的是他的活力充盈，生氣蓬勃，雖在劫運重重、流亡顛沛之中，他照樣的可以維持生命。不容易死，並不是指他不肯死，中國人是很肯死的；乃是指死不下去，心雖肯死，以至於要死，而身體却抓住了生命，死也不放。這種特點確乎是自成一格，不容我們不加以討論。

這活易死難的特點可以分做四部分來說：一是中國人的生殖力；二是他的隨遇而安，到處可以適應；三是他的壽命延長；四是五勞七傷，諸虛百損後他的復元能力。（譯者按，這四點之中，第一點目前已經成爲家喻戶曉的事，至少『人口過剩』已經成爲開明分子的一種口頭禪語，我們

決計節去不譯，其餘三點酌譯如後。）

…………………

中國版圖很大，東西跨許多的經度，南北佔許多的緯度，所以在土質上、氣候上、物產的種類上，形形色色，應有的盡有，不應有的也盡有。就我們觀察所及，中國人似乎到處可以發達，在亞熱帶的地段可以，在亞寒帶的區域也行，至於這兩個地段中間，更不必說了。在各個區域之間，人口發達的程度固然有些區別，但這種區別的原因，決不在人口的活力有甚麼不同，而在各區域的物力大有不齊；要是物力太差，不足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那自然是不行的。換言之，就是中國人的適應力極大，幾乎是到處可以生長，可以繁殖。這在他們的海外移民運動裏也可以充分的看出來。海外移民以閩廣兩省的人爲多，這兩省的面積，就全國而論，實在是很小的一塊，但無論他們移到甚麼地方，他們總能夠應付裕如。印度、緬甸、暹邏、東印度羣島、太平洋羣島、澳洲、澳亞兩洲間的羣島、美國、西印度羣島、中美洲、南美洲——那一處沒有中國的僑民？又那一處他們不能安居樂業？我們到處和中國僑民接觸，從來沒有聽見過失敗的消息，或和地理環境調和不來的消息；

唯一聽得見的消息是他們適應得非常之快，非常之圓滿；他們又勤又儉，其程度要遠出土著人口之上。 他們的團結力也極可觀，任何外界的勢力不能拆散他們——結果是，土著的人口以及華族以外的人類都人人自危，都開始排斥中國人，到處吶喊着，『中國人非走不可。』 但我們替這種土著人口及一般的世界人口着想，以爲他們應當心平氣和一點，他們目前的際遇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要知就大體而論，中國人是不大喜歡移動的，所以大批的移民運動是不常見的事。 要不然的話，中國人口排山倒海般向外發展的結果，不說我們可以無立錐之地，怕所謂適者生存一類的大議論，也早就斯文掃地了。

關於中國人的壽命，我們因爲缺乏統計，只好說一些很普通的印象。 中國的老人極多，這是誰都可以觀察到的，或凡是到過中國內地觀光過的人大都可以承認的。 中國人講究敬長的道理，以前並且有過養老的制度，在民族的社會理想之中，壽字是最大的一個，並且可以說是第一個。 中國人別的事不求準確，不注重數量的表示，但對於壽算是一個例外，他們記載一個人的生年死月，不但從不遺漏，並且一定要把生卒的時辰都記載下來；這種精密的程度在西洋是沒有的。 傳

記碑版的文字、訃聞、神主一類死後的記錄，對於別的事實可以不詳，是大書特書的。〔有許多地方的方志和人家的家譜裏，往往特闢上的人名都登載進去；在南方各省，此種風氣更較普遍。〕（譯者有多大力量，我們尊重一種事物，大都因為它稀罕難得遇見；我們尊的人實在太少的緣故？）

在中國，百歲以上的人雖不大聽見，但是八九十歲的男女是到要是有人肯出來提倡，如同耆老會之類。老人之多，我們認為是民國，因為中國是一個異常窮苦的國家，營養方面往往異常欠缺；但雖也還有不少的人能活上七八十歲，雖非奇蹟，去奇蹟也就不遠。西不過是最近百年以內的事。百年以來，醫學的發達，衛生事業的進防病於未發之先，一推一挽，算是把我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不少。他們的生活狀況還是和哥侖布發見新大陸的年代沒有多大分別；

下而能有如許高壽的男女，也就很難能可貴了。 假以時日，衛生的設施逐漸傳播開來以後，中國人的壽命延長，一定是更未可限量。

中國人的不懂衛生，與懂而不肯在生活上實行，甚至於見別人實行而嗤之以鼻，是誰都知道的。 這樣的不講衛生，不明白自然生活的道理，甚至於與自然生活的原則背道而馳，而民族至今還能存在，沒有走上寂滅的路，在許多西洋人看來，是一個大啞謎。 中國人的疾病率和死亡率都極高，但此種高度並不是沒有限制，足證中國人的抵抗力極強、復元力極大。 惡劣的環境固然極容易教中國人死，而強大的抵抗力與復元力卻又竭力挽救他，不讓他死。 這是一種矛盾的局面，但在這矛盾的局面之中，中國民族就維持到了現在。

講起復元的力量，我們最好是有些統計來加以證明。 但可惜沒有。 我們只好根據西洋醫生的經驗說話。 中國醫學逐漸發達以後，我們希望有人每年把醫院報告裏的資料，分析歸納一下，尤其對於復元的速率要特別注意，我以為結果是一定很新奇可喜而能發人深省的。 但目前我們只能舉兩三個例子來證明這一點。 三個之中，兩個是作者自己所接觸到的，第三個則得諸

於天津某大醫院的報告。作者可以說這三個例子是眞正的例子，一個可以概許多個，而並不是特殊的。

幾年以前，我和一家中國人家在同一個院子裏住着。我的窗戶下面有一個很大的蜜蜂房，是土磚做的，下面有一個大洞，讓蜜蜂可以出入。有一天下午，窗外忽然發生一陣很慘痛的叫喊。推窗一看，原來同居的十四歲的孩子，不知道這是蜂房，把頭從底下的大洞裏伸了進去。這孩子的頭是雍得光光的，又紅又大，進去以後，還不知是反對他的侵略，還是看錯了當做一朵龐大的芍藥花，全房的蜜蜂便一擁而上，待得別人把他拖出來，已經是刺上三十來處。這孩子自然不免哭泣一場，但並不久，隨後就在炕上睡了。明天起來，腫也退了，痛也止了，還是那個又紅又大的光頭。不藥而愈，這要算是最痛快的一例了——當時的痛固然痛，復元的快也眞快！

一八七八那年，一個外國人家的車夫染上瘟熱病。許多人死了，他到第十三天上，也到達了危險時期，忽然之間他爬了起來，三四個人都幾乎捉他不住。到了晚上，守他的人把他綑在牀上，但一覺醒來，病人已不知去向。原來他自己把繩子鬆了，光着身子，往外就跑；一直跑到北京內城

的城根，中間也爬過樹，跳過九尺多高的牆，走過好幾里的地。待得找到他的時候，他的頭正在城牆下面的水閘的鐵柵欄裏，夾在兩條鐵條中間，不出不進。本來他自己早就要求過，要在護城河裏洗一個澡來退他的熱。他總算是如願以償，別人把他抬回來以後，熱當真退了，後來腳骨裏雖有些濕風痛，他終於復了原狀。

一個三十多歲的天津人，向以檢拾破銅爛鐵為業；他常在靶子場附近拾取用過的砲彈。有一次檢到一個比較完整的，正在敲取碎片的時候，把自己的左腿炸了。治好以後，他仍理舊業，六個月以後，又遇炸一次，左手、右臂、鼻梁、上唇右臉、眼梢、額角、右腕、右腿重的地方完全炸去，輕的地方也是深可見骨、血肉模糊。炸的時候沒有別人知道，所以這人就暈倒了四個鐘頭，在太陽裏曬着。後來有一個官員走過，才吩咐當差的把他抬到醫院，自己還伴送上好幾里路。但當差的抬至半路，便把他扔在一條溝裏。他出血雖多，餘力尚在，後來便慢慢的爬了出來，爬到五百碼以外的一家糧食店裏，把一隻裝米的筐子倒翻了，鑽在裏面將息。店主人為省麻煩起見，又教人把他抬到醫院，扔在門口。他神志很清，脈息雖微，還能和醫生談話。入院以後，經過良好，第五第六兩天有

些腹瀉，又發了一兩天的瘧疾，但此外別無變化，四星期以後，他裝上一條木腿出院了。這人原是一個抽大煙的人，抽煙的人而能復原得這樣快，更可以教人驚奇。

中國人既有此種天賦的能力，假若今後能減少天災人禍的種種痛苦，能注意到生理上的衞生，能有充分的營養，我們很相信，他們的發展眞是未可限量。

六 沒有『神經』的中國人

近代文明有一個很有意義的一方面，其意義所在可從『神經』一名詞的許多不同的用法裏找出來。『神經』（nervous）一字的原意是『富有神經，精神驍健，心理堅强。』 後來意義一變，到今日最通行的是『神經脆弱，神經有病，神經易受激刺，易受震撼。』 近年以來，神經病學的發展，神經病的名目的多而複雜，也已經成爲家喻戶曉的事。 我們常說這個人『有神經，』或那個人『有神經；』這樣一種『神經，』還是沒有的好。 近代文明無疑的是刺激力太强大，太容易引起神經上的變化。 有神經病的人，比起一百年前的光景來，不但絕對的增加，相對的也增加了。

這些話固然不錯，但我們目前所注意的倒並不是害甚麼特別的精神病的西洋人，而是一般的西洋人。 這些人的光景很有趣，說他們有病，倒也指不出甚麼病來，可是他們一天到晚總是記

掛着他們的神經系統，惟恐它出甚麼毛病。簡單的說，我們指的是一切『有神經』的人，你，假如你是一個西洋的讀者，也就在裏面。我們盎格羅撒克遜人，在這些地方當然會有一個解釋，以爲我們住的是一個蒸汽和電氣的世界，不是一個帆船和驢車的世界，世界不同，脾氣自不一樣。我們的是一個『動』的世界，以至於『趕』的世界。我們連吃飯都沒有功夫，我們的神經不斷的在緊漲狀態之中；所謂『有神經』便是生活極度緊漲的必然的結果。

在我們中間，做生意的人總有一種慌張與坐立不安的態度，好像老在期望着甚麼電報的來到，而此種電報會傳達甚麼噩耗似的。這種不自覺的心理狀態是到處可以在一言一動之間看出來的。說話好了，但同時我們總要揉手裏拿着的鉛筆。我們老在搓我們的手，好像當前有極重要的工作要幹而非全神貫注不可似的。轉頸子往後看，或左右看，也是極尋常的事，但我們轉的特別快，好像一隻野獸提防甚麼埋伏的危險似的。……我們連覺都睡不大穩，睡的時間也不及以前的長。極不相干的小事可以把我們驚醒，一聲鳥啼、一縷陽光、一扇窗的吹動、一件小東西的墜地，都可以教我們睡不着。「最有趣的一個故事是有一個『富有神經』的人晚上在公寓裏

睡覺上床之後聽見二層樓上有皮鞋落地作聲，一響以後，他以爲一定還有第二響，於是就睜着眼睛在枕上等着，讓第二響過去之後再入睡。這樣一等，就等到了天亮。後來發見那位二層樓的寓客是一隻腿的，壓根兒沒有第二隻鞋子！」

但中國人却不同。在中國，解剖屍體的事還很不普通，但就偶有過解剖經驗的人說，他們的神經系統似乎和西洋人的沒有甚麼重要的分別。不過，無論解剖學方面怎樣的大同小異，神經的部位怎樣的可以彼此對比，我們總覺得他們的神經決不能和我們的相提並論。

中國人的耐性最好。他可以在同一地位或同一狀態之下永久的耽着，而絲毫不露厭倦的神色。做文章罷，他可以做上一整天，像一個自動的機器人一般。做一種手藝罷，無論織布、鋸木、或打金箔子，總是從日出做到黃昏，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而不以爲單調。在以前，連小學生讀書也是如此，整天的關在學校裏，不許越雷池一步；西洋的小學生若受此種待遇，怕早就變瘋了。中國的嬰兒，也不比西洋的嬰兒，可以自由叫喊，自由活動，它在襁褓裏裹着像一支大蠟燭（江南人呼襁褓爲『蠟燭包』）在床上躺着像一個泥菩薩。會走路以後，也是整天的立着、坐着、蹲着，沒有

特別事故，決不動彈。

中國人的用不着運動，似乎是一個生理的事實。對外國人的愛好運動，他們總不十分了解。沒有目的地而平白的散散步，他們總以為有點無聊。至於拚了老命賽跑比球，他們尤其是覺得大惑不解。有一位廣東的老先生，看見一個外國女人打網球，事後遇見她的西崽，便問他說，『你的女主人這樣的為了一個小皮毬趕來趕去，弄得氣喘咻咻，人家到底給她多少錢呢？』西崽說這是沒有錢的，他只是搖頭不信。若是講玩耍，一個好好的人儘可以出錢雇上許多苦力來玩給他看，為甚麼偏要自己出馬弄一個筋疲力盡：這在中國人是很不了解的，給他解釋了也還是不明白。『聽說李鴻章出使外國，見人家打球，便提出過這樣一個疑問！』

在睡覺一件事上，中國人和西洋人也表現同樣的神經上的不同。大體說來，中國人是到處可以睡覺的。對於睡着的中國人，天坍下來也不在乎，不要說鞋子落地的聲響了。破磚可以做枕，高粱桿子可以做床，太陽儘管照耀，別人儘管說話，小孩子儘管吵鬧——他的一枕黃粱，照樣的可以進行，絕無妨礙。到了夏天，下午一兩點鐘的時候，有午睡的習慣的地方便會闔村的瞌起睡

來，好像冬眠的熊一般，天性發作，一個個倒頭便睡。……對於勞力的階級，不說睡的環境可以不拘，連睡的格式也可以通融。中國將來不免要實行徵兵的制度，徵兵的時候一定要用測驗的方法，假定以睡覺的本領做測驗的一種，而此種本領的一方面又規定爲睡覺的不拘形式，就是要在三輪並列的小車（一輪手車）的頂上橫睡，要能睡着，頭要倒掛，像一顆蜘蛛，嘴要脫開，蒼蠅可以自由出入——我以爲合格中選的人，少則百萬，多則千萬！

………………

中國人很不怕痛，也可以說是『沒有神經』的一種表示。這一點，凡是在醫院裏做過事的人都知道。中國人忍痛的本領是很普通的，幾乎是很普遍的；同一程度的痛苦，要在西洋人，也許早就暈倒，中國人却處之泰然。就這一點，我們資料甚多，可以發揮成一篇專門的稿子，但姑且不必能。英國的女小說家喬治藹利奧德 (George Eliot)，平生很討厭基督教神學裏所講的東西，也不喜歡牧師的嘮叨，有一次在她給人的信裏說『最高尚的職業或「選召」（基督教中通行的名詞，指一個人做傳道工作，是由於神的選召）是用不着鴉片一類的麻醉品做幫襯的，要有

甚麼痛苦，要能坦白的忍受，絲毫不減神志清明的程度。』 若是這話對，至少大多數的中國人便有此種本領。

英國的女詩人白朗寧夫人曾經說過，『沒有同情的觀察是教被觀察的人受罪。』 這話不但對這位女詩人很確，就是對她的同國同種的人也都適用。 一個西洋人不喜歡有人看他，尤其是在做甚麼細緻或困難一些的工作的時候。 中國人卻不然，似乎看的人越多，他便做得越高興。「走江湖的醫生，在廟會裏或市集上替人拔牙，去眼翳，治耳聾，總是一面治，一面演講，把病人當做表證的對象；圍着看熱鬧的人越多，他講得越是起勁；那病人也從不會說一個不字。」 一個外國人跑到內地，到一個村鎮，便會有許多人叢擁而至，把你圍住，跟着看一個教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中國人雖不打罵你，也不嘲笑你，但是不同情的兩隻眼睛瞪着你也夠教你急出瘋病來。 但這種洋人心理中國人是不懂的；他們自己可以儘管讓人看，他們不明白為甚麼別人不行。

西洋人睡覺的時候講清靜，害病的時候尤其是注意環境的安謐。 親戚、朋友、醫生、看護，都是戰戰兢兢的，唯恐有甚麼擾亂的事物來妨礙他的復原。 假若復原無望，他們自然是更來得小心

翼翼，到送終為止。中國人在這方面的習慣又恰恰相反。有人害病，消息一出去之後，親戚朋友便從各方面蜂擁而至，病越兇險，來的人越多。淸靜兩個字是誰也想不到的，似乎誰也覺得無此必要。望病的人正是多極了，熙來攘往，絡繹不絕；於是走動的聲音，開門關門的聲音，敘寒暄講病源的說話的聲音，深怕治不好而引起的咨嗟歎息與嗚咽哭泣的聲音，要是迷信的話，再加上和尚、尼姑、師娘、道士因為趕鬼而造作的種種吶喊與樂器的聲音——便通力合作的把病人早早的催進西方極樂世界去。我們不知中國的病人如何，也許因為『沒有神經』之故，可以消受得起，甚或竟會鬧出一些轉機來，但在西洋人處此境地，他只有一個念頭，就是速死，因為死才是解脫。以前法國有一位著名的婦人，教僕人對來拜訪她的客人說，『主人抱歉得很，不能延見，因為她正忙着死 (engaged in dying)。一般西洋人對這位法國婦人是很表同情的；一個人既『生於憂患，』至少也該『死於安樂』。但在中國，這樣的婉辭謝絕，主人既不會說，客人也不會接受。

一個生於憂患的人平日也總有不少的操心與厭煩的事。中國人生活很苦，論理這種經驗一定比別的民族要多。好幾天不下雨，或連上下好幾天雨，也許足以打斷一年的生計；打一次小

官司，或無辜的受人牽連，也許可以傾家蕩產。諸如此類的天災人禍，不但是時常遇見，並且你可以逆料它們來到，眼看它們一步一步的逼近；在中國人卻能處之泰然，行所無事，真有上文那位女小說家所說的『神明不亂』的一般光景。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民族性中最奇特的一種現象了。凡是目擊過中國荒年的景況的人都明白這現象究屬是甚麼。

無論我們用甚麼一種看法，中國人總是一個謎。要希望了解這個謎，我以為我們第一得明白承認中國人在天賦上有和我們極不相同的一點，就是『沒有神經，』不吃『神經過敏』的種種虧。在未來東西洋人的交際生活裏，這一個特點究竟會發生甚麼影響，我們目前還不敢逆料。但我們是多少相信適者生存的說法的。誰是適者，誰能生存，是『富有神經』的歐美人呢，還是不厭不倦，隨遇而安，痲木不仁的中國人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

七　耐性太好的中國人

耐性這個名詞包含三種不同的意義。第一，它有長期等待的意思，不抱怨，不發怒，不表示不滿意。第二，它有忍受的意思，處一種逆境，遇一種危難，能安之若素。第三，它也有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意思。無論用那一個意義來講，中國人的耐性之好，是一望而知的。我們這一番關於中國人的特性的討論，事實上不能不把各個特性分別描寫，但即如耐性這個特性，一經分別描寫，便有許多不方便之處。它是和許多別的特點分不大開的，例如和上文已經討論過的『沒有神經』和下文將要討論的『勤勞』及『不守時刻』等等。這三種特性都充分表現着中國人的耐性之大，尤其是『勤勞』這一點，中國人做起事來，真是不厭不倦。但中國人的耐性實在太大了，我們不能不有一次專門的討論。

中國人口稠密，生活的愁苦真是無以復加。演化論者所說的『生存競爭，』在中國是千真

萬確。要活命，就得『做活』，就得『做活計，』究屬能『做』甚麼『活，』就看各人掙扎的本領了。有人說得好，『窮困這樣東西在中國人的手裏，已經成為一種藝術。』這話眞是概乎言之。窮困的藝術有消極積極兩個方面，積極的是勤，消極的是儉。而勤與儉的所以成立，又端賴耐性，沒有耐性的人是勤儉不來的。（此處原文條理不大明顯，譯文酌改。）而這三種特點，中國人是全都具備，並且彼此能通力合作，生活越艱苦，合作的關係越牢不可破……。

中國人肯為很少的酬報，做很久的工作，因為酬報雖少，總比沒有報酬好。中國自己的古語說，『勤有功，』又說，『勤則不匱，』好像只要能勤，一人便可以發達。但幾千年來的實地經驗告訴他們，這是不確的。人口的密度，一方哩來上五六百人，任你勤勞到甚麼田地，也是發達不到那兒去的。西洋人說勤和儉是發財的兩隻手。這在中國也是不確的。既然不確，在別人也許要失望，自殺，為非作歹，犯上作亂，而中國人依然肯克勤克儉，工作雖多不厭，報酬雖少不嫌，這便足徵他的耐性之好。

有一次聽人說，美國格蘭脫總統（一八二二——一八八五）環遊世界以後，有人問他甚麼是

他此行最深刻的印象。 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說，是一個中國的小販和一個猶太人搶做買賣，竟然把猶太人趕跑了！ 格蘭脫總統這個印象眞是大有意義。 猶太人的耐性，也是極出名的，在西洋也許要首屈一指。 在商業場合裏，要一種賣買成功，或要和別人競賣，也端賴耐性這一點。 如今猶太人居然敗於中國人之手，可見他的耐性還稍遜一籌，有小巫遇大巫之感。 格氏所見這樣的中國人和猶太人，雖祇各有一個，但誰都可以相信這兩個人，都很可以代表他們的民族。

中國家族生活的祕訣是一個忍字，中國民族生活的祕訣也是一個忍字。 在這一點上，它比任何民族要强。 以前一個老童生，一直考到九十歲，不考中不止，不考死不止，非極有忍耐的人決做不到；我們除掉了忍耐的特性以外，也別無可以解釋的方法。 功名利祿一類的解釋是不中用的，試問九十大慶以後，卽使中上秀才，又怎麼樣？ 它又有幾年福氣可享？ 所以惟一的解釋是他出娘胎就有這種忍耐的稟賦；這是他的氣質的一部分，和麋鹿的善走，鷹隼的善視，完全可以相提並論。 麋鹿無不善走，鷹隼無不善視，中國人也無不善於忍耐，就是最不堪的叫化子也不是例外。店家的櫃臺以外，他是一個常來的不速之客，他雖然惹厭，但是他的耐性終於戰勝了店中人的耐

性，他的戰利品便是一個大鑊。

……………中國人這種特性，不但在私人的行爲裏可以瞧見，在國家的行政上也時常作露骨的表示。康熙是中國最有名的一個皇帝，他在位的長久，在中國史裏也要算做第一（一六六二——一七二三）。在他統治的年代內，恰好有一位漢族的海上英雄不服皇化，佔據了台灣，在閩粵沿岸各地大肆騷擾。此人就是鄭成功，因曾受明代賜姓，所以常叫做『國姓爺』。鄭氏勢力强大，清朝的戰船無法可施，於是康熙帝想出了一個消極的抵制方法，就是教沿海的居民向內地退後三十里，實行所謂堅壁清野的策略。這樣一道奇特的上諭居然發生了效力，民衆既一體遵令搬家，鄭成功也覺得沒趣，退到海外，把台灣從荷蘭人手裏搶了下來。清朝隨後又封他做『海澄公』從此使相安無事了好多年。西洋人讀中國史讀到這裏，總不免和「中國」一書的作者（Wells Williams）同樣的表示驚訝，以爲政府既有如許權力可以教幾百萬的民衆搬家，也該有力量編造一個艦隊，把鄭成功和她的嘍囉一鼓成擒。然而竟計不出此，計不出此而出之以消極的抵制，也足見耐性之大了。（譯者按此例不甚佳妙，且所敍史實亦不盡符合，鄭成功以康熙元年卒，與康

熙年代幾乎全不相干，此不符之點一；『海澄公』之命，漳泉惠潮四郡割讓之議，是順治十一年事，台灣之襲取是順治十八年事，此處頗有顚倒，此不符之點二。 詳見近人許浩基所作延平年譜。）

還有一個比較新鮮的例子，早年到中國來的西洋人大概都還記得。 左宗棠奉命平定回疆，關內肅清以後，左氏於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進駐關外的拔古牧地和哈密等處。 新疆僻處西陲，廣漠萬里，勞師遠行，當時誰都以爲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左氏爲軍需起見，曾向中外商人移借大量款項，當時在中國的西文報紙因此嘖嘖有煩言，一面譏誚中國政府，一面也嘲笑左氏的好大喜功。 但不到一年，左氏的軍隊便在天山南北兩路連續的打上許多勝仗，不停的向前推進，到有供養不足的地方便實行屯墾，到收穫以後再走。 這樣時而屯墾，時而進剿，五六年之內居然把整個的回疆平定了（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 左氏這件功績，在近代各國的歷史裏，是最可以驚人的一例。 而成功的秘訣還是在能忍耐這一點上。

有人說，要知道一個人的脾氣的好壞，最好是觀察他在飢渴、寒冷、或被大雨淋濕的時候，作何態度。 要是態度很安詳，『你再叫他穿上乾的暖的衣服，吃喝一個足飽，你就無異的找到了一個

天使。』 這話是很對的，英國人便是一個很好的反證，而正面的證據，再好沒有的是中國人。

作者有一次看見一百五十來個中國人，被請到某處去吃飯。 本來約的是上午十點，但因爲種種臨時發生的緣因，他們不但不能按時就席，並且還得幫主人的忙，來招呼另一批先到的人吃飯。 這些先到的客人，照着中國人吃飯的老規矩，又慢吞吞的不知吃了多少時候才完。 待得散席，而這批後至的人將要就席時，不知又有甚麼事故發生，又使他們等上好半天。 要是他們是英國人，或任何號稱基督教國家的人，他們的行爲是可以推想可知的。 第一步，他們臉上決不會好看；第二步，不免嘰哩咕嚕，賭神罰咒；第三步，也許要通過一些議案，向主人提出抗議；第四步，也許有人會向倫敦泰晤士報去信，每一段話的開頭，總要提一次『主筆先生』。 但是這一百五十個中國人卻完全不這麼辦，他們雖挨着大半天的餓，卻始終是一團和氣，再三的向主人說，不忙，不忙，遲早是一樣的！ 讀者試想一想，西洋文化雖高，在那一處那一次有過這種精神的表現呢？

……中國人遇到甚麼疾病，不但能忍耐，並且還能相安，這是更不容易的了。 有一個兩目失明的中國人去見一個外國醫生，打聽他的眼睛究竟有沒有希望治好，隨後又很簡單的加上

一句說，他所以問這一點，本來沒有甚麼很大的用意，不過是假若治不好的話，他也就可以安心不去管它了。 這在中國叫做『安命』，英文也有一個不常用的字叫做 resignation，安命和失望很不相同；這個瞎子並不失望，他不過是能逆來順受，能安於一種不幸的環境罷了。……中國人的一般的生活是很像這位瞎子的，他們大都是十分愁苦，天災人禍，時常連一接二的來，但是他們却不『愁』。 客觀方面有種種可愁的條件，但是主觀方面他却並沒有愁的反應；也可以說，正因為可愁的條件太多，才明白愁的反應的無濟於事；一經看穿，此種反應也許就不發生了。 愁的反應越少，便越見得中國人耐性的根深蒂固，和別的民族迴乎不同。



八　不求準確的中國人

一個初到中國的西洋人最先得到的印象是中國的一切是很千遍一律的。中國人的那副面孔便像一個模子裏出來的他們的衣服，除了藍色以外，似乎再也不用別的顏色……；以前他們有辮子的時候，張三和李四的辮子也像是一手打出來的，或者也可說，像一個豆莢裏出來的兩粒豌豆，一點沒有分別。但這位外國人要是住上三天五天，無論他的眼光多麼遲鈍，他也會明白，中國人的性格雖特別，方才那種千遍一律的特點却未便斷定。即就方言而論，我們的結論便適得其反；關於這一點我想誰都知道，不必細說。風俗習慣也是如此。最有趣的是，許多數量方面的標準也到處不同。這一類數量的標準，在我們西洋認爲絕對不可游移的，在中國却隨時可以發生變動。

西洋人最怕的是一樣東西有兩個標準。但中國人却似乎惟恐它沒有兩個標準。制錢可

以有幾種度量衡的制度也可以有幾個；在中國人都覺很自然，並沒有什麼可以反對之處。有一個賣肉包子的人在此，你問他一天能夠做多少包子，他的答覆是他能做一百斤麵粉的包子；至於這一百斤麵粉究竟能做多少包子，還得請你自己去猜。一個農夫有一頭牛，預備出賣，你問他這牛有多重，他說了一個很小的數目，再度追問之後，你才明白，他祇算了牛肉的分量，沒有把骨頭算進去。又有一個僕人，有人問他多高，他也說了一個很小的數目，比起他的真正的身材來，要小得多；一經追問，才知道他並沒有把肩膀以上的部分算進去。原來他以前當過兵，以前舊式的兵是都有輜重的責任的，每人在肩膀上要帶不少的東西；只要肩膀高大，便是一個好兵，肩膀以上，自然可以不問了！又有一個鄉下人，有人問他從他的村子到縣城有多遠，他說有九十里，其實這數目得打一個對折，鄉下人上城總是走的，他把來回的距離都算在裏面了。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

最漫無標準的一例是算錢的方法了。以前中國是用制錢的。計算起來是一律用十進的方法。這原是最方便的，但不知因為甚麼緣故，究竟多少制錢算一百文，卻是極不一律，行旅的人

不先打聽一下，使永遠無法知道。有的地方是一百個制錢作一百文，稱爲一吊，有的卻是九十九個、九十八個、九十六個、八十三個（例如在太原），最低的可以到三十三個，例如在以前直隸省的東部，這些全都可以算作一吊。這種地方上的變化眞可以說是太荒唐、太沒有交代了。以前中國人也常用銀塊，銀塊有一兩重的，但同樣一兩重的兩塊銀子卻從來不會一樣的重，除非是碰巧。不但甲地與乙地的『兩』不一樣，就在甲地一處往往有各式各樣的兩，一個行旅的人初到其地，直如入五里霧中，手足不知所措。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耳目聰明、心神不亂的自然祇有那些吃錢莊飯的人，惟有他們纔可以佔些便宜；最吃虧的自然是一些老實人，而這種老實人就在中國，也還不少。這種混亂的局面顯而易見是有作用的，但我們目前姑不具論。

在度、量、衡的方面，我們發見完全同樣的情形。例如一斗究有多大，便誰都說不上來。貪官污吏，在接受民衆完納的糧米的時候，往往借此上下其手，從中漁利；好在中國人是一個耐性好的民族，要在別國，革命也許早就起來了。有時候因爲紊亂得不可開交了，官廳方面便硬定下一個標準，例如官鹽名義上雖始終十六兩爲一斤，實際上卻只給十二兩；如此，官吏雖仍舊可以從中

漁利，而民間的爭端自息，因為他們的待遇既一樣，彼此之間，便不較長論短；雖然誰都喫了虧，但誰也沒有佔甚麼便宜。至於佔了便宜的官吏，他們也不去追問，他們說，這是貪官臟的『老規矩，』是一個『陋規』，雖則是『陋』，終究是一個『規，』既成為『規，』大家便應當承認，至少也應當眼開眼閉的讓它去就是了。地面的丈量也是一樣的混亂，一樣講『畝，』甲地的畝可以比乙地大至一倍。所以住在兩地交界處的人也許得預備兩種不同的丈量工具，否則便永遠弄不清楚。

一斤米，一斤棉花，自然都有一個價，但行旅的人，聽了一次價，最好不要把這價對別人講，尤其是對別處的人講；你先得把這斤弄一個清楚。議論一畝地出多少稻米或棉花，也是如此，你也先得把畝的範圍確定一下。一個行旅的人最關心的是路途的遠近；但也就是在這一點上他最得不到要領。他第一得問明白那地方所用的『里』是『大』里還是『小』里。中國的『里』自然是有相當的標準的，但習慣上這標準卻沒有多大用處，它不斷的在那裏伸縮。在官築的大路上，一里的長短和標準所規定的也許沒有多大出進，但一離開官路，進入鄉間的小路或山路，那里便越拉越長。要是在大路上一個人一天能走一百二十里，一到小路，他便只能走一百『里，』

若走山路，也許只能走八十『里』 原來中國人計算路的距離，似乎於絕對的長短以外，又加上一個原素，就是行走的方便不方便，方便則少算些，不方便則多算些。 例如上山，從山脚到山頂其實不到四十多里，但說來却有九十里之多。 講距離的時候，還有一種有趣的事實，就是從甲地到乙地的距離和從乙地到甲地的並不一樣！ 幾何學上說，假定兩個數量，各和一個第三個數量相等，這兩個數量自己亦必相等；這說法對中國人是不大適用的，除非於相等兩字之上，加上一個不字。 例如有一條縱貫南北的官道，中間有一段，從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從南到北會變做一百九十里。

和上文所說的相同的還有一種現象，就是『部分之和並不等於全體。』 這一點在水程上最分明。 你坐船到一處去，問明前程共有四十里，但一經分析：這四十里是兩個十八里湊成的；你再追問的時候，那舟子就會反問你說，『四個九不是四十麼？』 同樣的，他們也可以把三個十八當作六十，等等。 有一個送公文的官差，沒有能如期把公文送到，後來縣官盤問他的時候，他說全程六十里全都是『大里』，不是『小里』，所以沒有能趕到。 縣官也覺得有理，就派人把那條里

實地的丈量了一下，結果確定爲八十三里，以後大家就不說六十里了。（譯者按：此例應移至前面，放在此處，略嫌脫節。）

縣城外有許多村子，離城自一里至五六里不等，但這些村子往往都叫做『三里村』。一條一里長的路，兩旁沒有房屋是一里，一有房屋，也許會變做五里。這也是常有的事。

總結上文，中國的度、量、衡的標準，是很流動的，是幾乎人自爲政的。一支尺、一管秤，可以由街上的店鋪隨便做；店鋪裏做的時候，在尺上或秤上釘上許多銅的點子，叫做『星』，星與星的距離，往往隨買主的方便；買主定做的時候，也總要定上兩副，一副是買進用的，一副是賣出用的。

這種漫無標準、不求準確的特性，在中國人講起年齡的時候也可以看出來。中國人記算年齡，用一種『牲肖』的方法。你知道一個人『肖』甚麼或『屬』甚麼，你就可以很方便的知道他的年歲。但若不用『牲肖』的方法，說來便非常籠統。一個老頭說是『七八十歲』，其實呢，去年剛辦七十大慶，今年是七十一歲。在中國，似乎只要一個人一過七十歲，就成爲八十的樣子。……用十來總括的計算方法，在中國是一個牢不可破的習慣；它是一個『成數』，舉了一個成數

就行了。假定一個中國人看見一堆人看熱鬧，後來有人問他有多少人，他的答覆是無疑的，『一二十個、』『幾十個、』『好幾十個，』要他說得再準確一些，是不可能的。總之，要把一種東西或一堆人數一個清楚，報告一個確數，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事。講千講萬的時候也是如此，在萬以上，他們也就壓根兒不大管了。

一個朋友告訴我，有兩個人聽戲，前後化了二百吊錢；後來又補一句說，『一起用了一百七十三吊，但一百七十三吊不就是二百吊麼？』

……………………

中國人的家族團結力也往往是講求準確的一個障礙。有一位中國朋友要打官司，到我這裏來談起他的家世；他說他的籍貫是在一個村子裏，但照他的敍述，他實在是住在附郭的一條街上。一經細問，他承認他現在並不住在村子裏，在十九代以前他的祖宗確乎住在那裏的。我問他，『你現在究竟算不算城裏人？』他說『是的，但是老根却在那村子裏！』

……………………

中國人於『相同』與『相似』兩個概念之間，似乎是很不求甚解的。 西洋人講兩件東西是彼此 identical「這 identical」字中國便無法翻譯。 中國人思想的時候所依據的種種假定，似乎根本和我們西洋人的有些不同西洋人對於一事一物喜歡尋根究柢，對它的格式分量等等，要得到一個澈底的認識，中國人似乎根本沒有這種興趣。 何以外國人有這種興趣總是鍥而不舍的在那裏追求他也很不了解。 一個中國農人往往不知道他闔村共有多少人家，他根本也不想知道。 一個人吃飽了飯爲什麼一定要知道這些人家的數目，對於他總是一個謎。 一村之中，總有『好幾百家』就是了，究屬有多少家誰又說得定，古往今來反正這數目是老在加減的。

……………………

中國人以前的教育裏很不幸的沒有化學這一門。 要有的話，他們這種漫無標準不求準確的特性是不會維持到現在的。 我相信化學的智識一到中國以後，第一代的中國化學家，做混合物試驗的時候，總有因爲把『幾十粒』這樣和『幾十粒』那樣混合的結果，引起了劇烈的地震（爆炸）以至於以身相殉的。 但第二代以後就要好得多。 我相信中國人是極可以做細密的

工作的，他們的耐性也是做此種工作時的一大幫助。但就現狀而論，他們似乎是不懂甚麼叫做標準，怎樣才算準確…………。

九 『一寸陰是競』的中國人

今日西洋的文明國家都有一句俗諺，叫做『光陰就是金錢。』 近代生活和以前的生活不同，一切都是安排得異常緊湊，所以一個生意人一樣做事，一樣做那麼多事，或那麼多種類的事，以前不知要多少時間才能做完的，現在在所謂『寫字間』的辦公時間以內，也許一天就可以做完了。 他所以能這樣快，當然一部分靠蒸汽和電力，但蒸汽與電力之所以能爲我用，至少就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而論，是多少沾了民族特性的光的。 換言之，要是民族的性格上快不起來，蒸汽與電力還是無能爲力。 無論我們的祖宗的生活習慣怎樣，我們料想起來大約始終受那種迫不及待的氣魄驅遣着，所以一件事剛剛完畢，便急急忙忙的想做第二件事。

中國人卻不這樣。 即就日常請安問好一類的習慣而論，你便可以看出一些意味深長的分別來。 中國人見了任何熟人或半生不熟的人，總說『你喫了沒有？』 或客氣一點，『你用過沒

有？』用就是喫的代詞。蓋格羅撤克遜人卻問，『你幹些甚麼？』("How do you do?") 後者所認爲應有的常態是『做，』前所認爲應有的常態是『喫。』時間就是金錢的見解，在我們差不多已經習慣成自然，在理論上我們既已公認爲毫無疑問，在事實上卻也眞能做到，離開理想的鵠的只得一間；但是中國人和大多數的東方人一樣，卻毫不受此種見解的束縛。以前中國人的計時方法，一日之間只有十二時，這十二個時辰的名字，又並不專指那每兩個不同的時辰轉變時的一霎那，而是指那些時辰的全部。例如西洋鐘表上的一點鐘，便是指十二點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後的一轉瞬，但是中國的子時就要代表一晝夜的十二分之一。又如『午』的一個名詞，在西洋是很準確的，但在中國卻指着從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中間的一切時光。我們有一次親耳朵聽見一個中國人向另一個中國人發問，『月亮在中午的時候是甚麼時候？』這種問法，眞是越問越糊塗，但發問的人的意思是：『夜間月亮在子午綫上時是甚麼時候？』子午綫的翻譯名詞裏就免不掉那比較籠統的『午』字！

不但十二個時辰如此，一切指點時間的名稱也大都如此。例如『日出』與『日落』或『落

出，』在中國語言裏要算是很準確的了，但實用的時候，還是大有伸縮的餘地；再如『半夜』『黃昏，』就不知道究竟指着甚麼夜間的打更也是最靠不住的，比較最靠得住的是最後那一更，那時候天已明亮，譙樓上打更的人看光起鼓，就不由得不準確一點。 就是在城市裏，那五更的分法也不很確定、不很劃一的。 中國的『打更』和西洋的『表』在英文原是一個字，叫做 watch，但以前的中國祇有打更的 watch，而沒有表的 watch；就在現在，大多數的中國人還並不知道表是甚麼；就是那少數有表的人，即使把表每天掛在身上，天天開着，隔了些時還要拿到鐘表店去整理一下，他們平日的行徑，卻並不十分受它的支配；還有些人是開也不一定開着的，算身上或家裏，有一隻或幾隻表就是了。 至於買不起表的平民，只要天有太陽，他們可以在『旗杆』上看太陽的高度，一杆、兩杆、三杆……，他們便覺得心滿意足；但若天氣不好，非雲即雨，他們也可借了貓的眼睛，激它瞳人伸縮的程度，來測度時間的早晚；這樣得到的結果，也就大致不差，夠對付了。（譯者按，作者在此小有錯誤，他把日上三竿的竿誤作旗杆，古時以竿測日影，那竿也就叫做表，今日西式時計的所以稱表，也就出典於此。）

以前英國有一位富有幽默的牧師叫做斯密士（Sydney Smith）的，曾經把世界上的人分做兩大類，一類是洪水前期人（ante-deluvians）一類是洪水後期人（post-deluvians）。所謂洪水，自然是指猶太經典裏相傳的大洪水了。洪水後期人很早就發現人的壽算不再像洪水以前那麼動輒就是幾百歲甚至於差不多一千歲，所以他們就竭力把時間撙節，迫不及待的想在很短的時期以內做很多的事體，並且力求遷就當前的環境，做一天和尚，好好的撞他一天鐘。那洪水前期人卻不然，你很難教他們了解那天皇、地皇、人皇氏的日子是早就過去的了，他們的生活還是照着一萬八千歲的高壽去安排的。（譯者按作者在原文裏引的是猶太經典裏相傳下來的最長壽的人默蘇塞勒 Methuselah，今酌改為天皇氏等，取其多一點本地風光而已。）中國人怕都是洪水前期的人罷。

中國人總得算做『洪水前期的人』，我們還可以舉一些例子。一個在茶坊酒館裏說書的人會使你發生的第一個聯想，便是英國大詩人帖尼遜（Tennyson）的那首溪流（Brook）的詩。那首詩的末句說：『世人來復去，溪流無盡時；』這說書先生可以說，喝茶喝酒的人儘管來來往往

他說的書卻是永無結束的一日。 說書如此，演戲也是如此，一個戲班唱戲也許可以接連唱上好幾天。 但據說比起暹羅的戲班來還稍遜一籌；有人告訴我們，在那裏的連臺戲或軸子戲，有唱上兩個月不斷的，這個人說也奇怪，居然在兩月後，還活着把這消息遞給我們！ 中國變戲法的人，要是做得好，往往極巧妙極有趣，但有一點最要不得的，就是在變出一套戲法以前，搭擋的人總喜歡說許多打趣搭訕的話，你問我答的說一個不休，一個外國人到這種地方，往往不等戲法變出，早就懊悔不該降臨賞光的了。 尤其可怕的是中國的宴會，菜餚花樣之多，和上菜所費的時間的長，眞可以教一個身當其境的外國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但是在中國人看來，似乎是還嫌其費時太短。中國人有一句意味極深長的老話，叫做『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這句話可以說很確，也可以說很不確。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此種筵席的拖長也就够你想像，所以他們形容許久不了的一件事的時候，又常喜歡用『長筵挂席』的一個比喻。 這是確的說法。 一個外國人喫中國人的酒席，欲罷不能，能使卻不過情，眞有天地長久之感，他那時候就覺得天下雖無不散之筵席，至少當前的一席是一個例外！ 這是不很確的說法。

一個中國人從他幼年時代起，便習與性成，按照着洪水前期的計畫辦事。進學堂罷，他就進上一整天，從日出到日落，除了喫飯以外，真是一刻也不放鬆。這是歷代相傳下來的讀書上學的不二法門，此外還有沒有更經濟的時間上的安排，做師生的使誰也不管。說科舉考試罷，進考場的人總是夜以繼日的在場裏蜷伏着，連上好幾天不見天日；明明是一種極不合理的辦法，也是和一個人的學問的造詣極不相干的辦法，但是你要這樣告訴他們，他們無論如何不會相信。

中國的文字也根本是一種宜乎洪水前期生活的文字。你真要把它弄通，你非有天皇、地皇、人皇氏一類的壽命不可。以前有人說，倘若羅馬人的學習羅馬文，是出乎強制、而不是出乎自願的話，我們敢說他們也許就會一輩子一句話不說，一個字不寫，到現在也許就不會有羅馬的文獻存留在天壤間了！這話對於中國的文字，我們以爲一樣的適用。中國的歷史也是有洪水前期的性質的。它不但遠溯到盤古氏的開天闢地，並且好比一條大河，在他那又長、又彎曲、又低回遲滯的濁流裏，不但隱蓄着往古以來所生生不已的無量數的動植之物，並且還拖帶着不知多少的樹皮、草根、以及其他陳腐不堪的東西。除非是一個沒有時間限制的民族，我想誰都不必希望把

這一部歷史看完，至於想編這一部歷史，那就更不必癡心夢想了。惟有中國人，一壁既不受時間的限制，一壁又有那麽好的記憶力，才能够裝上『滿腹經綸』才可以『胸羅萬卷』。

中國人的光陰不算錢，也可以從他們的勞作裏看出來。在新式的建築術和包工制沒有通行以前，你也有過福氣在中國造一所房子麽；你有過以後，還想再有第二次麽？那些泥水匠和木匠，到工遲，放工早，在工作中間，又不斷的喝一碗茶，抽一口旱煙。他們要泥或調好的石灰，就用麻布袋到很遠的地方去搬，所搬的無幾，而走的路卻不少；他們往往連一輪的小車子都不屑用，要不然一人也可以做三人的事。但他們的目的既不在快，你也就很難責成他們一定要用車子。要是逢着雨天，那工作就會全部停頓。你若到場察看，你會發見，動作不能說不多，大家在那裏哪咻哪咻着，但是老不見有甚麽進步。一天的工作完畢以後，你真看不出來一大堆人究竟成就了多少。我們認識一個外國人因爲不滿意於木匠們刨木工作的遲鈍，便親自出馬工作，他在一頓飯的時候便做完了四個人在半天之中所能做完的工作。

在中國人看來，盎格羅撒克遜人的沒有耐性，眞是不可救藥。這種特點，在他們也認爲極不合理、極不容易解釋的。有人很有見地的說起過，中國人的反對我們品性中的這一點，好比我們反對他們的對人沒有誠意和虛與委蛇一樣。

總之，要教中國人明白辦事貴敏捷和待人接物貴守時的道理，並且從而加以培植，是不容易的。

我們知道有一次有一大包外洋來的郵件，在兩個祇差得三十多華里的市鎭中間的半路上，居然就擱上好幾天，惟一的原因是因爲那郵差的騾子受了一點感冒，經不起跋涉。中國的電政，雖『速於置郵而傳命』，聽說也有同樣的情形。（譯者按這是三十年前的情形，現在當然不再如此，不見那電政當局最近告某書局的那一狀麼？）

關於中國人時間不經濟的種種都說過了，但是還有最教外國人無可奈何的一點沒有說，那就是中國人的拜客。拜客這種行爲，在西洋是公認爲有種種限制的；時間的限制自然也是一個。但在中國，假若一個客人不預備在這家人家過夜，而主人也不請他當夜留宿的話，那客人的任務就得不厭不倦的把話講下去。普通的拜訪如此，拜訪外國人也是如此，拜訪的人從不理會這其

間有寶貴的光陰問題。 他可以坐上好幾點鐘，自己既沒有多少的話可說，又不與辭告別。 眞可以急死人！ 以前有一位牧師在他會客室裏貼上一條格言說，『凡是要見我的人也就是我所要見的人，』這無非是表示他好客之意；但假若他在中國住過，我信他一定會把這格言更改。 他在中國的經驗一多以後，我並且相信他會學另一位忙得不可開交的牧師，照樣在會客廳裏貼上另一句格言『願上帝保佑你，教你平安出門。』 有時候有要事而談，中國的客人也往往不肯（還不知不能）直截爽快的說出來，好像說了在精神上會發生甚麼創痛似的，所以他總是半天不作聲；外國人見了那種囁嚅趑趄的情狀，不要說一個就是十個，也難免不把無明孽火提將起來。 到後來那中國客人終於開口的時候，主人方才明白那一句老話『上山打虎易，要人開口難！』的眞義。 去世不久的那位麥鏗齊醫師 (Dr. Mackenzie)，生前辦一個醫院，每天來找他的中國人多極了；他們只來不去，把他服務的時間佔去了一大半；最後他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對他們說，『請坐，不要客氣；我還有些要緊的事，恕我不能奉陪。』 麥醫生眞是一個善解脫的人。 但還有一位比他更能解脫的外國人，他那時正請了一位中國先生教中國話，有一次先生講完了還坐着不走，他

一半認眞一半算練習他的中國話，說『開門！走出去！』那位先生雖對他發怔，但終於採取了三十六着中最上的一着。

一〇　勤勞的中國人

勤勞的定義是對於任何事業的不斷的認眞——或對於任何工作的持久的措意。　在這個環海棣通、大家講求『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時代裏，勤勞自然是最値錢的一種美德，也是到處可以受人尊敬的一種美德。

一個民族的勤勞，約略說來，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一個是長的，一個是寬的，一個是厚或深的。所謂長的一方面，指的是工作時間的久或暫。　所謂寬的方面，指的是在勤勞中的人手的多或寡。所謂深或厚的方面，指的是在『不斷的認眞』與『持久的措意』裏大家究竟花費上多少力量。這三方面綜合的得數便是一個民族的勤勞程度的全部。　在中國住久的外國人和偶爾在中國走馬看花的外國人，所得的印象往往未必相同，但是他們對於中國人那種夜以繼日、孜孜矻矻的精神，卻是誰都沒有說過一個不字。　一個初到中國的外國人，第一次睜開眼睛看見熙來攘往的

中國人，就立刻可以教他聯想到美以美宗派的老祖師約翰衞士萊 (John Wesley) 所立下的那條教會的成功寶訣，就是『大家一齊來，老是來 (All at it, always at it)』。 躲懶和浪蕩的現象在中國是不大看見的。每個人看去總像在那裏做一點事。 在中國當然也有闊人，此種闊人雖則像鳳毛麟角般的不可多得，至少他們是可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但是此種人往往深居簡出，在外國人是輕易瞧不見的。 但即就瞧得見的而論，中國的有錢人到是不大願意退休的，他們窮的時候做甚麼，闊了還是做甚麼，並且祇要精力不衰，做來還是一樣的認眞。

中國人把自己分成四等人物，士、農、工、商，叫做四民。 讓我們把他們分別的過眼一下，看他們的勤勞程度究竟如何。

先說士。 要教西洋人士對於中國舊式的教育制度（科舉制度）來表示幾分同情，我是誠知其不易的。 它有許多缺點，即在外行，輕易也不會放過。 但其中也有萬古常存、永不磨滅、不由人不注意，不理會的一點，那就是惟有眞能焚膏繼晷、矻矻窮年的人才能得到酬報。 賣官鬻爵一一類的事固然是時常有的，以常理而論，似乎也很足以教一班想從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心灰意懶；但

事實上却也並不如此。 從各省出來的消息總是說合資格的候補人員太多，而可以遞補的缺額太少。 全國的考場從最低級的到最高級的，總是那麼的擠滿了應考的士子，一次府試中參加的童生總要在一萬以上。 我們只要把這種應考人員每次赴試以前的預備功夫想像一下，就可以了然於中國人在理智方面的鍥而不舍了。 中國史上的那些用功的標準人物，如同三字經上所舉的『囊螢』『刺股』的兩位朋友，到如今還不知有多少人在那裏景仰着，模倣着，並且還模倣得很有幾分相像。 有許多人，一進了學或中了個把秀才以後，便頭起脚起，不再巴圖上進，但在一般中國人心目中，秀才實在算不得甚麼，好比一莖稻、一棵樹，只不過發了芽就是了，離開一個成熟的學問家還遠，真正的學問家還得向着那又狹、又崎嶇不平的前途邁進，一旦大功告成，大家才肯把榮譽歸給他。 試問除了中國以外，還在那一國裏，我們可以發見祖孫父子三代，在同一日子，在同一個考場上，獵取同樣的功名。 試問又有那一國裏，一個八十歲的老公公，經過一生的奮鬪以後，最後終於取得了一個秀才、一個舉人、甚至於一個進士。

每逢考試，場上總有幾位年高德劭的應試人員在考場上撐場面。 記得一八八九那年（光

緒十五年）的朝報就登載着戊子那一科裏這一類的材料。據福建巡撫的報告，在福州應試的秀才裏年在八十以上的有九個，在九十以上的有兩個；這十一個老頭兒不但三場完全考完，並且文理精通，筆跡挺秀（譯者按，這是外行的話，考舉人的卷子總是有人抄過的，考官所看見的並不是應考人自己的筆跡。）這位大員還加上一句說，凡是一個高年的應試的人，只要中了秀才滿六十年，而在這六十年中曾應鄉試三次，到第四次的時候，即使再不中式，皇上也照例可以賞他一個欽賜舉人。河南巡撫也奏報應試人員中年在八十以上者十三人，在九十以上者一人，這十四個人居然照樣的消受了那九整天的磨難，所做的文墨也是十分精到，絲毫不呈龍鍾的狀態。這已經是够教人拍案驚奇的了，但是安徽一省所呈報的還要駭人聽聞，據說在八十歲以上的多至三十五人，九十歲以上的多至十八人！中國人常說海外奇談，海外奇談，試問海外還有比海內這種奇談更大的奇談麽？（譯者按，蘇皖兩省的鄉試是一起的，都在南京，這數字也許代表兩省的，所以特別的多，也未可知。）

中國農人的終歲勤動，手足胼胝，比較起讀書人來，到也不相上下。農夫的工作，和管家的太

太一樣，年去年來，是永遠做不完的。 就我所常見的北方的幾省而論，除了冬令中間的一小時期以外，他是沒有一天眞正的閒着的，不但閒着，並且有許多事體要做。 這種情形當然在別國也是大致相彷的，但是中國農夫的『勤藝勤種』怕很不容易找到一國對手。

中國的工人也未嘗不如此，並且那種毫不放鬆的程度，還要見得厲害。 工人不比農人，不能靠甚麼天惠，一日不做，便一日不吃，所以除了鎮日價的把一條老命來拚着以外，再也沒有維持生活的方法。 工人尋找工作，好比農夫在田間捉蝗蝻、去野草一樣，農人不厭瑣碎的把大批的害蟲和亂草一個一個的、一莖一莖的從泥裏搜剔出來，工人也是『不辭汗君不羞小官』的把項細微的差使接受下來，只要可以餬一口，圖一飽，他是無有不做的，假若所可糊者不止一口，而是全家的大小，那他自然是更加樂於應命，唯力是視了……。

我們又時常可以遇見很窮苦的人，隨着時令的變遷，兼營兩種不同而先後可以接筍的行業。例如天津的船戶，一到冬令，河水結冰，便改趕又便宜又輕快的冰撬。 又有許多的農戶在農作的餘閒，或做草帽，或結花邊；「到了現在，此種作物已經成爲重要的出口貨品」。 中國舊式的女子，

不管在家看孩子也罷，在門口看風光也罷，或在隔壁人家說長論短也罷，手裏總是拿着一隻碎布鋪成的鞋底，不斷的一針一針的穿着穿一針，收一把，越收得緊，作成的鞋底越來得硬，穿起來越是耐用；這在南方叫做『紮脚底』。要不然，也許就坐在家裏不停的紡紗。總之，閒着她們是不的。

士人的皓首窮經，工農的終歲勤動，又恰好配上商人的孳孳爲利，錙銖不遺。一個商店裏的夥計，就在西方也不能說是一個掛名差使，但是比起中國的夥計來，已經是要算能夠享清福的了。中國商店夥計的工作是永世做不完的。假期既然不多，責任又極繁重；但同時我們承認他們有特別忙的時候，也有鎮日價呆呆的像木瓜一般坐着不動的時候。

中國的店鋪開得早，關得遲。它們的流水賬簿雖也採用普通支出與收入的雙欄方法，但是記載得異常仔細，所以管賬先生一定要到很深的夜分才能夠把一天的賬結清。甚麼事都做完的時候，店夥們還得把一天收入的青銅錢，逐一檢點，看有值錢的古錢沒有，檢到了又可以替東家賺一些外快。

…………………………

上面說的大都是屬勤勞的寬的方面，如今再提一提長的方面。中國人動稱『一日之計在於寅，』所以他們的『日』要比西洋的開始得早，往往天還沒有亮，甚或夜尙未央，他們已經在那裏準備勞作。以前的皇帝上朝的時候，總是東方還沒有發白；西方的君臣上下那時還在黑甜鄉裏咧！對於西洋人，這是中國人生活中最莫明其妙的一點，但是中國人自己却以爲是最自然不過的……普通的平民生活也未嘗不如此。廣東的銅匠、福州的馬口鐵匠、寧波的雕刻工人、上海的碾米工人、北方的軋棉花和篩麵粉的苦力，都是晚上停工得很遲，白天開工得極早，早得駭人聽聞。天還沒有顯出一分魚肚般的白色，鄉下人已經絡繹不絕的到城裏去，有走十里八里的，有走三四里的，走到了黑暗中就在城門口或街頭巷尾等着，好一到天亮、可以出賣他們挑出來的蘿蔔白菜之類。大約到西洋人把早飯吃完的時候，他們的市面也差不多快要完了。你要有機會，揀一個夏天的淸早大約五點半鐘的光景，到上海的大街上溜得溜得，你就可以發見一個極有意義的東西洋人的對照來。那目空一切、皇帝不是他對手的歐洲人，雖則在外灘江邊造上些皇宮一般的辦公房子，在這時候是連影兒都找不到半個的，但是亞洲人呢，却已經是全體出馬，並且已

經登場了很久。一定還得過好幾個鐘頭，你才可以看見西洋人在馬路兩旁的人行道上旁若無人的直闖；等到他們在寫字間裏坐定的時候，中國人一天的工作已經十去其五了。

約翰戴維斯爵士（Sir John Davis）說得很對，中國人的勞作真是一種樂天的勞作，這種勞作也足徵以前的中國政府確乎能夠教人人安居樂業，實現那知足常樂的理想。這一點是中國民族特性的最彰明較著的一點，要懂得它，非有長期的觀察和細心的揣摩體會不可。

最後我們說一說中國人勤勞的深厚的程度。中國人終究不失為亞洲人，亞洲人做事的時候，總有那種不慌不忙的情形。中國民族確也是一個極有血氣和魄力的民族，但你却不能教他們照我們西洋人的樣子，根本改造一下。從我們的眼光看去，他們做事的時候確乎缺少那種一氣呵成的熱誠與毅力。一個盎格羅撒克遜人，就是沒有聖經上的教義的督促，也知道用全心全力來做手頭可做的事，但是拖上一個中國人，你就是拚了死也不能改變他的脚步的快慢，就是把一切宗教與哲學的力量像天羅地網一般的罩將下來，他也還是神色不動的維持他的原有的步伐。幾千年的經驗已經告訴他這種活命的方式畢竟是最有出息的方式；和希拉詩人荷馬詩中

的神道一樣，中國人是永遠的不慌不忙的。他牢牢記着他的聖人所教的『欲速則不達』和『其進銳者其退速』的兩句話。

猶太王蘇羅門說，唯有勤勞才能致富，此言果確，中國民族應該是世間最富有的一個民族了。我們也相信中國民族眞會有富强的一日；要是他們於勤勞的一種美德之上，再很穩當的配上許多其他的美德，這日子反正也是不遠的。可惜中國人祇是口口聲聲的講要誠實，要廉潔，要懇摯……而實際上總是只說不做。我敢斷言這些旁的美德都能從理論變做事實的一天，也就是中國人可以十足收取勤勞的効果的一天。

一一 撙節的中國人

『撙節』這二個字代表着維持家庭秩序的一條規矩；它尤其是注意到家庭生計裏出納或收支之間應該有甚麼一種關係。 我們西洋人所稱的撙節，大約有三種表現的方法：一是減少慾望，二是禁止浪費，三是加上一些張羅的功夫使很少的一些東西見得很多。 在這三方面中國人都有驚人的成績。

一個旅行中國的西洋人，在這方面第一件注意到的事是他們飲食的異常簡單。 偌大人口的一大部分所靠着過活的，不過是指頭上數得出的幾件東西，米呀、小米呀、魚呀、菜蔬呀、以及他們所說的『豆腐家門』。 這些，再加上幾樣別的東西，就是成千成萬中國人的活命的糧食了，除非間或掽上甚麼節氣或其他特別有勝會的日子，肉類是瞧不大見的。

近年以來，西洋人既忙着用種種方法可以教窮人享用些又便宜又有滋養力的東西，我們不

妨拿它來和中國情形約略比較的觀察一下。在平常的年成，中國並不缺少吃的東西；一個成年人，每天只要花上兩分錢，便可以得到很合衛生的幾頓飯。就在荒年的時候，最多只要有值一分半錢的東西就够保全一個人的生命，在以往，上千上萬的人便是這樣保全了的。這一類的事實可以教我們推想到中國人對於食品的製備是很有本領的。他們喫的東西也許往往很粗，也許淡而無味，用外國人的眼光看來，甚至於可以教人作噁，但同時我們還得承認在烹調和菜餚的支配與張羅上面，他們終究是老資格的行家。講起這一點，有一位戈克先生曾經下過一個評語，他說除了法國以外，中國要算第一，英國實居第三。（其實戈先生可以把美國和英國相提並論）中國人的烹調術是否在法國或他國之下，我們却不敢像戈先生那般肯定的說；但它一定在英美和他國之上，我們是可以斷言的。卽就我們上文所提的幾種簡單和常川的食物而論，顯而易見他們的選擇是很聰明的，就是請一位科學的生理學家來評判，他也一定首肯。至於準備的充分，烹調方法的變化無窮，例如廣東人喜歡吃的『一雞三味』之類，是略知中國烹調術的人都知道，無須我們多說的。

在食事方面，還有一點極有意義的事實，也是無煩推究便可證明的。這事實就是沒有浪籍。凡是派到用處的東西都是十足的派到，決不讓一分落空。通常中國人家吃一頓飯，那可眞吃；碗底裏面留剩下來的那一點底脚眞是所謂『不足挂齒』的那一點。否則決不會留剩。要證明這一層，我們但須向他們豢養的貓或狗，冷眼裏看一下。這些『阿咪』『阿六』之類眞是可憐，它們平日祇靠桌上和碗底的殘餘過『活，』結果，它們的生命也就變做一種半生不死有氣無力的殘餘東西。新興國家的人口是出名的浪費的，所以我們相信他們——好比美國罷，一天之中所浪籍與糟蹋的東西，便很够養活六千萬個亞洲人，不但够養活，並且够教他們享福。但是，反過來，中國人『喫飽』以後，那一頓飯的剩餘，經僕人們一再搜刮以後，還可以養活多少人，甚至於教他們發胖，那却是一個大大的問題了！就說茶碗裏剩下的茶罷，還得歸在茶弔子裏，煑熟了再喝。

還有一樁我們隨時隨地不由得不注意的事實。就是，西洋人吃東西時候的那種揀精揀肥和吹毛求疵，在中國人的天才裏是找不到的。南方的中國人有兩句俗話，一句叫做『搭勒籃裏就是菜，』又一句叫做『叫化子搭死蟹，隻隻好。』這兩句話最足以代表這種天才的缺乏。在

中國的北方死了的馬呀、驢呀、騾呀、閹過的牛呀，都要派到用處，甚而至於駱駝也要盡它那一點最後的責任。讀者中間一定有人以爲這未免撙節得太不成話了。但這確乎是事實，這些畜生們一口氣斷了以後，不管它斷氣的理由是病，是老，是遇了險，普通的收拾乾淨的方法總是『肚葬。』這是很尋常的事，誰都不會說什麼話的，就是有時候那牲口是因爲瘟疫死的，例如胸膜肺炎所造成的牛瘟之類，還是照樣的宰，賣，喫。瘟牛的肉沒有因別種毛病而死的牛肉那般乾淨，大家是承認的，所以賣價要比較便宜；但誰都照樣買，照樣吃。瘟牛的肉到了肚子裏，也許要鬧亂子，也是誰都了解的，但這種肉終究便宜，與其空着肚子不吃，不如挺着肚子吃它一飽，讓亂子來再說。但說也奇怪，眞正出亂子的例子倒也不多。死貓死狗之類的歸宿也和死馬、死騾、死駱駝一樣。我們自己知道的便有好幾個例。鄉下人討厭一條狗，便用木鼈子先把它藥死，然後煑了大嚼。有一次有一個人忽然腹智心靈，要向附近的洋醫生問問有沒有危險，但那狗已經下了鍋，香噴噴的，大家食指一動，誰也不肯放手，所以終於吃了，結果到也沒有甚麼！

中國人不但喫法經濟，煑法也是經濟。例如煎水罷，那水壺的安排和燃料的分配，是一件很

精緻的勾當。在中國，燃料是一種名貴的東西，通常用的無非是一些樹葉子、草根、豆萁、與花萁之類，經不得一把火，就完了。因此，那壺子或鍋子的底要越薄越好，煮的時候也得特別的留心，稍一大意，那水也許永遠不會熟。同時，燃料的搜刮也就成爲一大經濟的活動，在中國產業史上是可以大書特書的。一個做不了別的事的小孩子，起碼檢柴火是會的。所以一到秋冬兩季，我們便可以看見大隊的人馬，開始他們的清鄉運動，眞是竹耙到處，片葉不留！有樹的地方，又有大批孩子，用了竿子把樹葉子打落，那興致和勁兒竟和打落栗子一般無二。拾荒的人來到以後，你休想借了一莖枯草，看看今天的風是向那兒吹的。

每一個中國家庭的主婦都知道十足利用一種材料。做衣服罷，那式樣和裁法，自然是不像西洋女子的衣服一般，要有很大的浪費。她的唯一的目的是在省時間，省精力，省材料。中國女子拿到了一些外國的料子，不管多麼小的一塊，她總有一些法子給它一些剪裁，拚湊，轉眼成爲一種新的點綴品，雖未必美觀，却總有用處。這種廣大的神通，我們敢說那些整天在談『家庭經濟』西洋女學士們連夢裏都沒有做到過。在中國女子手裏，凡是在某一處沒有用的東西，在別一個

所在一定會恰好找到它的用處；一小塊剪剩的布角，起碼可以拿來鋪鞋底。 一個倫敦或紐約的做好事的人，當他把不用的衣服送人的時候，心裏老不放心，深怕把人家當做化子看待。 但是我們敢大膽的說，要是他把這衣服送給中國人，無論材料與剪裁怎樣和中國的不一樣，他很可以死心塌地的安慰自己說，他那件衣服，到了今天，才算真正的找到了用途，並且只要有半絲半縷存在，可以做和別的東西發生關係的張本，那用途是沒有盡期的。

中國人時常寫了對子送給人家。 那對子一面是綢或絹的，一面是紙的，那字自然寫在紙上。但紙和綢並不是黏着的，而是輕輕的縫上的，所以，到了不再用的時候，接受對子的人儘可以將紙的一面剝下，剩下的一幅綢子便又可以派用處！

中國人的撙節又可以從小本經紀的商人身上看出來，對於這種商人，天下就根本沒有小到一個不值得注意的地步的東西。 例如一個雜貨鋪裏的老闆罷，他可以告訴你每一種火柴每盒裏有多少根，他並且知道在每一盒上他可以賺一個小錢的幾分之幾。 他買一百張一塊的錫箔，你要是有功夫去數的話，你祇能够找到九十六張，甚至於八十幾張！ 草紙也是如此。

中國店鋪裏用過的賬簿無論整張零塊，總有希望派作糊窗或糊燈籠之用，也有翻轉了再用的。信封也是如此。

中國人因爲太講撙節，有時候連挨餓都在所不惜。這是常有的事，他們並不覺得有甚麼不合理的地方。亨利博士在他那本十字架與龍的書裏就舉過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有一次從廣州坐轎子出發到別處，三個轎夫擡了他五個鐘頭，足足走了七十里地，他們動身的時候，並沒有吃早飯，等到到了，也不預備留下喫午飯，却願意回到廣州吃那一頓他們分有應得的早飯。你想，走了兩個半天兩個七十里路，前半的路程裏還擡着一個人，肚裏却始終是空的，爲的是要省五個小錢。

又有一次，兩個轎夫擡他走了一百零幾里路，送到之後，他們坐船回去，從一清早六點起到後來上船，他們一點東西也沒有喫。其實每人只要化三個小錢就可以吃兩大碗白米飯，不巧那船又擱了淺，到了第二天下午兩點鐘才到廣州。擡了一百多里路，挨了二十七點鐘的餓以後，他們還向亨利博士拉生意，想擡他進城，原來船停的地方離城還有四十多里，後來因爲亨利博士行李太多，要不然那生意經怕早就給他們做成了咧！

中國人撙節的結果，也有許多西洋人覺得很討厭的；但其同爲撙節的眞實表示，我們却不能否認。

全國有許多地方（說也奇怪）尤其在北方，我們看見男女孩童在街頭巷尾流浪着的光景，我們就立刻聯想到當初伊甸園裏的太平盛世。一年四季之中，這種光景要佔到很大的一部分。

據說這樣他們才覺得舒服，其實最初的動機還不脫撙節。那許多一個輪子的小車爲甚麼嘰嘰咔咔的應天響的叫着？還不是因爲少兩三滴油麼？但是對於得天獨厚神經不脆弱的中國人，聽那嘰嘰咔咔的怪聲終究要比買油省事。

一個日本工人出洋的時候，契約上一定要注明他每天得享用多少加侖的熱水，讓他好在裏面蒸一個半熟，像在本國一樣。中國人自然也有他們的澡堂，但大多數是從來不去問津的。有的連見都沒有見過。一個多事的外國婦人問一個中國母親說，『你每天替你的孩子洗澡麼？』那母親很氣憤的回答說，『每天洗澡！他出娘胎就沒有洗過。』西洋賣肥皂的客人，歡喜喊一句口號，說『比土還便宜』，這句口號，我們敢說，在中國就不發生效力。

有人說，意大利人把英國人看作專門浪費肥皂的人，我們以爲中國人看我們，不免有同樣的

感想。中國人未嘗不洗衣服，也未嘗不替別的中國人洗，但規模狹小得很，比起我們的所謂清潔來，眞可以說無足掛齒了。所以然的緣故，似乎端在要省些物力。中國人並不是不愛清潔，他們愛清潔的程度並不讓我們，我們時常可以遇見一些纖塵不染的境地和人物，但這些都是下了極大的代價的，並且和一般的環境多少有些格格不入的。

也因爲過於撙節的緣故，要在中國買一種現成做好的用具是往往不可能的。你只能買到一些部分或一些零件，你得自己把他們拚湊起來再加上一個柄，一個把手之類。自己做也往往比較便宜一點，既然便宜，或大家以爲便宜，於是現存的用具便絕跡於市上了。

我們上文提過，一些很少的材料，在中國人的手中可以安排得十分經濟。我們再舉一些例。一盞半明不滅很不費錢的油燈，往往可以用來照耀兩間屋子。法子是這樣的：他們在隔牆裏打一個洞，那油燈就安放在洞裏，那不是左右都沾了光麼？這種所謂『挖打』的方法，在許多手工業場合裏最普通，例如瓷業、象牙業、鐵店、織造局之類。這種手工業場合裏所表現得最顯明的，與其說是中國人的匠心獨運，不如說是中國人的撙節天成。中國人做手藝的方法顯而易見並不

是最好的，比它們巧的還有，但是要把比較無用的原料，如竹頭木屑之類，儘量的利用，別人家的方法却不行。這些中國人眞像有一種本領，可以不用任何東西而產生任何東西出來。他們眞像有無中生有的神通；無論出品多麼簡單或複雜，『偸工減料』似乎是他們最普遍的原則。

這一類的例子，一個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隨時可以一個一個的添上去，但添來添去，總不會比下面所舉的例子更意義要來得意義深長。一個老太太，獨自在路上慢吞吞的挪步走着，好像身上還帶着甚麼病症，感受着很大的痛苦似的；後來一經打聽，才知道她正扶着病回到一家至親的家裏，好死了以後就在附近的祖墳上安葬，可以省一筆槓棺材的費用」

一二　知足常樂的中國人

中國人吃苦的本領，我們在以前的討論裏已經敘述過了。　他們那種越苦越能忍受的精神，眞教西洋人看了莫名其妙。　他不但能忍受，並且也似乎能始終不灰心，不失望。　也可以說，明知前途沒有希望，而他們的掙扎並不因此有絲毫的懈怠。　西洋人那種熱灶上螞蟻一般的坐立不安的光景，在他們中間是找不到的；他們也並沒有甚麼計劃、甚麼打算，指望着有甚麼好日子來到；但是他們的努力却數十年如一日，一刻不放鬆。

這一類的特性雖和耐性很像，但耐性二字似乎不足以把它完全包括。　同時我們得注意到他們那種『鬧中取靜，忙裏偷閒』的功夫，那種熙熙皞皞的生活態度。　這種功夫與態度可以用一個『樂』字來代表。　我們下文的討論目的就在敘述這個『樂』的特性，並且還要給它一些解釋。

所謂『知足』，當然並不是指人人安於所遇，絲毫不圖上進。就個人而論，若有好日子過，而此種日子可因努力而得，自然誰也不會推開，但就全般的生活系統而論，他們覺得它也夠好的了，前途實在沒有多事更張的必要。這一層，不用說是和他們的保守性有連帶關係的……。

但同時還有一個解釋。中國人通國是些相信命運的人。在他們自己也許不這樣覺得，但在別人看來是再清楚沒有的。中國經書裏常有『天命』這兩個字。民衆談話之間也隨時提到『老天爺的旨意』一類的辭句。這種『天意』『天命』的說法初看很像我們西洋人所說的 Providence；不過細看却有一個很基本的分別。西洋人講『天意』，指的是上天對於世間一切的關懷，好比慈母之於子女，時刻貼念着似的；但中國人所稱的天是超脫個人關係的，並且又是十分籠統的，所以無論怎樣說法，實際上總是等於『命運』。西洋基督教的天意總是好的，但中國人的天命或命運却可以有好有壞。中國人稱命運，很像西洋小孩子講仙人，遇到好的，甚麼都可以行，遇到壞的，甚麼都可以被它毀滅。

中國的風水、關亡、占卜、星相一類的術數，其實全都建築在這種命運的信仰之上。信仰了命

運，更要知道前途的窮通禍福，更要於萬一之中希望得到一些趨吉避凶、祈福免禍的方法，於是這一類術數，使發達起來。就在今日靠這種種術數吃飯的人，在全中國還不知有多少。他們活動的程度，在中國各處雖有不同，但就一般的民衆心理而論，他們還是一種很少不得的力量。你在街上或廟會裏閒逛，你總可以碰見個把男子或女子，剛剛離開一個算命先生，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我的命。』這種信仰的結果是不問可知的。在別的民族中間，這結果是失望、灰心；但中國人卻能安心守着，守到甚麼時候呢，守到『時來運轉。』中國人既如是其相信命運的存在，當然一切不安分與犯上作亂的行爲是不容易有的，因爲不安分也是無用。在中國，樂天、安命、守常、知足，實在是一而四，四而一的一種特點。上文云云，便是一個說明了……。

中國人既有這種樂天、安命、守常、知足的特性與經驗，於是即使有比較現存的方法可以改進生活狀況，他們也往往置之不瞅不睬之列。舉一個例罷。在西洋人，這種現存方法之一是移民。移民是能救人口過多、生活太苦的一個經驗良方。我們就普通的事理而論，中國人若採用這經驗良方，不但沒有困難，並且前途一定有很大的成功。但實際上我們知道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決

不會採取。理由之一是他決不能離開祖宗父母之邦；祖宗的墳地在那裏，他也就得在那裏；設非絕對萬不得已，他決不肯離鄉背井，去別尋生路。他的生活的理想是一棵樹的理想，有一位詩人唱着：

『釘住在一塊地上，好像一棵樹；吸水、開花、結果，枯萎了歸於脚下的黃土。』 ——

大體說來，中國人離家遠出，也從沒有不想回來的。他們盼望可以『衣錦榮歸』，可以『滿載而歸』，可以『壽終正寢』，可以『歸正首丘』，所謂『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正與上面兩句詩的意思不謀而合。這自然是一個很好的解釋。但我們如再細看一下，這解釋還是離不了樂天、安命、守常、知足的大道理，尤其要是我們更聯想到中國文化裏『務本』或『不忘本』的那特點；所謂『葉落歸根』，有守常的意思，也有不忘本的意思。

中國人這種特性，尤其是知足這一方面，似乎是天生成的。知足之於中國人，便好比鰭之於魚，翼之於鳥；中國人因爲能知足，所以在平常生活之中，未嘗不能有『鳶飛魚躍』之樂。他的勤勞，他的愛和平，愛秩序，他的任勞忍怨，和知足一樣，都像是些天賦的特性。惟其有此種種特性，所

以在順境裏，固然能優哉游哉，在逆境裏也能安之若素。就一般的中國人說，他們的脾氣總是好的，他們沒有『神經』這種東西，他們的消化力，比起駝鳥來並不多讓。有了這種種理由，再加上許多我們說不大明白的別的理由，我們便可以了然於中國人的安常處順的本領了。逆境之來，論理既知其必不可抵抗，論力知其實無法抵抗，唯一的應付方法，自然惟有儘量的遷就；祇有在遷就之中還可以找到一條『心安理得』的出路。

中國人有一句老話，叫做『知足常樂，』可見『知足』和『樂』是有一種拆不開的關係的。常人須富足以後，才能夠樂。但人慾無窮，物力有限，眞正富足的境界是永遠不會達到的。既不會達到，何如以不足爲足，而永遠可以得到生活的樂趣。中國人在這方面，是最有經驗的過來人。『安步當車，無罪當貴，』是有知識的人的知足常樂；『布衣暖，菜飯飽，』『今朝有酒今朝醉，』是普通民衆的知足常樂。

一三 有私無公的中國人

詩經上有兩句農民向天禱告的詩，叫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無論周朝和周朝以前的中國人是怎樣的大公無私或先公後私，現在的中國人是不大講究這一套的。 以前有一個黑奴聽見人家說一句老話，『大家替自己打算，上帝替大家打算；』他沒有弄明白，後來對別人說起的時候，一變而為『大家替自己打算，上帝也替自己打算。』 經此一番修正，老話雖不再成為老話，對於中國人却正合式。 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便等於這個黑奴心目中的上帝；（正合着中國人的一句老話，叫做『天高皇帝遠。』） 平時中國人的腦經裏是沒有國家這樣東西的，偶爾想到的話，他也不免自己安慰着說，『我自問只好替自己打算；國家是那麼大、那麼強，也夠自己當心了，還用得着我來幫忙麼？』 至於國家一面呢，名為建築在所謂『民父母』主義之上，實際上也老替父母自己打算，不大替子女打算。 做官的人總是抱着一種無為而治的主義，偶然替民衆做一

些事，其動機也未必在爲着他們的福利，而是爲着省將來的麻煩，深怕現在不做，將來做起來更要困難。還有一種動機是深怕不做的結果，會引起甚麼天災人禍，如同水災之類，以致稅收減色，國庫空虛。民衆方面也很明白這種經濟的動機。至於他們自身要舉辦一些公益事業的時候，最大的策動力其實也不外這一點，一則深怕不舉辦，勢必直接影響到身家的安全，再則深怕官場出來舉辦時，勢必有種種的勒索，所費的人力財力反而要多上好幾倍。

在這種爾詐我虞的心理狀態之下，一種極度的有私無公的生活習慣就養成了。最有趣的例子是中國道路的狀況。在新式的道路發達以前，中國是有過很好的官道或驛路的。這些官道都用石板鋪成，兩旁也種着樹，近自京師附郭，遠至四川湖南一類邊徼的省分，到今還留着不少的遺址。當初造它們的時候，也正不知化了多少國帑，論理只要隨時留意修理，應該可以歷久不壞。但事實上是到處沒有人管理，『路政不修』，似乎越是在承平之日，越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結果是，到現在此種路基反而成爲行旅的大障礙。有人以爲這些大路的毀壞，都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亂之際；這也許是的，但無論如何，有清二百五六十年的長期歷史之中，竟沒有能把它們修復

舊觀，也足證公益精神的缺乏到極度了。（譯者按此段議論現已不大適用，近年來中國公路建設甚為發達，眞有一日千里之概；但有兩點仍値得注意，一是此種公路中有一大部份是由外人合辦的賑務機關督造的，一是另一大部分是因軍事而趕築的，一旦軍功告成，恢復承平常態，是否有人加意逐年整頓，還是一大問題。）

民衆對於路政的態度也恰好和官家的一樣。只要與我不相干涉，卽使天坍下來，我也管不着，不要說一條道路的運命了。在中國以前只有『官道』沒有『公路』他們就壓根兒沒有屬於『公』的東西沒有『公有』這個概念。在以前，整個兒的河山是屬於皇帝的，只要他有本領守住，便始終是他的產業。所謂『官道，』當然也是他的，修理不修理，自然由他的便，別人管不着。

官道以外，全國還有許多許多的小路。這些當然不直接屬於皇帝，而屬於附近村莊上的田主，事實上雖不免公用，名義上却總是私產，和普通的田地一樣要納稅。惟其如此，所以田主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起見，總是不斷的在兩旁剝削，務使路的尺寸越來越小，而自己耕種的面積越來越大。剝削的結果也許在路的旁邊添上兩條又窄又深的溝，也許是堆上兩條又高又陡的堤岸，但

最後的作用是一樣的，就是使走路的人越走越困難，越走越沒有立足之地。 夏天雨大，把堤岸冲坍了，使它和路合而爲一，或冬天沒有農事走路人把路的闊度越踐越大，一到春天做田主的人自然會加以修正。 西洋人以爲一個人總得有行路的權利，在中國，尤其是在中國的鄉間，這權利是幾乎被剝削盡了的。

……………

在供給路的主人固然精明，在利用路的客人也真不客氣。 比如推小車的車夫，在路上裝卸貨物，總是把車子停放在路的中間，到裝卸完畢才讓開來；假若同時有別的車子經過，就只好恭候了。 又如一個農夫在路旁伐樹，最好是要它倒在路上橫着，可以讓他慢慢的砍成片段；若有車馬來到，也惟有委屈它們鵠立等候了。

在城裏的街道上，情形也很相像。 此種街道本來很少寬敞的，兩旁再加上許多臨時的小店鋪、攤子、蹲着叫貨的小販，便越發見得狹窄。 賣肉的、剃頭的、挑餛飩擔的活動廚房……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行業，又不斷的在這條狹弄堂裏熙來攘往，在特別熱鬧的時候，真可以教你連氣都喘

不過來。　路旁人家的婦女有時候也加入這龍華會，往往捉空把被褥拿出來，或是曬，或是縫上被面；她們家裏並不是沒有院子，但是院子那里有街道那般寬敞？　總而言之，中國人做的許多事裏，總有一大部分老是在街上做的，另外有一部分則在街上偶一爲之。

這種街道上的障礙物還有常川安放着不移動的啊，例如壽材舖裏的木料，磚瓦鋪裏的磚瓦，甚至於染坊裏晒着的布，麵店裏晾着的麵條，都可以公開的在路旁或路上展覽。　原來在這些店主人的心目中，不但店是他的，至少那店門前的一段街道也是他的，而並不屬於甚麼不可捉摸的『公家。』　但說也奇怪，街道的所有權雖屬於他，而修理這街道的義務，他却連夢裏也沒有想到過。　大約這還得有待於未來教育的啓發罷。　卽使萬一有私人想出來修理（這是不會的，）事實上也不行，一則沒有時間，再則沒有原料；至於說集合了街坊的人出來做，也決不會成事實，因爲人人胸中橫亘着一片私心，不是深怕出力太多，便是擔心得益太少……。

中國人有私無公或公私不分的脾氣，其實還不止此。他不但對於『公家』的事物不負責任，並且這種事物要是無人當心保管或保管而不得法，便會漸漸的不翼而飛，不脛而走。　街道上鋪

着的石條，城牆上砌着的磚頭，都會一塊一塊的減少。某商埠有一個洋人公墓，墓的四周有一道圍牆，有一年附近的居民發見它並沒有甚麼特別看管的人，便把牆上的磚頭搬了一個乾淨。不多幾年以前，紫禁城裏宮殿上的銅瓦竟會大批的被人偷去。以前中國人常說十八省以內，最受人剝削拐騙而無門可訴的是皇帝。這銅瓦的損失便是一例了。

常有人問起中國人究屬有沒有愛國思想。這問題是不容易答覆的。但大體說來，這種國家思想是無疑的有的，尤其是在士大夫階級中間。也可以說，國家思想雖有，而對於當時掌權的政府，例如三十年前的滿清政府究有幾分同情，却往往是另一問題。大約不管執政的人是誰，一般民衆的態度，可以『不聞不問』四個大字概括之。這種態度似乎孔老夫子自己也在論語裏說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民衆既不在位，自然對於政治不負責了。這兩句話大可玩味，它們對於中國人不問公家事務的性癖的關係，我們以為一半是因，一半也是果，而因的成分為大

以前有一位法國的神父，叫做許克(Huc)到中國旅行傳道；他的遊記裏有一段記載最足以表示中國人此種『天高皇帝遠』的漠不相關的態度。他說，『一八五一那年，道光帝升遐，我們

那時候正離開北京趕着路；有一天我們在一家客店裏喝茶，同座有好幾位中國人；我們便想借此機會引起一些政治的討論。我們談起剛從北京出來，不知道道光帝升遐以後，繼位的人究竟是誰。我們自己中間先裝着扳談，說「道光帝有三個兒子，究竟誰替他，倒是一大問題。若是大兒子罷，不知道他會不會勵精圖治。若說是小兒子罷，又似乎年紀太小一點。聽說朝裏現在有兩派對峙的勢力，這新皇帝究竟幫那一派呢，倒也值得推測一下。」我們說來說去，目的無非在刺激這些一起喝茶的人，盼望他們發表一些意見。誰知他們似乎連聽都沒有聽見，我們接着再三的向他們引逗，無論如何想在這些國家大事上，得到他們一些「輿論。」但依然沒有結果，他們最多不過是一面搖頭，一面很使勁的抽上幾口烟，或喝上幾口茶罷了。他們這種麻木不仁的光景眞教我們冒火。我們正待發作的時候，忽然有一位中國人站了起來，慢吞吞的走到我的背後，把兩隻手在我的肩膀上很慈祥的拍了一下，一面帶着冷笑說，『老兄，你聽我說！你費上這許多無謂的心思幹甚麼？朝廷的事自有官員去管；他們是拿薪俸的。讓他們籌劃去，免得閒着，挨尸位素餐的駡。您老兄又何苦的管這些與您全不相干的事？白管了得不到一些報酬，也豈不是

一大傻瓜?』其他幾個中國人聽了都說,『這話有理,這話有理。』同時他們又提醒我們,別忘了快涼的茶、快滅的烟斗。

一四　無惻隱之心的中國人

中國人很喜歡講仁愛平時辦一些慈善事業，也還認眞。他們的賢人孟子，還說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無惻隱之心者，非人也』一類的話。但據下文的觀察，可知孟子這話至少在現代已很不適用。中國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種品性，就是惻隱之心，或同情心。

不過事也難怪。我們在觀察這種品性上的缺乏以前，先得把中國的生活景況約略看一下。中國人口極稠密。水旱之災所引起的荒年是到處常見的事。這種情形在別國原可以成爲人口的一種限制，但在中國則不然，因爲中國人的子孫觀念太強烈、太沒法拘束。最窮苦不堪的人一樣的嫁女娶婦，並且嫁娶的很早，而嫁娶的結果總是一大堆的小兒女。明明在極度的困苦中討生活，而他們此種行徑，倒像是過着物阜年豐、家給戶足的日子一般。實際上呢，人口的極大的一部分是『饔飧不繼，』是『吃了早頓無夜頓，』是做來就吃，不做不吃。通國之中，十有八九可

以說是做一天活一天的人。 中國人叫『工作』爲『做活』，可見是十分寫實的一種說法。 和中國人來往多些的西洋人，都知道中國人手頭有現錢的極少。 所以雇人做工的時候，工人第一種要求總是先拿一些錢，好買東西喫，喫了好出力做工。 就是比較小康的人家，一會兒要湊些現錢，也是很不容易。 ……眞正能自給自足而不求助於人的人實在是寥寥無幾。 中國一般人的經濟狀況，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赤貧。 這些事實，對於人與人的關係上，究會產生何種影響，是不問可知的。 生計的困難，和此種困難所養成的種種習慣，自然不免把全部的社會生活逼落到一個極度的物質主義的水平綫上。 在這水平綫上透露着的只有兩大事實，一是錢財，二是食物。 假若中國的社會生活是一個橢圓形的東西，錢財與食物便代表兩個中心，社會生活就繞着它們整年的旋轉。

赤貧的生活和在此種生活中的掙扎所呈露的慘痛的經驗，日久自然會變做司空見慣的事。水深火熱一類的經驗，不但數量多，種類也多，不但種類多，每一種的程度又往往十分深刻。 看慣了的人，或自己再三有過此種經驗的人，自然是不容易有動於中，而興起孟子所稱的惻隱之心，或

不忍人之心。 就事實而論，無論中國人仁民愛物的心多麼大，也不能解除所有的痛苦的萬千之一。 稍有思想的中國人也都知道平時一點點的慈善事業，不論是私人的或政府的，總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一切救濟的方法，充其極，不過是止痛去癢而已，於病痛的本身是不相干的。 好比大批人染上傷寒症，醫院既沒有藥品、看護、飲食也都沒有着落，而有的只是一些小塊的冰，分給大家，權且教他們在高度體溫的壓迫之下，覓片刻的涼爽。 所以在中國可以驚異的是，不是慈善事業的不發達，而是居然還有人在那裏張羅，在無系統、無組織、無供給之下，竭力的做一些慈善事業。不過無論慈善事業的有無大小，此種普遍的水深火熱的生活狀況所引起的心理狀態是一樣的。無論一個人的眼光多遠，心腸多軟，時常和一種痛苦的光景接觸以後，同時又明知卽使赴湯蹈火，亦無補於此種痛苦的預防或解除，他的心理狀態是可以猜得到的，就是熟視無覩，就是，無動於中。近代的戰爭裏，這是最容易看出來的一大事實。 一個人第一次看見人家流血，他的刺激自然是極深，但見了幾次以後，就會麻木不仁起來，好像脚跟上長了厚皮一樣；這在他本人，起初也未嘗不以爲奇特，私心未嘗不悶，心腸硬軟，如何前後竟會變做像兩個人一般。 在中國，一種社會的爭奪

戰是永久的在那裏打着，一種慢性的流血也是始終在那裏不停的進行，所以誰都看慣了，誰都不當做一回事。

中國人同情心的缺乏，從他們對付殘廢的人的態度裏，可以看出一部分來。 他們中間有一種很普通的信仰，就是凡屬跛的、瞎的、聾的、禿頂的、以及對眼的，都是不祥而應當迴避的人，對於一隻眼的人，避之更是唯恐不速。 他們的假定好像是，凡是體格有欠缺的人，心地上一定也有欠缺。據觀察所及，這種人並不受甚麼虐待，不過他們也並不能引起別人的同情心。 這便是和西洋人很不同的一點了。 他們甚至於以爲這種缺陷是作了孽的報應，理有應得，所以沒有向他表示甚麼同情心的必要。 這一點却又和古代猶太人的見解有些相像。

凡是有甚麼缺陷的人，在他自己固諱莫如深，但在缺乏同情心的別人，遲早總會向他提醒，決不放他『過門』。 有一種比較客氣的提醒方法是把這種缺陷和這個人的稱呼連繫起來，好像是非教大家注意到他的缺陷不可似的。 例如，有一位出過天花的人到藥店裏買藥，店裏的夥計說，『麻大哥，你是那一個村子裏來的呀？』 有一個斜眼的人在場，遲早怕不免有人開他的玩笑

說，『眼睛斜，心地歪』要是彼此是讀書人開玩笑起來，更不免引經據典的說些『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一類的話。 一個禿頭的人也會有同樣的遭遇，別人會對他說『十個禿子九個詐，剩下一個是啞吧，』意思是假若不是啞吧，一定也要詐人。 天老或羊白頭一類的人，自然是更容易做開玩笑的上好資料。 凡是有這種缺陷的人，處此境地，也祇好聽天由命、讓人擺布而已。 要不然，他找到的麻煩怕還要多些。

心理上有缺陷的人也是一樣的受人明白指摘。 一個旁邊站着的人指了一個小孩說，『他是一個傻子。』 這孩子也許一點也不傻，，倘若時常聽人家講他傻，他那一點向上的意志、努力的動機，必不免受摧殘淨盡，終於弄假成真，也許會眞變做一個傻子。 有別種心理變態的人所受的待遇也是如此；他們的種種怪癖，他們在行爲上的與衆不同之處，他們的病源的種種推測，得病後種種變本加厲的原因，都會變做大衆的公產，大衆的談話資料，往往當着本人的面，如數家珍似的敍述出來；而傻瓜、癲、大毒頭、癡子……一類的雅號，自然會在這種敍述裏連一接二的用到。

……………………

中國人一面最講究客氣，而一面却往往不能體貼別人的地位與感情。這自然也是從同情心的缺乏來的。我有一位中國朋友，一向極有禮貌，一向沒有聽見他得罪過人；但有一次他對我說，他第一次看見外國人的時候，起初覺得非常奇怪，因爲他們那滿臉的鬍子竟和猴子沒有分別；但他又加上了下句說，『但後來看慣了，倒也沒有甚麼!』 有人當了許多學生的面向一位私塾先生問起學生的資質，先生很不留餘地的說，靠門的一個最聰明，不出二十歲穩可以中秀才，但是隔壁一桌上的兩個眞是再蠢沒有。這種不留餘地的問法與答法對那兩位學生會有甚麼影響，似乎誰都沒有顧慮到。

中國的家庭生活是建築在親親主義之上的，但同情心的欠缺，往往在家庭裏最容易看出來。中國家庭並不快活，是不會快活的，因爲它根本缺少那種情緒上的關切性與聯繫性。一個中國家庭往往不過是一個許多人的集合體，他們因爲血統關係、婚姻關係、利害關係，合則大家有益，分則大家吃虧，不能不維持一種集團的形式能了。至於西洋人所稱的家庭，便決不是這樣；西洋家庭所由建樹起來的同情心和親親主義也很有分別。……（譯者按：作者在下文講了不少的中

國家庭人員間種種不和睦的情形，詞長不譯。）

在同情心缺乏的一般生活狀況之下，最吃虧的往往是婦孺。這一點是可想而知的。鬧新房的時節的新嫁娘是最可憐的一例。大家庭制度下的媳婦婢妾也是一些好的例子。疾病中與災荒下的婦孺是最吃虧而無可告訴的分子。再醮的寡婦最容易受人的訕笑奚落。

見死不救，在中國是常有的事。幾年以前，一個外國輪船在揚子江上失火，當時岸上看火的人雖多，而動手搭救搭客及船員的人卻幾乎一個都沒有。看官們不但不救，並且等落水的人好容易爬上岸的時候，把他們的衣服剝光以後，依然把他們推下水去……。

和上文相像的還有一點，就是見陌生人不肯幫忙。在夏天大雨的時季旅行，有時候真可以教你起一種感想，以為天地人三者是通力合作的在和你為難。天是下着傾盆的大雨。地是鋪滿了水。你走的究竟是道路，是田地，或走了多少道路以後，便不免掉進醬缸似的泥潭裏去，再也爬不出來——你再也不會知道。人呢？他們會跑來圍着你看，越來越多，越看越有趣，但他們始終照着一句老話行事，叫做『袖手旁觀。』他們不和你交談，更不會明白告訴你前途還有多遠，

或如何乾淨平坦，因爲他們都慷然於『多言惹是非』之戒；至於幫你的忙，把你的車推挽一下，或從泥濘裏提拔出來，你自然是更不必希望，除非是你先給他們講好一個價錢。

……………

中國民族有許多需要。物質上的進步、科學上的設備，自然是在所必有。但若把國情仔細診斷一下以後，可知目前最不可缺的一種事物實在是同情心。國以內，地域之間；社會以內，人與人之間；家以內，親子夫婦之間；都需要一點慈祥和靄的氣息。中國人應當知道莎士比亞的幾句名言，就是這種慈祥和靄之氣是好比天上的雨露，輕輕的往地下落，在施與的人固然有恩，在接受的人更沾實惠（譯者按，出威尼斯商人。）

一五　言而無信的中國人

中國人的信字是由人言兩個字造成的。人言爲信，信字的意義原是最明顯的。中國人講五常之德，它就是最後一個，據熟悉中國人的西洋人看來，在中國人的德行之中，它也的確是最末後的一個。頡特教授（Kidd）在這方面有過一番評論的話說：『要是信的美德之所以被選爲中國民族的特性，目的是在表示中國人的知易行難、心不應口、聲東擊西、以虛爲實，那眞是再恰當沒有。無論在公私道德方面，中國人所表現的種種往往完全和信實或誠信相反；缺德一點的敵人，正大可以借了信字的名義，故意開中國人一些玩笑。據我看來，粉飾虛僞、「二三其德」、假意殷勤、遇事投機，甚至於到奴顏婢膝的程度，才是顯著的中國民族的特性。』這一番話究屬對不對，我們看了下文的論證再講。

我們曾經假定過，現在的中國人和古代的中國人在性格上怕沒有多大分別。所謂信，目前

中西的看法，雖有不同但在中國範圍以內，古今的見解當無二致。 凡是細心讀中國經書的人，大都能夠在字裏行間發見不少的閃爍之辭、搪塞之語、甚至於完全向壁虛構的議論。 西洋人的戇直，在中國古人看來，最適用的一句評語是『直而無禮則絞』（譯者按語出論語泰伯。） 不過孔老夫子自己有一樁行爲，在中國人看來雖毫無問題，在西洋人看來却大有可議之處。 論語陽貨篇裏說，『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孔子不贊成孺悲的爲人，所以不願意見他，但同時却要讓孺悲知道這種不願意的意思。 但在西洋人看來，他似乎不必繞這樣一個大灣，更不必扯甚麼謊。

孟子傳了孔門的衣鉢，也有同樣的一段故事。 孟子在某國作客，某國的諸侯請他上朝相見，孟子却盼望那諸侯先去看他，便假裝害病，同時却要他知道這病是假的，是一個推託，所以第二天便出門去拜訪別的人。 當晚他們弟子和他討論這件事究竟做得對不對，但討論中所謂的對不對指的是合禮不合禮，有沒有前例可援，而並不指應不應隨便撒謊（譯者按：事詳孟子公孫丑章句下。）

我們當然不能說中國人都會撒謊，卽使能說，我們也不願意說。但大體言之，中國人的善於撒謊是無可諱言的；在一部分比較能客觀的中國人也未嘗不承認。……但據我們看來，中國人的愛撒謊，倒並不是因爲根本喜歡撒謊，乃是因爲撒謊有好處，這種好處非撒謊得不到。巴勃爾先生(Baker)說，『中國人不能說眞話，別人說了，他也一樣的不能相信。』「中國人自己也有一句俗話，叫做『小孩嘴裏說眞言』，可見大人所說的話多少都有幾分不可信。」作者有一位朋友，有一次有一個中國孩子去見他，要他教他『你撒謊』這句話，英文是怎樣講的。我的朋友就對他說了，但同時教他留心，在外國人面前不要亂用，否則便有挨嘴巴的危險。這孩子聽了這話，臉上表示出十二分的驚訝，原來在他看來，『你撒謊』一句話實在和『你哄人』同樣的輕薄，同樣的不傷和氣。一八五七年，倫敦泰晤士報的中國記者古克先生(Cooke)說起西洋人最忌有人罵他是撒謊的人，『但中國人却不在乎，他並不發怒，並不以爲下面子。他也並不否認撒過謊。若在一個上司面前，他最多也不過說一句「卑職不敢撒謊」而已，說的時候是用力在一個敢字上。你對一個中國人說，「你是一個專門撒謊的人，你現在又快撒一個謊了，」便好比你

對一個英國人說，「你是一個專說雙關話的人，我敢說你現在要不開口則已，開口一定又是一個可以教人嚇一跳的雙關的笑話」。

一面既不信實，一面對於別人又多疑善慮（見下文第十六章），所以中國人講起話來，往往可以滔滔不絕；而內容却可以等於零。西洋人初到中國，覺着中國人莫名其妙，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了。我們靜聽了半天，眞不知道他們的用意所在。我們總覺得他們的話的背後還有東西。……這話說來雖然簡單，但在中國旅行、做買賣、辦外交的西洋人碰上這種情形，有時候却眞爲難。

中國人大都輕諾而不踐約。這和他們的不守時刻的特點有連帶關係。無論失約的原因究屬安在，在失約的人總有一大推理由和一大套解釋的話。遇到做錯了事而被人責備的時候，他也必再三的認錯、賠罪、答應趕快設法彌補，『以贖前愆。』他的認錯的本領眞大，大到可以教人全無遺憾，萬一有一些遺憾的話，那就是認錯之中還欠誠意。

有某一位教洋人漢文的先生，有一次替洋人編註一些中國的格言。在有一條格言之後，他註着說，『有人對你有甚麽請求的時候，你千萬不要的斷然拒絕，你就是心上不預備照辦，面子上

總得答應他。 或者『讓這事延宕下去，到明天，到明天的明天，這樣，他心上雖不滿意，却也不覺難過！』 這位老先生在這裏所引用的原則，在中國人待人接物的生活裏是極尋常的。 向人索債，便是一例。 在討債的人決不能希望第一次便討着，但他也不會完全失望，欠債的人總會再三的安他的心說，下一次準有，再下一次，更下一次。

中國人不誠實與哄騙的特性，往往在對付小孩子的時候，也可以表見出來。 小孩子還不大會講話的時候，甚至於連大人的話還聽不明白的時候，大人便嚇他哄他，說他若不聽話，便有東西從大人袖子裏跳出來把他帶走。 這袖子裏的東西往往不是別的，就指我們區區的洋鬼子。 小孩子哭了，大人要把他哄住，總說，『洋人來了！ 洋人來了！』 所以中國人的不信實可以說是在孩提的時候，便已不知不覺的種下了根。

在中國話裏，有一大批現成的字眼和名詞，凡是講禮貌、裝客氣的人都是非學不可的。 這種名詞的運用，有一個簡單的原則，就是對己要越謙卑越好，對人要越尊重越好。 例如，中國人普通總不在人面前提起他自己的妻子，萬一無可如何非提不可的話，他總說『拙荊』(dull thorn)

怎麼樣……怎麼樣。 再如，講起自己的兒子，總說『豚兒』怎樣、『小犬』怎樣。 有一段故事，不知是真是假，最能代表中國人這種假客氣的特性。 有一個衣冠齊楚的客人到一家人家去拜訪，在客廳裏坐着，等待主人出來。 客廳的樑上藏着一罐油，一隻偸油的老鼠正在探頭到罐裏去；忽然看見有人來到，便嚇跑了，同時把油罐子打落了下來，恰好掉在客人的頭上，不但把他敲了一個頭昏眼暗，同時在那件簇新的袍子上洒了一身的油。 客人正在冒着火走頭無路的時候，主人出來了，二人照樣打躬作揖後，客人便開始解釋說『鄙人進了貴客廳，在貴樑之下坐定以後，不知如何竟驚動了尊鼠，尊鼠一時心慌，亟於躲避，竟把尊油罐子打落下來，正打在賤體之上，以致在尊前鬧成這樣一個不成體統的樣子，還請海涵原諒。』

這種程度的假客氣，外國人是學不來的。 到一個宴會席上，請人喝茶，請人喝酒，那一套非不是從心裏出來的繁文縟節，眞是需要很久的練習才行。 中國人善於說『磕頭，磕頭，』但究屬在甚麼時候、甚麼境界，纔能磕，可磕，不妨磕，應該磕，必得磕，非磕不可——外國人也始終學不像。 有時候做錯了一件事，或犯了甚麼禮節上的小規矩，中國人總要說，『該打，該打，』『該死，該死；』何

以些些的小錯誤要受這樣的大責罰，我們也莫名其妙。一個人騎馬往東，另一個人步行往西，撞見了，騎馬的向步行的很客氣的說，『我下來，您騎，您騎！』意思固然很好，但終覺得太不近情理；不說別的，就是在方向一點上，便有些牛頭不對馬嘴。但是這些假意殷勤的中國人便不理會。

西洋人和中國人做生意，也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了。據一部分西洋人的意見，中國商人是很誠實的，往往能『一言爲定』，用不着契約一類的拘束。……但據作者看來，這並不是因爲個別的商人誠實可靠，乃是因爲中國商界那種共同負責或交相負責的制度，使個別的商人無所施其欺詐的伎倆。例如在『同業公議』一類的辦法之下，欺詐的商界勢必影響同業的信用，而不見容於同業。這種交相負責的原則與制度，作者以爲西洋人很可以一學，那確乎是中國人的一種長處。但就個別的商人而論，以至於中國商業活動的全般而論，『不信實』的判斷，還是無法避免。

有人做過一篇文章專論兩個中國商人怎樣用欺詐的方法彼此競爭。他倆的關係，用一句中國成語來說，眞像『鐵洗箒撞上了銅盤子，』或者是『烏龜抬轎，』意思都是硬撞硬，各不相讓。

中國人又有一種成語，意思是說把一個孩子送到店鋪裏學買賣，是害他一輩子。假的秤、假的尺、假的升斗、假的錢鈔、假的貨物，無往而不是壞他的心術的東西。中國的店家在招牌上沒有不寫上『童叟無欺』、『貨眞價實』、『眞不二價』的，但十有九家是口不應心的。貨原該是眞的，價原該是實的，是只有一個的，小孩老頭，原是不該欺騙的；如今一定要把本分應做的事，張揚出來作爲美德，也足見此種美德的絕無僅有了。

中國人揩油的本領最大。眞可以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揩油爲本。』所謂庶人，還包括沿門托鉢的化子在內。中國人揩油的學理和藝術，遲早總應該有人用一本專書加以詳細的敍述。中國人自有一種實際上對付錢財與應付人事的聰明，把這種聰明用在揩油之上，眞可以揩得又乾淨又光潔。你和中國人接觸，你就休想完全避免此種被揩的危險，你若避免此種危險，我相信你也必能避免空氣的壓力。揩油是中國人最大的通病之一，但除了整個兒的把民族的生活改造一下以外，我們眞不知還有甚麼可以糾正的辦法。

以前中國的政府，和中國的商業一樣，既然同是民族的產物，自然也是同樣的虛僞、欺詐、口是

心非，言不顧行。中國歷史裏，應付敵國、外藩、或民衆的皇皇文告，真不知有過多少，用意未嘗不好，修辭未嘗不美，但根本缺乏的就是一個『誠』字。「『修辭立其誠』一句話，可見是和『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完全可以相提並論。」這在接受文告的人倒也完全明白，也從沒有人出來揭穿這種假面具。有一位作家說，『中國政治家的洋洋大文，很像盧騷的懺悔錄，滿紙是仁義道德，而底子裏甚麼齷齪的事都做過。他一面草菅人命，一面却大談其孟夫子的不忍人之政。一面侵吞修堤築壩的公款，洪水之來，使農民流離失所，而一面却大貼告示，對下屬則責成他們廉潔從公，對民衆則表示他的「痌瘝在抱。」中國好官自然是有的事，但不容易尋找就是了……。』

就在目前，中國也並不是沒有錢來開闢它的富源，發展它的實業。但在此種虛僞、欺詐的空氣之下，誰又肯把錢拿出來給公家使用。中國也不是沒有有學問的人，但彼此之間既不能誠信相孚，推心置腹，試問又何從團結合作。有錢而不能使，有才而不能用，民族的前途就非常黯淡了。如今要覓取一線的光明，自然應從立信入手。孔子曰，『民無信不立，』還是他老先生的話對。

一六　爾詐我虞的中國人

在討論這題目以前，有兩點是應該注意的，一是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要是全無信義，自然不會維持到今日。孔夫子很早就有過『民無信不立』的話。我們用『爾詐我虞』四個字做題目，無非是要表示在一般的信義之外，猜忌的特點，在民族品格上，很要佔一些位置。第二是這種特點也決不是中國人所獨有，它實在是各種東方民族中間的一個通性；最多也只能說中國人表示得特別明顯罷了。

這種猜忌或爾詐我虞的特性，在中國有一個最不可磨滅的象徵，就是州縣的城垣。中國人講起都市這樣東西，就用城字，因為凡是都市都有城，沒有城的地方不能成為都市。都市的城池，在以前是有一定的規制的，多長、多高、多厚，都有一定的尺寸。洪羊之亂以來，各地的城垣已日就毀壞，不能作保護之用，不要說盜賊可以來去自由，就是雞犬也往往出入不禁。但這是因為經濟

衰落，無力修築，並非因為大家覺得已無修築的必要。一旦有天災人禍發生，如大水，如匪警，第一件事還是搶修城牆。

這些城垣的基礎，物質上雖是一些磚石，精神上卻是政府對民衆的疑忌心理，也可以說是士大夫階級對農民階級的猜忌心理。在名義上，以前的皇帝和許多官吏是民之父母，叫做『父母官』，但事實上這父是繼父，母是後母，其間很有幾分隔閡和介蒂。士大夫階級雖時常說，『四郊多壘』，是『卿大夫的恥辱』，實際上能把鄉下人關在城外，自己每晚上可以高枕而臥，私心也未嘗不引為快慰……。

不但州縣有城垣，就是私人的房屋也往往有圍牆。中國人聽外國人講起倫敦紐約，說是沒有城垣的城市，便搖頭不信；如今更聽說人家的住宅，不論身家大小，都不打圍牆，他覺得更是一種海外奇談；在倦倦於黃金時代的中國人，也許不免與『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的感慨咧！

………………

猜疑和傾軋的心理有兩個原因，一是人與人之間彼此太不了解，一是彼此太相了解。在中

國人中間，這兩個原因都有。築城垣，打圍牆，是由於第一種原因；家庭中間的爾詐我虞，使出乎第二種原因了。兄弟是同根所生，但為了父母的愛寵，為了家財的分配，往往可以相煎得很急。兄弟有了妻室，妯娌之間既直接彼此相猜相忌，間接又不免使兄弟鬩牆之爭，更變本加厲。在少數能『忍』的家庭分子之間，表面上的爭吵雖少，底子裏的疑忌却是一樣的多。有人說，猜忌是由於了解的不足，看了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可知這話是不很確的了。

既講起家庭生活中的猜忌心理，我們更不妨提一提一家之中的僕婦丫鬟的關係。這種關係很可以用『武裝中立』的名詞來代表。假若她們中間全無親戚的瓜葛或同鄉的情分，這種『武裝中立』的關係自然是更來得壁壘森嚴，動搖不得。假若僕婦某甲有了甚麼過失，被主人知道，這某甲第一層要追究的，決不是『主人怎樣發覺了她的過失，而是淘伙中間究竟是『誰把她的過失向主人告了狀』。即使她自己明白這過失是證據確鑿，無可抵賴，她的第一個主意，還是要向人聲明告她狀的人是和她有宿怨的。有一次一個老媽子見院子裏有人交頭接耳，她一心以為是在說她的閒話，她就帶上一臉的氣往外跑，正待發作，忽然看出和她全不相干，才忸怩着

臉把氣平下去。

在西洋，小孩子長大到八九歲，而逐漸可以和外界發生接觸的時候，做父母的總要告誡它們，和素不相識的人，不要太接近、太推心置腹。在中國，這種告誡是無須的，因爲對於陌生人的一種猜疑心理，在中國小孩的經驗裏，即使不是與生俱來，至少也是跟着母親的奶一起裝到肚子裏去的。在中國有句俗話，叫做一人不進廟，兩人不窺井。爲甚麼？原來一人進廟，和尚也許要起不良之心，把他謀害。二人窺井，要是二人之間有債權和債務的關係，或一人身上有甚麼財寶，被另一人看中，那債主或有財寶的一方也許不免受另一人的暗算，被他推下井去！

另外有一類的猜疑心理是在尋常日用之間都可以看出來的……。中國人生計困難，平民日常所最關心的東西自然是食物和可以購買食物的錢財。因爲有這種關係，所以凡是支配錢財或分發食物的人，在中國是最不容易做。在唯利是圖的小人，借此自肥，毀譽在所不計，我們可以不說；但是在潔身自好的人也往往蒙貪汚的惡名，終身無法洗刷，却就大可傷心了。原來在一般人看來，你總是在所謂『嫌疑之際』，你既有管理公帑的權柄，你便有『動用』的便利；你既有分

發軍糧的職司，你便有『剋扣』的自由；你既有支配賑款的任務，那賑款便難免被『吞沒、侵蝕』或『剝削』的危險！（譯者按：作者這一番話眞是鞭辟入裏。貪污風氣的養成，一半固然由於一部分人的自私自利，一半也未始不由於大衆的猜疑誣蔑的態度。本來可與爲善的人，在此種形勢之下，也許就自甘暴棄，同流合污起來。江南有句俗話說，『蹲在坑（厠所）裏臭，立在坑裏臭，』既然一樣是臭，一樣洗刷不清，樂得眞正的貪污一下，來提高一身一家的生活享受。以前分析貪污的人，似乎始終只顧了前一半；至兼論後一半，當以明氏爲第一人。好比分析中國歷年政治組織的腐敗，普通總說是因爲沒有良好的領袖；但明眼人看來，這也不過是說得一半，其它一半是大衆中間服從性的缺乏。必也雙方都有欠缺，政治組織才無法樹立起來；猶之自私自利的人和猜忌誣蔑的大衆心理，須裏應外合，才會造成貪污的風氣。兩種理論實在是一樣的。）

中國的客棧、飯館、和澡堂一類場所有一種規矩，就是在客人付賬之後，接受銀錢的堂倌一定要高聲報告小賬的數目。這種規矩表面上好像是替客人拉面子，表示他如何闊綽（或其反面）；也確有初次出門的客人這樣想的；但實際上是讓其它的堂倌們知道他並沒有揩甚麼油小賬是

大家平均分配的，經收的他是『涓滴歸公』了的。（譯者按北平某城門之某收稅機關，大門上懸有『涓滴歸公』的四字匾額，此中用意和虛報小賬數目完全沒有分別——就是，要免除別人猜測和議論。）

……………

中國文字裏的『外』字，有很廣泛的意義，決非西洋人在短時期內所能完全了解。外國人是從『外』國來的，自然是不可信託；外省人、外鄉人，也是一樣。要是外來的人，有來歷可查，有任務可以和盤託出，那還可以，否則大家第一要推究的問題便是，『他的葫蘆裏究竟賣些甚麼藥？』這個問題得不到答覆，那外來的人便不要想在本地方立足。〔中國人朋友之間，也常用『見外』二字，無須客氣的地方表示客氣，就是見外，見外就是不信任，就是猜疑。〕

一個趕路的人要是走錯了路，錯過了宿店，想找一個鄉村人家過夜或打聽路綫，十有八九是不成功的，不但不成功，恐怕連敲門都沒有人理會。作者自己就有過這種經驗，他在一個邨子裏轉了好幾個鐘點，想出錢找一個領路的人，不要說沒有人做，並且沒有人理。

中國人的彼此猜忌的特性還有一個很切實的證據，就是一個作客的人，往往不願意獨自一個人在一間房裏留下。遇到這種境地，他自然而然會踱出房外，否則他面上便會有一種侷促不安的神情。意思好像對主人說『你不要疑我，我決不拿你的東西。』……在中國有兩句老話，叫『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這兩句老話最能够反映出本章所討論的特性。

商業場合裏是最需要信用的，中國人在這方面一面固然極重信用，一面却也十足表示彼此猜疑的心理。賣主和買主間的關係，往往採用契約的方式來表示，這原是古今中西相同的，但在中國的契約上，我們總可以發見『恐後無憑，立此存照』兩句話。

商業方面的猜疑，我們可以用一個很奇特的例子來證明。數年以前，紐約報紙上有一段新聞，講起唐人街中國商會的組織和活動。這商會的最高職員是十二個董事，共同管理會中的經費和各種文件。他們有一隻大鐵箱，是很新式的，和紐約各大銀行所用的沒有多大分別，但所用的鎖却很不同；他們用的是中國的大銅鎖，一起十二把，列成一長排，外形雖然相同，裏面的簧却不一樣；十二個董事每人各執一鎖，遇有開箱的必要時，照章須十二人到齊，同時開鎖。有一次，有一

位董事病故出缺，一時後繼無人，而同時他的鑰匙又不知遺落在何處，於是全會的工作，不但停頓了許久，並且弄得異常混亂。（譯者按：明氏此例確有相當代表性。國人保管公共事物，往往採取此種嚴密而笨拙的方法。甯波范氏天一閣藏書，亦即爲極有趣之一例。但范氏圖書終於散失過半，可見建築在互相猜疑的心理上的方法，無論如何周密，是徒然的。）

一七　愛臉皮的中國人

我說臉皮是中國人特性之一。臉皮是一種大家有的東西，如今說是中國人特性之一，似乎是太不合情理了。但我不妨解釋一下，我這裏所稱的臉皮，也就是中國人心目中的臉皮，並不指頭部前面的那一薄層，却是一個綜合的名詞，中間包括許多的意思。不要說我們西洋人描寫不來，恐怕根本就懂它不得。

我們眞要明白這臉皮的意義於萬一的話，我們先得了解，中國民族是富有戲劇的本能的一個民族。戲劇可以說是中國獨一無二的公共娛樂；戲劇之於中國人，便好比運動之於英國人，或鬥牛之於西班牙人。一個中國人逃到了甚麼事故，他就立刻把自己當作一折戲裏的一個脚色。他就唱諾，逕擊，或磕頭如搗蒜，在一個西洋人看來，似乎是絕對不必的，並且除了引人發笑以外，絲毫不能有甚麼功用。中國人的思想也不脫戲臺上的意味。假使他受了人家的欺侮或奚落，以

致不能不作自衞之計的時候，他的話就像對了一大羣的聽衆說的，其實在場的不過兩三人而已。他囔着說：『我對你說這話，對你，對你，對一切在場的你們。』解決了甚麽難題，他便自以爲『落臺』得很有面孔，或並沒有『坍臺』。假若這難題不能解決，他就覺得不好『下臺』或『下不了臺。』這些，讀者們請注意，都是和實際不相干的。中國人的問題永遠不是一個事實的問題，而是一個格式的問題，不是事實對不對，而是格式合不合。譬如臺上演說，只要說得好，時間不錯，格式不誤，他便盡了脚色的能事。我們便不該再到幕後去尋根究柢，否則不免『拆穿西洋鏡』以後便沒有戲可看了。這一類日常生活中的扮演的行爲，併起來說，就等於臉皮，就是臉皮；臉皮能够扮演得活龍活現，就是有臉皮，別人就會『賞臉』。假若不會扮演，不理會這種扮演的藝術，或扮演時受人阻撓，以至沒有結果，就是沒有面孔，就是『丟臉』。這一點，我們要是能够充分的明白，我們對於中國人其他的特性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但是談何容易！臉皮的養成，有它的原則，有它的功夫，這些原則與功夫，決不是一個西洋人所能窺探於萬一，因爲他的生活習慣裏很少那扮演的成分，偶一爲之，又不免於不知不覺之間，掉

落到事實的探坑裏去。在他看來，中國人的臉皮便好比南太平洋裏海島上的土人的種種禁忌，怪可怕，怪有勁，但是不可捉摸，沒有規矩，除了取消之後用常識來代替以外，再也沒有第二個對付的方法。在這一點上，中國人和西洋人只好彼此分道揚鑣，不必強彼就此，或強此就彼，因為我們沒有方法叫雙方設身處地，來體會彼此的特殊景況。在中國鄉間，鄰舍是時常要吵架的，吵架不能沒有和事老，而和事老最大的任務便在研究出一個臉皮的均勢的新局面來，好比歐洲的政治家，遇有國際糾紛的時候，不能不研究出一個權力的均勢的新局面來一樣。遇到這種案件的時候，和事老的目的決不在公平的解決，使權利義務各有所歸，而在把臉皮向當事的雙方分配一下，厚薄多少，各有攸當。至於公平的處斷，雖屬有它的好處，在東方人看來，往往認為是不可能的。在縣衙門裏的公堂上，這條臉皮均勢的原則是一樣的適用，一大部分的官司，歸根結底，總是打一個平手，兩不相虧，各不傷臉。

……………中國人之於臉皮，眞可以說是保護周至，無所不用其極。讓我來舉幾個實例罷。做錯了事被人指摘，是很『丟臉』的，所以非否認、非抵賴不可，不管這錯事究竟做了沒

有，也不管這事究屬錯不錯；否則便不能保全面孔。　有人拍網球時失落了一個球，大家都疑心是一個苦力拾去的，並且疑心得很有一些根據。　但是這苦力堅不承認，滿臉是受了冤屈的怒氣，但他一面否認，一面卻跑到掉球的地方，找了一會，把球檢起來說：『這不是你們掉的球麼？』　其實誰都看出是從他的袖管裏掉出來的。　一個老媽子把客人的洋刀偷了去，主人查得急，她就裝着東尋西找，後來居然在臺布底下找到了，說，不是在這裏嗎？　那苦力和這老媽子總算都沒有『丟臉。』　一個不經心的長班，失落了主人的一件東西，知道這一件東西是非賠不可的，或至少要賠出一部分的工錢來抵償，臨了被主人辭歇的時候，主人照例把工錢扣去一部分，他須行裝着行所無事並且很神氣的說，『那隻銀調羹的錢我不要了，』這樣，飯碗雖去，臉皮卻絲毫無恙。　一個債主放出了一筆債，明知這筆債是討不回來的，他卻跑到欠債的人家裏，拖臺拍凳，大鬧一場，表示錢雖則討不到，他卻並非不知道在這種場合裏擺出些應有的架子與顏色來給欠債的人看看。　有了這架子與顏色，他不但保全了他的臉面，並且可以教那些窮親戚窮朋友們下次休想在他手裏叨借半個大錢。　又有一個男傭人忘記了做一件事，知道他的主人必將因此把他辭退，他便故意

再度忘却一次，同時自動的遞了辭呈，挂冠而去。飯碗可以不要，臉皮却不能不要，有如此者。

救了臉皮，丟了性命，似乎並不是一件很上算的事，但是我們知道有一位知縣老爺因犯案將處斬刑，他向刑部上書要求穿了命服就刑，好救他的最後的一些臉面！

一八　婉轉的中國人

中國人是有婉轉的天才的。

我們盎格羅撒克遜人却沒有這種天才。　不但沒有，並且以能夠單刀直入或開門見山自豪。我們對付一個題目，一起手就想抓住這題目的精髓，抓到之後就把所抓到的和盤託出的講出來。這在我們早已成爲一種習慣。　我們在社會交際場中，或者和外國人折衝樽俎的時候，自然不能始終維持這個習慣但就大體說來，『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那兩句中國古詩，倒像是爲我們的脾氣詠的。

但是在亞洲民族中間，情形就不同了。　你不必和亞洲人結識很久，就可以發見他們的本性和我們根本不同，不但不同，並且恰恰相反。　在亞洲各國的文字裏，客套的字眼，榮華富貴、福壽康寧的字眼，疊床架屋，正不知有多少；這層在中國文字裏，比較起來還算不多，我們不必多談。　許多

極簡單的意思，原可以用極簡單的字眼來傳達的，但是東方人却惟恐其過於簡單，惟恐其傳達得太快，於是就在文字裏造作了許多轉灣的說法，許多囉嗦的說法；關於人的稱呼，也有不知多少的混名、綽號之類。 例如一個人死了，在中國文字裏就有許許多多的字或名詞來傳達，目的全都在免除把死的事實說得太赤裸裸了，以致傷了人家的感情，並且這種體貼的態度，亦不因一個人的社會身分而有分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死的代名詞雖不同，而其同爲代名詞則一。 但這些我們也不願意多談。 同時我們對於中國文字的眞實性，卽所傳達的意思是否準確可靠，我們也不願意仔細過問，最多不過提一個大致罷了。 因爲言辭婉轉旣成爲一種風氣，你也婉轉，他也婉轉，彼此都能心照不宣，那問題就不在文字的準確不準確上，而在用文字的方法上

一個外國人，不必在中國就擱很久，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你不能從一個中國人所講的話裏，知道他要說的究竟是甚麼？ 就是對於在中國已經歷有年所的外國人，這結論也始終可以適用。 你儘管會講一口的土話，儘管懂得一切的名詞套語，甚而至於能夠把聽到的話逐句逐句逐字逐字的寫下來——你依然弄不淸楚和你說話的人究竟要和你說些甚麼。 這問題當然在

說話的人並沒有把心裏要說的話直說，却只說了一點多少有關係的話，希望你自己下一番功夫，可以把他的本意全部或局部的推想出來。

所以聽中國人說話，除了充分的文字上的準備以外，你還得有活潑的想像與推論的能力，否則你休想成功；但同時你也得自己明白，無論這種能力多大，你也決不會完全成功，你還時常會有摸不着頭腦的地方，因為碰上中國人那種說話的方法，你這種能力仍然不免供不應求，捉襟見肘。讓我舉一個實例能。 外國人到中國來以後，最早有機會接觸的中國人自然是他們自己雇用的僕人，中國人叫做西崽。 有一天早上，我們家裏的『僕役』（Boy 一字的譯音）跑來對我說，他有一位『姨母』病了，他想回去探望一下，在這探病時間，他很對不起的只好暫時放棄他為我們工作的權利；他說的時候，臉上還是那一副又冷淡又呆板的面孔，和平常毫無分別。 我引到這一段故事，我並不一定說這個『僕役』並沒有甚麼姨母，或有而並沒有甚麼病，或雖有病而他並沒有去探望的誠意；但是真正的事實說得平淡一些，大概是這樣的：他和廚子最近吵過一次架，廚子的地位恰巧比他來得高，平日多受一些主人的寵眷，他明知合作既不可能，相持又得不到勝利，所

以決意用改變陣線的方法，全師而退。

一個中國人替你幫了一次忙，你隨後自然想酬報他；送錢既然不便，你也許送一件小小的禮物，『聊表微意。』　他却很客氣的不收，很堅決的不收。　他說，爲了那麼一樁小事來受你的厚賜，是違反五常之理的；同時他也說你不該送東西給他，送了就瞧他不起，假若你再堅持要他接受的話，你眞是陷他於不義了，那是萬萬不可的。　這一番話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你送得太少了，他幫了你的忙，本來希望你可以重重的酬謝他，却想不到你不知趣，只送得那麼一點；失望之餘，只好連那一點都原璧歸趙，又外加一番仁至義盡的大議論。　要不然，他就另外有一種意思，就是讓你自己知道，你在這時候，或在最近的將來，並不是沒有能力送他一些更好看更貴重的禮物；如今把小禮物收了，一段交情從此了結，豈不是太殺風景？　不因小利而忘大利，所以他情願守着，讓你有機會把他的旨意細細揣摩一下，只要你有恍然大悟的一日，那更大的禮物是不落虛空的。

天下第一件可以引人發笑的事便是暗中觀察中國人在將要揭穿別人甚麼祕密或壞事的時候的行徑。一個中國人既已決心要揭破或暗示一件不利於人家的事，他的言動舉措往往是特別有趣。不過他眞要用揭穿的方法的時候，那件事一定是已經弄得很糟，已經到了遮掩不住的地步；那便沒有多大趣味。不過比較普通的是暗示的方法；有一件祕密或壞事於此，以常理論是不能講的，是一定講不得的，那其間他就不能不用很繞灣的很間接的路徑把它透漏出來；那時候便十分有趣了。我們這位中國朋友在沒有張嘴以前，先局促不安的東西張望一下，好像是防着甚麼奸細似的。他的聲音低下去了，臉上也表現出一種神祕的情狀。他伸出三隻指頭向你鄭重的搖擺着，意思裏說他這一齣啞吧戲裏的主角是那一家人家的老三。接着他也許說一些比較不相干的開場白，慢慢『好像引你漸入佳境了，可是正要到要緊關子的當兒，他却戛然而止，把那最傳神的一點筆墨縮在半舌頭上，再也吐不出來，同時却不住的只管自己點頭，好像說：『你懂了罷？你自然懂了。』事實上呢，那瞪着兩眼聽着的外國人却始終莫名其妙，他只懂得一點，就是他一點也懂不得。有時候你這位知風報信的朋友把你的興趣引起以後，便突然中止，連暗

示的功夫都不做一點，却對你說，過些時你自然會明白現在所說的一切實在是千眞萬確的！

中國人又有一個和全人類共通的特性，就是把不好的消息瞞着不講，可以瞞多久就多久，或者是用改頭換面的方法講出來。但是中國人中間因爲已經變本加厲的成爲一種規矩，這種隱瞞和改頭換面的功夫實在做得可以驚人。例如有一家人家的孫子死在外鄉，兩個老世交的朋友特地跑來向他的祖母報信，他們正在客廳裏低着嗓子商量用甚麼法子來揭穿的時候，那老太太忽然走了出來，撞了一個照面。她看見他倆竊竊私語，便問有甚麼事。他們却再三的說沒有甚麼事，不過是講些閒話而已。不出半點鐘，那噩耗終於給老太太知道了。又如某家的兒子出門了好幾個月之後回家，在他到達和他的家最近的一個村子的時候，有一位朋友教他不要就闖下來，看村中演戲；從這一點暗示他就知道他的媽已經在他離家期內死了；因爲臨喪不樂是古有明訓的。再如某次有一位中國的朋友託我帶一封家信給一位異鄉作客的人，家信的內容大致說，他出門以後，他的老婆忽然得病死了；他的東鄰西舍看見他家裏沒有人照應，便把屋子裏所有的東西搬了一個乾淨，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家徒四壁』的程度。但是在這封信的封面上，却寫

着四個並不很準確的大字『平安家信！』

中國人的婉轉的天才又往往從數目字的避免上可以看出來。 數一堆東西，或排列一個次序，通常總要用幾個數目字，中國人卻偏要轉一些灣。 一部五册的書書簽上便題着『仁、義、禮、智、信』因爲這五常之說，並稱起來總是跟着這次序的。 那十幾本一部的康熙字典，各部前後次序的注明，既不用數字又不用內容的部首，卻用計算時間的干支。 貢院裏面考房的號碼用的是千字文，好在這一千個字裏沒有兩個是重複的。

在稱呼方面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繞灣的好例子。 最有趣的是對於已婚女子的稱呼，一個已婚的女子是沒有名字的，她只有夫家和娘家的姓。 平常人家稱呼她，總說是『阿×嬸娘』或『××的媽』。 一個中國人有一次談起『小黑兒的媽』病了。 你也許以前並沒有聽見過他家裏有一個『小黑兒』，但他一相情願的假定你一定知道的；因爲你已經知道『小黑兒』，所以你也自然知道『小黑兒』的媽是誰。 倘假若一個女人沒有兒女，那問題便更麻煩了。 大家還得沒有辦法，也許只好叫她『小黑兒』的嬸嬸或姑姑之類。 一個中年以外的婦女很不遲疑的

叫她的丈夫做『外人』，意思說他是管屋子以外的事的一個人。但是一個還沒有兒女的青年妻子，要提到她的丈夫，那就眞有些登天無路入地無門了。有時候她叫他做『先生』，有一次一個女人急得沒法，竟把她丈夫的生意經常做他的名字，她說：『油車是這樣那樣說的！』

年關到了，作者在路上撞見一位相熟的中國人，他向作者做了一些似乎有深意存焉的手勢。他又把食指指着天，又指着地，又指着作者，最後又指着自己，却始終不發一言。這一套把戲原是很容易理會的，但是說來慚愧，當時作者竟沒有完全懂得。他的意思是要借一點錢來度過年關，並且他希望對方要嚴守祕密，使『天』、『地』、『你』、『我』以外，別讓第五個人知道！

『喫、喝、嫖、賭』四個字的一句套語，指着四種最普通的惡習；近來又加上了第五種、煙。一個中國人議論人家的長短，時常伸出了四隻指頭對你說：『他都來。』意思裏說這四種惡習他都犯。

中國人發怒了都喜歡彼此相罵，但是有文學天才的人却有一種本領，使你挨了罵還不曉得，使你吃了虧還以為他正在恭維你，他好比給你吃一種補丸，外面是一層甜的殼子，一定得把這外層消化之後，你才領略到可以令人作三日嘔的眞味來。這是一種藝術，有文學天才的人就時常

在這方面從事創作，因而找到人生的樂趣來。

一九　客氣的中國人

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善於客氣，可以用兩種不相同的眼光來看，一是賞鑑的，一是批評的。我們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喜歡自己稱讚自己的種種美德，但這種種美德裏，客氣所佔的部分卻很少。所以我們到東方來以後，目擊亞洲大陸上芸芸總總的大衆，大都擅長一種藝術，可以使人與人之間，衝突日見其減少，和氣日見其加多，我們便自愧弗如，而油然生敬仰之心。不要說普通的西洋人，就是平素批評中國人批評得最嚴厲的，也不能不承認他們已經把客氣的藝術推進到一種登峯造極的程度；這種程度，西洋人不但從沒有見過，並且，要是沒有到過中國或親身經歷過的話，一定要認爲不可思議和決非人力所可做到的事。

中國的經書上有兩句話，叫做『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就是說，儀式的規矩有到三百種，而平日行爲上的規矩有到三千種。在那樣一個沈重的擔子之下，我們還要希望負擔的人類可以生

存下去，並且可以傳宗接代多少未免有些不近情理；但天下事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那些中國人到現在還不天天在那裏『行禮如儀』麼？ 他們已經把禮數這樣東西，和他們的教育一樣，變成一種先天的良知良能，不再是後天的一些教養了。 禮節的拘泥和一舉一動的循規蹈矩，在西洋只限於朝廷之上以及折衝樽俎的外交會議或宴會席上的，在中國很早就成爲民族天才的一部分，成爲日常交際生活裏須臾不可離的東西。 這並不是說他們一天到晚被許許多多支離[illegible]的規矩綁着，弄得絲毫動彈不得，不過是說他們的儀節生活已經嫻熟到一種不費吹灰之力的程度罷了。 好比我們在良辰佳節休假的時候穿新衣服一樣，只要日子一到，那簇新的衣服自然會穿上，而對於那良辰佳節的來到的認識，他們也好像是有狗鼻子嗅路般的一種天性似的。 勝會的事或場面的事一到，假定一個中國人不知道怎樣應付，那就無異是一大笑話，那可笑的程度和一個西洋人不曉得九乘九是多少一樣。

西洋人所以不易領略中國人的所謂客氣，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客氣的見解不同，似乎是最關重要。 例如，我們對於客氣有一個極通行的定義，說，『客氣者，真正慈祥和藹之心情用慈祥和

需之行爲表而出之之謂也。』 西洋的文化，在理論上，是以『愛人如己』或『別人的休戚便是自己的休戚』做主旨的，所以對於客氣的見地也不能不受這種主旨的支配。 但是中國人的客氣卻與此大不相同。 它是許許多多細微節目與零星規矩的總和，它們好比法律上的咬文嚼字，那咬與嚼的行爲並不代表甚麼心理或情感的狀態，不過爲咬嚼而咬嚼罷了。 例如婚喪喜慶或其它大典時所用的吉慶和榮哀的字眼，連篇累牘而不厭其多，千篇一律而不厭其煩，在外國人看去可以急得冒出無明孽火，中國人卻處之泰然。 顯而易見的，這種種字眼最多只有兩個用處，一是把社會上貴賤貧富的分際仔細的刻畫一下，以爲非此不足以維持社會的安全與秩序。 二是可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上的融洽；即就喪事而論，也可以落一個『生榮死哀』『存歿均感！』一事總有來蹤，也有去跡，總有上文，也有下文，只要來去分明，上下接筍，便算盡了生活的能事，中國人的客氣就是這麼一回事。 他們的客氣的生活又好比兩個人下象棋，到了吃緊的時候，一個說，『某謹將敝帥躪出，以避尊砲之大轟，』一個說，『某亦不揣冒昧，敢將賤砲挺進一步，以避尊車之鉅掃。』 ……中國人的生活就這樣的一步一步走去。 車可以喫砲，或來不及而帥老爺子竟被

砲轟走，這些不幸的事儘管發生，而客氣不能不講，因爲客氣本身早就成爲生活中不可須臾離的一部分，客氣就等於生活，生活就是生活。『觀棋不語眞君子，落子無悔大丈夫』，要是下棋觀棋的人不明白這些規矩和其他零星的客套，他們就不免被人嘲笑；生活也是如此，一個人不懂得客套，便等於不懂得生活。

中國人講客套，講規矩，那呆板與繁瑣的程度當然也並非到處一樣，大率在都市裏最厲害，越是落鄉，便越減少。鄉下的農民和山上的樵夫未嘗不感覺到規矩的必要，但是街上人的許多零星節目，他們却不大熟悉了。鄉下人時常要受街上人的揶揄，街上人總喜歡把鄉下人開玩笑，大原因也就在鄉下人不懂規矩。當初外國人初到中國來，也被中國人瞧不起，被叫做洋鬼子、二毛子，在文人看來，是野人，是蠻夷戎狄，不知道『上國衣冠』是甚麼東西——也無非是因爲『不懂規矩』與客套的緣故。

客氣好比是一個裝空氣的橡皮墊子。中間空無一物，但要有甚麼震動或撞剋的時候，它却是一大恩物，正合着老子所說的『當其無，有器之用。』這一點固然是很對的，但中國人的客氣，

面子上、自覺的，好像是爲對方客人打算，實際上、不自覺的，恐怕還是爲了主人自己。 它的用意似乎並不在要使客人舒服愉快而在表示他是一個懂規矩與守規矩的人，怎樣的局面須要怎樣的應付，甚麼上文須要甚麼下文，才算合式，才算入調——便是做主人的所時刻留心的事。 所以你到一家人家去，主人一定要引火煮茶，那茶也許根本就吃不得，水也喝不得，煮水的煙也許衝滿了一屋子，叫你眼睛出淚，鼻子打嚏，喉嚨發嗆，茶還是要煮，還是要堅持着請你喝。 這眞是待好客人麽？ 也許不。 但至少可以表示、可以證明主人並不是不懂得享客的規矩。 要是客人覺得不舒服的話，只好算他活該。 你也許到鄉下人家去借宿，他那一間空屋，早不收拾，遲不收拾，偏要等你到了以後，當你的面，便使勁的掃起地來，你越勸他，他越不放鬆，好像一直要把幾十年陳的厚灰塵都給它們一次跋扈飛揚的機會，才算躊躇滿志。 也許禮記上說過，地一定要掃，非掃不可，所以客人的活受罪可以不必顧盧到罷。 也許又有人請你吃飯，不管你愛吃不愛吃，把滿桌子的菜用筷子調羹向你的飯碗裏不斷的輸送，堆得連飯都瞧不見，越堆得高越見得客氣。 你在那種情形之下，自然又祇好叫苦，但在你的主人一定覺得很能盡主人的職分，別人也決不能怪他不懂規矩；要

是客人不舒服，那是客人不懂規矩的自作自受，和主人無干。

……………………

中國人的客氣又往往用送禮物的方式表現出來。凡是被人贈送禮物的人有福了，那福便是我們以前討論到過的『面子。』這種禮物又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常和中國人來往的西洋人時常可以接到一大堆包紮得很齊整的大小紅紙包兒，打開看時，無非是一些又油又膩的糕餅之類，吃既萬吃不來，推又推不回去。受寵若驚的外國人，到無可奈何的時候，也許要對餽送的人說，『你送我也是沒有用的，我只好轉送給別的中國人；』但是餽送的人一往情深，始終不加理會。但說也奇怪，中國人雖客氣，却並不反對接受禮物的人開口問禮物的價錢。當送禮物的人臨走的時候，他還要鄭重的說一聲：『很對你不起，麻煩了你，花了你不少的錢！』

某次有一個外國人到一家人家去吃喜酒，席間吃的東西中間有一種麵粉做的餅，很多也很好吃。酒數巡以後，侍役又遞上一盤餅子，中間只有兩三個，大衆都說『請，請，這是熱的。』那外國人坐的是首席，所以他們把盤子最先遞到他的前面，外國人道一聲謝，說是不能再喫了。話還

沒十分說完，但見全席一聲不響，陰沈沈的好像是被一股黑氣籠罩了似的；那盤子也忽然遞走了，並沒有送到別的客人前面。 弄得那外國人如入五里霧中。 吃喜酒要送錢，原是中國一種普遍的風俗，但在這塊地方，這種『賀儀』或『花敬』是要在酒筵席上當場摸出來的；但若當面開口索取，又未免太不客氣，太不成體統，所以改用在盤子裏遞送熱麵餅的法子，西方禮拜堂裏做禮拜將近完畢的時候也有人遞盤子，但中間並沒有熱騰騰的麵餅，中西洋文化的不同大概就在這熱麵餅的有無了。 這種不成文的法律，在當地的中國人自然是都了解的，但是苦了那位外國人，他不明白這些委曲，自然沒有照規矩辦，坐首席的他既不照辦，其餘的客人也就不便照辦了。 後來這家人家又有一次喜事，這外國人又被邀出席，這一次情形有些不同了，除了遞盤子的辦法照例實行以外，賬房先生又對客人們宣布說，『凡是有銀錢財物要送未送的人都請到鄙人這邊來。』有上次的婉轉，忽爾又有這一次的直截爽快，有上次的客氣，忽爾又有這一次的老實，中國人眞是不可捉摸。

把一些繁文縟節撇開了以後，我們終究得承認，在社會交際一道裏，中國民族畢竟是過來人，

有許多地方值得西洋人的效法。 我們的客氣固然很注重誠懇這一點，但有時也太老實、太乾脆、太不留情面，要是能夠加上東方人的一些圓轉而無害於誠懇眞摯的程度，豈不盡善盡美？

但同時我也承認有許多西洋人無論如何不會接受我剛才所說的那種看法。 我有位住在巴黎的英國朋友，他於不知不覺之間學上了巴黎人的一些應對進退之節。 後來他回到倫敦，見了每一位朋友，終要脫了帽子深深地一鞠躬。 有一次有一位朋友却喝住他說：「喂，別玩甚麼法國把戲，我這裏是用不着的！」 所以客氣雖小道，講究起來却也不易；誰能夠把東西洋人對於客氣的見解與方法融會貫通以後，節取其中的精髓，不偏不倚的走上那又狹窄又崎嶇的中庸之道，誰便是世界上第一個有福氣的人。

第三篇　自然淘汰與特性的由來

二〇　中國歷史中的迴環

一部中國歷史是幾箇周而復始、更迭遞轉的大節目所造成的。這些大節目，順着次序，是：外族的侵陵；人口的移徙；人文的進步；人文的退步；政治的混亂；接着又是外族的侵陵。這些外族大都來自西北方，或北方，就是來自土耳其斯坦（新疆青海）和蒙古的沙漠一帶，或來自滿洲。最初侵入現在中國地域的也許就是原來的華人，但是對於這層我們還沒有完全確定。後來的外族有匈奴人、蒙古人、韃靼人和滿洲人，他們都是遊牧的民族，或是遊牧民族的後裔。派干（E. H. Parker）在他寫得很生動的中國歷史裏說，『歷史初期裏的薛細亞人(Scythians)、匈人(Huns)、匈奴人，實在和後期裏的突厥人與蒙古人沒有甚麼分別，在分布上也許有些不同罷了。』就是

滿洲人也是和他們一派的。

西史中的 Parthians, Mamluks, Mongols, Seljuk Turks, Ottoman Turks，和許多比較不出名的小族都和近代滿洲人有血統關係的。 這許多派別，和滿洲人一樣，不但善於侵略，並且曾經再三征服和統治遍亞洲大陸上一切文化很發達的國家。 中國便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我們除非對於秦代（公曆紀元前二四九）以來中國北方民族的勢力先有相當的了解，一部中國史便讀不通；中國許多重要的朝代和政治的領袖大都來自北方幾省，而北方幾省的人口大都是韃靼人和華人交婚後的子孫；這些事實，我們也不便忽略過去。（引威廉 E. W. Williams 語）

中國北方雖有長城一類的保障，雖不缺少披堅執銳的大軍，但是土著的華人始終沒有把握未開化而却有能力的戎狄永遠阻擋住，他們抵禦的成績，至多不出二三百年，便失敗了。 每失敗一次，便有大批的胡人蜂擁似的向南侵佔，安土重遷的華人，不用說，當然不是他們的對手了。 大凡逢到中亞細亞一帶（即指蒙古新疆一帶）天時久旱，例如公曆紀元前第三世紀、紀元後第四

第五世紀、又如第十二第十三世紀，這種侵略的災難（安知不就是幸福？）總是特別的厲害。 由此可知遊牧民族之所以征服中國，一半是因爲受了經濟的逼迫，一半也因爲他們富有領袖的能力；凡屬遊牧之民都是重領袖的。

就中國方面說，外族侵陵的時期，也就是內部混亂的時期。 一壁有旱災——這和沙漠一帶之地一樣——久旱之後，又有水災和其他天行的錯亂，一壁又有因爲他種原因而發生的內部的退化；天災人禍，裏應外合，不久就把華人陷入了無政府、無紀綱的狀態。 在這種時候，北部的華人感受二重的壓迫，一是生計的愁苦，二是外族的侵陵。 結果，有許多人便自然而然的向南或向東南遷移。 人口的遷徙，當然也有時候是因爲比較積極的動機，例如，想覓到比較膏腴之地，或以前未經開墾之地，或見遷往之地生計充盈，文物薈萃，想去沾一些光。 但是，中國大批人口的流動，十九是因爲荒年和胡族的侵略，並且沒有一次不是朝南走的。 他們好比波浪似的向着一箇方向推移；有史以來，也就推移過不少的次數。 第一次便是從陝西東北部河套一帶華族發祥之地向東南黃河下流逐漸推移，到布滿黃河流域爲止；後來的移徙便直接從北方幾省向南了。 一直要

到差不多耶穌誕生的時候，卽中國有史以後二千年，這種移民的波浪才推到現在的廣東。

北方人民南徙之後，剩下的空隙就被胡人塡滿了；這些胡人生活一有了定所，就立刻受中國文化的同化，同時也和華人在血統上發生混合，逐漸養成一派新的、有活力的人口。中國史上開創帝業的人大多數若不是眞正的外族人，便是韃靼與華種混合後的產果。例如，『中國北方，從公曆紀元後三〇九到四三九年，卽自劉淵都平陽到北涼降魏，中間稱帝稱王的無非是匈奴、通古斯、吐蕃、吐蕃與通古斯的混合種、和已經移徙過的通古斯等的族人，外加華族自出的叛徒，綜合起來，正不知有多少小「朝代」』（語出派干，見前。）直到公曆紀元後五八一年，卽隋文帝開皇元年，華族才算自立了一個朝代，統治南北，但就在隋朝創業者的血統裏，因為以前移殖的關係，恐怕一定也有韃靼或蒙古族的成分。到紀元後一三六八年前的三百年間，就是明代立國以前，北京一帶的平原就完全在韃靼人手掌之中。明代是華族首屈一指的土著的朝代，並且統治中國北部到四百五十年之久（譯者按此數不確，其實有明一代不過二百七十餘年年。）把一切外族入主中國的朝代綜合了看，恐怕中國北部受外族統治宰割的年限要比受華族自治的長久，至

於號稱華族土著的君主恐怕也有不少從北方沙漠一帶移來的血在他們的
外族入主中國北方的初期裏，南遷或向東南遷徙的華族便進入土人的
的地位替代了。揚子江流域當然最先受這種民族更替的影響，以後逐漸南
海南島等處。更後，在東南各省的華族又向南移殖到台灣、印度支那、爪哇、和
人總稱爲南洋的地方。要是沒有歐洲文化同時自西漸東在南洋作一樣有
到得今日，大概不免已經執了南洋的牛耳。華族南遷的歷程中比較的沒有
的結合，却遲早往往把他們殲滅了。不但血統方面不發生多大關係，就在文
沾過土人多大的光。這種事實恰恰和北方的相反：在北方，華族受胡族的強
被華族的文化征服了；今在南方，華族用強力把土人征服了，但是土人沒有相
反征服的工夫。我們把華族自北徂南不斷的移徙的歷史認清楚了，我們便
『眞正的華人在舊的中華版圖內往往找不到，却要到比較迤南的地方才找
域當初雖不屬中國版圖，却很早就有華人移殖，如今所尋到的華人，便是這種

出派干，見前。）

中國歷史的迴環經過了外族侵略、內政混亂、和人口移動的三箇段落後，便進入一箇人文進步的時期。這也是數見不鮮的事實。在外族所創立的新朝代的領袖人物之下，例如蒙古人與滿洲人，中國歷史總有一箇典章文物盛極一時的期限。中國史蹟裏最可注意的一端便是：凡是外族勢力發達的時期和地域裏，便在在有新的發明、新的見解、和別的文物演進的步驟。這是怎樣解釋呢？大約外族從沙漠一帶移入中國本部，移徙之際，所受淘汰的影響很大，所以能夠達到中國本部的分子大都是異常有才力的人。中國歷史的每一箇迴環裏，總有向上舒展的一節，這便是這種有才力的人所造成的人。

滿洲人便是很好的一箇例子。他們近代的『墮落確是一箇事實——那似乎是和一箇比較高級的文化發生接觸後所不可免的——但我們不能因此把他們早年的豐功偉烈掉頭不顧。』（語出威廉士，見前。）他們不但征服了滿洲和中國本部的全部，幷且奄有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高麗。卽在希馬拉亞山以南印度以北的不丹、尼帕爾也受了他們的册封，印度支那半島裏的暹

羅也聽命於北京，同時緬甸、安南都歲時入貢，絲毫不敢疏忽。滿洲人的勢力並且踰海而東南，把臺灣也收入了版圖。

清代的所以爲大陸帝國，比較元代尤爲鞏固；成吉斯汗和他的子若孫果然可以號召俄羅斯、亞米尼亞、和波斯的君王親自入朝聽命，但四傳之後，到忽必烈汗的時候，元代實際的統治權祇限於中國本部十八省，他和波斯、蒙古、滿洲的諸親藩不住的發生爭執；此外，蒙古人在智識事業上和文學上，也不是滿洲人的對手，所以待遇被征服的民族和管理被征服的土地的財富起來，也沒有滿洲人一般的手腕和把握（語出派于。）

就是在他們執掌政權的末日，滿洲人也還出過幾箇偉大的人物，例如慈禧太后。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把圓明園燬了，接着皇室就築了一座頤和園，凡是有賞鑒能力的人，見過這座頤和園的，沒有不感覺到：一箇民族能規畫佈置出來偌大的一箇園景，一定是一箇具有絕大才能的民族；就部分而言，功力容有不到的地方，但全部的規畫眞是堂皇壯麗極了。舊時科舉取士的制度，也許不是甄別吏才的一箇善法，但是眞要成功，與試的人非有異常的潛心、異常的毅力、和其他

高尚的心理品性不可。要是滿洲人沒有多量的這種品性，他們在科學裏成名的人一定不會多，但事實上却不然。據一九一〇年卽宣統二年的縉紳統計四一〇箇由科舉出身的朝臣疆吏和其他大官裏，五〇箇是滿洲人，三箇是宗室。

試閱滿洲人的歷史，可知他們中間特殊才智的產生，至少局部是由於自然淘汰的效力。在這裏我們當然要認清楚，在自然淘汰能夠發生效力以前，一族中間一定先要有種種不相同的人品，否則淘汰將無從活動，自生物學方面言之，就是先得有種種突變或異乎常態的箇體才行。這種突變和異常的箇體也許是向着某種特殊的方向變去，作一番有目的有順序的演進，或者是受了環境狀態的淘汰與感化才會發生；至於甚麼是這種環境狀態，我們如今還不得而知。不過這層和我們目下的討論不甚相干。我們只須承認，一羣之中各箇箇體是很不相同的，因此自然環境、或社會環境、或各箇體自身活動的方式，可以使這一部分生存，使那一部分滅亡，所謂淘汰和選擇的作用便是。

滿洲人最初見於史乘，約在公曆紀元後第七世紀的初年。那時候有自稱契丹——馬可波

羅遊記中的（Cathay 大概就是契丹的轉音——的民族向中國北部開始侵略（譯者按此亦不甚確，拓拔魏時已有契丹之名，且契丹以前其他東胡種族若烏桓等，對於中國很早就有侵略的行爲。）當初雖被華族擊敗，退歸北方，但是到了第十世紀初葉，就立起國來，〔太祖阿保機稱帝，尋又改國號曰遼。〕又二百年之後，契丹始爲女眞所滅，這女眞族便是近代滿洲人的直系祖宗了。又大約一百年之後，女眞人所立的金國又被蒙古人驅逐出中國國境之外，當時蒙古人的領袖便是成吉思汗。此後凡三百年光景，我們就差不多完全聽不見滿洲人了，他們已經退踞滿洲東南隅的老巢，繼續過他們半開化的生活，沒有甚麼可以稱道的文物，但依然是很有體力、很有才幹的一箇民族。到了十六世紀中葉以後，他們的領袖中間有名努爾哈赤的開始握大權，不久就建設了一箇滿洲王國，又不久就把中國征服了。

這都是很普通的歷史事實，但是我們在這裏要了解的是：滿洲人經過了千餘年的南北移徙，若干次的和異族爭競以後，所受的淘汰的影響一定是非常嚴酷的。滿洲人的韃靼祖先似乎都是遊牧之民，幾千年間，沒有多少變動。他們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常有時候教他們墓地裏要特殊

依舊發有爲，要特殊的通力合作，結果就提鍊出很大的領袖人才來，因爲遊牧生活最宜於領袖的養成。大凡遊牧民族都不怕沒有強有力的領袖，例如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突厥人、）和目下正討論着的滿洲人。當初諸迭克人（譯者註一見書末附錄三）的祖宗也經過同樣的生活，所以今日諸迭克人仍舊遺傳着多量的領袖能力。當滿洲人的祖先，如契丹或女眞等，侵略中國的時候，他們似乎又經過一度的淘汰，當他們被蒙古人追歸滿洲東部之際，這種淘汰的影響尤其是厲害。他們當初退歸老巢的情形究竟怎樣，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但是從別的民族的經驗推論起來，能夠回去的和有志願回去的一定是比較聰明強幹的分子，毫無疑義。有一部分的領袖分子當然死於戰爭，不能回去，但是同時許多愚弱的、無能力的、無勇氣作抵抗的分子一定是苟且偷安、靦顏服侍征服他們的人，他們也是不回去的。唯獨是有作爲、有箇性、也就是有智慧有體力的人，才不肯寄人籬下，才恥居奴僕的地位，才情願把家產貨物完全拋棄，才甘心冒風霜雨露的痛苦，來遄歸他們的老巢。這種選擇的情形，本來是到處一樣，不祗滿洲人如此。蒙古人入主中國北部之後，退歸滿洲的金人怕大都是這種人物。後來創立清代帝業的人，也就是這種人物的最有才力最能

奮發的子孫；努爾哈赤本人，雖沒有進過中國，便是滿洲民族中最最優秀的一分子。他不但是一箇軍事的，並且是一箇政治的天才。他是一箇帝業的創造者；因爲他創業鞏固，所以他的子孫竟可以守成到二百餘年之久。清代其它的帝王，雖不是每箇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但若和別的中國朝代的帝王相比，同一在二百餘年的時期裏，他們便不免略勝一籌了。他們的成功可以說完全靠了領袖的品格，好比創立阿多曼帝國的土耳其人一樣，不過阿多曼帝國的運命更是長些罷了。滿洲人在任何別的重要品性上都比不上華人，但是他們終究把華人征服了；無他，就因爲領袖的能力比華人强（語見威廉士）

在滿洲人入主中國的一段史蹟裏，我們可以看見，如同在別的同類的史蹟裏一樣，怎樣這一壁征服者的才能，和那一壁被征服者的天災——也就是征服者所經歷的，因爲二箇民族所處的畢竟是一個地段——彼此通力合作，來促成朝代的興替。在被征服的民族方面，天災之外，復有人禍，在統治階級方面，既因驕奢淫逸而日歸退化，在被治階級方面，又因內部的爭鬥傾軋，一天比

一天輭弱。

威廉士敍述滿洲侵略時期內的中國情形，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中國內部的狀態，經過長時期的連一接二的荒年和叛亂之後，眞是惡劣極了。荒年與兵事使經濟的活動完全停頓，使國家陷入一般的無政府的狀態。在當時那種無組織無系統的狀態之下，我們眞不能說人民的疾苦究竟是政治紊亂的因還是政治紊亂的果。一個人口很稠密、農事很發達的地方一旦鬧起災荒來，裏面的居民自然不免分散，成爲許多獨立的强盜團體，彼此爭奪殺害，使辦理內政的人完全無從措手。在這種形勢之下，除非政府先有相當的賑濟的設備，要想減少混亂的狀態，是不可能的。要是遇到不良的政府，那就更壞了，因爲他的懦弱無能適足以使人民痛苦顚連的生活變本加厲，終必釀成更大的亂源，一旦爆發，這個政府就不啻自絕了生路。讀中國歷史的人都記得歷來每逢政治上有大變動，同時一定有凶年饑饉做他的襯託。例如第十七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頭裏，北方幾省遭了一次非常厲害的旱災，當時一班貪官污吏便借了辦賑的機會斂錢自肥，結果是大隊的平民挺而走險，劫掠行旅和比較安居的鄉民。這是中國北部的情形。其在西部幾省，荒年之外，因爲抵

禦滿洲人南侵，需要大量的兵力財力，從一六二一年起，又加上強迫募兵和苛捐雜稅兩箇病民的條件，從此叛變的空氣，在西部也逐漸的緊張起來。 不久變亂眞正發生了，政府用盡了力，也沒有能全部把他們蕩平。 到一六三一年，內地各省的流賊都愈聚愈衆，各成大軍，都有相當的頭領，各地比較安居樂業的壯丁，見他們着着成功，下一個城池，便多一分富貴榮華的機會，於是也毫不遲疑的加入了他們的隊伍。 又過了十年，一個山西的頭領（譯者按應作陝西，李為陝西米脂人）叫做李自成的，東刧西掠，居然成了流賊中最大的魁首，手下挺而走險的流寇約有一百萬人之多，那年（一六四一）就陷了正在荒年中的河南，並且向着北京方面蜂擁而去。 流賊橫行的二十年間，北京中央政府雖然毫無能力，但說也奇怪，流賊攻陷各省的府縣城池時，却也未見得一帆風順，往往有圍攻了很久，還是攻不下的。 這是因為人民自衛的抵抗力很強的緣故。 但是這種抵抗並不是有組織的，中國人有死守一己身家財產和鄉土的品性，所以一定要患難臨頭，才有人肯出死力抵拒；同時流賊也是沒有組織的，也正合着中國人的國民性。 但沒有組織不打緊，流賊的橫行、人口的顛沛流離，却從此越拖越

久了。 流賊領袖李自成，和滿洲人的領袖努爾哈赤是兩個恰恰相反的人物，但都足以表示其所屬民族的特殊精神。 人家常說中國人太不喜歡打仗，才受滿洲人征服。 此說實在是不確的。 他們在滿人入關前後，都很想用武力來對付滿洲人，就個人的才智體力而論，也未嘗沒有用武力的理由；就明人抗拒滿人和漢人反清復明的一段史實看來，我們實在可以把中國人列在好勇善鬭的民族裏。 中國人真正的弱點却在沒有第一等的領袖人才，無論因反抗或因自衞而用武力，他們中間總沒有人能夠規畫部署使全部分的勢力成爲有組織的、可以指揮的一個系統。 滿洲人雖然不得不採取中國人的文物制度，但是因他們知道如何教人服從，他們就終於成功了。

中國歷史裏的迴環，照着規矩，總是政治混亂、外族侵略、人口移動，這都是我們方才討論過的；人口移動之後，便是人文進步了。 但是關於滿洲人入主中國後的人文進步我們不必多說，因爲我們對於滿洲人才力的雄厚，在上文已經再三申說過了。 我們如今要討論的是滿洲人統治下中國的人文退化。 中國近代的人文退化，是很親切的史實，大家明白，也用不着多說。 十七世紀

中葉，滿洲人初入中國以後不久，中國史上確有過一個很有光輝的時期；到十八世紀末年（乾隆末年，）這種光輝就達了頂點，當時大清帝國號令所被，不但是空前，並且是絕後了。 當時的中國，在中國人的世界觀裏，的確是一個『中國。』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退化的種子已經開始萌芽了。我在這裏不必多說，因為誰都知道，到得今日退化的種子已結了果實；在政治方面，中國已經無力到不能振作的地步。 他的毛病怕還不止於此，他正迷迷糊糊的睡着，至少旁人看去是如此。 今日之下，關心『華國』的人不住的問：中國何時可以醒來？ 中國舊有的才力還存在否？ 這種才力在領袖階級裏似乎確還存在，因為在智識事業方面，中國人並不在任何他族之後。 並且許多領袖人物也正竭了心思才力想把中國喚醒過來。 在政治以外的活作上，例如教育，他們的確有些成功，因為求新學問的欲望在中國非常之深切，沒有幾個別的國家還要比他深切的。 但是，在表示同情心的外國人看去還是覺得中國沒有進步許多，還是像淤塞住的水一般流不動。 今日的中國，當然不比五十年前的中國。 但是要知道今日的日本，今日的歐洲和今日的美國，就絕對不能和五十年前的日本歐洲美國相比了。 中國的進步是不是和別國的一般大？ 不問外面的

，皮毛，中國、日本、歐洲、美國的變遷，究竟各有多少是很根本的，很實際的？是不是別的國家進步太快，中國人雖有些少進步，他和別國的距離，不但不見減短，反見加長？

我不能答覆這幾個問題。要答覆他們，一半先得了解今日的中國是不是依然在退化的過程中。普通的習慣，往往把中國的退步歸咎到君主或領袖身上，說他們如何沒有能力，如何因為奢侈淫逸和教育不當而自暴自棄；說起別國的退步來也是如此。這種種壞處，對於滿洲人的退化，確有很重要的關係，我們並不懷疑，只要看拔克霍斯和濮蘭德合著的清廷紀事（Backhouse與Bland: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就明白了。

但是據我看來，此外尚有若干生物學的原因，他們的意義比上文所列敍的還要深長。外族的侵入，對於中國人的血統上不無貢獻，這是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所承認的。淘汰的作用的確可以構成一個新的强有力的朝代，但是淘汰作用一旦停止，或者領袖階級不知自愛，任意和比較未經淘汰的血統互通婚姻，退化的現象，退歸平庸的現象，就立刻可以發生；這一點却沒有多少學者認識清楚。至於在特殊情形之下——這種情形在中國是常有的——尤其是在人口過庶和

饑饉頻仍的時候或地域，一地方優秀的分子，可以受很大的打擊，可以受很迅速的淘汰，那認清楚的人就更少了。中國的退步最大原因之一似乎就是北部人口品質的日趨窳敗。因爲荒年和人口過庶的緣故，能夠生存的人大都是很能節省、很能勤勞、很能忍耐、很能吃苦——無非是一些消極的品性；至於積極一些的、有領袖能力的人品便不容易生存了。中國歷史的迴環中遇有極嚴酷的荒年時，接着又加以內部的混亂，外族的侵奪，這時候人口中比較愚弱無能的分子便要受大批的淘汰。淘汰賸的，或者亂後遷徙歸來的，或者移民的子孫遷歸父母之邦的，當然比以前被淘汰的分子要優秀幾分。這種比較優秀的分子，機會自然也比以前要好，因爲亂後人口稀少，曠土很多，他們可以盡量的利用。因爲如此，所以他們的營養比較充分，他們的健康比較的有保障，和當初地狹人稠的景況完全相反。等到歷史的迴環再進展一步，新出生的領袖逐漸把國內的種種生活奠定了，於是一方面既有比較有能力的平民，一方面又有比較充裕的生計，做領袖的人乃得舒展他們的天才，把中國引進到一個人文進步的時期裏。

所謂中國歷史的迴環大致如此。在一個大迴環之中當然時常有小的迴環穿插其間，又有

臨時發生的事故加以點綴，例如天才的出世、外國思想的輸入、和與一個新的民族發生接觸等等。但無論如何，迴環性是中國歷史裏一件根本的事實，在許多別的國家的歷史裏，也未嘗無同樣的情形，不過形式上不免大有變動罷了。這個迴環性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並且了解他的人很少，所以我不能不就中國的材料，加以詳細的解釋。尤其不能不解釋清楚的是，爲甚麽就是在人文進步的時期裏，人才的銷歇已經下了種子，結果終於釀成內政的混亂和大規模的人口減殺。

二一 北中國與南中國

近代的中國有許多大可注意的特點，其一是南方和北方的大相懸殊。 從這種大相懸殊的情境中，似乎可以看出自然淘汰在中國北方害多利少的影響來，並且可以看得很淸楚。 因此我想詳細的解釋一下。 在解釋的當兒，我們也可以尋出種種事實來，多少和有迴環性的全部中國歷史有些關係。 中國的事情，從西方人眼裏看來，往往有些奇特，如今南方和北方的懸殊性，也是奇特不過的。 南北情境不同，原是人文地理學上常有的事，所以不同的情狀，各地也大致相似，但是中國的恰恰和普通所見的相反。 通常同一地域之內，大抵緯度數目低一些的部分的人文進步要比高一些部分的稍遜一籌。 換言之，就是離開赤道較遠的要比較近的佔便宜。 所謂較遠，當然也有限制，氣候嚴寒、生活艱苦的地方便談不到人文，更談不到進步。 這種緯度數目的大小和人文進步的遲速的關係，在歐洲、亞洲西部、印度、和北美洲都可以看出來。 其在南半球，也是如

此，南美洲人文領袖的國家要推阿根廷和智利，在非洲，便推南非諸邦。 但是中國的人文狀況，却是進步在南而比較不進步在北。 就全世界而言，除了西洋人新近移殖的若干地段外，其他在赤道南北二十五度以內各地的人文進步，似乎沒有一處可以比得上南中國的。 只此一端，便足以證明中華民族確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一個民族了。 但是從北緯二十五度以北，尤其是在三十五度至四十度之間，那種人文凋敝的情形，除了亞細亞洲的中部以外，恐怕在全世界上也尋不出一個敵手來。

中國人自己很早就看出南方和北方的不同。 他們自己說，南方人喜歡遨遊，容易採取新的見解，求智識的慾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勸導，風俗習慣富有流動性，做事很有火氣，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手腕傾向急進的一方面。 北方人的品格恰好相反，他們愛家，情願困守田園，不容易採取新的見解，很有決心和毅力，主意一經打定，誰都動搖他不得，風俗習慣富有固定性，做事很慢，但很有耐性，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手腕傾向保守一方面。 和中國人不大有好感的人便說南方人很聰明，但是易於感情用事，不穩健，靠不住，甚或情令智昏，忘其所以，北方人却是蠢到一個不可名狀的

地步，但是比較誠實可靠。

這一番話，不管說好說歹，都有幾分眞理；凡是仔細研究過中國的人，也大都可以見到。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起自南方，滿洲皇帝被迫退位，也是南方人的力量。 一般的中國人對於公衆的責任心本來極端的薄弱，因爲責任心薄弱，所以就絕對不宜採用民主性質的政治方式。 但是革命的結果居然把民主式的政府生呑活剝的建設了起來。 這又是南方人做的事，這是他們急進的趨向的表現。 中國人的公衆責任心當然不是完全沒有，但是所有的一些只有在南方可以看見，至少是在南方人中可以看見。 但是中國北方却始終擁護着舊局面。 北方人起初運動復辟，復辟不成功，就把民主政治轉變成極端保守的寡頭政治，政權完全歸少數武人掌了去。 用西方的標準來打量，就在中國南方，保守性也未嘗不重，但比較起中國北方來，却已大不相同了；我們的觀察本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如此我們也就可以說，南方人比較富裕，比較奢華，比較好逸惡勞，比較喜歡聲色貨利，比較慷慨，也比較不修邊幅；北方人比較窮苦，比較省儉，比較嚴謹、不放肆，比較吝嗇，行檢也比較整飭。 但這許多字眼都要根據了中國文化的背景來體會，不能用西方文化的

背景來胡亂估量。

中國南北兩部的相反，有許多方面可以觀察到。例如南方人，尤其是廣東人及其他東南沿海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喜歡遠遊。總算起來，他們前後到新加坡、馬來諸邦、爪哇、台灣、美洲和其他外國的不下數百萬人。北方人也不無移殖的行爲，但移向之地只限於滿洲蒙古兩處，嚴格講來，實在算不得移殖，因爲滿蒙都屬中國的版圖，並且移殖的人時常回到家鄉，沒有打算在滿蒙成家立業。南方遠遊的人，大率在國內外經營着很大的工商業，北方人却很少有這種情形。馬來半島、爪哇、台灣、和其他東印度島邦的實業鉅子有許多是中國人，他們經營着大規模的蔗糖、樹膠（卽橡皮）、茶、咖啡，等種植業；他們也有在錫礦、糖廠、和其他大工業裏投資的。

我前在上海的時候，遇見過一箇商界裏的人，他所和我談起的經驗，很可以做我們上文一番議論的見證。他生在廣州附近，十四歲的那年，獨自一箇人跨海到澳洲去，口袋裏只有預備零用的一鎊錢。他在澳洲做了二十五年生意，但始終覺得澳洲不是他久留之地，因爲無論他的營業怎樣發達，澳洲的商人總不給他相當的尊崇與和平的待遇，就因爲他是一箇中國人。所以最後

他回到中國來，另外設了一個大商號，專和外國顧客交易，信用非常之好，名聲也就很大，他所賣的貨，中西都有，品質道地，價錢公道。初開辦的時候，他聘任重要的幫手，如間各部主任等，大都不問地理上的來歷，隨才任用，大約廣東籍的與江浙籍的各居一半。但是後來人選上逐漸發生調動，到了現在，廣東籍的竟佔了不止一大半。爲甚麼呢？因爲據他說廣東人的能力比江浙人要强，而可靠的程度至少也不亞於江浙人；嚴格說來，這兩處的人都不能算十分誠實，這不過是比較的罷了。講起誠實這一層來，倒要推山東人，他們比廣東人上海人都强。但是爲甚麼這個商號裏不雇用他們呢？因爲他們太遲鈍，太不善應付。這位商人自己是商界中的一個成功者，他完全能運用西方商業上貨品一律和交易公平的原則，但是對於別的中國人他就不肯輕易置信，因爲他最後對我說，中國人做事，除了他個人可以得到的利益外，再也不關心到別的東西。就是爲他們自己打算，他們的眼光也往往很近，他們不了解凡是一個絕對的誠實不欺和抑私濟公的人，眼前雖喫小虧，日後必收大利。

南方人比北方人精幹，也可以從現代中國領袖人才的籍貫上研究出來。我在中國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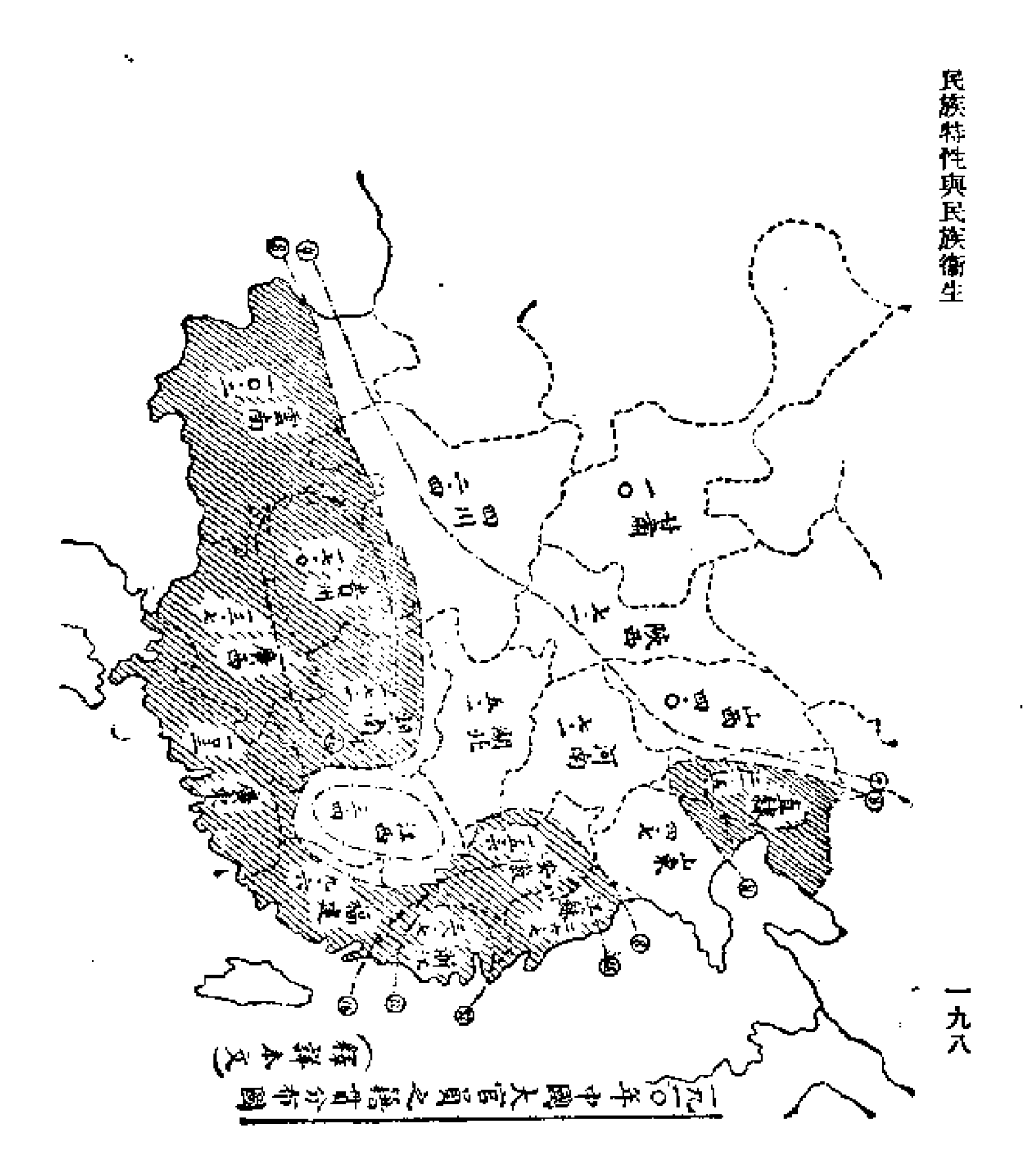
僥倖遇見過不少的領袖人才，我也用過一番心思，想遇見愈多愈好，但當初沒有留意打聽他們的籍貫。我在北京筵席上所遇見和因別的關係時常晤面的七位重要人物，只有一位是本地人，他却是一個旗人，有五位是生長在長江以南沿海的幾省的，還有一位我就說不清楚了，

要確切研究這一層，却並不是沒有方法。北京美國公使館裏有一位普萊士先生曾經替我想了一個方法。他借給我一張縉紳的名單，上面所列的是一九一〇年十月間的京城裏各部院的大官和各省的封疆大吏，那時候恰好是革命爆發的前一年。從這張單子裏，我把凡是得過功名，就是經過科舉制度的甄別的官員，不論他是秀才，是舉人，或是進士、翰林，都挑了出來。有許多武官，當然挑選不上，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科舉甄別的手續。

挑選的結果，除了五十個旗人，十五個蒙古人，和十四個漢軍的旗人以外，中國本部十八省所產生的共有三百二十四人。用各省同時的人口做比例，這三百二十四人的分布就非常的不平衡。例如甘肅一省，通扯要有人口一千萬，才分派得到一個經過科舉甄拔的大官員，再如浙江一省，一樣一千萬人口裏，就可以產生差不多四十個（三八・七）這樣的官員。這不是大相懸殊

麼？各省的分布如下表：

直隸	二一・五
山西	四・〇
陝西	七・一
甘肅	一・〇
山東	四・七
河南	七・一
湖北	五・一
四川	二・四
江西	三・四
江蘇	二六・七
安徽	一五・六



一九一〇年中國大官員之籍貫分布圖
(錄潘全文)

浙江	三八・七
福建	九・六
廣東	一〇・三
廣西	一三・七
雲南	一〇・二
貴州	一七・〇
湖南	一七・一

在表中除了湖北、四川、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比較居中的六省不計外，北方的六省中只有直隸高出七・一之上，其餘五省每一千萬人口中至多只派得到七・一人，至於南方六省，推福建最少，然而每人口一千萬中，已經可以派到九・六位大官員。中部近海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出的大官員極[illegible]、[illegible]地三省則又甚少。直隸的情形有些蹊蹺，因爲北京久爲首善之區，數百年來，聰明精幹的人，[illegible]移住的一定不少，大都麕集在京城之內或北京附近；北京一帶積聚得愈多，其餘北方諸

省就愈覺得相形見絀了。 除了有特別情形的直隸一省不論外，附印的那張大官員籍貫分布圖至少可以教我們得到一種顯明的印象，就是中國有才力的人、因才力而能殼受嚴格的鄉會試甄拔的人、又因此而能在許多人競爭之中得做大官的人，大致愈向西北愈少，愈向東南愈多。 這不過是一個印象的結論，眞要確實證明這一點，非廣搜同性質的材料，而加以詳細的分析與歸納不可；但是大官員分布以外，既無別種事實可以引來作爲南方强於北方的旁證，我們這個印象的結論，雖不中的，但怕也不遠了（譯者註二）。

除了人才的分布以外，還有很多的事實可以指出南北兩方的不同來。 假如你到廣州去，你在街上總可以遇見許多女子，老的少的都有。 一日之間，總有兩次三番，街道上滿擠着幼年的女學生；男的也有。 女學生都很可愛，身上穿着輕便的白色的短衫，黑色的裙子，雙幅可以中分，約略比膝節低一些，脚上穿着白襪和低跟的鞋子。 烏黑的頭髮往後梳得很光，最後辮成一條長的辮子，拖在後面；在黑髮籠罩之下，一副小圓白淨的面孔，隱約帶些黃色，往往引起旁觀者的美感；她們笑的時候，又可以看見她們很可愛的酒窩。 她們一面走，一面講話，臉上不時作生動的微笑。 略

上了年紀的婦女們也大都有白淨的臉，除非被太陽曬黑了；她們的言語舉止也很活潑，足以表示她們的生活並不十分愁苦。她們有天足的，但也有許多是纏過脚的，走起路來，不住的搖擺，好像一件東西，上重下輕，上大下小，放不穩似的，看去很是可憐。從三十歲到四十歲光景的婦女往往有纏得很小的脚，但比上年紀的纏成一箇圓錐形的似乎好些，因為十多年二十年前她們已經有機會把脚放了。至於三十以下的青年女子，便沒有一個不是天足的，至少沒有一個有特別小的小脚的。

再看廣州的男子，有幾箇有辮子的？除非你立意搜訪，恐怕就尋不出一箇來。事實上當然不是絕對沒有，不過很少很少罷了。有衣衫襤褸的麼？差不多沒有。有叫化子麼？不多幾箇，並且也不死命要錢，不很惹厭。街道上所看得見的，十有八九似乎是比較的食飽衣暖，心無罣礙，至少用中國人的標準看來是如此。他們走路很快，比較別地方在同等緯度內的居民大都快些；熱帶裏的居民大抵行動遲緩，廣州也在熱帶範圍以內，然而却是例外。他們工作起來雖然不很快，有時並且費許多功夫坐着空等，工作上如須斟酌籌畫，費的功夫就更多，但想起他們所處的氣

候來，我們已經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奮發有爲了。在別的熱帶的社會裏，女子比男子要勤勞，在這裏也是如此，有搖船的，竭力逆着潮水搖去，也有挑担的，也不辭任重道遠的勞苦。

假如你現在又到濟南去，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你在廣州看見十箇女子，在這裏只好看見一箇。在湫隘的街道上，也看不見載言載笑的大隊女學生。一言以蔽之，山東的女子依舊是閨閣式的，在保守的山東男子的眼光裏，家庭依然是女子一生用武的地方。偶爾在街上看見的幾箇女子，不論貧富貴賤，皮色大都比廣東女子要黑些，男子也是如此。青年女子和上年紀的婦女們看上去也沒有廣東人一般的好看和聰明，北京教會學校裏的女教習對我說過，凡是皮膚最白淨、最好看、最伶俐，但未必最用功讀書的女學生，大都是從南方來的，至少是南方大族的子女，上代遷移到京城裏來的。在濟南遇見的婦女，並且十有九箇是有小脚的，就是青年女子，甚至於幼年的，至今還要受纏脚的苦楚。至於男子的髮辮，我在濟南的時候，一想到它，我就動手數起來。我最初遇見的一百箇男子裏，恰恰五十個人有辮子，有的照常拖着，有的盤起來壓在帽子下面，其餘五十箇却已剪去了。有人對我說，要是我出城到鄉村裏去尋去，一百箇男子中總可以挑出九十

條辮子來。卽此一端，便見得山東人的長於保守了。但是，說也奇怪，從體格方面看去，他們要比南方人强健許多。他們身材高大，骨幹又整齊，又有分量，望去充滿着活力似的。活力二字似乎太好一些，其實不過局部見得有力量能了。在北方城市的街道上，你遇見的疾病痛苦的痕跡，實在要比南方爲多。衣衫襤褸的人，也隨處可以看見，至於乞丐，竟像蒼蠅蚊子一般，糾纏你一箇不休。假如你遊泰山，在濟南以南一百里光景，那裏乞丐之多，眞好比一窩蜂子，你循了大石道上山，他們可以緊緊地跟上十幾里，直到山頂；他們可以把你團團圍住，把他們的跌斷的脚、爛殘的手，逐一展覽給你看，他們還要不時的指腹搥胸，表示那裏面已經空了兩天了。

歷史上的山東是中國人文進步的中心，如今竟會落伍到這般地步，眞不能不令人驚怪（譯者註三）。公歷紀元前四五百（原文誤作三百）年，孔子孟子先後生長在山東，中國人文進步的勢力，從此就像車輻似的從鄒魯的轂點出發，散布全國。論起氣候、疾病、和生理上的健康與體力來，山東的確比廣東的地位要好，山東冬天的氣候冷些，教人提得起勁來，廣東在夏季總有好幾箇月，旣潮濕，又酷熱。住慣了中國北方的西洋人，抱怨着北方冬天大刮風沙，夏令悶熱不退，但從全體

講來，他們總還覺得舒服，沒有多大埋怨的；但是久住在上海以南的各地方的，常說南方濕熱的氣候很傷他們的元氣。

還有一件可以詫異的事：中國的南方人雖比較北方人爲進步，北方城市的歐化程度卻比南方爲深。天津和北京兩處不但有一大部分的市街差不多和歐洲大城市的無異，並且有電車的設備，北方的大城市大半有很寬敞的新式馬路，人力車和汽車可以自由通行。但是南方的都市，即重要如福州和汕頭，只有幾英里長的馬路可以駛行汽車，大部分的街道連人力車都不易於通行。我一九二三年到過廈門，那時候除了幾輛垃圾車以外，簡直看不見甚麼有輪子的可供轉運的傢伙。這究竟又爲甚麼呢？有人說因爲在北方做官的大都是南方人，他們自己早就受過西化的影響。這層意思有些似是而非。北方的大官員，除了滿洲籍和蒙古籍的以外，的確大都是從南方來的；但要曉得南方本地的大官員，又何嘗不是南方人呢。據我猜度起來，北方大都市歐化之所以很快，一部分怕因爲最近的北中國又正經歷着一度新的移民侵略的影響，和以前狄人與胡人的侵略有些相似。這種向南侵略的分子，不管是北方那一族裏出來的，總比他們一般的

族人更有才力；如今北方都市歐化的成績，怕局部就是他們才力的表現。 換言之，就北方從移民侵略中產生的少數領袖人物看來，北方進步的速於南方本來在情理之內，因爲旣有相宜的氣候，又有傑出的人才，自然不怕沒有進步。 但是就大多數的平民看來，怕另外有別種原因終於使北方趕不上南方。

這別種原因又是甚麼？ 一般人總說南方和歐洲發生接觸較北方爲早。 我在中國問了許多人，他們異口同聲的這樣答覆我；許多關於中國的書籍，也是千篇一律的作此論調。 但我很覺得懷疑。 有好幾箇理由。 第一，要是南方人的進取性是受了西方文化勢力的薰陶才發生的，那末，爲甚麼在沒有和西洋人接觸以前，有許多舊的記載告訴我們說，中國南方人進取的勢力早就伸張到國外去呢？ 第二，錫蘭島上的土人和西洋人發生關係，比中國南方人還要早許多，但是他們的能力和進取心至今並不見得增加；他們出外遠遊的風氣也並不見得發達。 反過來，日本人和歐洲發生接觸，尤在中國南方人之後，然而他們的進步却遠在中國南方人之上。 這又怎麼說呢？ 第三，東三省，尤其是東三省北部的中國人，據說比任何地方的中國人要奮發有爲。 就是在

靠南的奉天省城，我當初遊蹤所及，就覺得比任何別的都會要有生氣。我聽人說哈爾濱也是如此，活潑的程度比奉天似乎更高一些，由此往北，還要厲害。但是這許多地方除了俄羅斯那一條路以外，向來和歐洲的接觸，可以說等於零，就是和俄國方面的關係也是在西比利亞鐵道通車以後，至于粗具端倪，那就在一九一〇年以後了。總之我們若把錫蘭、馬來半島、中國南部、中國北部、日本、和關東三省各地進步的程度比較一下，同時再比較他們和歐洲發生接觸的遲早久暫，我們可以看這三宗事實之間，實在沒有甚麼關聯。

我把上面的意思對中國人說了之後，他們又想出了一個別的原因來解釋南北的不同，這個原因就是種族的混雜。他們說，北方的中國人有蒙古人和滿洲人的血種，南方的中國人有馬來人的血種。這種血種上的混雜，多少確是有的，但究竟和南北的不同有何因果關係，却不容易看出來。在中國南方，我們的確可以遇見鼻子又闊又扁的人，有的望上去很像內格羅種人。有許多南方人的皮色很黑，好像眞有馬來人的血在裏面，或者是因為加上了狄克遜 (R. B. Dixon) 所稱的原始內格羅種或原始澳洲種（譯者註四）的血，也未可知。這種種都可以認為事實；但是

者甚至這事實便是南方人比較聰明伶俐的原因，那就絕對沒有證據了。　大凡膚色黑些好像含有幾分惰性的中國南方人大都是農人或是苦力；至於上流社會的人，左右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的人，卻都很白，比北方人還要白些。　我在中國南方遊歷的時候，向他們打量，尤其是沒有經太陽曬黑的公司書記和婦人女子們，慣常對自己說：『這些人實在算不得是有色的人種，他們連黃色都沒有；你看，雪白的臉上和兩頰上不還添上粉紅的血色麼？』　由此言之，中國南方的特點似乎是最純粹的華人所造成的，和夾雜的別的血種無關。

　　至於北方人，他們中間的蒙古血和滿洲血，卻與比南方人為多，並且所含的總量也確不在小。難道北方人的遲鈍愚蠢，又是這多量的蒙古血和滿洲血為之厲階麼？　當然不是。　不但不是，並且適得其反，我在上文『中國歷史中的迴環』裏說過，這班向南方侵略的滿洲人蒙古人，都是比較堅剛強幹的人；上文論到經過科舉的大官員的分布時，他們的人數比例起來非常之大，也就可以證明他們的能力了。　在咿唔呫嗶向中國舊書堆裏討生活的把戲中，他們既不多讓，其它可想而知了。　總之，我未嘗不知種族混合的重要，因為它確能轉移一個民族的民族性，但是對於我們

目下的問題，就是何以中國南方比較進步，北方比較退步，而極北的東三省又反而比較進步，這個種族混合的說數答覆不來。

南方人的進步既不因爲和歐洲接觸較久，又不因爲和異族發生血統上的混合，却有一個綜合的證據。南方有一派中國人叫做客家人。他們的來源很是奇特，但在我們的定義之下，他們却是很純粹的華人。客家人的總數約在一千萬以上，大部分住在廣州東北部和福建西部迤西的山裏。客家的名稱，英文是 Hakkas，在東方人類學上已經有相當的位置。客家人向來很受土著的歧視，土著把他當做非中華的蠻族（譯者註五）。要是你在廣州或汕頭向苦力或商人打聽誰是客家人，他們大概答覆你說，客家人怎樣野蠻，怎樣墮落，怎樣和強盜差不多，怎樣不當心他們的婦女，怎樣危險，一類的話。但若你繼續打聽，你就可以發見，在新加坡、暹羅、台灣、與荷屬東印度羣島一帶的苦力，凡是特別有能力的，大都是客家人。廣州一帶本地的苦力不如客家人能幹，怕客家人搶他們的飯碗，所以說他們的壞話。客家人向南經商的也很不少。據說汕頭就有一萬五千人光景，有許多有名望的商業鋪子便是客籍的。在廣州也是如此。跨海而南，也隨處可

以遇見客家人，因為他們都是喜歡遠遊的。 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是客家人；當我寫這幾句文章的時候，廣州正有一位軍人想把孫中山擠出去，那位軍人又是一個客家人（譯者註六。） 總之，客家是一派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們的勢力逐漸從閩廣邊界的山地向東向南伸張，慢慢的把沿海的人口排擠出去，所以當地的土著很怕他們，時常誣蔑他們。

但是若有機會向熟悉客家人的歐洲人打聽，你所得的結論就大不相同了。 我很僥倖的遇見過好幾位在客家人中間傳道的教士——外國人中惟有教士才真正了解中國人的家庭生活。這幾位教士的意見是大同小異的。 有一位是士拜克先生，他和客家人相處很久，也住過汕頭山東南處，遊歷的地方也很多；他說：『客家人是中華民族的精華，好比牛奶上的奶油一般。』 他有很充分的理由說這句話，別的教士也如此說。 例如，他們說：真正華人中間，唯有客家人是一向天天洗澡的，也惟有他們從沒有纏過腳；客家婦女不但是非常好看，並且特別受男人的尊敬；客家女子很享受一些生活上的自由；土著的廣東人不解此意，因而說男子不當心她們。 這一番話的意思並不指客家人的道德標準和歐美人的一樣，那就不確，中國人的道德觀念沒有一處和歐美的

相像，客籍人的也不是例外。中國南方人的行檢，本來沒有北方人的嚴謹，這和氣候的寒暖有相當關聯，沒有甚麼奇怪。關於客家人的生活，我們如今要注意的，不外女子比較的自由，也比較的有勢力，不受嚴格的法律和風俗的束縛，如同別處的中國女子一般罷了。

客籍人中間，還有一件可以引人注目的事，就的教育的發達。在他們最繁衍的地方，據說男子中間百分之八十可以讀書動筆。嘉應州（即梅州，民國改梅縣）城裏人口不過一二萬，但是他們所謂中學的學生却似乎有三千人之多。有一部分的學生，大概是從附近的村鎮來的。但無論如何，很小的人口中間，竟產生這許多學生，偌大的中國境內，恐怕尋不出第二個地方來。有一位教士寫着說：

客家人比城裏的人勇敢，富有特立獨行的氣概，渴愛自由。普通山居的民族大都如此，客家人也是如此。滿洲人入主中國，客家人降服得最遲，並且曾經一再起兵反正，第一次就是太平天國的事，第二次就是這世紀內新近的革命。梅州居民的房屋整齊高大，在中國別的內地地方，恐怕不容易尋出一個對手。在興甯的客籍的各式手工匠，手藝之精，中國別處的

匠人未必能出其右。（語出艮貝爾，見下文一一〇頁。）

客家人是十分純粹的華人，上文已經說過；他們可以說完全沒有和外族的血統發生過混合；除非很古的時候，在中國北方和很早的一派蒙古人發生過關係。他們住得離海很遠，當然不會和歐洲的影響輕易發生接觸。但是南方人比北方人進步的最大的動力和最大的表現，恰正好在他們中間發見得最多。南方人有比較進取的品性，而這種品性在客家人中表現得最强有力；今對於客家人的進步既不能用文化接觸或血族混合來隨意解釋，其他比較不如客家人的進步，例如在廣州一帶或其他沿海一帶的，當然更不能解釋了。再如東三省的居民，大部分是從已經進步的山東直隸吸收來的，他們如今却也稍發有爲，爲關內所望塵莫及。這一班吸收來的山東直隸人又何嘗和歐洲文化發生過多大關係，或接受過多少外來的血種呢？客家人和在東三省的直魯移民，所以這般有能力，最後怕還是得力在自然淘汰或自然選擇。一般比較優秀的南方人也是得力在此，甚至於孔子時代的山東人，即耶穌誕生六七百年以前的山東人，也未嘗不得力在此。這都留與下文交代明白。



二二　饑饉薦臻的夏楚

荒年和生計的艱苦對於中國史上盛衰興廢的關係，我們在上文的「中國歷史中的迴環」的一章裏已經提過。中國的人文狀態，一壁有東三省和東南各省的進步，一壁有西北各省的退步，探本尋源，也是和饑饉的薦臻有重要關係的。荒年有淘汰的作用，北方每經一次荒年，人口的生態上就要發生一次大變動，有的死亡，有的勉強生存，有的移徙他鄉，別尋樂土；剩下來的大都是苟延殘喘，頑劣無能之輩；至於移徙出去的當然比較有能力些，但是移到附近城市中的，後來也不免死亡；惟有那些走得遠些，到東三省、東南各省、或別的比較進步的邊省的，才有重整生計的機會。在這章裏，我們要研究歷次的荒年究竟怎樣行使它們淘汰或選擇的功用，至於淘汰後的中華民族作何狀態，有何特別的品性，我們留到下文第二十三章裏再說。

又擴大又持久的荒年，在中國北部是常有的事，在東三省很少，在中國南部，差不多從未發生

為。

中國北部的雨水，大率集中在夏季的幾個月內；要是來得遲一些，穀類的初期生長就得靠人工灌溉。要是到陽曆七月還沒有雨，或雨水很少，這一年的收成就要絕望。這種情形在中國南部是可以說沒有的，南方的雨水要比較的勻稱些，並不限於夏季的月份內；在東三省這種情形也不常見。那邊的溫度比較低些，所以地面的蒸發也比較不甚厲害，同時春秋兩季的陣雨也比關以內的中國的北部要多。

久旱之外，中國北部又常有大水，這也是荒年的一個原因。水災發生的區域往往就是旱災發生的區域，並且發生起來，又往往在同一的時期裏面，因為久旱的地方，一旦旱止雨來，這種雨便非常的大，來時真像翻江倒海一般。中國北部的山陵，又是石多土少，十分磽瘠，並且所有的森林，已經砍伐殆盡；平坦的區域，又是平得非常；大水之來，浩浩蕩蕩，毫無阻礙，所以災情便越見得一發不可收拾。我在各國遊歷過多年，足跡所經的平原亦復不少，但從來沒有見過比中國北部水災區域更平的了。數百哩之間，極目望去，很像無風的海一般，瞧不見一些波濤起伏。夏季大雨的時節，一連幾天，就可以造成一片一尺來深的汪洋，望去毫無邊際。若再加上河水的汎濫，災情就

越發重大了。 河水從上流山陵之地流來；山勢既峻，山坡上的泥土又淺又鬆，一經大雨的衝擊，便都順流而下，所以河水裏面總是夾着多量的泥土。 有的河身同兩岸一般高，有的竟高出平地之上，於是平日非預先築堤防堵不可。 但往往就是有堤也不中用，只要水勢大些，就不免於潰決，使兩岸數十哩之間受到很大的損害。

有時官吏營私舞弊，可以使水災的災情更加不可收拾。 山東省城以北，歷次開掘了好幾條並行的小渠，大約每隔三十里便有一條；它們的功用是在宣洩運河裏過量的水。 平時無用的時候，渠口用泥土填塞，所以渠底是乾的。 這一帶的土壤自然很值錢，據說每英畝可值美金二百元，即約華幣六七百圓，要是移到美國來，就等於值一二千元，因爲美國的生活程度高，所以地價也相對的提高。 這種值錢的東西，當地的貪官劣紳那有不注意的道理？ 他們就據爲己有，教人在乾的渠底上耕種，他們便坐享其成。 一旦雨來水發，照例應當把渠口開掘，把運河裏多餘的水宣洩出來，但是這些官紳們怎肯？ 這不是教他們幾個月的心血完全斷送了麼？ 他們知道一有大水，便準有荒年，一有荒年，他們許多不正當的財源準要斷絕，別椿財源既都不保，他們又怎肯把這一

棒輕輕的放棄呢？ 所以幾百年來，凡遇到這種官紳當道，這些渠口是不開的，一九二一（民國十年）那年就是如此。 結果運河的水就汎濫出來，把附近的平原都淹沒了。 可是官紳們的渠底，因爲兩岸築着高高的堤，居然就沒有殃及。 老百姓們的田地，比渠底的面積要大什伯倍，却都成了澤國；裏面的收成，指望着要維持幾十萬口一年的生命的，也就完全斷送了。 這種情形在中國沒有甚麼希奇，這可以說是出乎中國人的根性，因爲要知道自私自利是中國人最大的一個弱點：可是說也奇怪，一個人要是沒有這種畸形發展的自私心，也就抵擋不住那種慘酷的荒年，它有它的功用，我們讀到下文就明白了。

河水汎濫的結果，不但把田禾毀了，並且把農民土做的房子也沖洗一個乾淨。 我們不要以爲凡是常患水災的地方，住家的房子一定造在高出平地的土墩上，無論水漲至甚麼程度，可以不致浸濕。 這當然是不確的，不要說在中國，就是在美國，又何嘗有這樣周密的防備呢？ 這只要把災區受災後的情形打量一番，就明白了。 水災是三年兩頭有的事。 災民當水退歸來的時候，簡直是『手捏兩爿皮』，窮苦得不堪言狀，他們第一件事是把水浸過的田地重新整理一過，接着就

要播種，又要造新的土屋。 一刻千金，誰有這閑功夫來挑土墩；挑土墩是何等費工力的事，尤其是災荒之後，牛馬一類可以負重的家畜是找不到的，他們自己未嘗不想有一天好日子到了，他們可以留出工夫來挑土墩造新房子；可是好日子永不見到；只要連上兩年沒有水患，他們健忘，以爲生活很安全了，可以無須另起爐竈。

關於挑土墩一層還有一小點該說的。 中國平原一帶的人口稠密極了，就在平日，已經感覺到糧食的不敷分配；所以農民把田地看得異常貴重，寸金尺土，種植之外，不作別用。 若爲了造房子挑土墩，勢必將田裏的土壤減少，並且不免在田裏挖出洞來，無端添許多水窪，當然是絕不經濟的事；因爲少一分耕種的土地，就添一個挨餓的人。 美國人幸而生長在一個天惠特別厚的地方，生活上總是綽乎有餘裕，便很不容易體會到人口過度和生活程度低的痛苦與憂慮。

讓我們把水災的情形再描寫一下。 大雨來了，地上就浸透了水，河水往上直漲，不久就汎濫到岸上。 水在地上積到一兩尺深的時候，秋收便完全無望了。 接着房屋發生危險。 他們本是曬乾的土磚做的，所以牆壁一着水就發軟。 不上幾天，茅草的屋頂就把牆壁壓得東倒西歪，終於

整個住宅，以至於整個村子倒塌了爲止。這是水災區域裏常有的事，不倒塌的村落是難得看見的例外。要是村子四周築有堤壩，村民的安全還可以多保幾天，可是中國人的惰性很深，平日對於這種防禦工程往往不加修葺，任其剝蝕，加以自私心很重，無事的時候，誰都不肯出頭，出頭了也不能號召衆人來做修理的事。所以千百年以來，災去災來，田禾的損失、產業的蕩焉無存、家庭的流離失所，動輒以千萬計。農民的牲口，最後也都不保，因爲農民把它們賣了，好買糧食。

許多挨餓的災民就向沒有災的地方覓食，叫做『難民』或『流民』。這『難民』或『流民』的名目，二千年來，在中國占有很大的地位，現在還是如此。那些損失了莊稼以外又損失了房產的人，心無罣礙，可以立刻變做難民。有房產的也許有一些積蓄的糧食，可以敷衍一時，水勢略退，也許還可以在田裏挽回一些造化。他們大概可以度過秋天，但是到了冬天，許多也祇好上路了。有的難民要在外就擱很久，才回去有事可做。田地一經水浸，就不容易乾。有許多直要到秋天乾燥的氣候『落正』之後，才逐漸乾起來，可是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下種了，就是白菜也種不熟，因爲很冷的冬令不久就要來到。南方未嘗沒有水災，但災情之重遠不如北方，一部分也因爲長江

以南，有許多穀類蔬菜可以在冬令下種；江以北就不行。

冬去春來，中國北部的災民有的還是不能着手耕種。因爲大水留滯的時候，把土裏所含大部分帶有鹻性的化合物都給分解了，水退之後，地上就添上一薄層白的沉澱。科學進步的人民也許會設法把這種沉澱用人工洗去，但是中國人對此，便一籌莫展了：他們只好等着，讓自然的勢力把含有鹻性的物質重新調劑一過以後，纔着手耕種。因爲這種土質上的變動，一時不易恢復原狀，難民欲歸不得，竟有在外流離至數年之久的。此外還有一種歸去不得的難民。水漲的時候，河流有改道的，這些難民的家宅田產，不幸恰恰在新河道的中間，後來河水雖歸故道，可是凡屬河水流過的田地上，都鋪上一層細沙。細沙所佔的面積往往很寬，黃河改道後遺下的沙有寬到數英里的地段。論起淺深，自幾寸到幾尺不等。但無論淺深如何，其不宜於種植大多數的農產物則一。細沙只有幾寸深的地方，還可以把他翻到土裏去，和土混在一起。這可是很費力的一件事，尤其是因爲沒有牛馬的幫忙。並且卽使做到了，這種泥沙混合的田地自然沒有以前那般肥沃，將來的收成一定減色，少不得要多幾個人有挨餓的機會。細沙堆得很深的地方，難民們一

且歸來，只好選略爲淺些的地段把他整個兒的挑走，至於挑走的沙也無非是移東補西，堆在別的地段上；要不然就直接在沙地種果樹或其他可以在沙地裏生長卻不能供給多量食料的農產物。結果，一部分的農民依舊不免挨餓，依舊不能不出去當難民，除非打頭就餓死了。水災可以損害土質的事實，別處也有，可是別處所受的影響，很少像中國一般的厲害。有一位沽爾門先生告訴我說，美國剛塞斯河流域裏在剛塞斯城迤西一帶的土壤，也受同樣的損失。剛塞斯河春天往往發水，水退之後，有時留下一層很深的細沙，致兩三年內種不熱馬鈴薯。低窪之地，細沙層的闊度，也可以從五英里到十英里。

人口過剩和荒年兩件事，在中國二千年的歷史裏，是時來時去的。我在北京的時候有一位韋爾特博士告訴我一樁事實，從這樁事實裏就可以窺見現代中國人口過剩的一斑。離北京不遠，有許多小村子，它們在平時好的年頭，就只指望每年的收成祇供給九個月或十個月用的糧食；那裏的田地就根本不夠，換言之，他們生殖得太快了些。秋收以後，他們就快快的把明年農事應有的預備功夫做完了，然後闔村出發，去覓食去。每家又把一部分的種子留了出來，剛彀來春播

種和『青黃不接』期內維持生活之用。其餘就作秋盡冬初的糧食，等到喫盡了，他們就把門窗用泥磚封砌好了，然後起身。泥磚而外再無別的保障，是不消說得的了。村民出發的目的地不外比較殷實的城市或鄉鎮。到了那邊，有工就做工，沒有工，便討，偷，搶，甚至於結夥打劫；在人浮於事的中國，尤其是在冬天，平均一人派一事，不論那件事怎樣無聊，怎樣乏味，便十有九個人要賦閑；結果，做散工的一途自然是沒有多大希望的。再不然，就簡直往遠處做移民去。可是中國北方人保守得厲害，走這條路的實在很少。他們但求苟延殘喘過了冬天，一等春天來到，便趕回家鄉去。離家有數月之久，但是說也奇怪，『歸來池院皆依舊』，泥磚封砌的門窗，絲毫沒有變動。這是全部情節中最有趣味的一段。因為大家都窮得厲害，因為大家都承認出去當難民的必要，日子一多，居然形成了一個新的道德觀念。這個道德觀念是：盜不入泥封的房屋。你可以在路上當霹手，可以進有人的住家當小竊，也可以擄人勒贖，也可以明火執仗的搶劫，但是不能動半寸封門窗的泥磚。這便是韋爾特博士告訴我的話，沒有半句是我自己潤色的。韋博士是在華北多年的老教士，所以對於當地居民的疾苦十分熟悉。他後來又同我說，新近賑災的時候，曾經有人

附帶調查過這一帶村民的智力，認為全部看去，恐怕都還不及平庸的程度。恐怕比「騃癡」（譯者註七）程度的低能高不了多少。這沒有甚麼奇怪；大部分是反選擇的自然淘汰的效力，我們在下章裏就要說到。即使沒有這種淘汰的效力，一個從出世那天就挨餓的人，身心兩方面自然也不會有充分的發展。

上文所述種種在中國歷史裏都算不得新奇。我們從李美步女士的中國經濟史裏就讀到下列的一段引文。李女士所引的不止一家，這不過是一個小例罷了。我們在這裏不妨提一筆：李女士是中國留學生中有數的女哲博士，這本中國經濟史便是她在哥侖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寫得極好。下文引它的地方很多，字句上我曾經略加調動，但所敘事實與原文毫無出入。下面第一段，據我所可以確定的，是發生在公歷紀元後一五三〇年（明世宗嘉靖九年）或以後，原文是一個在陝西的官員寫的，他先到安徽，後來又到雲南，路過災區，文中便寫他所見到的情形。那時候正是陰歷七月以後，在好年頭就該有東西可以收成了。

我看見田裏的小米（亨氏按李女士原譯文作大米）差不多完全被蟲喫了，尤其是在陝

西河南一帶。 我過潼關的時候，我看不見有甚麼可以收成的晚黍。 路上難民絡繹不絕。行程中間，偶爾可以看見有人做收成的工作；我就很高興的向他們打聽，却發見他們所收成的是一種草。 那一帶有兩種草，一種軟些，一種像細絲。 兩種都可以用來做麵條；據說飢民們靠它過活，到今已有五年了。 我自己也嘗了一下，覺得很難下嚥，粗劣得觸嘴，吃了下去，肚子裏作怪，好幾天不舒服。 這一班小民的困苦顛連真正是罄竹難書。 （譯者按，原文見通紀會纂一書，因一時檢覓不易，轉從英文用白話文譯出，下文中凡屬一時不及檢出之此類引文，概從轉譯。）

這裏所講到的荒年大概是因爲久旱，而不因爲大水。 在陝西一帶，久旱是荒年的最通常的原因。 就一般而論，也惟有旱災的荒年，可以延長到數年之久。 水災所釀成的荒年來勢比較凶險，但爲期較短，很少有一塊地方連上兩年都經歷到水災的。 水災還偶然有些意外的好處，要是今年的水小些，高一些而水沒不到的地段的收成便沒有妨礙，甚而至於反比往年好些。 旱災後的荒年則不然。 它的來勢並不十分凶險，它既不傷土地，又不傷房屋；但是它可以拖延好幾年，所

被的面積，可以很大，例如引文中所說的，便已經有五年之久。最不幸的是水災旱災輪流發生的地方，中國北方有許多部分就恰恰犯這個毛病。中國所受荒年的痛苦比世界任何他國要深刻，這怕是一大原因了：印度也是一個常鬧荒年的國家，但還不如中國。

要領會荒年與中國民族性的關係，對於中國荒年的頻數以及它的凶險的程度，不能不先有相當的了解（譯者註八）。我們就從漢朝初年說起。大約在耶穌出世以前二百年，即前漢立國之初，就有一次很凶險的荒年。據李女士的譯文說：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漢書，食貨志。）

一百年之後，又經過了幾次荒年；可耕的土地大都被有錢的地主吸收了去，那時候在歐洲的意大利也有同樣的經濟變遷，並且為了同樣的原因。每逢一次荒年，許多窮人就把土地押給富戶，後來就被富戶吞沒了，

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就食江淮

閒，欲留留處。（漢書，食貨志。）

「元鼎二年，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令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漢書，武帝紀。)

（譯者按右引文頭尾尙有數語出處一時檢覓不到，轉譯爲語體文如下。首數語：『結果，隴畝相接，無非是富人的田地。』尾數語：『又許饑民到江淮的地域去覓食去。』）

又過了五十年的光景，到公曆紀元前四十八年（漢元帝初元元年：）

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亨氏按這一次的荒年可見是旱災造成的。）（漢書，元帝紀。）

公曆紀元後一六〇年（後漢桓帝延熹三年，譯者按此次實發生於紀元後一五五年，即桓帝永壽元年）前後，又有一次荒年，從那一次荒年的記載裏，可以看見中國農民的保守性，從那時候起已經有些顯著了：

冀州饑，人相食，勅州郡賑給貧弱。（後漢書，桓帝紀。）

那時候有一位政府顧問似的官員說：

現在青徐兗冀諸州，地狹人稠，百姓們不能自給。但是「在別的州郡裏」人口稀少，有許多田地閒着沒有人耕種。大體說來，鄉間的細民往往有安土重遷的脾氣。他們情願在家鄉挨餓，不情願出外尋樂土去。所以政府應該把不能自存的貧民移到地廣人稀的州郡去才是辦法。（原文見古今治平略。）

中國農民安土重遷的一點，我們應當記住。因爲有了它，我們就可以把他們現在窮困與不進步的情形解釋一部分。

在舊的記載裏，『人相食』和其他慘不忍聞的行爲，眞是不一而足。公歷紀元後二九七年（晉惠帝元康七年：）

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晉書惠帝紀。）

最可哀的是這一類慘痛的經驗去而復來，川流不息。上千上百關於荒年的記載裏，有一段講到公歷紀元後五七五年（南朝陳太建七年，北朝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的一次，就說：

有許多人，扶老攜幼，穿了草鞋在路上流蕩着。他們早就失去了職業（亨氏按：大概就因

爲以前已經受過災情的壓迫，已經把田地賣給別人的緣故，）早就變做流浪的分子。 如今荒年〔又〕來又加上瘟疫，難怪他們要離鄉背井的流落了。（譯者按此段原文不知出自何書，惟北齊書後主武平五年有曰，『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 又周書高祖建德三年有曰『詔以往歲年穀不登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準口聽留已外盡糶』。又曰『詔蒲州人遭飢乏絕者，令向鄜城以西及荆州管內就食』。 可見這次荒年是在山西境裏，陝西却沒有災。）

經過了一次短期的富庶以後，到公歷紀元後六一六年（隋煬帝大業一一年；）

鄉間的民衆漸漸放棄他們的工作，都蜂擁到城市裏去，因而糧食就不夠供給。 最先他們喫的是樹皮，後來逐漸又喫樹葉子。 等到這兩樣都喫完了，他們就把泥和着糠，當作一種麵粉喫。 最後他們喫人肉。 （原文見古今治平略。）

我們又在別處讀到，獸皮、糠粃、樹皮、葉子等喫完之後，飢民們用一種有黏性的土來止他們的飢，初幾天，肚裏有些沉着，覺得比空着總好些，但是再過幾天，就一個一個的倒斃了。 這一次饑。

的災荒大約到紀元後六二〇年才結束，災區人口的損失，估計起來，約有三分之二，其中一部分自然不是死亡而是移徙的結果。 上文提到耶穌紀元前第二世紀，中國和南歐同時有災荒的現象，這一次中國有荒年，地中海四圍的國家也有同樣的遭遇，並且遭遇得很苦，真是無獨有偶了。

在全部又長又慘痛的中國荒年史裏，我們時常可以看見在政府方面，未嘗不想設法防範或補救。 但往往這種救荒的動機，是爲着要使稅源上不致太受打擊。 例如，公曆紀元後七〇〇年（唐武后久視年：）

饑民離開鄉井，日久不歸，所以公家便沒有收入，官庫裏也沒有貯蓄。 土地荒着沒有人種，種了也不會熟。 所以我們非立刻着手救荒不可，好教農民把他們的田地再重新整頓起來。災區內的產業，平日本來要納稅的，如今應一概豁免。 兵站逃亡的兵丁，也一概赦免，不加追究，也一概無須納稅。 那些應該回家而沒有盤費的，也讓他們得到相當的供給，好教他們可以回到老家。 （據李女士經濟史參考書目，謂此段原文出馬氏文獻通考，但徧覓不見，姑轉譯其意。）

無論政府有甚麼設施，荒年的結果常是富人把窮人喫一個光，每一次荒年就給富人們喫光窮人的一個新機會。 約公歷紀元後九九〇年（宋太宗淳化元年）這一年小米的稈有好幾尺長，但是往年有好幾年沒有好收成。 富人屯積居奇，窮人出重利借債過活，利錢與本錢幾乎相等。 雖則有時候年成還好（李氏按大約這時期還算是比較富庶的，）但是富人逼債逼得很忙，窮人的進款等不到付租納稅，已經開支完了。 所以政府通令，凡是出借麥稻、或錢鈔的，利息不得超過百分。 （原文見古今治平略）要是在比較富庶的時期裏，法律所許可的最高利率已經是百分，在十年九荒的時期裏，那種民不堪命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比較富庶的時期過後，不到百年，就接上一個很壞的時期，在中國史裏，恐怕要算最壞的時期了。 大約紀元後一〇五〇年或一〇六〇年前後（宋仁宗皇祐二年或嘉祐五年前後）江淮以南在春季遭過一次大旱。 有些地方井水和泉水都乾了；牛和其它畜類渴死的不少，雞犬的蹤跡也都看不見。 結果，九種田地（即各種田地）都沒有人耕種，大家都在怨生

活的艱苦。（原文似出歐陽文忠公集，但一時未能查出。）

又如：

甚至父子兄弟都不能相保。鰥、寡、孤、獨的人也不能自謀生活。 強壯些的人都流落在外邊或是搬走了；柔弱的都已死亡。 情形所以這樣壞的緣故，是因爲水災和旱災；水災和旱災所以這樣多的緣故，是因爲陰陽不調和。（原文係劉敞奏議之一段，此亦轉譯。）

陰陽是自然界的兩大原則，據中國人的見解，陰陽是支配一切自然現象的。 陰陽調和，世界就太平，不調和，禍亂便發生。

自此以往，近二百年，中國的情形越來越壞。 下面一段引文講的大約是公曆紀元後一一八五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間的情形，雖則寫來很是輕描淡寫，但所敍的事實却是最不堪的了：

東南民力凋敝，中人之家至無數月之儲……蘇、湖、信、舒等州以前偶爾遭到水災，但是現在却成了常有的事（前半段見文獻通考，國用考，賑恤項下，淳熙十年；下半段係轉譯。 信舒二州，未敢確定。）

這一段記載是極可注意的，以前所引種種災荒的記載都是關於北方的。 並且大都在黃河流域以內；如今災荒的區域却擴大了，揚子江下游的幾省也經歷到大水與久旱的痛苦，卽南至福州，亦在所不免。

因爲有這種種情形，一個政府的官員於公歷紀元後一二〇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報告說：

逃亡的人家一天多似一天，政府所可收入的田賦便一天少似一天。 （原文出續文獻通考。）

接着又是一段評論，其識見的膚淺，令人可驚，但是在歷史上這類淺薄的評論却也不在少數：

官吏和平民都感覺到形勢一天比一天的嚴重，但是誰也說不出來究竟病源在甚麼地方。有幾個地方官員很熟悉災情的嚴重，以爲非重訂經界不能補救。 重訂經界，自然可以教小戶人家取回一部分被侵佔的土地，因而在生活上比較可以寬展些，但是大戶人家一定很不願意，要不安定起來。 （出續文獻通考。）

當時政府的確設法把田地還歸原來的業主，實行其所謂『正經界』的政策。 但是七年之後，我們讀到下面的幾句話：

要是年成很好，我們也許可以僥倖不遇見甚麼大亂子。 但要是年成不好，田戶們就合起夥來，幾十個或幾百個不等，搶劫商旅或鄰近的農民。 有時候竟至殺傷人命，到今已經發生過好幾樁案子。 我恐怕在荒年的時候，劫掠殺傷倒是一大問題。 要是我們（指政府）能設做一些淸鄉的工作，好教他們沒有合夥的地方，這一類竊盜的禍患，就可以消滅於無形了。（出續文獻通考。）

這位官員的見地也不能說是錯。 中國現在要的是地面，從前要的也無非是地面。 他的人口實在是太多了。 但是在常有水旱之災的國家，往往把種種困難推原到分田制度的不善。 在古代的意大利如此，在愛爾蘭、墨西哥、和許多別的國家也都如此。 但是實際上，荒年饑歲一多，即使不眞正荒年，只要連上好幾年，土地的出產，不能維持已經習慣的生活程度，隨你有甚麼好的分田制度，也不能使一個地方富庶起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窮的田戶總不免把田地、或勞力、甚而至

於把自己的身體都押給富戶人家，無論如何嚴密的法律，也無從禁止。 唯一的應付方法，是要糾正大自然的怪脾氣；比較治標的糾正方法不外灌溉、宣洩、築路等等設施；至於治本方面則須早早的測定季候的變遷，而預爲之地，更須節制人口的數量，使好年成可以有多量的餘粮，備壞年成賑濟之用，因爲無論預防得怎樣周到，壞年成是免不了的。 因爲大自然的怪脾氣而發生的荒年，祗是改良分田的制度或賦稅的制度是不能解決的；這種治療方法，祗能暫時止痛，不能永遠斷根。

法律雖然嚴密，無濟於中國的災荒情形，可以從下面的一段記載裏看出來，這裏所記載的是公曆紀元後一二〇八至一二三四（宋寧宗嘉定元年至理宗端平元年）年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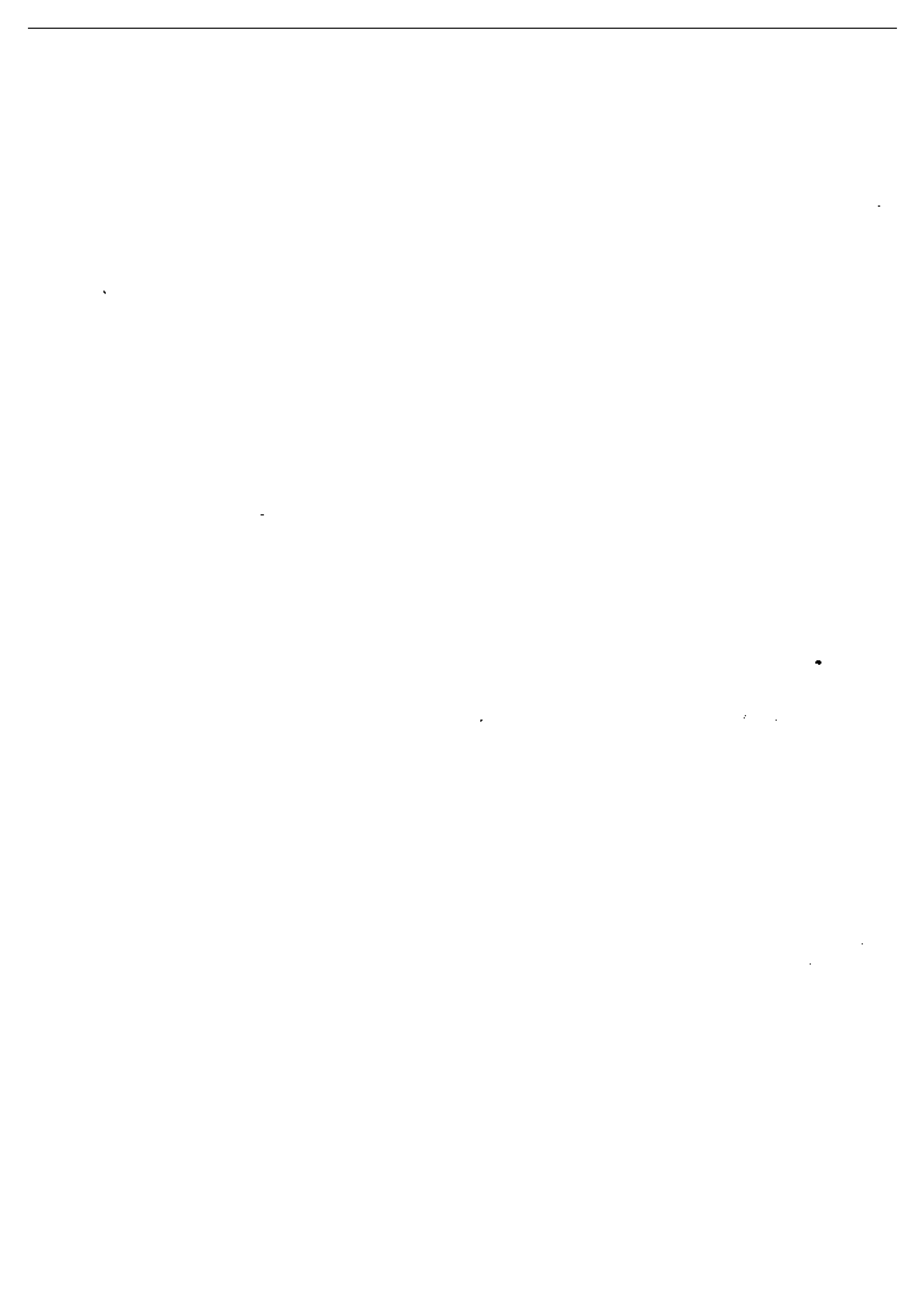
前代未嘗沒有天災（指水災及其它）和大旱，但是所釀成的災情從來沒有像現在的這般惡劣。 現在穀倉與錢庫都已空了，剩下的些少糧食不敷一個月的消耗。 一升米要賣千錢，並且繼續在那裏漲價，不知漲到何時爲止。 富戶也都保不了身家；十家倒有九家餓死的，也有集合了跳在揚子江裏自盡的。 鄉里之間，民衆聚合了評論政府的官吏，至於軍隊中的怨聲載道，更是不忍聽聞了。 這種情形確是嚴重。 更不堪的是，這種情形也在大城市（都

城）的中心裏發現。浙西一帶向來是出米的中心，但現在卻是赤地千里，粒米不收。淮河流域的民衆陸續的棄家出走，流落在外鄉，還帶着在襁褓裏的子女。他們未嘗不願意別成家業，但茫茫大地何處是可以成家的地方？所以他們祇好東奔西走，後來越走越疲乏，祇好等死。（原文似出宋史食貨志。）

我不怕瑣屑，講了許多關於荒年的話，因為它實在是中國歷史裏最最大的一個節目。不過我所講的尚不及十分之一。在全部中國史裏，似乎沒有一個時期有過連上幾十年的風調雨順物阜年豐的，除非是在歷史初期的黃金時代裏。最壞的幾個時期似乎是（一）公歷紀元前第三世紀與第二世紀，（二）紀元後第四世紀與第五世紀，（三）第十二與第十三世紀，（四）第十六世紀。別的時期也差不多一樣的壞，但是我們還不能確定的說。

前章早就說過，中國每逢一次大荒年，北方半開化的戎狄便乘機侵入；真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了。這種雙料式的艱難也許都可以推溯到氣候變遷的原因上去。在上文所說的第一個時期裏，因為北方形勢的緊迫，不得不逐漸造起一條長城來，大約在紀元前二一四年光景，東西首

尾聯綴，就完成了這個大建築。 到了第四與第五世紀，韃靼人又侵入中國，把中國北部全都佔據了。 第十二與第十三世紀的時候，又重演一次，最後演成了蒙古人入主中國的局勢。 第十六世紀裏，北方民族又起騷動，最後滿洲人入關，握政權者幾三百年。 北方遊牧民族的大騷動，看來每次都是間接因為頻年雨量的缺乏，直接因為大旱所造成的種種痛苦，至少這種種情形是他們大騷動的一個刺激，大騷動便是反應了。 中國的北方人，既經水旱之災，又被野蠻民族的刼掠殺害，層層剝削，其為慘痛，不言而喻。 在中國境內，幾乎沒有一個時候沒有上千上萬的難民在外間飄泊着，同時每隔開幾年，總有幾百萬或幾千萬的人挨着餓，讀了上文種種，也就不以為奇了。



二三　中華民族的選擇與淘汰

中國每逢一次荒年，死亡的人口，少的幾千，多的往往有幾百萬。　他們未嘗不可以餓死，但是眞正餓死的却不多，他們另外有死的原因，有一位一向住在天津的美國教會中人，叨雷先生，曾經在一九二一那年的水災裏助過賑。　他有一些經驗告訴我們。

某一個受災的村子有三百個口子。　叨雷先生問他們說『有人餓死沒有？』

村民回答說：『沒有。　我們有糧食。』

事實上這村子裏的人，幾個月以來，天天喫的是一種半糠半麥的混合物，剛彀維持他們那一口氣。　所謂『有糧食，』當然只是根據了他們的定義說的。　叨雷先生接續又換一種方法問他們。

『約摸十天以前不是天氣特別冷過一個多禮拜麼？　這一個多禮拜裏過去了幾個人？』

那幾天的確是非常的冷，風刮得緊，寒暑表將近零度。

他們回答說：『六十個。』這六十個人好像是餓死的，其實不是。他們還是因病而死，因為感冒風寒而死；實在因為他們好久沒有得到充分的營養，傷了元氣，所以小有病痛，偶受感冒，就沒有救了。每次荒年裏死的人大都是這樣死法的。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在這種形勢之下，死亡的究竟是怎樣一種人？是不是死亡的人的品質和不死的人的品質有些不同？

還有兩個類似的問題我們也要答覆。上文說過，每逢荒年，總有許許多多的災民離鄉背井的出去。出去的裏面，有的死亡，有的在別處住下，有的在荒年過後陸續回來；回來的快慢要看災荒的程度而定，少的隔一年，多的有隔好幾年的，換言之，要看他們的運道如何，看土壤的性質有無變動。這幾種人的品質是一樣的呢，還是不一樣的呢？死去的人不說，說不死的，天然淘汰對於災後歸來的人，和移住他鄉的人，有沒有不同的影響，可以使這兩種人越顯出不同來。

中國式的荒年的影響，最初總是把身體孱弱些的人先淘汰了，這是無須引證就可以承認的。因為災荒的時候，營養既不夠，加上風雨的感冒，又加上心神上的愁苦，疾病之來，要見得兇險，要容

易致命。 現在的華人既大都受過這種淘汰力的磨鍊，他們的體質，推想起來，一定是相當堅強的。這大概是對的。 許多人都這樣說，尤其是在北方，山東和其它屢經災荒地方的人比聰明活潑的南方人確似乎強健得多。 可是仔細看去，北方害病的人、殘廢的人、或身體上小有缺陷的人，實在要比南方為多。 至少我看去是如此，我曾經就商過的幾位醫生也以為如此。 這種不健全的情形當然未必是種族的，也許是因為營養太缺乏或太不相宜的緣故，一個人在嬰兒或孩提時期內得不到相當的營養，發生的影響自然是更加嚴重。（譯者註九）

荒年所發生的淘汰的影響不止上文所說的。 還有一種和省儉撙節等品性有關係的影響。平日很撙節、總要留點餘裕下來的人家，比了『一頓光』絲毫不留餘地的人家，總可以多活好幾天，多一些生存的機會。 二千年的中國歷史裏，既有這許多荒年，我們就敢說現在生存的中國人的祖宗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受過災荒的磨難，就是沒有一個不時常感覺到省儉、撙節、甚至於吝嗇的習慣是生存競爭裏很有用的條件，有了它，生存的機會就大些，沒有了它，就少些。 凡是窮奢極欲的人，到了這種危急的時候，一定是很不客氣的被淘汰一個乾淨；所以在今日中國經濟生活

裏，我們幾乎看不見浪費的現象。這種情形，在南方也可以觀察到，因爲現在南方人的祖宗當初原是北方人，他們在沒有移殖以前，大概也經歷過許多次的災荒，所以撙節的行爲也提鍊成他們的一種根性，到了子孫手裏，雖然不再受災荒的痛苦，依舊可以表露出來。但是在南方人中間，奢侈和浪費的情形，畢竟要多一些，沒有十分淘汰掉；就是節儉的風氣，也決不會和北方人一樣，因爲生活比較富足之後，比較奢華靡費的人也未嘗不可以生存下去。話雖如此，要是用美國人的眼光看去，中國南方人的節儉已經是很可以的了，並且已經有些過火。中國商人受過西方的訓練的，對於這一點，也時常批評自己；他們往往太想積死錢，不肯把商業的贏餘去做更大的生利的事業，結果反而阻礙了自己的成功。以利生利是西方商業的大原則，積死錢是中國商業的舊脾氣；他們還嫌擺脫不了這種舊脾氣。

中國人生活裏有一件最惹厭的事，就是有一種特殊的貪小利行爲，文言叫做『染指』，俗語叫做『揩油』。上而至於軍官的剋扣軍糧，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庶務買辦的『賺』錢，下而至於家裏老媽子的『落錢』，都是同性質的行爲，都可以說是從前預防荒年來到預防得太周密了的

一些遺蹟。中國人因爲太切心於預防荒年了，所以等不得把工作做完之後，再坐收工作的報酬。所以凡是經過他們手的銀錢貨物，他們多少總要染一染指，「捱苦些的南方人甚至於有一句話說『連糞擔過都要蘸蘸！』」他們不理會要是他們肯忍耐須臾，博得一個誠實可靠的美名，他們的出息一定要比染指得來的大得多。做官的人也是如此，他們第一天上任，就動手搜括，和別的中國人一樣，他們預防災荒或預防窮困的一種熱誠，像生來就有似的，非眞正有志氣有毅力的人往往戰勝不過這種天賦的根性。並且長時期荒年的經驗已經明白告訴大家，凡是能夠搜括、能夠羅掘的人，不愛惜前途名譽的人，的確要多佔一些便宜。因爲要曉得，荒年的來到，往往是冷不提防的，除了少數極有錢的人緩急總有辦法以外，其餘誰都保不住『無端窮困逼人來』。

省儉或撙節原是美德，但是他們很容易變爲吝嗇和自私自利。自利和自私便是中國人中間最顯著、也最可惜的品性。好比他們堅强的體格和省儉的美德一樣，這種自私自利的品性似乎也成了種族血統的一部分，深深的鐫在精質裏面，可以說它是種族遺傳的一部分因爲以前凡是能夠損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輩，在荒年的時候已經死完了。讓我詳細的解釋一下。有一家十

五口子的家庭在此。家主是一位老祖父，下面有三個兒子和每房的媳婦，還有好幾個孫子孫女。全家所剩的糧食祇彀一百天的消耗，可是離開下一季的收成還有一百五十天；換言之，就是要有五十天青黃不接的時期。再假定東西鄰舍有好幾家也有這種情形。要是有一家肯分些糧食出來，幫別一家的忙，這慷慨些的一家就要減少他們自己生存的機會。要是太慷慨了，生存的機會便更少不上幾天，自然不免餓死，在這種形勢之下，談不到『以羨補不足，』因爲災區很大，往往包括好幾省，大家都是『不足』不比平日少數個人或少數家庭有困難的時候，別人可以賙濟他們。

祇顧自己不顧別人的行爲還不止此。荒年的時候常有賣兒女的，尤其是女子，要是妻子年輕，也可以賣。荒年來了，家裏的老輩便向全家打量一過，最後便決定說，要是媳婦中間最年輕貌美的一個和聰明伶俐的十一歲的小姑娘肯出賣的話，得來的代價就可以養活其餘的大小口子，可以敷衍過災荒的時期。要是某家的老輩心腸輭一些，聽了媳婦和女兒的哀求，就沒有把她們賣出去，結果便怎樣？幾個禮拜或幾個月之後，全家就再也無法支持了。住屋的樑已經拆下賣

了因為閤家祇有這類的家當還可以賣幾個錢。小孩子天天睡的被褥也已經賣了，可是隆冬的氣候已經咄咄逼人。還有一些衣服可以出賣，也許可以向比較富餘的鄰舍討一些糧食；此後便眞正是山窮水盡了。到這時候如果再不把女兒媳婦出賣，這家人家就祇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是全家出發作化子，或做搶匪。第二是死。第三是吃人肉。要是這家人家有些傲氣，神經比普通的災民略為銳敏一些，他們也許會自殺。有一個教會中人告訴我說：有一家，把最後的一頓吃不飽的飯吃了之後，做父親的把全家人拴了一根繩子，自己也拴在裏面，連一條看家的狗也拴上了，然後全家投河而死。還有一家，家主把最後的一床破爛的被褥賣了，買了一些糧食，暗中也買了一些砒霜。他對全家說：『喫了這一頓最後的平安飯，我們就要上路了，』這話一些不錯。因為他把砒霜放在飯裏，大家吃了就同時『上路』——上西天的路。這些例子並不是向壁虛造的，它們是新近有一次荒年裏的實在情形。這一次荒年，比起以前的幾百次來，實在算不得厲害，並且又有鐵路可以轉運糧食。又有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等組織來作大規模的賑濟事業；然而還不免有這一類的慘劇發生。一位教會中人所耳聞目擊的已有這兩家和其他零星自殺的案

件，其餘他沒有聽見的還不知有多少咧！　其餘在以前千百次荒年中所發生的更不知有多少咧！

但是那一家並不理會女兒和媳婦們的哀求的，却生存了。　犧牲了一家的如花美眷，居然把其餘的人保全了。　歷來的情形便是如此。　二千年來賣兒鬻女，尤其是鬻女，早就成爲過渡荒年的一個公認的方法；法律和政府且往往加以許可（見上章）。　於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就越大；多經一次荒年，人品上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深一分。　充其極，一個全副精神只替自己打算的獨夫，在這種形勢之下，便最有生存的機會。　不過說到這裏，我們必得顧到另外一種情形。

自私自利的心腸未嘗不可以發達過火。　把一切責任義務都掉頭不顧的人未嘗不可以保障一己的生存，但若是他把妻孥都拋撇了，他的血統却就從此斷絕，再也傳不下去。　他自然可以續娶，但是他那種逃荒的經濟狀態未必能使他如願以償，除非他是一個極有才幹的人。　即使他續娶，他的子女也不會比義氣重些的——至多祇肯犧牲一兩個人來維持全家的——人家那般多；他的後裔也不會比這種人家多。　所謂犧牲當然不必專指出賣，也許全家把一個小輩殺了，把他的肉當糧食。　這的確是中國荒年史裏所數見不鮮的事。　總之，極端的自私自利心腸可以

候，一家人家渡過荒年生存下去，祇要當家的人不把自己做單位，却把全家做單位。

我一面寫這一段文字，一面也自己覺得奇特，難道災荒的淘汰能力真是這樣厲害，真可以從遺傳方面養成這許多複雜的品性麼？　不過這一點是很明白的：中國人的許多特性，尤其是中國北方人的特性，恰好是一些可以在災荒的時候幫忙的；換言之，仔細看去，真像是天造地設，專為對付荒年之用似的。　二千年的長時期裏，既惟有這種自私的人纔受選擇，中華民族雖大，我恐全部的遺傳性上總不免發生一些顯著的變遷罷。　換言之，自私自利一類的性格，本來任何民族多少都有的，不過對於中華民族，因為選擇和淘汰的關係，不免越來越深刻、越來越牢不可破罷了。　這種性格究竟如何表現，如何用以對付生活上的難關，當然要看當時當地的社會習慣而定，不過這種品性的養成與維持，却是自然淘汰的能力。

我們對於災民賣兒鬻女的話還沒有說完。　讀者也許以為我把這件事說得太重大了。　却不然。　中國舊的記載裏不都記下了麼？　試再看最近的一次災荒。　華洋義賑會裏的洋員，於賑務結束之後調查災區的人口，發見年輕女子特別的缺乏，比起其餘的人口來要少四萬到五萬的

光景。換言之，這四五萬女子早就打發開了，早就移出災區以外。災情厲害的時候，隨處都可以買這種女子。有一位教會中人不忍看她們墮落，特地買了幾個，少的只值華幣兩圓，多的不過五圓。只值兩圓的大概不很好看，值五圓的就很過得去；眞正好看的可以值到二百圓。這種情形還是在有大規模的賑務的災荒裏發生的，試問沒有的又怎樣？若把以前幾百次荒年裏出賣的女子總算起來，一定不下幾百萬人。

這種女子的人品怎樣？她們後來的遭際又怎樣？她們是一村之中比較最好看的、最聰明的、也是最惹人喜歡的女子；換言之，她們是身心兩方面發育得比較最健全的女子。我這裏用的最字，當然不是絕對的，本地方比他們更好的女子自然還有，不過這種女子大都生長在比較富裕的人家，不會有被賣的資格的。不過在一般的農民中間，我們差不多可以說全部的農民中間，這種被賣的女子都不能不算是上選了。我們怎樣曉得呢？一則我們可以當場看見，再則賣買女子的市面很大，眞正醜的蠢的女子便無人顧問，三則特別好看的女子比一般女子的價錢要高出幾倍，弄得自私心重一些的家長們捨不得不把如花如玉的親女兒賣給人家。

這種女子的賣買，對於農村的人品上所發生的影響，是不問可知的。 這些女子本都是下一代的母親，但是如今做母親的最好的原料，身心兩方面比較最健全的原料，已經價賣一個乾淨，再也收不回來。 上文不說過麼? 中國北方人一天比一天蠢；中國北方很少好看的女人，至少要比南方少得多。中國北方人也極端的看不起女子。 但是當初沒有說出原因來。 如今該明白了罷，該不覺得奇怪了罷。 讀者到此，不妨把斯密士做的中國人的特性（參看上文第二篇）和中國的農村生活讀一遍。 他講中國婚禮的時候，說做新娘的怎樣受人輕侮，受人愚弄，讀去真覺得可憐。 中國女人的生活真是愁苦極了，尤其是在北方，所以一年之中，總有不少尋短見的。 女子生活的愁苦，我們一半也可以猜想得到，在災區裏面，凡是有一些人格，有相當自尊心，和可以教人尊重的女子，既不免賣的賣，死的死，剩下來的當然是些比較不中用的女子，不中用的女子容易受人奚落，自然更見得愁苦了。 就在不荒年的時候，賣妻鬻女的事情也不算希奇。 有幾個十年九荒的村落裏的居民，看上去比朦朧（譯者註七） 好不了多少，這也許就是大原因之一了。 你把不論那一個社羣裏的最優秀的女子挑剔了出來，挑剔上五六十代，那個社羣一定不免一代比一代要

墮落，要愚蠢，要把女人看得不值錢。因爲這種品性，到那時候，不但成爲社會的習慣的一部分，並且成爲血統遺傳的一部分。

但這種被犧牲的女子，難道對於中華民族就被淘汰淨盡了麼？那也未必，不過淘汰的成分居大半罷了。有一部分，有的時候很大的一部分，自然是賣給沒有荒年地方的人做妻室，但是買主大都是窮無聊賴的人。凡是只有能力娶這種老婆的人家，一旦本地遇上荒年，也就要站不住了。那些比較有姿色的女子，却另外有兩條路可走。上品些的嫁給附近城市裏的富商大戶做小老婆，他們從此以後就變做都市人口的一部分，永遠不回到鄉下去。所以從鄉村人口方面看去，他們再也不會有甚麼貢獻，就算完全犧牲了；然而要曉得在今日的中國，鄉村人口却佔上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實在是在全人口中比較舉足輕重的部分。至於她們變做都市人口後的前途如何，我不久就要討論到。其餘的女子就賣給娼家做妓女，有許多比較最好看、最伶俐的女子也不免被迫上這條路。這些女子對於種族前途，不會有絲毫貢獻，是無須說得的了。總之，平日賣妻鬻子的結果，即足以使鄉村人口裏的優秀分子日歸淘汰；到了荒年的時候，這種淘汰的傾向

要加上許多倍數。

但是我們還沒有把那些離鄉背井的難民講一個結束。在受災的人裏，難民往往居一大部分。一九二一那年的災情不算很嚴重，可是出外當難民的就不在少數。最初不過是比較最窮苦些的才背上路，除非是災情打頭就厲害，把全村掃了一個乾淨，那也是常有的事。要不然，難民就陸續的一批一批的上路，災情一拉長了，到了後來也就差不多全村子都出來了，假使有留下的，也不過是絕少數的幾個最有錢的人家；關於闔村絲毫不留人烟的記載在史書裏是數見不鮮的。一九二一那年，據教會中人說，他們隨時看見成羣的難民二十、三十，多至五十的，不等，從老家裏出來，往往走上四五百里路，七八百里的路，有的到東三省去的，差不多就有一千里了。這種完全出於無可奈何的移民所經歷的流離痛苦，眞是無從寫起。這些移民又往往不等到羅掘俱盡，不肯出門，所以出得門來，便是痛苦。於是他們從這個市鎮流落到那個市鎮，從災情厲害的地段流落到比較和緩的地段。要是遭着的是水災，這種地段還不難尋覓，若是旱災，他們也許飄泊上幾百里路，還尋不到一個比較富裕的所在。

最初，每天或每幾天從這一村到那一村，討些零食，也許還不很困難。最初，這些沒有十分受災的村子，施捨起來也還算有求必應，不過每次所捨的總是十分有限罷了。有一位教士見過許多成羣結隊的難民，說起據他所見，難民所求乞到的，往往祇是一些饅頭皮屑之類，一口也就吃完了，所謂施捨，不過當施主正在吃飯的時候，略微扔一些下來就是了。越到後來，求乞的成績就越少，一則難民的體氣越來越壞，再則施主越來越覺得厭煩，不肯再捨；於是害病的害病，脚痛的脚痛，有的犯上別的毛病，也弄得不能再走，最後再加上隆冬肅殺的天氣，於是死亡相繼，這其間自然淘汰就大大的活動，不但是體氣柔弱的，就是精神不健旺些的，都被收拾了去。自殺的人也很多，女人家有跳井的，據說有許多井裏竟塞滿了婦女的屍體。但是剩餘的難民還是繼續向前移徙，團體一天小似一天，氣力一天弱似一天，但是爲下一代設想，他們的力量却一天大似一天，因爲他們是經歷過淘汰了的。

再到後來，這些難民又分做兩派。一派還想回到老家。對於他們，老家好像引起了嗓子竭力在那裏叫喚，這一半固然因爲在家鄉方面，他們有田有地，捨不得拋棄，一半却因爲他們的性格

氣，和別人不同，他們不忍得拋撇了祖宗的遺留，不忍得把舊習慣舊行徑都洗革了，明知故鄉的生活愁苦，但是他們卻不以爲意。一言以蔽之，凡是有保守性的人都想回老家去，當初最捨不得出來當難民的，也就是這種人。上文不提到過那些永久守着老家的人麼？不說他們如何省儉，如何克苦，如何只顧自己，如何硬心腸，見不到別人的痛苦，如何保守性成，又如何能忍飢耐勞麼？如今出去之後又回來的難民，恰好也有這種種品性。有這種品性的人，根據了類聚配偶律的道理，（譯者註十）自然互相婚姻，於是凡是常鬧荒年的地方，便成了這種品性的中心養成所。

還有一派，卻是比較有毅力有獨立性和開創性的人。爲着避免荒年的慘苦，他們總有一些很積極的作爲，不肯消極的求乞，或坐以待斃，或待辦賑的人來到。他們有一部分便去當強盜，但是爲數不多。大多數卻立志暫時拋撇老家，別尋樂土，換言之，就是情願做移民。有的搬到都市裏，有的遇到有相當的土地，就住下了，恢復他們的農村生活。他們當時未嘗不想早晚總得回到祖宗墳墓所在的地方，但是日子一久，人事變遷，這種志願便無形消滅了。凡是在新地方生活越成功，這種志願的消滅也就越容易。到都市裏的移民，手輕腳健，可以做苦力的人自然不少；但當

苦力是很苦的事，比不上從前的種田，所以凡是老家裏本來有一些田地，到這時候又可以耕種了的，便依舊回去。 比較聰明些的，可以當木匠、泥水匠、銅匠、做饅頭餑餑，塑佛像，或加入它種手藝；他們在都市裏的成功便要比做苦力的大，老家對於他們的吸引力，也就要比做苦力的小。 至於特別有腦經的人，可以加入各種的智識業務，當然也在一去不歸之列。 所以凡逢荒年，總有許多人要移到城市裏去，而這些人中間，惟獨是有腦力的、有手藝的、能夠自食其力的才最先移徙，移徙後又最不會回來。 這樣一來，荒年的結果，不特把鄉村裏優秀一些的女子都拐跑了，優秀一些的男子也不免去而之他，這不是很傷元氣的事麼？ 這種自鄉而市的移民運動，在別國不是沒有，鄉村人口中優秀分子逐漸減少的情形，也不算得罕奇，但在中國，荒年確有鼓勵這種情形的大力量，那是特別的。

這種優秀分子，移到了城市裏之後，要是能發生男育女，像在鄉下一樣，那就沒有多大問題，因爲失之於鄉，得之於市，從人口的全部看來，不能算是損失。 但事實上卻不會一樣。 不論查那一國的人口統計，都市人口的生產率總要比鄉村人口的低，在衞生行政未發達的時候，或衞生行政

至今未發達的國家城市裏的死亡率卻比鄉村裏的要高。常有人說，東方的都市，死多生少，大相懸殊，要是沒有鄉村人口隨時塡補，不久就漸漸的可以消滅。中國至今沒有確實的人口統計，但在北京，據協和醫學校附屬醫院裏的萊諾克士醫生和英國人辦的慈善醫院裏的格雷醫生研究北京人每家子女多寡的結果，發見北京人的生產率實在很低，要比普通所料想到的低得多。一切家庭之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是沒有子女的；其中大原因之一似乎是花柳病。把一切家庭總平均起來，每家祇有二·六個子女，就是祇有兩個半光景。北京人口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如今生產率又這樣的低，生死相抵，恐怕死亡數要超出生產數不少。要是這個結論是對的，而且可以適用到別的中國都市，那末移到都市裏的鄉村人口，就不啻上了死路，早晚是要絕種的。這是就鄉村人口的本身上說話。若從人口的全部看去，自鄉而市繼續不斷的移民，把比較聰明活動的分子逐漸的吸收乾淨，全部人口的優秀程度，自然也不免江河日下了。

這種情形自然是很可以悲觀的。不過從那些保留着農村生活的移民方面看去，却很有幾分曙光。中國南方很有能力的客家人，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到過，便是這種移民。中國北方的人

口，怎樣因為荒年才移到別處去，從客家人的歷史裏，很可以看一個清楚。當他們移徙的時候，自然淘汰的勢力一定很活動，逐漸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後面，所以凡是能夠到達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較有毅力的有才幹的。關於客家人的來源和特性，外間誤會很多，許多文字的記載也靠不大住。有位英國教士，叫做艮貝爾的 (George Campbell)，他在客籍人中間傳教有多年的經驗；一九一二那年，英國的長老會和美國的浸禮會等在汕頭開會議的時候，艮貝爾關於客家人的歷史和現狀，作過一度報告，他後來又把這個報告印成十頁長短的小册子，分送給朋友。這個報告，我覺得最可靠；教會中人往往可以做很有價值的科學的研究，這篇報告就很可以做個例。這種研究的結果不容易傳布出來，使大家可以利用，實在因為教士們有他們的日常工作，無暇及此。

關於客家人的情形，第一件可以注意的事，便是他們的方言。他們說的實在是一種官話，和四圍非客家人的話很不相同，但是很像現在中州河南的話（譯者註十一）。客家人原出北方，在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來。據艮貝爾直接從中國材料考據的結果，現在南方的客家人是先後三

次移民所造成的。第一次，發生在公歷紀元後第四世紀，（譯者按：就是中國史家稱爲五胡亂華的時期。）當時中國北方很亂，一半因爲荒年，一半因爲北方通古斯族人的南侵，尤其是匈奴人纏繞不休。李女士在他的英文中國經濟史裏引某史書說：『今日的人口（地段未詳，時則約爲公元後三百年）比起漢代來，不過十分之一。……並且大多數也不在田間做工。』又說：『好田多荒着，生滿了野草，人民都聚居在草澤裏，（亨氏按此層也許因爲他處乾旱，此處易於取水，也許因爲可以避胡人的侵略。譯者覆按：亨氏此註恐出誤會，聚居草澤一語，作良民多變爲寇盜解，似較近是；但不知李女士所引史書原文究作何語，目前查看不易，姑不具論。）田地不論乾濕，都已不合耕種之用。却都變做牧場了，（著者注冗不譯）林木也都乾枯了。』

正在那時候，匈奴人把中國的皇帝，先後擄去了兩個，第二個並且被迫做了匈奴頭領的奴僕，（譯者按：即西晉懷帝與愍帝；尤西堂詩，『青衣行酒懷愍辱』即是，）後來匈奴的頭領覺得他惹厭，又把他殺了。『這種民族的羞恥，（著者按，又加上了荒年的慘痛）弄得民不聊生，精神渙散。後來東晉元帝遷都南京，就有許多人家跟着遷移到大江以南。對於向來安土重遷的中國人，這是

一件很嚴重的舉動』（民貝爾語。）

過了天塹的揚子江——後來蒙古人南侵的時候，中國人更把它當做一個天塹——客家人繼續向南移動，有的偏向東南海岸，向浙江福建兩省進行，有的一直向南向着江西省。 他們後來的歷史還沒有完全考據出來，大約往東南海岸的後來稱爲福老，往南的變做江西省的客家，把當地的猺民驅逐到了別處去。

第二次的客家移民發生在公元第九世紀。 那時候的中國也混亂極了。 據民貝爾引蒲耳格（D. C. Beulger）的話，當時的『鄉村絕了人煙，市鎮都剩了瓦礫，就是國都也幾乎變成灰燼。沒有一省沒有經歷過內亂的創傷，沒有一個城堡不受過包圍，也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受過洗刼的。中央政府既混亂不堪，民衆的公共精神又一些也沒有，無怪地方的長官各自爲政，互相攻擊了。』

在那時期裏中國又有很厲害的荒年。 那厲害的程度是否超出普通荒年以上，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據記載說，在這個時期裏浙江一省也遭着好幾次荒年；浙江是難得有荒年的，如今居然有了，而且有好幾次，那末，當時北部災情的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大混亂的結果之一，便有許多河南人結了隊向南移徙；一起有五千人模樣。沿路經過了許多的抵抗和長時期的飄泊，他們居然來到福建的山地裏，在福州的後面，那時候大約是公元後八八五年（唐僖宗光啓元年。） 這一批移民大約是帶了家眷走的，因爲零星的記載裏講到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他的兩個兒子，也算是這番移徙裏的頭目。有一次出發攻城掠地的時候，最高的領袖有命令說，凡是老弱殘廢的人不許同走，因爲前面路途既遠，所帶的糧食又不多。但是這兩個當頭目的兒子，不聽指揮，把上年紀的母親領了要走。據說中國人常講許多孝子的故事，這兩個兒子的事後來便做了某一件故事的根據。（譯者按：即二十四孝之一，王潮負母從軍。）兩個兒子既不奉命，於是領袖就責備他們說：

『凡是兵丁都要服從紀律，世界上沒有無紀律的兵丁。你們不聽我的號令，若是不重重的責罰你們，以後誰都可以不守紀律了。』

大一些的兒子就說：『凡是兒子都有母親，世界上沒有不是母親生的兒子。』

領袖下令殺他們的老母，有一個兒子說：『我們兄弟二人侍候母親，如同侍候領袖一樣，你殺

了他們的母親，又怎樣能夠使喚兒子們呢？ 請你先把我們做兒子的殺了。』

這兩個忠孝的兒子，自然有別的兵丁勸解，沒有殺掉。 那個大兒子後來並且代替了那個領袖，自己做了領袖。

這個新領袖叫做王潮（譯者註十二）。 在他的統治期內，『他的將士們和他們在河南的族人親戚還時通音問。 軍隊裏要有添補，大都是用這個方法招致的。 在河南的族人親戚方面，本來叫苦連天，也就很願意應募而來，尤其是因為新地方的領袖不是外人，是他們血族裏的人』（艮貝爾語） 這樣，客族的人就以生以長，在新地方日益蕃衍起來；好比十七世紀裏從歐洲到美國的殖民一樣。

這第二批的客家人，在福建居留了差不多有四百年，從沒有和四圍的本地人結過婚，所以保全了他們血統的原狀。 不比第一批的福老，很早就和土人混合。 艮貝爾以為福老好比後來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而這一批的客家人好比在新英倫的清淨宗的耶穌教徒。 他們在新英倫也和少數土人發生接觸，但結果把土人殲滅了，沒有和他們混合。 福老和西班牙人所接觸的土人

比較多些，又比較開化些，就彼此通婚，結果也許把他們原有的品質降低了些。

但是過了四百年的太平日子之後，全部的客家人便遭遇一次很大的刼難。大約公元後一二七六年（譯者按是年伯顏入臨安宋亡）前後，一面有荒年，一面又有蒙古人的侵略。客族人口，有一大部分遭刼而死。記載上說，有一個姓祝（譯音，恐非是）的客家人在本族中招募了一千人來應王師，但是後來生還的祇有一個。當初客籍人最發達的地域，到這時候便變成一片荒涼的曠土。當時有一個作家說起怎樣房屋都空了，田地都荒了，並且故意的問着，爲甚麽人們都變做地上的狐狸、天上的飛鳥。少數因爲特殊的才力、勇氣、和耐性、而未遭刼的客家人，後來就形成了第三批的移民（譯者註十三）。這一次移徙很簡單，所經歷的路程祇有二三百里，就是從福建的寧化遷移到廣東的梅州，那時候寧化所經的刼難不算十分厲害，人煙還多，但是梅州却已弄得靡有孑遺了。此外到梅州的，似乎還有在第四世紀裏先到江西的客家人。這第三批移民的數目恐怕很少。到公元後一三九〇那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梅州客人祇有一千六百八十六戶，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但到了一八四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除了許多向外移殖的，梅州客

籍的子孫，統計起來還剩二十六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人。總之現在的客家人，尤其是在梅州一帶的客家人，似乎是少數河南人的子孫，這些河南人有的在第四世紀裏，有的在第九世紀裏，先後移到南方。第九世紀的那批移民起初住在福建的山地裏，居然四百年中沒有和他族混雜。四百年之後，因爲荒年、戰爭、和移徙的經驗，又給他一番劇烈的淘汰的影響，最後的孑遺才算到了廣東梅州一帶。一直到現在，也差不多沒有和四圍的土著在血緣上發生過關係。艮貝爾說得好，今日的『客家人確是中華民族裏最顯著最堅强有力的一派。他們的由來遷徙，種種經歷，確替他們養成了一種愛種愛家的心理與同仇敵愾的精神。對於前途中華民族的奮發和進步，客籍人的貢獻，將見一天大似一天，這是可以斷言的。』

現在梅州一帶，人口的動盪依舊沒有停止，因爲有一部分的山地還未經拓殖。但據教會中人說，凡是好動善移的，往往是比較開明和比較急進之輩，人口一面增加，田地一面減少，一部分的客籍人就到廣州、汕頭、或其它都市裏去。有的別起田莊，自成村落。據斯拜千先生說，那些別起村落的人就是喜歡採用新方法的人，唯其如此，所以容易引起別人家的猜忌。

客家人的歷史很値得仔細的研究。許多有眼力的人不說過麼，他們是今日『中華民族裏的精華？』他們的毅力、愛淸潔的習慣、對於婦女的尊重、和教育程度的卓越，都是一些難得的特點。他們和比他們早到南方的移民就是現在圍着他們的土著很不相同；好比這些比較進步的南方土著和現在還在北方的中國人的不同一樣。客籍人的品性，有許多地方很像侵略中國北方和一再做中國盟主的韃靼人、蒙古人和滿洲人。客家人要是不因爲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壓迫，大概也不會離開北方的老家的，在這層上我們確有相當書面的證據。我們從此可以看出，怎樣生活的困苦和戰爭的殺戮，在這些地方不無汰弱留强的影響。我們也看見，在客家人方面，這種淘汰作用竟發生了三次之多。最後，這些客家人，尤其是在梅州一帶的客家人，一旦脫離了環境的壓迫，一旦無須再事遷徙，無須再受淘汰，他們也能彀不和別族相混，因而保全他們血統上的純潔。今日的中華民族裏，一端有有才幹、有聰明、有進取心的客家人，一端有無能的、愚蠢的、頑固的、荒年來到祗曉得泥封了門牕、出來乞食的北方鄉下人。這兩派人，一是天涯，一是海角，然而所以造成他們的，無非是移徙和自然淘汰兩種勢力。不過一則所受的影響是消極的，一則是積極

的罷了。

客家人而外，我們再可以舉一個比較新近的例，來證明淘汰與文物進步的關係。我在上文說過，瀋陽是今日中國一切都市裏最熙熙攘攘、最有生氣的都市。據人說，哈爾濱比瀋陽還要進步，但是最進步要算是極北的幾個市鎮，例如黑龍江上、對着俄境海蘭泡的璦琿（譯者註十四）裏面居住的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活躍的精神，和別處的中國人很不相同（譯者註十五）。有人說，這是因為接近俄境，和俄國人來往，受了俄國人的同化，所以如此。這句話當然不能說錯。但是為甚麼香港一帶的中國人，經過了許多年的和英國人接觸，不多多的染上一些英國人的氣息呢？香港的中國人和多量的英國人接觸，至少要比東三省人和多量的俄國人接觸早上四五十年。可見祇是外來文化的鼓動，是不足以解釋的，足以解釋的還是淘汰的說數；東三省人所經的淘汰，比較新近，比較嚴厲，香港的人卻比較和緩。

近代東三省的人口，差不多完全是從山東直隸兩個保守性成的省分裏移來的。大約商人和城市的居民以直隸人為多。農民以山東人為多。因為經濟生活的艱苦，就在平日之間，兩省

的人多少不免要搬些出去，遇到了荒年，搬出去的人當然特別加多。　他們搬到東三省，一則因爲東三省是在中國人統治之下，並且已經劃爲行省；再則在十九世紀以前，東三省的人口是很稀少的。　移殖的方法不外如此：一家的壯丁先出去，不帶家眷。　直隸人則先尋一個可以幫忙的東家。後來小有成功，然後自己獨立的做生意。　大約每三年回家一次，在家就擱五六個月，然後再出去。每次出去，總要帶幾個本村的人同去。　起初幾年，這些不帶家眷的男子們合夥住在一起，好像一個很大的家族。　要是生意發達，有的商人就決意把家眷接出來。　從此就不必按時跋涉千里、回家省親了。　這種人是有能力的人，是二十個、五十個、甚至於一百個人中才尋得出一個的人。　所以想得到做得出；不久他的家眷果然來了，他的兒女子孫便成了東三省人口永久的一部分。　他仍舊把直隸當做老家，他的籍貫並不變動，好比至今澳洲的英國移民仍舊把英國看作家鄉一樣。後來這個商人的兒子們長大了，中間比較更進取、更肯冒險的便再向北移殖，比當初他們的父親要走得遠些。　他們生活要是成功，他們也就如法泡製，把家眷接出去；怎樣選擇的效用，不就又進了一步麼？

當商人的直隸人如此，當農民的山東人也是如此。每年冬盡春回，他們便合夥的到東三省去，總算起來不下數十萬人。有的坐火車，有的徒步走去，雖有千里的路程，他們也不以爲意。春天來到，他們也都到了，散在東三省各處，準備着田主們雇用。到了秋天，他們就照樣回去，等到臘裏再蜂擁似的出來。中間也有不甘心做散工的；比較有野心的和有數力的，便自己買一塊小田地。起初他們也許一面種自己的地，一面兼做散工。但是一二年之後，他們也許可以多買一些地，足以贍養一家了。於是便造一所小房子。等到明年再從山東出來的時候，我們在路上也許可以看見一輛單輪的小車子，上面坐着一位老太太，看去像是那位小田主的母親；又有許多東西亂七八糟的把老太太包圍着，甚麼鋪蓋卷呀、箱籠呀、米袋呀、煮飯的傢伙呀、和其他窮人家家用的東西。那位田主人却神氣十足的站在車子把手的中間，正東搖西擺的趕着車子，他的大兒子灣着腰在車前趕路，他背上還有一根繩子，一頭拴在車頭上，原來他正拖着車子，好省些他父親的力。田主的妻子卻跟在車子後面，肩上挑了一根竹竿，竹竿兩頭每頭挂一隻籃，每隻籃裏裝一個小孩子。跟着這副擔子，也許還有一兩個大些的孩子。行行重行行，這一家老小，披霜踏雪的，最後就

到了他們的新家鄉;他們是有能力的,惟其有能力,才有資格被選來『宅茲新土』來蕃衍他們的子孫。然而這種精意,他們自己又何嘗了解呢?要是那位做父親的小田主,有充分的志願和能力,他的工作就不久可以抬高他的田地的價值。他就可以把田出賣,自己再向北搬去,這一次却不用一輪的小推車,可以用兩匹馬一匹驢子拖的大車了。他在新地方又有很好的成功,也許再繼續向北推進。總之,今日東三省北部的居民,不是普通的中國人,而是直隸山東兩省中選剔出來的最精幹的中國人。同一淘汰的勢力,在歷史時期裏培養成了客家人的特性,現在正在東三省人身上,培養出些特點來;這是我們可以親眼看見的。這確乎是中國種種現象中最有希望最可樂觀的一種,因為我們可以看出來,就在直隸山東等處,經了不知多少次的荒年,遭了不知多少反選擇的作用,居然還剩下不少的人才,可以供後代的揀選。所以祇要有適宜的選擇方法、充分的經濟機會、相當的人口限制,好教大衆不太受過庶的壓迫,就在今日比較不出人才的地方,也未始不可以培植出一派强有力的中華民族來。



第四篇　民族的病象

二四　民族病象的意義

民國二十三年春，上海青年會舉行德育演講四次；演講的總題是『中國民衆的病象』四次的分題是『私』、『愚』、『貧』、『病』；其中『病』的一題，是由作者擔任。當時在開始討論之前，作者對於原題曾經提出一個修正。原題中『民衆』二字是不妥當的。陡然看去，很像一切的病象，只限一般的工、農、商界的分子，而與達官、貴人、富商、大賈，以至於教育界、學術界的許多領袖人物無干。那顯而易見是不對的。中國人要有甚麼病，那病就散布在民族的全部，決不能教一部分的人獨尸其咎，至少我們無法指出那一部分應該獨尸其咎。換言之，這種病象是一般的、普通的；它在人口部分之間的表示至多祇會有程度上的不齊罷了。所以

應該改爲『民族的病象。』

這次演講會的總題與分題，大約是從胡適之先生那篇我們走那條路?的文章裏產生出來的。胡先生在那裏提出了五大仇敵：一是貧窮，二是疾病，三是愚昧，四是貪汚，五是擾亂。 四個分題，使預備分別發揮這五個仇敵裏的四個。 仇敵在這裏也就等於病，是廣義的病。 主持演講的人的原意，大約是要我討論狹義的病，就是普通所謂疾病的病，但我既不是醫生，又不是衛生事業的專家，狹義的病我不配討論。 還是討論廣義的病罷。

廣義的病在這裏可以說就是等於民族的病，而狹義的病便是個人的病。 狹義的民族的病，可以說是很難找到的。 我們最多只能說某某民族，因爲抵抗某種細菌的能力薄弱，所以比較的容易犯某種特殊的病；但是即此也不容易找到良好的證據。 最妥當的說法是，某某民族因爲抵抗某種病菌的能力薄弱，所以一旦撞到這種病菌，便不免凶多吉少，就是要多死一些人。 在這個標準之下，我們能說我們對於那一種或那幾種的病菌，是特別的缺乏應付的能力麼? 我們不能。所以我說狹義的民族的病這一個概念，是不容易成立的。 嚴格說來，幾乎是不可思議。 這樣，我

就更有理由祇談廣義的民族的病了。

要曉得一個民族有甚麼病，先得明白甚麼是一個無病的民族。換言之，一個眞正健全的民族是怎樣的？這可以分能力與意志兩層來說，而能力一層又可以分做積極與消極兩方面。先說能力。

在積極方面，我們要看一個民族創造文化的力量。所謂創造，不但指那些比較好像無所憑藉的新發明，也是指一切舊文化的推陳出新，以適應變遷的環境。不但指固有文化的推陳出新，也是指外來文化的吸收調合。在推陳出新之後，在吸收調合之中，尤須有擇善固執的能力，把已經精鍊出來的一些民族中以至於民族間共通的經驗，握住不放。

所謂文化，又可以分三部分來講。一是人對於宇宙及人生在理智與情緒兩方面所產生的種種反應的跡象；這裏就包含抽象的宗教、哲學、科學、藝術之類。二是人與人相處與相交的種種方式，包括倫常關係、社會習慣、與政治組織之類。三是人對於自然環境種種避免、修正、與因勢利導，因而促進他自己的物質生活的種種方法，這裏就包括經濟與技術方面的一切活動。在這三

部分中間，一個民族自然都盼望有充量發展的能力；但充量發展之中，又得緊緊的拿住一兩條原則。一是持平。即三部分須有平衡的與協調的發展，不能舉一廢二，或舉二廢一，或僅僅顧到某一部分或一些支節。以往已經覆滅的文化與民族，其所以覆亡的一大病原，就是偏廢。二是執中。我們在這文化的三大部分求發展，所謂發展，原有二義，一是空間上求其多變化，二是時間上求其能持久。但這二層往往不易兼顧，大多數的文化，不是變化多而如曇花之一現，便是極有苟全性命的能力而無所表見，終究也不免變成一塊僵石而後已。此中病因，也正坐偏廢兩個大字。不能持平與執中的結果，都是偏廢，偏廢等於半身不遂，半身不遂與死亡沒有多大分別。

要是積極的民族健康大都屬於心理與智力的方面，那末消極的民族健康便大都屬於生理與體力的方面。要是積極的是一些創造意識的文化的能力，消極的便是適應自然環境的能力。環境是一切物質條件之總和，條件中，氣候有冷暖，水分有多寡，土質有肥瘠，物產有豐歉，人以外的生物，對人有有益的，也有有害的；我們如今要問，一個民族，對於比較極端的寒暖、乾濕、磽瘠的土地、枯澀的物產、足以致病的細菌，假定不引用智力來加以修正或袪除，或雖用智力而一時亦無法加

以轉變的話，有沒有直接應付的能力。 所謂直接的應付，一、當然是指能不能抵抗，二、到自問不能抵抗或不能對付的時候，能不能便去而之他，別尋樂土。 因爲要是不能抵抗，又不知退避，結果也是一個死亡。

在抵抗的能力與別尋樂土的能力裏，我們特別看重別尋樂土的能力。 普通講文化的人往往忽略這一點；他們一面把一種豐富的文化的成因都推在豐富的物質環境身上，一面又好像假定創造那個文化的民族始終是這塊環境的土著似的。 其實這假定是完全錯誤的。 一種文化的形成，一面固然要看原料，就是環境中的種切，一面更要看利用這原料的能力；所謂利用的能力，又有兩層意義，一指轉變這原料、使發生用處的本領，一指最初選擇與取得這種原料的眼光與毅力。 別尋樂土的能力便是選擇與取得一種新環境的眼光與毅力。 當代的許多民族裏，可以說沒有一個是絕對的土著，沒有一個不是經歷過移殖的，但有的是比較的出乎自動、而是有選擇的，例如現在南北溫帶的各民族；有的是比較被動、而不能有多少選擇的，例如在寒帶熱帶以及深山窮谷中的民族。 自動的移殖力要比被動的移殖力來得名貴，正好比別尋樂土的能力要比直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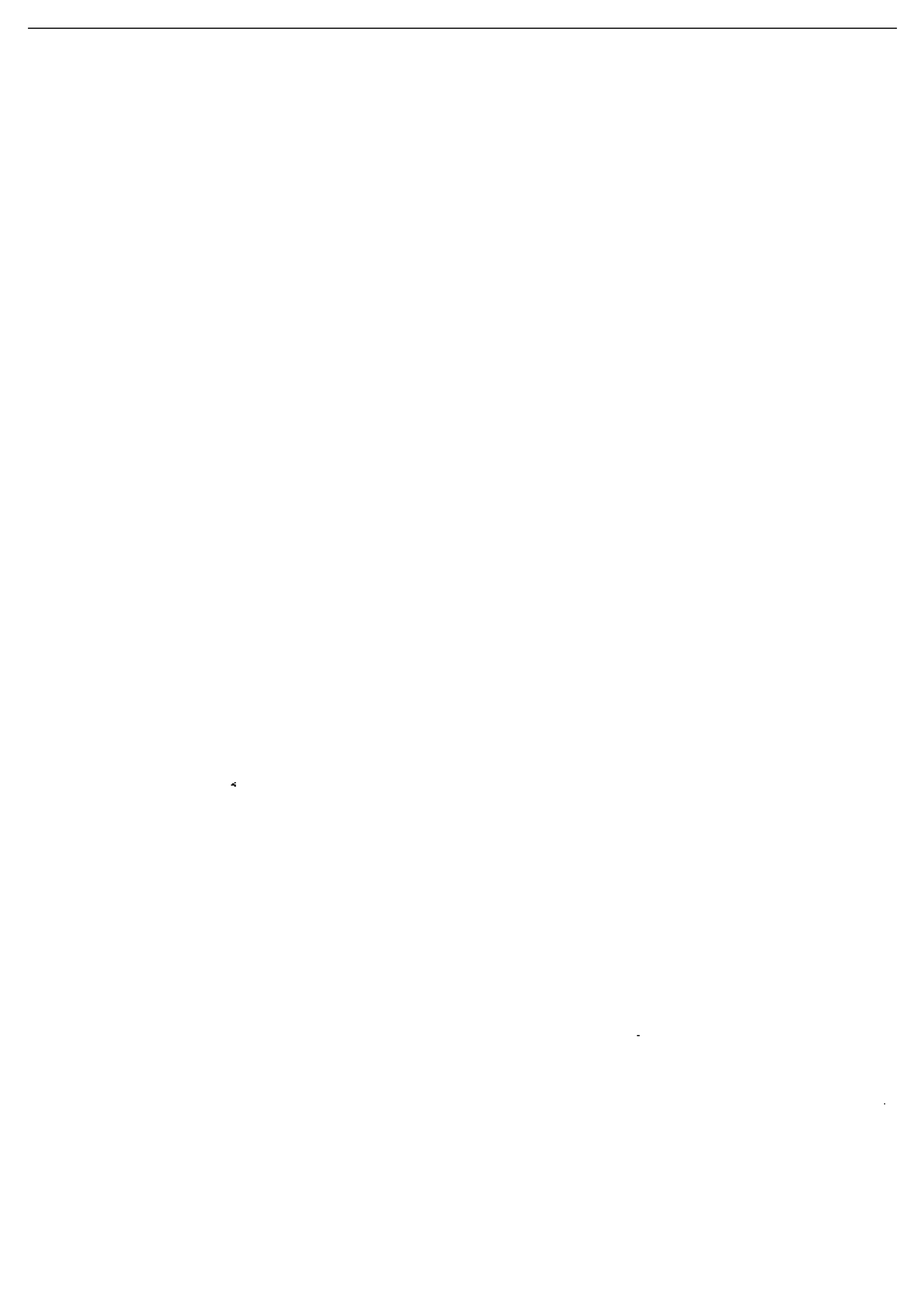
抵抗環境的能力來得名貴一樣。不久以前在中國各大都市影戲館裏出映的愛斯基摩人，便是絕好的一個例證。他們當初決不是格林蘭的土著；他們在格林蘭雖能生存，却不能產生多量的文化。

上面所說都是關於健全無病的民族應有的能力。現在說這樣一個民族應有的意志。所謂民族的意志，也有兩部分，一是民族生存與團結的意識，二是民族維持與發展的企求。生存與團結是一種事實，民族分子應該人人認識。維持與發展是一種理想，也應該人人懷抱。我們現在要明白一個民族有病無病，更得問它有此種認識與抱負沒有。二者之中，意識的獲得比較容易，而抱負的養成比較困難。要知道一個民族也會像一個人一樣，或因衰老，或因外界的壓迫，或因病魔的纏繞……，以致精神頹廢，終於引起厭世與自殺的意念。所謂自殺，並不指每個分子引刀自刎或投繯自盡，乃指大衆把生育兒女的任務，視為畏途。太平洋羣島裏一部分民族淪胥以盡的原因，間接雖說是白種人的宗教、武力、病菌以及烟酒一類的毒物，直接却是這些事物所逼出來的厭世、悲觀，與生不如死的意念，與此種意念所釀成的低生殖率。

積極的創造力與消極的順應力合在一起，再加上民族團結與發展的意志，又可以叫做位育的能力。一個健康無病的民族便是位育能力沒有欠缺的民族。

把病象一個名詞的意義說明之後，我們便可以進而推敲中國民族有些甚麼病象了。中國民族是有病的，我想誰都承認。不過病究竟在甚麼地方，却誰也未必能確實指出，至少是言人人殊，不容易得到一個公認的結論。我們現在根據上文所提出的健康的標準，來給它方一方脈看，也許可以不致完全徒勞。

我們姑且不講病的根源，但講病的現象。這病的現象，根據上文所提的標準，又可以分做五方面來看。第一是狹義的文化生活，第二是社會生活，第三是經濟生活，以上三方面都屬於積極的創造的方面；第四是我們的體格，那就屬於消極的順應方面。第五是民族的意志。在文化方面與社會方面，我們要說的話比較少，所以併做一章。



二五　文化與社會生活的病象

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可以說是一件事。我們爲討論方便起見，姑且把學術的貢獻當作文化生活，至少是狹義的文化生活。倫理關係與政治組織，則歸作社會生活。

在狹義的文化方面，就是在哲學、宗教、藝術、科學等等方面，我們的貢獻實在不能算多。宗教與科學的不發達是誰都知道的，至於藝術，我們在畫的一方面貢獻較多，其餘就談不大上了。哲學，尤其是所謂形上之學，我們是很不講究的。有人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太過於注意到人，所以對於人以上的神道（宗教）與形以上的哲理，以及人以下的物理，都不能兼收並蓄。這話恐怕是確實的。既不能兼收並蓄，於是就發生了單調與少變化的弊病，也就是偏廢的弊病。這種偏廢的弊病，秦漢以後就很顯明，從兩晉到唐代，雖稍稍有轉變的趨勢，但不久又還歸偏廢的舊轍。

就二十世紀的需要來說，這種偏廢的病象所最較我們感覺痛苦的，當然是科學能力的薄弱。

一般人講起國人的愚昧，總是把教育的不普及與文盲的充斥一類的事實抬出來，以為這便是愚昧的表現。識字教育與學校教育果然是減少愚昧的一種方法，但我們以為目前的大問題並不在此。沒有受過此種教育而見事明確、處事敏捷的人，以前有，如今也還有。我們真正的愚昧並不在一般智力的不足以應付日常普通的環境，而在特殊才能與科學頭腦的缺乏，以致不能應付像目前一般的特殊的科學文化環境。科學能力的缺乏若當作一種後天失教的現象看，原是誰都承認的。但我們以為它的病根有深於後天失教者。我們以為中國的民族分子，大多數便缺少科學的興趣，而後天興趣的缺少往往便是先天能力薄弱的表示，所以雖施以相當的科學的教育，成績還是不會好到甚麼程度。留學教育在這一方的效果不大，比起以前也未必注重科學的日本來，尤其是見得可憐——這是誰都已經知道的。但這還可以推託，說是留學生早年便缺少可以引起科學興趣的刺激所致。也許是的。但試問又何以解於這幾天我們在報上正讀着的會考的結果。教育部統計二十一年度各省市中小學會考的成績，據說高中最優科目為國文、黨義，次為史地，最劣為算學，次為外國語，又次為理化；初中最優科目為黨義，次為國文、地理，最劣為算

學，次爲自然及外國語；小學最優科目爲國語，次爲社會，最劣爲算術，次爲自然及外國語。　算學與理化或自然的成績究屬那一科最劣，照上文所引的那種報告法，很是看不清楚，但是二者都是很壞，是無疑的。　這至少可以證明，卽在幼年，卽在有科學刺激的今日，尤其是都市裏，我們所表見的科學的興趣還是微薄得可憐。　我們以爲這是病根深的表示，並不能完全責備教育的祇尚空談，不務實際。

此外還有一點，我們以爲也許和偏廢的病原有相當的關係。　在今日的形勢之下，不要說對於新的科學上的發明，我們不能有所貢獻，就是教我們把中西新舊的文化勢力，研究一個融會貫通的辦法出來，我們還不免束手無策。　主張復古的人，現在還有，而主張維新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而主張維新的人也並不能主張一種會通的維新。　所以目前在中國號稱對於國是及社會改造有些主張的人，大都是留學生或醉心於西洋文化裏某一方面的人，而其所以有某種主張的原因，不是因爲他是某國的留學生，便是因爲某種學說或政策確已在某國發生效力，並且正在熱鬧的當兒。　至於那些比較能夠新舊兼顧，想截長補短的人又大都不免牽強附會，以爲這便是會通的

表示。三四十年來，國是的不能奠定，社會改造的不能走入正軌，始終在那裏顛簸動盪，不入於楊，便入於墨，而彼此還不住的爭奪傾軋——推本尋源，也未始不是智力偏廢的一種必然的產果。

其次說社會生活的病象。

社會生活自身是一個多方面的東西，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不能不有限制。我們姑取社會組織這一點，加以推敲罷。我們根據上文不偏廢的原則立論，認為健全的社會組織宜乎是一種隨時可以聚散、可以伸縮的一種東西，太散漫固然不行，太嚴密也有危險。好比兵式體操，習練成熟之後，一條散兵線，立刻可以成雙行，成四行，雙行四行也可以不旋踵的變為散兵線；化整為零，合零成整，總要能隨意為之，嗟咄立辦，才是一個真正健全的組織。就這一點而論，不但中國民族有病，西洋民族也未嘗無病，不過所病的却好相反。西洋的病在組織過於嚴密，以致不能化整為零，所以一髮被牽，週身搖動，局部破裂，全部便有崩潰的趨勢，最近的不景氣的現象便是一個絕好的例子。中國的病在組織過於散漫，就最近數十年的形勢而論，幾乎等於沒有組織。懶散的局面既成習慣，一旦有事，也就無法合零成整；二三十年來的政治經驗便最足以證明這一點。這種懶散

的局面也未嘗沒有消極的好處，不景氣的影響在美國是非同小可的，海外的華僑的經驗也就夠嚴厲了，但我們在國內所感受到的倒也不過爾爾——就因爲借了平日懶散慣了的光。這一點，記得張公權先生在去年的中國銀行報告（民國二十二年）裏也談到過。但是積極的好處，却一點沒有，要我們拉攏起來，抖擻了精神，做一些建設的事業，就比登天還難了。

組織的缺乏，在中國是到處可以看見的。政治方面，近來未嘗不竭力講求組織，但我們所見得到的，無非是一些文字的週到、條例的嚴密、機關的疊牀架屋、人物的熙來攘往罷了。本來請外國專家經營的機關，原是辦得極有效率的，一等到收回自辦，成法便會破壞，效率便會減少。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學校雖小，而架子却大，程度雖淺，而科系却多。聽說近來中學裏便已分科。有人批評某大學辦得沒有系統，那個大學的當局便替自己辯護說，有了那麼多的學院和學系，系統於院，院統於全校的校長，還說沒有系統麼？學校裏學生的團體生活也是如此，同鄉會很發達，講主義的團體也很熱鬧，各種專門學科的研究會社也還不錯，擴大性的金蘭的小組織有的學校裏也不一而足，但是一個整個的全校學生會便往往組織不起來。在工商業方面也未嘗不如此。華

僑在中國民族分子中間，是比較善於組織的了，但日本拓殖運動『南進策』中的重要人物堤林數衛便看透了華僑的弱點，他說『華人的短處，在利己心太強，個人企業，往往成功，團體企業，則往往失敗』（見劉士木編日本海外侵略與華僑。） 在集團主義與工商化運動絕對佔優勢的今日，試問我們又有多少和人家爭勝的機會。

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分析。 說中國人絕對沒有組織，當然是不通；說絕對沒有嚴密的組織，也說不過去。 我們至少在下列幾種場合裏，可以找到很嚴密的組織。 第一是家族或宗族，這是無須多說的。 二是同業的公會。 三是舊式的農村；最近社會學會年會裏許仕廉先生報告北方農民所組織的青苗會，是很有條理、很有效率的。 四是祕密或半祕密的會社，這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略一查考，便知這種種組織之所以嚴密，是各有特殊的憑藉的：在宗族，那憑藉是血緣與情愛；在同業公會與青苗會，是密切的經濟利害關係，同時地域的密邇也是一重憑藉；至於祕密會社，除了志同道合的一點以外，還借重不少的宗教的暗示力。 這種組織的嚴密是不希奇的；我們目前需要的，是比較不受主觀的利害或情操所支配的組織。 西洋最健全的政治組織，例如英國的，

便是這一種；它的分子之間，雖不能沒有利害與情操的關係，但是此種關係，在時空兩間上，都要見得疏闊，所汲汲的決不是一時的小利，所沾沾自喜的決不是一些家人父子，師兄師弟……一類狹隘的同類意識。狠是食肉獸裏比較最沒有團體生活的，但到有大動物可以獵取時，居然也會合夥，但是獵取成功的時候，也就是散夥與彼此相爭相殺的時候，試問此種組織又有甚麼久遠的價值。以前中國社會裏號稱有嚴密組織的團體生活，其實大都有些合夥的意味；強盜打刼要合夥，開設商店也要合夥，分子間的維繫祇靠一些切膚的利害罷了。

真正組織能力的缺乏，還有甚於此者。少數人會『合夥』，已經算是不可多得，至於大多數，連這一點還談不上，他們祇會『成羣』。這裏的羣字和『合羣』或『羣策羣力』的羣字有些不同；是絕對消極的，所謂成羣，不過是憑着寬泛的同類意識的暗示，擠在一堆罷了。羣字從羊，羊羣便是這樣擁擠而成的。『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留英學生在倫敦開救國大會，請劍橋大學教授馬喇嘉（原名不詳）氏演說，其中有這樣一段切中我族病態的癥結的話：

余讀揚州十日記及嘉定屠城記，余深嘆支那人種是天生在應行淘汰之列。蓋當時揚州

城內，尙有人民八十萬人，清兵來者不過數千，兩人敵一人，可以殺死四十萬，卽以十人敵一人，亦可殺死八萬人。而其時人心渙散，尙各希冀免死，祇思鼠走兔奔，不想集合大羣，同心禦侮；至刀斧臨頭，則惟有引頸就戮而已。故往往聚數千百男女，令一兵驅之，如驅羊羣，莫敢發一聲者。夫人類究非牛馬貓犬，何以馴服一至於此？（見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申報自由談。）

無組織的現象不止於散漫而已。只要人數一多，而當前所應付的環境又是一種有急迫的時間性或狹窄的空間性的環境，於是人與人的關係便從參差零落一變而爲擁擠混亂。難民搶米的時候所表現的擁擠混亂是最好的一個例子。但這還可以解釋得開，認爲是事關生死，不得不爾。但試問又何以解於上電車時的擁擠混亂，買火車票時的擁擠混亂，進電影院看名片時的擁擠混亂。梁秋郎先生主持時事新報青光的時候，曾經開始編一種幽默的社會教科書，第一課便叫做『別擠』，題目好像很小，見地却極深刻。胡適之先生所論的民族五大仇敵裏，也有『亂』，他的原意似乎是單指內戰，我們以爲不妨把它推廣，好把社會生活裏一切擁擠混亂而不受制裁

的現象包括在內。

中國民族在社會生活方面所表現的病象不止一二端，而最關重要的自莫過於組織的缺乏。一時的或一隅的組織缺乏，不難在文化生活或社會生活的其它部分裏尋一些解釋，但若爲比較普遍的而又是已經成爲一種類似痼疾的東西，那就不能不疑心到民族的能力方面去了。



二六　經濟生活的病象

講起民族經濟的詳細的內容，歷史上的遞變，以及未來的發展的計畫與統制，自然要一個經濟的專家。但若講民族在這一方面的病態與病態的所由來，也許專家以外的人也還有插嘴的餘地。

經濟生活自身有三個方面，生產、分配、消耗。我們在生產方面向來未曾有過多大的發展，是誰都認識的；即在今日，有可以發展的刺激而實際的不發展如故，所以才有『生產落伍』一類的口頭禪語。因為生產『落伍』，所以分配與消耗同樣的要見得遲滯。此種落伍的原因自然不止一端。最基本的原因之一是地理的。我們一向自以為地大物博，因為地大，所以人口不妨儘管膨脹，因為物博，所以大家以為可以取用不竭。但最近各方面的調查證明這並不是一件事實。即就農業一方面論，我們可耕之地實在不多，好像祇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二十九（美國是百分之

五十九；這些都是美國農業經濟家貝克的估計。） 大工業所憑藉的種種礦產，比起先進的幾個工業國家來，尤其是見得稀少。 至於水旱災荒對民族經濟的有百害而無一利，更是無須多說的。所以生產生活的所以不發達，至少有一部分可以推原到物質環境的不豐厚與不能供給相當的刺激上去。 第二個不發達的原因是民族傳統的經濟觀念。 民族各派的思想中，只有法家是注重經濟生活與此種生活的生產一方面的，但是法家在中國歷史裏難得有幾次擅場的機會。 至若道家，就幾乎根本不談經濟問題，他們以為『……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所以無須講究生產；主張『民老死不相往來，』所以無須講究分配；他們物質生活的最大原則是『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結果更無異否認了消費的重要。 墨家未嘗不看重生產，但是所見也很消極，以為消費不枉不濫，就等於生產，所以竭力主張節用。 儒家的生計學說雖於生產、分配、消耗三方面都能顧到，但是最最注意的一方面是分配，唯其過於注意，有時候便有置生產於不問的危險，所以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荀子也說『不足非天下之公患。』 除了法家的學說以外，其餘幾派都流傳得極廣，大家所講求的始終是一些節儉、一些知足、知止、以及一些理論上的均平。 其間儒墨兩家唯一的比

較積極的貢獻是一個『勤』字，但對於生產力的增加，也並沒有多大良好的影響，因爲它是不講求勞作的效率的。 所以二千年勤儉哲學的產果，只落得荀子所批評墨家的一句話，叫做『勞苦頓瘁而愈無功』！

但是從我們目前所採用的眼光來看，經濟生活，尤其是生產生活之所以落伍，最大的還是一個能力問題。 近代西洋生產方之所以强大，物質的條件以外，至少還藉兩種或三種力量，一是發明。 發明的結果，可以利用自然，減少人工，而大大的增加生產與分配的效率。 二是開拓。 探險與遠征的結果，不但找到了大工業的原料，並且取得了商品的市場。 三是組織。 這自然又和生產與分配的效率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在這三方面的能力如何。 發明能力的薄弱也就等於科學興趣的薄弱，我們在上文已經加以論列。 組織的能力我們也已經談過。 至於開拓的能力，我們在下文討論到體格的時候，也有機會要討論到，但可得的結論我們不妨在此預先提及，即此種能力和發明的能力與組織的能力差不多一樣的薄弱。

但是經濟生活所以落伍的最大原因還不在上文所說的種種，而在一個私字。 私是公的反

面，原來的寫法作ㄙ，ㄙ上加一個八字，就是把ㄙ分潤開去，就成了公，所以祇是私，並不是一個毛病，毛病在私的畸形發展，以至於逐漸失掉了『分潤為公』的一種能力——也還是一個能力的問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代表着一種很高的理想，但二三千年來的經濟生活十足的表現我們不但不能實踐此種理想，並且把『雨我私田，遂及我公』所代表的自然的趨勢都給阻擋住了。

自私之所以為中國民族的一大通病，到現在已經受人公認。西洋人對中國人表同情的，往往認為這是中國民族性裏最可惋惜的一點。三十四年前有一位明恩溥牧師做了一本『中國人的特性』，就有一章專論這一層，耶魯大學的教授亨丁頓氏，更認為這是中國民族的很不幸的一種根性，並且對於它的由來，還有過一番很詳細的推敲（說詳上文第一第二兩篇）。在國人自己，對於別的病象也許不肯自承，時常要加以解釋辯白，對於自私這一點，卻也異口同聲的直認不諱。二三十年來的憂時的筆墨裏，時常可以看見類似下列的話：『……論事則無人不至公至明，任事則無人不自私自利，此則敗亡之原因，下走殆不欲深言之，徒付之浩歎耳』（張鶴齡與友人書）近年以來，此種認識，更越來越普遍，所以胡適之先生既把它認作民族五大仇敵之一，在

各處與辦平民教育的一班領袖也把它列入四大病態，認為有從速剷除的必要。

私的病態所影響到的生活的方面自不止一端，但和它關係最切的總要推經濟生活。一個搜刮的官員、一個揩油的僕婦，所貪者雖有大小，其目的在求經濟生活的固定與安全則一。中國人的經濟生活，根本是一種私人或私家的經濟生活，不以一個人做單位，便以一家人做策萬全的對象。所以弄得好，也不過是一人的克苦辛勤，一家的自給自足，弄得不好，就是吝嗇、刻薄、貪小利、損人利己、假公濟私。能『自掃門前雪』的人家，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人家，已經要算是弄得好的一部分，但是弄得好的究竟少，弄得不好的究竟多。在過渡、離亂、或其它經濟狀況特別不景氣的時期，人人各奔前程，此種畸形發展的自私自利的心腸自然是更容易表現，因為在此種情勢之下，唯獨有此種心腸的人纔最能彀估些暫時的便宜。目前中國的『私』的通病，所以特別見得疫癘一般的橫行的緣故，一半固在病的本身的嚴重，一半也未始不因這是一個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過渡時期。但反過來，我們也承認，要是不因為這種牢不可破的通病，這個過渡時代的嚴重性也可以減輕不少。

根據了這個私的通病，讓我們再回頭看看我們以前各家的經濟學說所產生的實際的結果，生產的不發達，因為物質條件與人力的限制，固然早就受了相當的命定，初不待私的通病的傳播。但私的病態傳播以後，確有一些變本加厲的抑止與消極化的傾向。　上文論組織能力的缺乏之時，我們不引過日本人堤林數衞批評華僑企業家的話麼？（『華人的短處，在利己心太強，個人企業，往往成功，團體企業，往往失敗。』）　那幾句話也正可以引來證明自私的病和生產生活的關係。　華僑在民族分子中間已經要算能開拓進取的分子，因為開拓的能力較大，所以生產的能力也相對的大些，但依然不免失敗，依然不免此類外國人的近乎訕笑的評論，為之厲階的豈不是又是私的通病？　據上文所譯亨丁頓氏的觀察，因為中國南方的經濟情形比較優越，所以華南的人的自私自利之心要比別處的好一些，好一些的猶且如此，猶且不免深深的影響到生產的活動，那末一般的生產生活和私的通病的因緣固結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消費方面，在原則上各家會通的主張是一個節字，這原是一種無可非議的主張；但私的病態傳播的結果，我們實際所履行的，並不是中和的節，而是兩個極端，一是吝嗇，二是浪擲。　吝嗇之

風以北方爲多，而浪擲之風，則以南方爲盛。 吝嗇也許是過火的節儉，所以未可厚非，但也不盡然，許多人往往對於一己的貨財十分吝嗇，而到支配或消費公家的貨財時便會隨意浪擲；這在官場最可以看見，而在家庭裏的老媽子身上也可尋出一些證據來。 以前大家庭時代，一家在分家以前的支出往往很大，一到分家以後，各房用度的總和反而比以前會來得小；也未始不是一個良好的證據。 由此可見至少一部分中國人的節省以至於吝嗇，並不是因愛惜物力而然，乃是私的通病的一種表現！ 至於浪擲，所表見的大半不出兩途，一是衣食的自奉，一是賭博與其它一切投機與僥倖萬一的經濟行爲。 華僑中間，往往有把數十年血汗換來的積蓄，在回國的旅程中完全做賭本輸掉的。 奢侈的衣食自奉，不用說是一種畸形的自私的症候；而賭博與投機的行爲，稍有公德觀念的人自然也不屑爲。

　　至於儒家所主張的均平的分配，在事實上也沒有做到。 『均分』和『節用』，都有分寸的道理存乎其間。 要取得社會的『均』，先得做到個人的『節』。 但私的通病既使我們不能有『節』，有如上述，稍稍有錢的人不是把銀子鎔化了埋在地下或貼了利息存放在外國銀行裏，便

是爲了一己的樂利一擲百萬，試問『均』字又從何處說起。就大多數的民衆而論，固未嘗沒有『均』的表現，但所謂均者，『均是貧耳。』生產的能力旣薄弱，又繼之以深中了私病的消費與分配，又安得而不貧？

總之，民族在經濟生活方面所表見的病象不但是很深刻，並且也是很複雜。所謂複雜，就是指病的來路不止一條，發明的能力、開拓的能力、以至於組織的能力的薄弱，都要負相當的責任、而最大的致命傷則在自私心畸形的發展，而此種的畸形發展怕不止是一種暫時取得的習慣，而是一種牢不可破的根性。

二七　消極的體格與活力

我們在開始討論民族病象的總題目的時候說過幾句提綱挈領的話。這幾句話我們認為有再提一提必要。民族健康可以分兩部分看，即消極的與積極的。要是積極的民族健康是大都屬於心理與智力的方面，那末消極的民族健康便大都屬於生理與體力的方面。要是積極的是創造文化的能力，消極的便是適應自然環境的能力。……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一個民族，對於自然環境中種種不良的事物，假定不引用智力來加以修正或袪除，或雖用智力亦無法加以轉變的話，有沒有直接應付的能力。所謂直接的應付能力，一指抵抗力的大小，二指到自問不能抵抗的時候，能不能用移徙的方法，根本另換一種環境。（見上文第二十四章。）

先說抵抗不良環境的能力。在這一點上，我的印象是，我們的能力不在許多別的民族之下；差堪和我們相比的怕祇有一個猶太民族。這印象也是很普遍的，因為從日常的生活裏、醫學衛

生的經驗裏、移民的轉輾遷徙裏，我們到處可以看見這種抵抗力活動的痕跡。說氣候的冷暖罷，我們是一個江南人所謂『喫得溫燉來得熱』的民族。而此種『喫得溫燉來得熱』甚麼都不在乎的人，也就有了一個綽號，便叫做『溫燉湯』，說見清人崔灝（晴江）的通俗編。這一層，在我們移民的經驗裏最容易看出來。就國外移民而論，誰都知道華僑的足跡是隨處可以遇到的。白種人是以善於開拓著稱的了，但是在熱帶區域，他們便不能應付，有一位澳洲的地理學者有見及此，甚至於主張變通『白澳政策』使中國人可以向昆士蘭（Queensland）一帶移殖，因為惟有中國人纔有開拓這一類地面的能耐。大凡熱帶與半熱帶區域的民族，因為精力都被熱氣所消磨的緣故，大率墮性極重而於文化不能多有創造，但是據美國地理學者亨丁頓氏的觀察，中國的南方雖有半熱帶的氣候，却是一大例外（見上文第二篇）。在南洋的華僑，也是如此。

就抵抗病菌的能力而論，我們也有類乎的情形。疾病誠然是我們四五個大仇敵的一個，我們各種疾病的死亡率，雖至今無確實的統計，也誠然是很高。但據許多有經驗的西醫說，中國人對於各式病菌的抵抗能力，有時候眞可以驚人。一個民族或種族往往有許多比較已經習慣

了的疾病，例如非洲黑人之於睡眠病，巴拿馬一帶土人之於黃熱病，我們之於瘧疾與肺病。各族對於此種習慣了的疾病，死亡的人至今雖還是很多，但若易地以處，恐怕所得的結果，還不僅僅是高的死亡率，而是大規模的瘟疫例！

中國人在這一方面的抵抗力，是不是比別的民族特別的强，我們不得而知，但是許多人的印象，總覺得它所能抵抗的疾病的種類，似乎要比較的多。記得十年前和對於花柳科研究得極有成績的一位醫學家談起梅毒與中國民族的關係，據他說，中國人在這一方面似乎有一種很特別的抵抗力。白種人受此種病菌襲擊後，往往會因爲神經系統被牽入漩渦的緣故，犯一種癲狂，叫做『全身性不全癱瘓』，是一種不治之症；但在中國人則不然，我們的神經系統似乎不容易被侵蝕，所以此種癲狂難得遇見，這是一二醫師觀察的所得，是不是完全可以成立，我們也不能斷定，但至少是很有參考的價值的。

其次是躲避不良環境和尋覓新環境的能力，也就是移徙的能力。我們在這一點上的綜合的印象，是以前這種能力要大些，要普遍些，但後來便越來越小，越局部化。我們的祖先大約是從

西北來的，所以最初的民族經驗裏，移徙要佔很重要的部分。商民族在成湯與盤庚之間便搬了五次國都，所謂『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的便是。那時候所以非搬不可的理由，有一位註解先生說得好，便在『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近人李濟之先生研究民族自西北入東南的移徙的歷史，發見甘肅是廢棄的城郭最多的一省，其所以廢棄的理由，直接便是移徙，間接是西北的日就旱荒。在中古時代，我們隨時還可以遇見一些比較大規模的自動的移民運動，其中最著的要推中原民族的幾次三番的向閩粵推進；所謂客家民族，便是此種運動的一部分的結果。降至近代，江西人的向湖南移徙，徽州人的向長江與錢塘江下游移徙，山東河北人的向東三省移徙，以及華僑的向海外移徙……都算是犖犖大者。但是就大體而論，此種『別尋樂土』的衝動與能力似乎日見其少，移徙的人雖還陸續的有，但自動性日見其小，强制性日見其大，而隊伍亦日見其零落與無組織。例如明代洪武年間的屯戍運動，在中國史上原是僅見的，但當時些少的成績，還得靠政府很大的壓力來維持。假如當初自動的性質强些，再加上一些政治的不斷的督促推挽，無論關以東的地域多大，早就可以將次開闢，到今日也不致受異族的覬覦而終於淪陷

了。

五六年前，浙江鬧水災，省政府決定把一部分災民向東三省輸送；第一批送去了一二百人，當時作者在英文中國評論週報上還做了一篇短評送他們的行，但不上一兩個月，這批移民一個一個的逃回了浙江，說是受不了行旅的苦，住不慣北方的環境。在南洋方面的移殖也復如此。在閉關時代，政府向有移民出國的禁例，科犯者以很大的刑罰。一種行得通的法令大率和民族性也有相當的關係，唯其移徙的衝動與能力不甚強烈，此種法令才發生了效力。

移徙的衝動與能力一天比一天的減少，也就等於安土重遷的性格一天比一天的發展，也就等於消極的抵抗環境的能力一天比一天的增加。一個民族遇到不良而又無法加以轉變的環境，而不知躲避，結果便會造成兩種人，一是被淘汰的死人，二是被選擇而苟延殘喘、去死不遠的人。這第二種人的唯一的長處，說來好像很矛盾，卻就是不容易死，他們在體力上與心理上都有百折不撓的耐性，也有百推不動的墮性；你若能把他們推動的話，他們倒也會『隨遇而安』，要是境遇再變本加厲的惡化的話，他們也始終能『逆來順受』。他們生活的原則是『得過且過』，是『一動不如一靜』。他們所用以自己慰藉的格言是：『抵死無大難，叫化再嘸窮』（我所生長的家

鄉有此二語，但流行到何種程度，則不得而知。） 消極的抵抗到這種程度的時候，其實已經沒有多大抵抗的意味，大家所抵抗的，就祇不過一個『死』而已，只要能不死便甚麼都可以犧牲、甚麼都可以遷就。 這一類的民族分子，就脾氣而論，固然像上文所引的『溫燉湯』，就體格而論，尤其是像作者在下文『民族衛生的出路』裏所提出的『牛皮糖』。 除了邊疆與濱海的區域裏，我們還可以看見一些移民子孫的剛勁之氣與霹靂火箭一般的性格以外，普通的中國人就多少總有幾分『溫燉湯』與『牛皮糖』的風格與情調。 這種風格與情調，就其和久已習慣了的環境而論，也不能完全說壞；它可以息事寧人，可以守己安分，成事雖然不足，敗事也並不有餘，還能說不好麼？ 就是移民的能到處成功，輕易不受淘汰的一層，也未始不仰仗這種『滿不在乎』的本領。但這種本領無論怎樣好法，歸根結底總是消極的，是一種對於不良環境的十分十二分的遷就，尤其極是和寄生蟲的遷就環境沒有多大分別，就是不惜犧牲種種固有的優良的特性來換取氣息僅屬的一些生命。 這也未始不是『適者生存』，但萬萬談不上『優勝劣敗』！

我們現在要看這種體格在實際的生活上究竟發生了甚麼影響。 在閉關時代，誠如上文所

云，我們也未始不能和環境打成一片，卽使生活比較平淡些、窮苦些，我們也不大在乎，因爲我們有的是『守』的本領，是『捱』或『挨』的耐性，我們能『自甘澹泊』能『苦守清貧』。　一言以蔽之，在實際生活裏，我們進取的衝動極薄弱，保守的脾氣極強烈，鬬爭的性格比較縮減，妥洽的精神比較發達，也就接踵而來。　戰爭的事，在歷史上並不是沒有，並且是很多，但是所以多的原因，幾乎完全可以推到政治的混亂與經濟的壓迫上去，並且一定要混亂之至壓迫之至，才會有亂事發生；換言之，大部分的內亂可以推到我們以前已經討論過的組織能力與生產能力的薄弱上去，而絕對不能歸罪於民族一般的好戰，或尚武，至少在秦漢以後，是不能的。　至於近代的革命，誰也知道它是發源於南方移民的子孫中間，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例外，而其所以成就，所以能一方發難、全國景從者，與其說是因爲大家都抱同仇敵愾、滅此朝食的胸懷，毋寧說是大家都有隨遇而安、通權達變的能力。

上面這一番話也並不是說中國人不能當兵，或中國的兵不能有多大的成績。　因爲上文所說的政治的混亂與經濟的壓迫，兵總有人當的，並且也是很多。　兵的地位雖在『四民』之下，而

普通又雖有『好男不當兵』的諺語，隊伍裏總不怕沒有人，並且只要提調與訓練得法，也還可以和人家較些短長。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中國兵的好處大部分也是比較消極的。 在中國訓練新兵的外國兵官一面很稱許中國兵的長處，但同時却也看出一些和歐美兵不同的特點來。 有一位極有經驗的蒙鐵將軍 (General J. W. N. Munthe) 說，中國兵的目力好，神經也不容易受震撼，（參看上文第一篇第二章。） 容易受指揮與紀律的束縛，有長力，強壯的程度雖不及歐洲的兵，但是耐性與持久的能力却比較大；他們的工作也不及歐洲兵的敏捷，但可以一連工作上許多鐘點而不疲；講起步兵長征的能力，這位蒙鐵將軍以為據他的經驗而論，中國兵要算第一，（見 H. F. Bain, Ores and Industry in the Far East, 頁二四〇。） 這許多長處，除了眼光一端而外，其餘都和我們在上文所討論的可以脗合無間，並且也始終沒有跳出『長力』與『耐性』兩個似二而實一的特點的範圍。

在體格的鍛鍊裏面，我們上面所說的也大致適用。 以前我們並非不講究所謂體育，但第一、此種講究極不普遍。 就大多數的人而論，他們似乎除了日常工作所須的筋肉的活動以外，並不

感到甚麼額外的需要。 第二、少數講究運動的人的運動和近代西洋的運動也大有分別。 例如練習拳擊罷，他們很講究所謂『內功』，講究『以柔制剛』的道理。 近來有一個拳藝的組織，不就叫做『致柔拳社』麼? 這自然又是和我們在上文所說的話一氣渾成的。 我們在上文所說的牛皮糖似的體格根本也許不大要鍛鍊，若要鍛鍊的話，似乎一定得採取此種『內功』的方式，才覺得舒服。 至於那些以『靜坐』『運氣』為攝生要道的主張，以及道家所稱『龍虎胎息，吐故納新』的『內丹』等，當然比『內功』的運動還要更進一步，不過在原理上始終都是一貫的。近代新式的體育與運動，提倡得也不止一二十年了，但是成績也還不過爾爾，我以為大原因倒不在提倡不力，而應於我們特殊的體格中求之。

我們這種特殊的體格，我們儘可以不把它當做一種病象看，我們甚至於可以微帶自珍的認為別具風格、與衆不同，但是要它在這個競爭劇烈，不進則退的二十世紀的大局裏周旋中矩，不實隕越，多少總不免是個問題罷。



二八　民族競存的意志

二十年前，因爲一部分西洋人類學者的努力，尤其是在英國人類學泰斗瑞芾士（W. H. R. Rivers）的領導之下，我們對於民族問題，取得了一個比較新鮮的見解，就是一個民族，像一個個人一樣，也可以抱厭世主義，也可以對生命覺得索然無味，因而自殺。

民族的自殺和上文我們已經解釋過的民族的病象一樣，當然不是指人人自尋短見，乃是指團體生活的退化或瓦解進行到相當程度以後，民族分子對於婚姻與生育的行爲，不復感覺到多大的興趣，不復感覺到有維持的必要。　他們認爲民族生命的前程是一團漆黑，是等於沒有前程；既然沒有前程，又何必生男育女，徒然教他們受罪呢？

瑞芾士教授在一九二二年編過一本論文集，叫做東北海洋洲羣島的人口減殺（Depopulation of Melanesia）這是許多人合作的一本書；有引論一篇，是一個受過歐化而得過英國封爵

的土人做的；總論一篇，蘇羅門羣島兩篇，新黑勃力提士羣島一篇，聖克羅羣島及礁島合一篇；都是熟悉當地情形的傳教師和屬地長官做的；一篇講土人的疾病，是一個醫生做的；最後一篇叫做『心理的因素』，即全書的畫龍點睛處，是瑞氏自己的手筆。

全書有一個一貫的主意，就是這些羣島中的人口之所以減殺，行且到一個滅種的境地，是因爲土人已經失掉生命的興趣，心目中已經瞧不見圖存的理由。瑞氏煞尾的一文就是專發揮這層主意的。大意說，一個民族的衰亡總不外兩個理由，一是死亡加多，一是生殖減少。死亡加多的因素不一：一是新來的疾病，如同癆瘵、赤痢、結核、花柳病、流行性感冒等；二是所謂民族的毒品，例如酒；三是軍火；四是習慣上的變動，例如本來是裸體或幾乎裸體的，如今採用了歐洲式的衣着，本來住的是很通風的土屋，如今改用了牆很厚、窗子很小的西式建築；五是風俗上的革除，例如人頭的獵取、已婚男女平日分居的制度、祖先崇拜等。這種種因素又合併了引起一個心理的因素，就是對於生命的索然無味。尤其是風俗上的革除一端最關重要。一個傳了好幾百年或幾千年的風俗，和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在已經發生不可須臾離的關係，一旦突然撤廢，而同時又別無

相當的替代物，結果就不曾把民族生命所由寄託的根盤完全拔了起來一般，無怪其要『未知生樂，焉知死悲』了。 瑞氏說，『我願意再三申說的一點是，因為我們把土著的制度，不問情由、不分皁白的給搗毀了，這些民族便幾乎完全失掉了他們生命裏所引為最有興趣的事物。 我如今更進一步的提出這種興趣的失落便是這些民族所由衰亡的一大理由，並且也許是最有力量的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生殖減少。 生殖減少和死亡加多之間，自然也有因果的關係；死亡所以多的直接因素往往也就是生殖所以少的間接因素。 不過有一個因素，是對於二者同樣的有直接的關係的，那也就是生趣的缺乏。 土著們問，我們為什麼要生孩子？ 為我們自己麼？ 我們自己是已經沒有前途了的。 為白種人添些牛馬麼？ 那似乎也太不值得。 總之，一個民族的文化環境，它的文化的有機的整體，無論在演化的歷程上是多麼高或多麼低，一經破碎支離以後，那民族的生命便好比沒有根的樹，沒有錨的船，是無法維持的，這樣一個民族根本就不再有生存的興趣，更不必進一步的說競存的意向了。

人類學者這種對於土著民族的結論對我們又可以有甚麼教訓呢? 我們上文解釋民族的病象時，曾經說過民族的意志可以分爲兩部分，一是生存與團結的意識，又一是維持與發展的企求。 如今所謂生存的興趣，可以說就等於生存與團結的意識，而競存的意向就等於維持與發展的企求。 中國民族在這兩點上的狀況又如何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似乎不能作一個單純的答覆。 先就西化東漸以前的情形而論。 中國人生存的意識是一向極强烈的；我們上文討論體格的病象時，已充分的考慮過這一點。 但團結的意識，亦即共同生存的意識，却不强烈，不但不强烈，並且是異常薄弱，這在上文社會生活的病象的討論裏也早已分析過。 這二者合併的結果是生存的意識雖强，而其表見往往祇限於一人一家，所謂『明哲保身，』所謂『保全身家性命，』無非是一人一家的生存意識的表見。 至於民族全部，這種意識却並不發達，至少歷史期內雖有過相當發達的時期，也從未能維持很久。 尚書盤庚篇有一句盤庚告誡商民族的話說，『毋俾易種於茲新邑，』這種富有民族意識的口氣，我們後來就不大聽見。 儒家『尊王』與『攘夷』的原則，原是二者並重的，但後來尊王一端，則愈來愈畸

形發展，而攘夷一端則成一種極空疏的議論，寖假至於無人道及。

至於第二部分所謂維持與發展的企求情形亦正復相似。維持的企求是極强烈的，但發展的企求却很薄弱。我們所要的祇不過是生命的繼續（continuity）而對於生命的廣被（extensity）與夫深入（intensity），則置之不問。基督教的教主對他的門徒說我的來，爲的是要你們得着生命，並且要很豐富的得着。如今我們要的祇是『生命』至於『豐富』與否，便不在意計之中；就一人而論，往往能苟延殘喘，能維持一日的生計，便於願已足。北方有許多苦力，例如人力車夫，賺足了幾毛錢，便再也不願意做額外的努力。以一家而論，生男育女的事，倒也誰都不推諉，並且也從不厭其太多，但是只要能老來有些依靠，能繼續一姓的香煙，最多能稍稍替一姓的門楣，爭些光寵，便算盡了生育與教養的能事。至於民族全般的生命的發揚光大，自然是更無從談起。消極的攘夷的原則，既很早便成空論，積極的探險遠征，開拓疆土，漢武張騫而後，亦幾於繼起無人。至於兩晉以後的大段中國歷史，在狹義的文化生活上，頗若我們在在能吞併人家，同化人家，但在廣義的民族生活上，我們却早就呈十分頹廢、不能振作的光景。道家清靜無爲的哲學，便

在這大段落的初期裏變本加厲的復活。佛教也在這時候乘虛而入。在釋道二教此推彼挽之間，民族全般的頹廢狀態使找到了一個躲藏之所，一個自圓之詞。向來以『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精神著稱的儒家，到此也就無形之中和它們攜了手，多少也不免替此種頹廢的光景作些護符。再經過了好幾次的外族侵陵以後，實際上的民族精神已經如漏網之魚、驚弓之鳥一般，再也不敢抬頭。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一類爲民族抗爭的人，其事跡的所以能動天地而泣鬼神，正因爲他們是一些證明一條例的例外！這例是甚麼？就是民族的一般的頹廢，就是民族對於全般發展的企求，可以說等於沒有。

西化東漸以後，問題自然是越發見得複雜。在以前，我們武力上儘管不如人，儘管不敢抬頭，在心理上還强勉的可以自己慰藉，就是，我們的文化高人一等，只要年代一多，不怕不能把別人吞併同化。這種自慰事實上總算也沒有落空。但西化東漸以後，情形便大非昔比；和別人家幾番較量的結果，我們發見不但武力不如人，文化的能不能終操勝算，也就成了問題。於是於實際的虛弱之上，又加添了一種精神上的自餒。目前民族最大的危險，就是這種自餒的心理。

討論到此，我們便可以設法和瑞葸士所提出的結論，合併在一起討論了。我們的民族和東北海洋洲羣島的土著很不相同；我們所處的地理環境、我們的文化、我們的人口數量，在在要比他們佔優勝。我們目前雖受人侵陵侮辱，但整個的民族還未到完全受人支配的地步。所以，適用於這些土著民族的結論並沒有適用於我們的必然性，並且以常理論之，怕根本不適用。

不過，我們除非不做關於民族前途的文字則已，做則不能不根據『策萬全』的大原則立論。詢于芻蕘，古有明訓，希拉、羅馬一類大民族的衰亡，固然可以做我們的千秋龜鑑，一羣土著民族的淪胥以盡，又何嘗不能供給一些參考的資料呢？

土著民族的衰亡是由於生趣的減少，生趣的減少又可以推源到許多物質的以及精神的事物上去。我們先要問我們目前有沒有這一類可以減少生趣的事物。西化東漸以後，確乎引進了許多我們以前不曾有過的東西，不過因爲我們的文化本身已達相當成熟的程度，民族應付環境的經驗本來就很豐富，所以眞正簇新的項目不多就是了。在土著民族認爲新的疾病，我們便早就司空見慣；所謂民族的毒品酒，我們是不怕的，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事實上比西洋人還要豐

富；不過雅片和海洛因一類的毒品却是一大問題，至少有一部分的民族分子是受了它們的摧殘的。軍火的地位比較重要。二十年來的內戰，糟蹋了多少的生命產業，局部不能不說受它之賜。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習慣上的變動，怕也並沒有多大的影響。比較影響大的是種種風俗上的革除而得不到相當的替代。我們也有種種根深蔕固的風俗；這些風俗和生活的各方面也是息息相關的。歷年以來，在『破除迷信』『打倒偶像』的口號之下，我們也做過不少摧殘破壞的工作。農民終歲辛勤，惟一的假期是一些季節，惟一的享樂是這種季節時候的一些逢場作戲，如迎神賽會、享神演劇、朝山進香之類。如今有許多地方這些已經被黨政教育機關取締一個乾淨，即不啻的在大衆的生活中挖出一個窟窿來。這種窟窿要是越挖越大而同時又沒有補綴的好法子，怕遲早也會引起問題的；問題的大小固然和土著民族所經驗到的很有分別，但問題的性質却是相仿。

歸結上文的討論，我們可以說民族競存的意志目前實在受好幾方面的威脅。一是個體生存的意志大於團體生存的意志，一個人但願身家性命可以委曲求全，別的便都可以不管，甚至於

把公家當犧牲品，亦在所不惜；躲在租界裏的富翁，甘心出賣國家的漢奸，全都受這種意志的支配。二是苟安的心裏大於振作的精神，而維持現狀的祈求大於開拓發展的願望。一條陋規，明知其『陋』，而依然不失爲『規』；一個偏安之局，明知其『偏』，而依然可以『安』之若素；全都是此種苟且的心理的表見。三是自餒心理的變本加厲，吃了敗仗，畏首畏尾，固然是自餒的表示；和強國辦外交，別人的要求還沒有出口，我已經先意承旨，也未始不是自餒的表示。承認別人的文化有百是而無一非，自己的有百非而無一是，以爲非全盤西化不足以圖自強，也未始不是自餒心理的表示。四是種種風俗上的操切的改革所可能引起的一種生活上的不寧靜與失望。作者說是『可能引起的，』因爲此種不寧靜與失望固在所不免，但究屬普通不普通，究屬深刻不深刻，和士著民族所經歷的究竟有幾分可以相比，我們却不知道。

再約言之，這四種威脅之中，前三種可以說是很實在的，是數十年、甚至於千百年來的民族經驗已經詔示給我們的；第四種却是可能的，是得諸土著民族的暗示的。但不論是實在的或可能的，民族全般的競存的意志，在四者合力威脅之下，不免呈一種異常萎縮之象，是可以斷言的。

我們討論民族競存的意志，動機蓋得諸人類學者對於土著民族所下的一種結論。但討論的結果，發見此種結論未必很適用，而適用的却另有兩三個從民族自身的經驗裏所產生的特殊的心理品性。

民族的病象，我們前後所已診察過的也不止一端了，但要以競存的意志的薄弱爲最關緊要。此種意志上一有病象，就無異一個參加比賽的運動員，在沒有上場以前，便爾宣布了棄權！

第五篇　民族衛生的出路

二九　民族衛生與選擇作用

民族衛生就是優生，英美等國所研究的優生學，就等於德、奧、瑞、挪等國所研究的民族衛生學。

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不止一條，政治的出路、教育的出路實業的出路、輿論的出路、宗教道德的出路、打倒帝國主義的出路、甚而至於音樂的出路，一切一切都有人提出討論過了，有的並且已經經歷過多少的試驗，成或敗也都有可說的。

但民族衛生這一條出路似乎還沒有人具體的提出過。作者從民國十二年起在這個題目上，或站在這個題目的立場上，固然不揣鄙陋的發表過不少的文稿，但幾乎沒有一次不是旁敲側擊的。作者有鑒於西方民族衛生運動的覆轍，深怕一做正面文字，就不免有一知半解的好事者

出來大敲大擂，不但不足推進此種運動，反足以阻礙它的健全的發軔。往年在平社歷次的敍會裏，我擔任過兩次討論，第一次從民族衛生方面分析中國問題，第二次從同一方面尋一箇解決的方案；但兩次的文字都沒有完全發表。那篇胡適之先生認爲平社討論的產物的說才丁兩旺，實在和平社無干。中間固然提到民族衛生的出路，但只是偶然提及，並不具體。那篇人文選擇和中華民族確是第二次討論會中宣讀的，也確乎帶着方案的性質，但只詳全部方案的一部分，即人文選擇的部分，其它部分完全沒有顧到，所以也不能說是具體。（二文現均收入人文史觀中。）

民國二十年八月間在廣州演講，題目之一便是『民族衛生的出路』。這一次不但題目很顯明的具有方案性質，內容也確還具體。但人事碌碌，到了次年才有機會把他寫成比較完整的稿子。自『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以後，國人爲民族和國家求出路的聲浪又甚囂塵上；一切一切又都談到了，只是輪不到民族衛生。本文的所以終於成篇，局部也自不能不推溯到當時的一番刺激與此種挂漏的認識。

民族衛生的出路，可以分做好幾部分說：一是目的，二是選擇的原則，三是反選擇與民族病象，

四是糾正選擇作用的方法與路徑。 共分兩章討論，一至三合一章。

民族衞生或優生的目的是極簡單的，就是要教民族中的優秀分子相對的加多，不優秀分子相對的減少。美國有一位生物社會學者，把民族畫做一箇陀螺形的東西（是外國式的陀螺，非中國式的地黃牛）一個中下分子特多的民族好比一箇普通玩的陀螺，上小下大，上輕下重；一箇中上分子多的民族便好比把同樣的一箇陀螺倒了過來，變做上大下小，上重下輕；一箇中下中上比較均衡的民族便好比一個中間大兩頭一般尖削的陀螺。 我相信中國民族是好比最後的一種陀螺，同時又有像第一種陀螺的傾向，即平庸的人獨多，中上和中下的分子比別的民族相對的要少；同時又因中古以來種種反選擇的影響，中下的分子有日益增多的趨勢。

上文『優秀』『不優秀』、『中上』『中下』一類的說法自然是指民族分子的能力和品質。 討論到一個民族的盛衰與亡，終究不免談到民族分子的能力和品質上去。 以前講出路的人也談到這一點，如今講民族衞生的出路自然也不能把它避免。 不過有一些不同，我們着眼在能力和品質的天賦限制上，講其他出路的人注意的却是後天的、人為的、種種努力的程度。

談一切出路的人幾乎誰都承認下面四種能力或品性的不足，至少不足以應付二十世紀內中西新舊兩種勢力交流的局面：

一、體力。

二、科學能力或研究能力。

三、團結能力和組織能力。

四、社會意識或『八厶爲公』的能力。

至於這四種能力爲甚麼缺乏，卻一百箇裏有九十九箇不是從環境裏尋答復，便是從自由意志裏求解釋。我不妨舉最近的一個例。

黃任之先生去年到日本去觀察，大受感觸，回來做了一本很有趣的黃海環遊記。他在最後一節裏提出了四項改進中國的辦法來：一是人人把體格練好起來，二是堅決的信仰科學，三是大家團結起來，四是大家從本位上努力進取。黃先生是爲中華民族找尋出路的一位前輩，我們誰都很敬愛他的。他這四項辦法裏，至少有三項牽涉到能力問題，但黃先生似乎並不承認中國民

族的能力，在這幾方面有多大欠缺，不過沒有下決心去做罷了。 他說：『今後的問題，就是對於這四辦法，快快去做，快快去做。』 可知他所見到的，始終是一個意志問題，不是一個能力問題。 即使他也見到能力的薄弱，他很明白的否認這種薄弱是因緣於先天的不足。 他說：『如果吾們還覺得吾們的土地是很肥美的，物產是很豐富的，基礎到現在還是很好，病就在人的方面；而且人的生殖是很繁盛的，姿質是很聰明優秀的，病僅僅屬於後天，而完全不在先天，那麼中國決不是不可爲的國家。』

我爲黃海環遊記做了一篇書評，我也承認『中國決不是不可爲的國家，』但要可爲，第一先得承認目下民族體力的不足、科學能力的薄弱、領袖人才與組織能力的缺乏、自私自利心的普遍深刻與夫團結的不易；應知我們目前所應力謀應付的不是一個自由意志的問題，而是一個遺傳的能力問題。 不承認這一點，便不知病根所在，不知病根所在，便不能開方下藥，沒有資格講求民族衛生。

上文不說到四種能力的欠缺麼？ 如今我們要根據遺傳和淘汰的原則，來給他們分析一下。

打頭我應當再說一遍，我是相信中國民族先天不無問題的，不無病態的。『民族病態』的意義當然和『個人病態』的意義不同。 因爲淘汰不得法，使民族分子一般的體力智力不足以應付一時代一地方的環境，這個民族便不妨說是有病的。 我很怕中國民族便是這樣的一個民族。（詳上文第三篇。）

所謂淘汰，也似乎應當不憚煩的解釋一下。 達爾文死了五十年了，物種原始出來了七十多年了，嚴譯赫氏天演論以來也三十多年了，但是除了少數生物學者對於達氏演化論的精義至今並沒有抓住。 達氏演化論的精義便是淘汰或選擇。

究竟甚麼叫做淘汰或選擇？ 生物箇體因爲遺傳品性和平生際遇的不同，配偶行爲的發生有有無遲早的分別，生產後輩的行爲又有有無、遲早、與多少的分別，死亡的行爲也有遲早的分別。這三種不同的行爲，在人類方面，我們有三箇名詞來代表，叫做軒輊的婚姻率、軒輊的生產率、軒輊的死亡率。這種軒輊的現象便是淘汰或是選擇的結果。 早死、遲婚、不婚、不育、少生——是屬於淘汰一面的；遲死、早婚、多生——是屬於選擇一面的。 同一地段裏，同一時期裏，人物的各種流品，在

數量的分配上，因此關係，使有顯著的不同。在同一地段的不同的各時期裏，流品數量的分配也大有不齊，爲的是同一原因。

選擇或淘汰有兩種，一是自然選擇或淘汰，這在不懂生物學的人也曉得在文章裏自由引用。一是，在普通動植物方面，人工或人爲選擇，在人類方面，可以叫做社會選擇或文化選擇，作者一向喜歡把他叫做人文選擇。在人的方面，達爾文自己並沒有來得及發揮，大部分的研究是後來的德法英義國學者做的。這一點，知道引用的人就不多，即在翻譯赫氏演化論的嚴幾道似乎還沒有十分了解；他始終以爲中國民族的種種惡劣性根，非經天然淘汰的巨靈之掌層層洗伐，不足以言更新。

其實呢？所謂人文選擇是極容易了解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化勢力，這種勢力決不是混同劃一的，往往某派文化勢力特別佔優勢，而成爲社會生活裏人們適應或位育的最大的對象；順之者生，逆之者亡。例如漢代以後的中國人，凡是比較能夠在孔門或儒家的學說和制度裏討生活的，個人生存的機會總要大些，配偶的機會也要早些，生男育女的機會也要多些。這一層至今

還未經切實研究，但是正統者和異端者不能共戴一天，至少不能『戴』到同一程度，是中外古今通例，可以無疑的。 但假如一種文化對於婚姻與生產的機能有抑制的影響，則順生逆亡的原則可以一變而為『順亡逆生』，例如兩晉三唐以還中國的佛教信徒，或歐洲中古時代的基督教信徒（參看拙著宗教與優生。）

明白了選擇或淘汰的意義，我們不妨進而分析目下中國民族品性上的四大缺點了。

中國人的體格顯然是千百年來饑饉薦臻人口過剩所淘汰成的一種特殊體格。 說他壞，壞在沒有多量的火氣，以致不能衝鋒陷陣，多做些冒險進取開拓的事業。 說他好，好在富有一種特別的順應力或位育力，乾些、濕些、冷些、暖些、餓些、飽些，似乎都不在乎；有許多別的民族認為很兇險的病菌，他也能從容抵抗。 有一位西方學者說，任何民族可以寂滅，但有兩箇民族不會，一是中國，一是猶太；大概就因為這兩箇民族，飽經世故，最富有『牛皮糖』的勁兒的緣故。 我們平日在街頭所遇見的『半人半鬼的』『同胞』，其實身體並不柔弱到甚麼地步；在很不衞生的環境之內，他們的生活力倒比西方人要強；衞生的環境經他們居住之後也往往可以變做比較不衞生的，因為不

衛生了，對於他們的生活並沒多大妨礙，他們並不因此而多遭淘汰，他們祖宗的餘蔭早就承了他們的乏，他們是已經被選擇了的。海禁開放以來，第一種救國的口號，就是提倡體育，鍛鍊體格，但這種『牛皮糖』似的體格平日就沒有鍛鍊的要求，也不容易養成鍛鍊的習慣，鍛鍊之後，也決不會變成西洋人一般的體格，因為彼此種族的系屬和淘汰的背景原是不同的，數千百年歷史和環境所形成的不同要靠三年五年的操練來變換他，是一件絕對不可能的事。

在海禁開放以前，中國人的體格至少是夠應付中國的特殊環境的，水也罷、旱也罷、兵也罷、疾癘也罷、官家豪強的壓迫也罷，死了張三，李四總還活着，民族全般總可以苟延殘喘。但開放以後就絕對不行了。『牛皮糖』的勁兒儘多沒有用處，我們要的是火氣、活力，可以衝鋒陷陣，可以冒險、進取、開拓、發見，才有希望和別的民族打一個平手。這種火氣和活力更不是學校裏的徒手體操可以鍛鍊得出的。

科學能力的薄弱，時至今日，大概是誰都承認的，至少是懷疑到的。而所以薄弱的原因，也可以在不良善的淘汰中求之。迫於生計，日以孜孜的無非是開門七件，民族分子中間或有些科學

頭腦，也就用武無地，早晚要受糟蹋埋沒，所謂糟蹋埋沒就是淘汰；科學頭腦特強的人，興趣所屬，每每不能兼事家人生產，結果自然是受人排斥貶薄。這是比較在自然淘汰方面的說法。二千年來的選舉和科舉制度也是富有淘汰能力的。選舉的目的和標準異常狹窄，至後期尤甚，所有種種變異品性的極端——舉凡可以促進科學的研究和發明的——都在不能維持發大之列。在選舉制度之下，人口並非沒有智力卓越的人，但這種智力都是清一色的，至多總跳不出考據、詞章、義理三個圈子，而考據的範圍又僅僅限於古書的釐訂詮釋，至於聲光化電動植生理，初則因社會不與鼓勵故，為興趣所不屬，終則因生物淘汰故，變而為才力所不逮。及西化東來，發明與研究的刺激和需要雖多，而研究精神和發明成績的卑劣不足道如故。這又是人文淘汰的說法。

團結能力和組織能力的薄弱，也一半因為自然淘汰，一半因為人文淘汰。千百年來水旱災荒的選擇勢力已在中國民族中間釀成了一種最不幸的心理品性，就是自私自利心的畸形發展。（說詳上文）畸形的自私自利的人聚在一處（家庭中人另有血緣關係，不論）當然難望他們通力合作，打成一片。這是自然淘汰的說法。中國家制的發達與鄉邨中『無為而治』的精神的

普遍，像選舉制度一樣，是中國文化比較獨有的特徵。 這種特徵雖有別的好處，却最不利於領袖和有組織能力的人才的產生。 大家族裏有了一位比較有力量有見識的家長或族長，一村之中有了一位年高德劭的村正或村長或紳董，幾乎一家一村的事都可以因他們的一言而決，平日用不着組織，用不着多量政治上的分工合作，幾乎完全用不着法律，也用不着比較嚴格的領袖和隨從的身分區別。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團體生活所憑藉的權威是一個血緣的『親』字，是一個高年的『長』字或『齒』字。 有時候一村卽是一族，所構成村正也就是族長，於是兩重權威合而爲一，越見得牢不可破。 在這種權威之下，偶有一二富有領袖天才和組織能力的子弟產生，試問究有幾分用處。 他們若想施展他們的才力，想創造一些比較有組織的共同生活、一些法治的觀念……來，恐怕話還沒有出口，已經要蒙『不務本』和『犯上作亂』的罪名，受大家的箝制、宰制、和淘汰了。 夫團結全靠組織，無組織或組織不嚴密的團結不叫團結，只是一個部分不相聯絡的集合體；所以團結的先決條件是領袖人才與其組織能力；有了眞正的領袖人物，才有眞正的服從人物；家制與村制的服從只是感情的、習慣的，並沒有經過理性的辯駁的。 如今眞正的領袖既不

易產生真正的服從性，也就無法培植；缺少團結的原料與條件而輕言團結，無怪其不可能了。這是文化淘汰的說法。

中國民族的四大弱點，上文已去其三，第四弱點是因自私自利心的畸形發展後所產生的貪污與公私不分。在家我們想盡方法要教老媽子不揩油，爲國又想盡方法要澄清吏治，整飭官方，所謂澄清，所謂整飭，無非是教他們不貪贓不刮地皮。但在這方面我們至今不但沒有成功，並且更覺得束手無策。爲甚麼？這同團結能力的薄弱一樣，又得向自然淘汰和人文淘汰的勢力求解釋了。貪污是自私自利的一大表示。在饑饉薦臻的自然環境裏，唯獨貪得的本能（acquisitive instinct）比較特強，而平日之間能下功夫去搜刮、儲藏、以備不虞的分子才最有機會生存和傳種。這是自然淘汰的說法。家族的畸形發展把闔族的經濟生活打成一片，人人把家族的利益看在個人利益之上，一人不生利則已，否則直接間接卽負贍養闔族或全家的責任。這在生存比較充裕、凡屬丁壯盡人可執一業的時代，可以不出亂子，但一到「生寡食衆」的時候，這生利的人勢非作奸犯科不可了。而唯獨作奸犯科的在這種年頭才有保全個人和全家的能力。所以家制

的畸形發展不但淘汰了領袖人才，並且選擇了貪官汚吏土豪劣紳。 這是文化淘汰的說法。

四種劣點的話似乎是完了。 不過我對於團結力的薄弱，還要補充一句，因爲誰都承認他是二三十年來國家多難的第一大癥結。 上文不提到陀螺的比喩麼？ 假定中國民族的結構與好比一個兩頭尖中間大的陀螺，那就等於說民族中極愚頑不靈的分子雖少而第一流的領袖可以開拓和擔頭陣的分子也同樣的不多，最多的是庸庸碌碌的中人。 在第一流人物比較充足的民族裏，中等人物原是極有用的，他們受了第一流人物的感動指揮，往往可以心悅誠服的陳力就列，而爲公衆出力。 如今中等人物獨多而第一流人物幾乎少得沒有，於是人與人的關係，正合着江南人一句俗話，『你看人家不多大，人家看你大不多』； 辦起公事來又往往合着孟子的兩句話，『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誰都想坐第一把交椅，又誰都坐不穩，誰都只配做些守成的事，而誰都想開創；近代的教育又很錯誤的假定誰都可以培植成第一流的人才，從而打動各人的領袖慾，同時却不能把領袖的能力從外面灌輸進去。 結果就造成了二十年來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種種傾軋、嫉妬、散漫、混亂，與相持不下的局面。 局面既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又豈是一朝一夕所可改革？

最近有一位教育界的先覺對人說，我們參攷邏羅與國的舊例，以爲只要第一流人物能團結，民族與國家是定可挽救的。不錯。無奈我們缺少第一流人物而多中流的人物何！縱有二流三流的人物，無奈根本缺乏團結的能力何！

三〇 民族衛生的路徑

上文關於病態的討論，雖可痛惡，却並不能教我們失望。 民族衛生學者是對於任何民族不失望的，因爲他知道一個民族的遺傳品性原不是固定的，而是因爲軒輊的生產、死亡、與婚姻率的關係而會隨時發生變遷的。 這種變遷既可以像上文所說那般的自陵成谷，也未始不可因淘汰與選擇勢力的轉變而自谷成陵。 所謂淘汰與選擇勢力，其屬於文化與社會的，既完全出諸人爲，可以隨時斟酌損益，其屬於天然環境的，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時代，也未始不能因人力而多所修正。

優生的目的，就今日中國民族的特殊情形而論，是在增加四種富有遺傳基礎的才力或有此才力的分子，已具如上述。 說起增加，我想誰都贊同的，不過增加的門徑，優生學者的見地與一般的見地很是不同。 優生學者要增加的，第一是這種人才的原料，第二是希望這種原料於既得之後，不要浪費。 他相信這種原料並不是現存的，尤其是在「飽經世變」的民族像中國民族，唯其不

現存，所以有先事增加的必要。一般人的看法却以爲這種原料是現存的，並且俯拾卽是，所以只要不糟蹋，只要盡心利用就是了。『玉不琢，不成器，』這是優生學非優生學都承認的至理，不過優生學者主張先得有玉，玉是要開採的，不是俯拾卽是的；有了玉，然後言琢。琢是教養，開採是健全優良分子的早婚與多育。以前講改革的人但知教養的重要，而不問教養的原料如何，更不問原料的由來，更不問原料有何增益的方法；優生學者却要雙方兼籌並顧，並且認定原料的認識與增加比原料的琢磨還要基本。

上文所說又可以歸納爲下列幾點，也可以說是幾個步驟：一是才的認識，二是才的增殖，三才是才的培養。這裏所謂步驟當然並不指時間上應有先後，乃是指在我們的見解裏應有先決後決之分。

根據了上文的理論，我們不妨提出下列幾條應走的途徑來。

一、在自然環境方面，救荒是目前最急迫的一條路。這裏所謂救荒，因爲立場不同，當然和現下救荒的目的與工作不很一樣。目下的荒政，說得大些，目的在挽救國計民生，說得小些，在減

輕被災民衆的痛苦。這些當然也是不可少的。不過我們目的是在挽救民族品性的一部分，教它不變本加厲的惡化。災荒的淘汰的影響，上文已經提到過不但教我們的自利心突飛猛進的發展了，並且降低了鄉鄙人口的智力，（上文第二十三章）養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逆來順受的體力和心態。自利心的增益即等於同情心的減少：見人急難，不但不加援手，反要引爲笑樂；這種變態的性格未始不出荒年之賜。政治腐敗，社會混亂，生計凋敝，而可以漠然無動於中：這種西洋人所不能了解的逆來順受的本領，也未始不出荒年之賜。對於荒年已能充量『位育』的民族，試問還有甚麼吃消不下的橫逆？

所以要改革民族在這方面的品性，非先改革荒年與荒年的成因不可。西北苦旱，東南苦水；水與旱是天時氣象有大變化的表現，往往有時期性，初非人力所可更改；但水可以宣洩利導，旱可以蓄水預防。造渠所以蓄水，築堤所以防水，濬河所以洩水，都是很根本的；但最基本而水旱可以兼治的是大規模的山麓與河岸造林。近年來因災荒的層出不窮，公私的力量忙於救濟，這一類根本的工作還做得很少；導淮，長江築堤，陝西的涇惠渠的開闢已經要算犖犖大者了。至於造林，

似乎更沒有通盤籌劃過去實際的設施尚遠。

關於災荒的成因與根本救濟辦法的議論，最完全的，據我所知，要推美國人麥勞瑞（W. H. Mallory）的災荒的中國（China: Land of Famine）是民國十五年美國地理學會所出版的。麥氏先把災荒的經濟的、自然的、政治的、與社會的成因先分析一過，然後再就四方面提出了許多辦法。他在自然方面，對於造林、築堤、疏濬、灌溉諸端，都有很賅括的討論，於灌溉與疏濬兩端所論尤詳細。造林一端，他雖以為未必能防旱，至少可以防水。

麥氏在分析災荒的自然成因的一章裏，打頭就講到森林的關係。他說：

> 有幾次的饑荒，差不多完全因緣於自然的原因；同時和自然現象完全沒有關係的災荒，也可以說是不常見的。自然狀況對於人民的不利，中國要首屈一指，至少在像中國領土與人口一般大的國家裏，中國要首屈一指。
>
> 中國人民有一大部分居住在有曲折的河道通過的大沙灘上；這種河道往往沒有界綫分明的河牀。雨水非常不調勻，在北部與西北部尤甚……。

科學家大率將上述的情形及其聯帶發生的災害都歸罪於中國歷代任意蹂躪樹木的民衆。

我們深信現在的中國本部，以前是曾經布滿過樹木的；並且我們已經得到很充分的歷史和地質學的證據，來坐實這個信仰。

南京金陵大學的勞德密而克（W. C. Lowdermilk）教授，曾經研究過樹木茂盛的山陵怎會變做一些濯濯的山坡；他新近曾將山西省從前的情形和現在的情形作一比較的研究。山西省境，十分之九是山地，並且大部分的山坡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斜度。 在大雷雨的時候，沒有遮蓋的山土，立刻就被沖壞。 山西的北部，在三年到十五年之間，泥床就要被雨水沖去一層。 關於目下山西剩餘的情形，勞氏曾說：「最可靠的標識，恐怕要算廟產內的樹林了。山西所有樹木如能遮掩像廟產一般高或較高的山西全部山地，已經就了不得了。」

至於中國人民所以毀壞這個天然大富源的原因，我們在這裏不必討論。 我們已很充分的知道中國前代蹂躪樹木的行動，比任何國家，都要來得殘暴。 任意斫伐的行爲，其害不特造成了今日的情形，且使中國西北兩部的地方日漸乾燥；不但如此，現在比較肥沃的地段，也

會越來越磽瘠，越來越沙漠化，像中亞細亞的土地一樣，（據吳鵬飛君譯本酌改。）

『解鈴還得繫鈴人』，中國民族的許多『劣根性』既因緣於災荒的反選擇的影響；而中國的所以成為『災荒的國家』是因為西北的旱化，而西北的旱化，又局部因為先民斲喪與蹂躪樹木的行為；那末要袪除這許多劣根性基礎的工作，在防旱，在止旱，防旱須有大規模的造渠工程，止旱須有大規模的造林運動。

二、在經濟生活方面，我們可以提出兩點，一是求國家生產能力的提高，二是求分配的利便與公允。要做到第一點，大規模的改良農業是第一步，適度的工商業化是第二步。中國向來是一個重農的國家，以後仍應以農業為立國的大本。工商業的發展，一壁既受制於重要原料的缺乏，一壁又限於組織能力的薄弱與領袖人才的不敷分配，前途本來不能望歐美各先進國的項背；所謂重要原料的缺乏，如煤鐵石油之類，向來以地大物博自豪的國人近亦將次領悟；至於組織能力的薄弱，當代從事改革的人還諱莫如深，但早晚也不免默認。民族分子中組織能力比較富厚的向推兩廣的土著，及自兩廣移出的華僑，歷來規模較大與組織比較複雜的工商企業一大部分

是華僑回國創辦的。但據我在廣州的觀察和外人對於華僑企業的評論，可知在這裏所表現的組織能力雖較一般內地的中國人爲強，較之歐美企業界所表現的，還不知要落後幾級。日本南洋富商與南進運動的領袖堤林數衞氏看透了中國僑民的這種弱點，說『華人勉勵精勤，善於貯蓄；貯蓄後漸起新業，至倒閉而後止。彼等最初是勞働者，少積資產，爲乘時崛起之商人，其貯蓄最多者有數億之富力。此乃華人之共通性。然而華人之短處則利己心甚强；個人企業往往成功，團體企業，往往失敗也。』去年基督教協進會舉行民生改進會議的時候，燕京大學教授泰雷氏（J. B. Taylor）提出一篇專論小企業組織的論文，我認爲是最合理可行的，因爲小企業組織不特不背國情，並且適合民性，上文所謂適度的工商業化，便是指有合於國情民性的工商業化。

生產的能力提高以後，經濟享受的分配尤不能不求利便與公允；分配的利便靠交通的發達和銀行與信用機關的進展，而分配的公允則大部分視工商業的組織。資本主義下分配的不易公允，尤其是對於勞力的人，到今日是很容易承認的，但社會主義之下也未必公允，尤其是對於勞心焦思的人，則承認的人還少。中國在這方面的出路似乎應斟取二者之長，而不應作整個的迎

拒，尤其應該參取原有的農村經濟與家族經濟的優點，融合既久，也許可以演變出一派比較合乎國情民性的經濟組織來。 上文所說的小企業運動便正向着這條路上走。 近來很多人提倡的合作運動，也是同樣的值得贊助的。

上文所論的各點誰都可以主張，初不待從事民族衛生學的人出頭說外行話。 不過，主張儘可相同，而主張的動機可以大有出入。 誰都着眼在個人生計的充裕與分配的公允上，優生學者，對於『充裕』與『公允』的注脚却有些別致。 他所謂『公允』並不是等於一般人所說的『平等』。 一方面他否認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凡屬有錢財有地位的人都是好人，都是有才力的人；同時他也看不出來爲甚麼沒有錢財沒有地位的人都會有孟子、潺湲、馬克思與其他平等或平權論者一般的聰明智慧，而人人有做堯舜的資格。 換言之，經濟的待遇應視才力與運用此種才力後對於社羣與文化的貢獻爲移轉。 目前所稱的上流階級中，便有許多分子不配受目下他們所得的待遇；目下所稱的下乘階級中，也便有許多分子應受更良好的待遇。 前者既不肯放棄已得的待遇，而後者又非掙扎奮鬥來改善他自己的待遇不可，於是一種不安定與敵對的社會局

面以起而社會經濟與人才的虛耗於此種局面中的正不知凡幾了。生產的增加與分配的便捷,如能實現至少可以教現在沒有財富沒有地位的人多得一些自由發展的機會。不致横遭淘汰。

優生學者所謂『充裕』不但指一個人一身與一生的贍足,同時更參致到這個人的血統的前途,尤其是否是他或她是民族中的比較中上的分子。因此,他不以個人做單位,而以家庭做單位,而這裏所指的家庭一定得包括適量的子女。以前民族理想之一『光前裕後,』我們以為依然適用,尤其是『裕後』。不過所謂『裕,』決不應完全指錢財,更不應指多量的錢財。漢書與三字經上所說的『人遺子,金滿籯』決不是『裕後』的精意。『裕』字固然脫不了經濟的意義,個人要立業成家,相當的贍足是絕對不可少的。若不止贍足而成富足,則自來社會經驗早就告訴我們,不但於個人的發展與生活未必有益,並且往往可以減少遺留子息的願望;尤其是在一夫一妻制通行的社會裏。英國的貴族,美國的富豪,大半子女極少,甚至於絕嗣,遺產雖多,終於轉入他姓。所以我們說『充裕,』含有『裕後』的意義,『裕』的程度要適中,以不妨害產生適量子女的願望與子女出生後的教養的健全為限。

三、在社會生活方面我們也可以提出兩點：一是都市化的控制，二是家庭制度的整頓。

都市化的控制問題，與上文所說農本經濟與適度的工商業化有密切的關係。農業人口的減少與農村的衰落、工商業的勃興、都市化的突飛猛進，是工業革命以後三種拆不開的現象。所以上節裏所未能詳細討論的，我們希望在這一節裏補足。

都市化對於個人衞生的害多利少是顯而易見的。空氣的惡濁、汚物的不易掃除、細菌的容易散布、一般生活的不自然與不守規則，在在有提高疾病率與死亡率的可能。比起農村來，都市人口因結核、痲疹、白喉、猩紅熱、腸炎、肺炎而死亡的，要多許多。至於社會衞生的不易講求也是盡人而知的。罪案的沓出、娼妓的充斥與花柳病的傳播、自殺的頻數、啞產流產與私生子的成分之高、煙酒毒藥的銷耗之鉅，無一不是社會不衞生的症候。這一類事實凡是從事公共衞生與醫術的人類能言之。但是都市化對於民族衞生的危害要遠在個人與社會衞生之上，即都市化有絕大的反優生的傾向，則見到的還少。

近代都市人口的發展並不靠都市人口自身的生殖，而是靠四鄉的移殖，上文所云反優生的

傾向就可以在這移殖的現象裏尋出來。眞要靠自身的繁殖，現在有許多大都市早就不能維持了，遑論繼續的擴大。德法學者對於柏林巴黎人口消長的研究都能證明這一點。所以不能維持的緣故，是因爲出生率的低落與嬰兒養育的不易。凡屬在城市中作業的人，其生活的大目標決不在子女滿堂、兒孫繞膝，而在個人功業的成就、競爭的勝利、與物質的享受。一個都市的成功者決不能欣賞像下列這樣的一首詩（清汪繹田家樂）

短籬矮屋板橋西，
十畝桑陰接稻畦；
滿眼兒孫滿簷日，
飯香時節午雞啼。

都市人口的死亡率既高，出生率又低，無怪其不能維持了。但就統計的字面而論，往往死亡率反比農村的爲低，而出生率反而要高。這是因爲都市中多青年與壯年的人，他們年富力強，不但自己不容易死亡，並且因爲正當生殖時期，多少會生一些子女。鄉郡人口的年齡分配恰與此

相反，老弱的人多而中年的人少，無怪生產數要少而死亡數要多了。但這是因年齡支配不同而發生的一種特殊現象，並不足以證明城市生活要比鄉鄙生活為良好。假定把雙方的年齡分配用統計方法糾正之後，再加比較，便可見城市人口活力與生殖力的表現實在不如鄉鄙人口了。

個人的活力與生殖力不足而都市依然可以進展，這顯而易見是靠四鄉的幫襯。這幫襯就便是源源不斷的移民。要是人類真是平等的，或從事移殖的人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並且分配得很平衡，那也就不成問題了。可惜不然。老態龍鍾、疲癃殘疾、眼光狹窄、保守性成的人不會自動的移到都市裏來；唯有年輕力壯、軀幹健全、品貌整齊、思想靈敏的人纔有移殖的志願與成功的能力。換言之，移殖是有選擇作用的。從鄉村人口中選擇了許多比較優良健全的分子，放在都市裏，教他們死得容易一些，少享受一些安定的婚姻與家庭生活，少生一些子女，或生而得不到充分發育的機會——這可成問題了。

中國人口，至今十分之八還在鄉村或小市鎮中居住。但照現在的趨勢，這分數難免不日就減少，而終於要步西方大都市的後塵，形成像上文所說的反優生的問題。即據現狀而論，這個問

題已具不少的端倪。　上海的電影明星、舞女、甚至於上等的妓女，都是本地的土著麼？　十個裏恐有九個以上不是。　他們原是四鄉工農或小商家的子息，他們一面受經濟的壓迫，一面慕上海的繁華，才陸續向上海移住；她們的智力與姿色也自然會替她們找到相當的去路。　現在的問題是，她們在一般的鄉村與小市鎮女子中間，是不是算比較優秀的。　若說是，那末她們的加入都市生活，對於民族終究是一個損失。　理由我們已經在上文說過了。　都市生活是不利於婚姻、居家、與子女的養育的，對於這一類的女子，這種正常的家庭生活尤容易見得像兒戲。　亭丁頓講起北方頻年受災荒的鄉村裏，因為出賣女子的關係，品貌比較特出的女子幾乎是沒有了：這種現象其實隨時隨地可以發生，不過在荒年之際強迫性比自動性要多一些罷了。　（見上文第三篇）

所以都市化要受限制，不能任其自然，是中國優生學者應有的主張。　至於怎樣的限制方法，教都市農村化、園藝化呢，還是學德國所提倡的歸農運動呢……這就有待於市政專家與農村社會學家的通盤籌劃了。

四、　在社會生活方面，優生學者還可以提出一種主張，就是家庭制度的整頓。　對於家庭的

制度，近人或主根本推翻，或主照歐美流行的方式改革；我在已往的五六年裏，偶有論列，始終只主張整頓。從本文的觀點看去，家庭應有兩大功用：比較抽象一些，它是培植種族觀念與優生觀念最自然的一個機關；比較具體一些，它是生育兒女與教養兒女最適宜的一個場合。關於第一種功用，西洋的家制，除了猶太民族與羅馬民族的以外，是向來不過問的。最近意國的汎繫主義竭力把民族綿延不斷的觀念拉做主義的一部分，但除非它同時提高家庭的地位，我們以為這一部分的主義是行不通的。但試問在國權黨權高於一切的政制之下，家庭又會有多少地位呢？至於第二種功用，即家庭環境九九歸原是教養兒女最好的地盤，西方流行的小家庭制多少已證明這一點。小家庭制所欠缺的，祇是往往得不到老年人閱歷與經驗的贊助，因為他們另立門戶，不和小輩同居的緣故。至於家庭中幼年教育的效能，往往有非學校教育所能比擬，更非學校教育所可替代，亦早經教育學者與兒童心理學者的公認。兒童公育的學說，不特經不起學理的盤駁，即在今日的蘇俄，除了勞働婦女臨時的託兒所以外，也未見已經實施到甚麼程度。最近靄理士在人類往那裏走那本合作的集子裏也討論到這一點，認為與其公育不如私養(Havelock Ellis,

在 Whither Mankind? 的論文集中，頁二一七。）

我以前在拙著中國之家庭問題裏設過一個譬。有兩條交叉而成的十字街於此，東西的一條代表橫面的社會的空間佔有，南北的一條代表縱貫的民族的時間經歷，家庭應有的地位是十字街的交叉點：

社會
⋮
（大家庭）
⋮
源　遠⋯⋯⋯⋯⋯⋯家庭⋯⋯⋯⋯⋯⋯流　長
⋮
（小家庭）
⋮
個人

我當初還有下列的幾句解釋：『自其橫亙空間者觀之（社會組織，）個人為一極端，社會為一極端，而居間調劑者為家庭，自其縱貫時間者而觀之（民族或種族經驗，）上為種族血統之源，下為種族血統之流，而承上起下者為家庭。』　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為個人，小家庭以個人為重，所以

圖中傾向左方；最大單位爲社會全部，而往昔的大家庭不啻一小社會，其組織與精神極像小規模的國家社會主義，故圖中傾向右方。

今後要整頓中國的家庭，就不妨用這箇十字圖做根據。我們需要一種家制，左不至於抹殺個人，右不至於忘却社會，上能對於已往，有相當的留戀，下能對於未來，有充分的願望。以前的家庭，因爲組織過於發展，對於社會與個人，似乎兩未討好。它自成一種小社會之後，竟把更大的社會忘了，中國人社會意識與公衆觀念的缺乏，胥坐此故；而同時因家長的權力大，家人的衆多龐雜，個人的發育，好比茂林中的一棵小樹，叢篁中的一枝小竹，別人既但見林與篁，小樹與小竹自己也就得不到充分的陽光、雨露、與養料了。這是一點亟宜整頓的地方。但此種整頓的工作，我以爲不宜過於效法英美或蘇俄的家制，因爲從個人與社會宜乎兩全的眼光看去，他們的弊害正復相同，不過方向不同（一則個人太跋扈，而一則個人太受抹殺）罷了。

至於第一種功用，即對於種族觀念與優生觀念的培養，中國舊制的功似乎要在過之上，而西洋的家制可以說是很少貢獻。我最近爲申報月刊討論優生學的應用，中間有一段話，我認爲不

妨在此摘要再說一遍：

「種不可滅與血脈相繩的觀念，在中國是極強烈的。……「承先啓後」「繼往開來」「光前裕後」一類的成語，可以說是中國的獨家發明，在外國文字裏是絕對找不到的。 若說以前血脈相繩的觀念只教人向已往看，不向未來看，事誠有之，但上文所引成語中云云，一半也未始不以後來者爲念，而詩經所說的「無忝爾所生」與鐘鼎磚瓦上層出不窮的「宜子孫」，更是完全爲未來者着想。 唐人張說之燕府君神道碑的起結數語，說得最是妥貼。 起語說：「積德垂裕之謂仁，追遠揚名之謂孝，仁則慶鍾厥後，孝則榮及其親」。 結語說：「毓至德以庇後嗣，仁之厚者也；揚令名以崇祖考，孝之大者也；仁爲五常之先，孝爲百行之首」。 西方優生學最近始講到「忠恕下逮子孫」的道理，中國在千餘年前早就成爲人生哲學的一部分了。

「這種一脈相繩、種不可滅的觀念，並且不限於智識階級，它在平民的思想中也早就有了很堅固的地位。 有一個很有趣的證明。 近來翻閱大家的譜牒，至比較鄉僻的支派而命名發生困難時，子姓的名字就不免大同小異，甚至於雷同的，而雷同最多的幾個字是「根」「泉」「茂」

「榮」，「源」，等，尤其是「根」與「泉」二字。『我認為這決不是偶然的遇合，而是一種文化精神的表現。自來家庭文獻——唯有中國可以說是有家庭文獻——裏最常見的是「木本水源」、「枝榮葉茂」、「根深柢固」、「源遠流長」，一類的語氣。鄉曲小民，雖不識字，而不知怎的，居然把這種血脈相維、百世不絕的觀念吸收下來了。』（優生學的應用，申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一面要保留這種舊有的精神，一面又要使以後的家庭可以不再為個人教育與社會進步的一種障礙，我在五年前曾經提出過一種整頓的方法，即所謂折中的家制，大旨主張保留大家庭的根幹，而去其枝葉的支蔓與蕪雜；家庭的組織應兼收並蓄老、壯、幼三輩，老的貢獻閱歷與經驗，壯的貢獻成熟的思想與能力，幼的貢獻熱情與理想，不可缺一，三輩中以壯的一輩為主體；家大須分，但只限於成立的兄弟與妯娌之間而不適用上下世代之際；好比斫竹，宜直劈而不宜橫截，宜分劃其纖維，而不宜中斷其關節；兄弟房分衆多的人家，老輩可以輪流居住。至以前家制中『慎終追遠』的觀念，『瞻前』固有餘，『顧後』則不足，要實現『啓後』『裕後』『開來』的理想，宜另

立『謹始懷來』的觀念，以資調劑。詳見拙作中國之家庭問題中『大小家庭制平議』一節，茲不多贅。

五、在政治生活方面，優生學者有消極與積極的兩種主張。在消極方面，我們主張思想、言論、與學術的自由；在積極方面，我們主張國家仍須厲行一種科目舉士的制度。

思想、言論、與學術的自由顯而易見是人才所由呈露的第一條必要的條件。人才不止一種，其所表現爲思想、言論、與學術的也不限於一門，惟有在最寬大最優容的政治環境裏，纔各有盡量表現的機會。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而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思想的蓬勃繁變，就從此銷聲匿跡，在中國歷史裏再也看不見第二次。政教不分的中古的歐洲，對於離經叛道的人，重則殺戮，輕則放逐，最輕的亦必強其收回已發的言論或學術主張，例如近代科學的祖師蓋立劉（Galileo），結果造成了所謂黑暗時代，把文藝復興的運動阻壓了好幾百年。當代所謂的黨治，不論其爲中國的國民黨，或俄國的布紮維克黨，或意大利的汎繫黨，因爲不容其它政論與社會學說的共存，長此不改，對於文化與民族品性，勢必養成中國秦漢以後和歐洲中古時代同似

的惡果：輕則阻礙文化的煥發於一時，重則斬絕人才流品的繁變於萬世。　中國自實行黨治以來，在這方面也有過相當的惡果。　凡是對於黨與主義有微詞的，輕則拘禁，重則殺戮，即如許多被殺戮的共黨青年，其間很有幾個才識卓拔的分子，難道政府對於他們除了殺戮滅絕，再沒有別的應付的方法？　這樣的政府、和支配這政府的黨與主義，也未免太沒有能力了。　數年來政府曾經再三頒行過言論自由保障的條例，但觀其內容，名為保障，實多限制，去自由與容忍的意義尚遠。

言論自由的重要，英國政論家拜憂特在他的物理與政理一書裏討論的最周到（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近代國家裏最能容忍言論的自由的也就是英國。　英國國勢的優强，直接固由於人才的衆多與一般民衆智力的高超，而間接實由於思想、言論、學術的不受箝制，凡有才識的人，不論程度、不論品色、莫不有建白的機會與塗徑，有到建白的機會與塗徑就等於有生存與光大其流品的機會與塗徑。　這樣的一個民族與國家是不怕不能保世滋大的，因為真能保障思想、言論、與學術的自由，就等於對於有能力思想、有膽力說話、有才識可以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保了一筆壽險，並且所保的還不止是這種人本身的險，而是他們的子孫的險。

選舉的制度，一樣使有才識的人可以自由表見，却要比言論與學術自由的風氣更爲具體化。自由的風氣不過容忍才識優長的人出來，選舉制度却要特地甄拔他們出來，給他們一個優越些的地位，教他們於充量的發展一己的才力之外，還有餘裕把這種才力遺傳給後代。環顧古今中外的國家，只有中國是有過這樣的一個制度的。不論漢以前的鄉舉里選制，或魏黃初以後隋開皇以前的九品中正制，或唐以後直到清末的科目考試制，方法雖有異同，標準雖有寬狹，其甄拔與選擇的原則則一。上文論中國人才的缺乏之時，我們也曾把選舉制看作人才所由缺乏的一種原因。原是不錯的。但以前選舉制的不孚人意，在標準的過於狹隘，與方法的客觀程度不足，至於選擇的原則是依然值得稱贊的。明清兩代的科舉，標準是狹窄極了，但終究選出了不少的才識卓越的人才來。英國有一位人文主義的哲學家說：『羅馬所以滅亡的理由，中國都有，但中國至今未亡，爲的是他三千年來選舉與科舉制的存在，不知怎的把民族中優秀的成分保留了。』用今日所謂智力測驗的眼光看去，這是不難解釋的。智力也許有兩種，一是普通的智力，一是特殊的才能，在狹隘的選舉制或科目考試制之下有各種特殊才能的人或因不受選擇而終歸淘汰，而

一般普通智力高的人却依然可以受甄別。 近人心理學者張耀翔氏稱八股文爲一種智力測驗而非教育測驗，可以爲此說左證。

所以我們主張重新規畫一種用科目考試的選舉制度，目的與原則依舊，但方法的客觀化要增加，而標準與考試範圍尤其要放大。 唐代科目最多，但今日視之，猶嫌太少，不足以盡人才流品的繁變，依然免不了野有遺才之歎。 孫中山先生的政治學說裏主張設考試一權，目下的國民政府也確有考試院的設立，以『選拔眞才，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來號召。 驟然看去，很像可以恢復舊制固有的精神，而匡救其不及。 事實上却還未能如此。 名爲選才，實則選官；舊制雖由政府執行，它的最大效用却是社會的與教育的，今則完全是政治的；舊制的考試法有智力測驗意味，今則完全爲教育測驗與職業測驗，教育測驗而可以選拔眞才，則學校出身也就夠了，只要政府能整頓學校教育，使不怕沒有做官的專家，又何必疊床架屋，多添一次考試呢？ 所以我們以爲眞要使考試合於優生的主張，那種考試的目的決不在甄拔官員，而在選擇各種人才出來，一壁給人才本身以充分發育與傳種的機會，一壁也教社會有所表率，而實現『義者宜也，尊賢爲大』的民族理想。

六　在教育設施方面我們不妨提出兩點。一是教育的人文化與種族意識化　二是教育應適合性的分化。

近代人文思想的派別很多，但歸納之不外三說。　一爲人本主義，所以別於神本，物本等思想。第二說承認人爲有分化的動物，故論能力與身分爲差等的而非平等的，論社會作業宜分工合作。第三說以爲個人平日操行應守中道，不走禁慾與放浪的兩個極端。　近代西洋教育，顯而易見的是反人文的：或迷戀於舊日基督教的神話，或一味推進物質享樂的生活，於人的自身，近之如一人處世接物的道理，遠之如種族全般的前途的休戚，則反不加存問。　平等的謬說，深入人心，故論才力則認爲人盡相同，論業務則認爲任何人可作任何事，與任何兩種不同的事業的價值相等。　近代教育也就建築這種錯誤的信仰上。　近年來自智力測驗之法行，教育界中人才知稍稍改革，但因流弊已深，一時效力還不見大。　至於『節制』的觀念也口說的多，實踐的少，名爲節制，實同禁絕，而反對此種『節制』的，又成放任。　論者謂近數百年來的西洋文化，不啻基督教的禁慾主義與浪漫主義一段互爭雄長的歷史，不偏於此，便倚於彼，永遠得不到『節制的中道。』　這話不幸

是確的。

人文主義與優生的關係深切是不言可喩的。優生的大目的在駕馭和促進人類自身的演化；它對於人類自身的興趣自較任何事物要濃厚。從優生的眼光看去，教育既爲人類活動之一，自不應不在在以人爲本位。聖人初以神道設教，又制規矩方圓以爲人用，迨其末流，喧賓奪主，不但神道以威福制人，畸形發展的機械也役使起人來，浸假都變做淘汰人文的媒介。論者謂以前的宗教與今日的機械，初則由人創制，而終不免以人爲芻狗，眞是慨乎言之！人是有變異的動物，生物學者稱爲一種多形的（polymorphie）動物，唯其變異多方，品質不齊，才可以供選擇。選擇是一種過程，這種過程所到達的狀態就是優生。所以差等或不平等的現象是優生的出發點，豈可被社會冥想家的任情曲解與抹殺？個人衞生與種族優生往往衝突，但在『節制』與『執中』的原則上，彼此却可以完全同意。即就性的行爲而論，娼妓的縱慾固不合，尼姑的禁慾又何嘗是人情的正軌？再就人品而論，不失諸狂，即失諸狷，而優生的目的之一，未嘗不想爲民族增加一些中行的人。

在中國提倡人文主義的教育應該是比較不難的，因爲中國文化裏早就有一派很成熟的人文思想，而這一派不是別的就是孔門的。 上文所列敍的人文三說裏，有那一說是越出了孔門的範圍的？ 『不語怪力亂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鳥獸不可與同羣……，』『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一類的見地，屬第一說。 講禮，主『分，』是第二說。 講禮也主『節，』是第三說。 近代西方人文主義者，動輒推源到孔子，不是無因的了。

可惜過於短視的中國教育家至今還沒有看到這一點。 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舉行的高等教育討論會裏，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唐蔚芝先生提出『尊崇禮教，以正人心』一案，竟被認爲『不成立。』 不知因爲提案措辭陳舊呢，還是因爲諸位教育家根本不認識孔門思想顛撲不破的價值呢。

種族意識的教育較人文主義的教育還要進一步。 一樣以人爲本位，而種族意識的教育卻明明白白的用未來的人做對象。 西方有幾位學者，例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伊士德(E.M.East)與英國湯姆斯赫胥黎之孫友廉赫胥黎，往往把種族意識與他們所稱的科學人文主義併做一說。

這一種教育在西方最近才算萌芽，在中國却久已成爲家族文化與教育的一部分。 我們所要補正的，上文已經說到過，只須於『愼終追遠』之外，另申『護始懷來』之旨；能懷，族可以維持民族的數量；能護，更可以改進民族的品質。

於上文所說種種之外，今後的教育更應注意到男女兩性的分化。 性的分化的教育也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因爲人文思想的大原則之一，就是『差分』，上文已提過了。 這種教育也可以說是種族意識教育的一部分。 種族造端乎夫婦，婚姻的所由成立，所由維持，蓋完全以分工合作的原則做基礎。 所以要培植種族意識，非先了解男女品性的分化不可。

男女不但身心的品性不同，發育異率，甚至於彼此的細胞都沒有一個同的。 雙方身心外表的差異，正坐細胞內容有差異的緣故。 近代從事於所謂婦女解放運動的人，往往不理會這種基本的差異，而一心唯男女平權是求。 在她們情令智昏，猶可原諒。 但教育事業中人，動輒以學理做根據的，也不免熟視無覩，這却教人難以索解了。 試查閱各級學校的課程與設備，與像新時代的教育只承認『同是圓顱方趾』的人，而不再承認身心各異的男女。 這種運動要是真能一視同

仁，在男女之間，打一筆統賬，倒也罷了；實則在在以男性歷來習慣了的種種做標準，而强女性削足適屨似的來遷就。所以名爲男女平等待遇，實則抹殺了女性，其抹殺的程度要遠在解放運動發軔之前以上。學校裏對於女子的待遇如此，出校後社會對於她們的期待也無不如此：於是男女分工合作的局面一變而爲同行嫉妬與競爭的局面；於是婚姻的關係、家庭的組織、子女的生產與教養，一天比一天散漫、浮薄、與失所憑藉，終於造成今日都市文化杌陧不安的狀態。

但婚姻與家庭崩壞的惡影響，不止是社會的，並且是種族的與生物的。有智力的女子歛屣治家教子的職務而不爲，而日惟熙來攘往於大工廠大商店或其他公共場所之間，以營所謂經濟獨立的生活；婦女一己的生活果然是獨立了，爭奈全般的種族生活何。賢母良妻的放棄，實際上就等妻與母的職務沒有適當的人擔任。母的職務沒有適當的人承當的民族，遲早必有家亡國破與種滅的一日。

要糾正這種局面，或預防這種局面的產生，惟有根據男女身心品性的不同與發育率的各異，實施分化的教育；要認清女子的主要作業依然不能越出良妻賢母的範圍，而良妻賢母的職業價

儲絕對不在任何職業之下。我以前曾經說過，假若男子是產生財富的人，女子便是產生產生財富的人的人假若男子是創造文化的人，女子便是創造創造文化的人的人。男女都能用這種眼光觀察賢母良妻的地位，男子既不會鄙夷女子，女子也更可以不必妄自菲薄了。大家能運用這眼光，婚姻、家庭、與民族的前途，才有保障。

民族的出路不止一條，民族衛生或優生不過十百條中之一；而優生的途徑也不止一條，上文所舉的也不過五六條犖犖大者。我相信中國民族中人品的分配，以中材的爲獨多，所以問題的癥結似乎在中上的流品不敷分配，而不在中下的流品太多，以至妨礙改進的工作，所以在上文的幾條主張完全側重喬派優生學者所稱的積極優生，即中上流品的增殖，而於消極優生、即低能、癲狂、羊癎……一類惡劣流品的減少，則隻字未提。這並不是說中國民族中這一類的分子很少，可以無須顧慮。那決不是，不過說就近代迫切的形勢而論，積極方面比較更應受關心國是者的注意罷了。

附錄一　『中國民族之改造』

——一本關於民族的新書的評論——

張君俊先生任中國防務協會總幹事，近出其餘暇，著『中國民族之改造』一書，前後凡十六章，序兩篇，附錄五篇，都十三四萬言。　際此民族復興之空論高唱入雲之日，張先生乃有此比較脚踏實地之作品以與世人相見，是大可欣幸者也。

張先生此書值得欽佩與欣賞者固多，值得評議與商榷者亦復不少，請前後各分四端言之。

一、關於民族之議論，自孫中山先生提倡民族主義以來，至爲充斥，其以品質改善爲題目者，亦復不尠；然以品質改善爲題而著成專書者，當以此冊爲嚆矢。品質改進之文字不佞自民國十二年以還，固亦嘗數數爲之矣，其曾經搜輯成書者，前後有優生概論與人文史觀二種；拙作『中國之家庭問題』，實亦爲推闡優生之原理而作，顧不失諸零星片段，即失諸旁敲側擊，究與有系統之專

書有別。張先生此作，純然爲一種正面之筆墨，且前後章節各有其聯繫與呼應之關係，自不能不以前所未有之專書目之。

二、張先生著本書之動機與其立論之根據，大體上與優生學所詔示之原則頗相脗合。彼於自序中嘗揭櫫四點：一曰民族之病態；二曰失本逐末之失敗；三曰體智均衡『發展』之重要；四曰民族改造之迫切。四端者，皆我儕所絕對贊成者也。其於維新以還舍本逐末之抨擊，尤爲實獲我心之論，其言曰，『吾國對於西洋強國之術，不問適合國情與否，無不抄襲移殖，然而對於種族之強弱，則漫不關心，此我國之日日圖強而反不見其強之基本原因也。』不佞於十一二年前著『西化東漸與中國之優生問題』（今入優生概論）一稿時，硜硜之愚衷，與此正復相似。又曰，『中國之存亡，全繫乎生死人而肉白骨之民族改造運動，此種改造方案之能否實施，又完全仰賴國人對改造原理認識之深淺爲轉移。是我人一身，不僅繫中國現在之安危，實乃繫乎今後千百年中國整個民族體智之強弱。前者雖然重要，榮顯不過一時，後者功在種族，綿延可以萬代，孰重孰輕，可知努力之動向矣。』不佞於十一二年前所不惜喋喋言之者，正與此不謀而合。

三、本書內容頗爲充實，非時下一般民族改造之空論可比。 而其所以充實之故，蓋得諸搜輯之勤。 全書十六章舍第一章與四五章爲緒論、結論以及推論之文字外，餘十章皆爲事實之鋪敍，循次序臚舉之，爲：血統狀況各省歷代人物消長之情形與原因；身長與體重；南北兒童與成人之死亡率；北方氣候與民族之生機；南方氣候與民族之生機；米麥之消耗與南北民族之體質；中國南方之寄生蟲；中國南北之疾病；世界民族在北緯三十三度至二十度者之衰老現象。 人才消長之事實蓋得諸丁文江與朱君毅二氏之研究；血屬、身長、體重、寄生蟲、疾病、嬰兒死亡、成人死亡種種事實，大率得諸歷年國內醫學界之經驗與研究；氣候與生機之關係，則得諸於氣象學及地理學者，例如亨丁頓氏之推論。 諸如此類之事實，雖尚不多，然散見於專家作品以及雜誌文字中者，亦復不少，欲加以網羅整理，亦良非易事。 醫學界種種研究之結果，性屬專門，尤非常人所能問津。 今張先生乃以一人之力，既廣爲搜討於前，復細爲分析比較於後，使切心於民族健康狀態者得作更進一步之認識。 其爲功德，似尤在上文所敍兩端之上。

四、書中精警的議論與主張，隨在而有；作者爲湖南人，自謂生性爽直，故常能言人所不肯言，

而出諸以直截痛快之筆調。姑舉一二例於下。

丁文江氏解釋歷史期內南北人才分布變遷之大勢，有曰『例如浙江。在南宋以後，經濟勢力發展，產生人才之地位亦隨之居高。』 今作者作駁論曰：『不過我們要問浙江在南宋以前，爲甚麼經濟不發展？此無他，在南宋以前，浙江人物太少，故不能促進經濟發展。 但在南宋以後，宋室南渡，遷都浙江，凡河南的名門望族，皆移殖該省。 浙江得了大批外來生力軍的人物，它的經濟發展，始形發達。 此明明是人物提高經濟發展，不是經濟發展產生人物了』（頁二三三） 就尋常事實而論，經濟發展與人才產生，自是互爲因果之二事，或相互依倚之兩種功能；然就南宋之浙江而論，頗若人才之麕集在前，而經濟之發展在後，及其既經發展，於是人才之數量乃益見增加，丁氏之議論固不可謂謬，而作者之說似尤見扼要。 此可爲一例。

作者以爲北方人才以及文化之消竭，乃由於歷代優秀分子之向南移殖，此種認識可謂甚是。 惟其有此種認識，故一方面積極主張南方人口之向北移動與此種移動之鼓勵（頁二三一）一方面更深以遷都南京爲非。 其言曰：『民國遷都南京，這是中國民族最失算的事。』 蓋謂南京

一地，不特氣候不及北京之適宜，且遷都之後，有使南方優秀分子，減少其向北移動之傾向也。 姑不論此說之合理與否，作者之膽量，亦殊不可及已。

以上四端為本書值得欽佩與欣賞之四種特色。 下文各則則為我儕所深致疑而不能不與張先生商榷者。

一、全書理論根據，竊以為有不甚健全或充實者四端焉：一曰人才消長之「一元論」；二曰南人體弱智強北人體強智弱論；三曰作者對於選擇論之認識不足；四曰作者民族健康論之範圍過泛。 請得分別言之。

人才消長之因緣亦即一切生物演進之因緣，其為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固早為近世人文生物學者與優生學者所公認。 若變異，若遺傳，若選擇，若移徙，若隔離，皆此種因緣也。 即再作進一步之歸併，至少亦有遺傳與環境兩大因緣，遺傳除外，上文所云變異、選擇、移徙、隔離等數者，舉不能離環境而獨立，即舉不能憑空活動。 丁文江氏解釋人才消長時所舉之六種因緣，雖於品質遺傳一端，未能十分注意，於移徙與品質之關係，亦未能充分指出，要不能謂與消長之現象無干。 所云

『都城地位』『皇室籍貫』『文化中心』『經濟發展』等四五端，雖皆屬環境之一部分，固舉足以左右選擇與移徙之方向者也，既足以左右選擇與移徙之方向，卻不能謂人才分布之變遷與一地方人才之消長，不生因果關係。 張先生所假設之『一元論』蓋專指遺傳而言，一地方人才之消長，蓋即良好遺傳之消長，而其所以消長之故，人才之移徙，實爲一大因緣。 此種理論，究其實，與丁氏之理論原無大出入，其所堅持之『一元』，實亦不大明顯，良以移殖之發生，必有待於環境之變遷，而非偶然之事；一牽及環境之變遷，一元之論即不能成立矣。 此全書理論根據不甚健全之一端也。

中國民族品性，南北頗有不同，此在常人，亦能認識。 然必謂北人體強而智弱，而南人體弱而智強，則不特證據不足，亦且於理未順。 何以言於理未順？ 身心二元之論，姑不論其在今日之哲學界中居何種地位，其在生物學界，固已束置高閣久矣。 生物學者以身心爲一種事物之兩種表現，猶之物理學家以質與力爲一種事物之兩種表現；彼以身爲結構，心爲功能，以身爲體，心爲用；體用之間，蓋有輕易不使分離而各論者。 體格而健全，則平均論之，智力亦無有不健全之理，所謂健

全之心理必寓於健全之身體者是；否則反是。 西洋心理學者研究之結果，亦謂兒童之智力與體格大率有相聯之關係，即聰明者較高較重而疾病率較低，低能者較矮較輕而疾病率較高而平庸者體格亦平庸也。 姑舉霍林華士夫人與泰勒二氏 (L. S. Hollingworth 與 G. F. Taylor) 合作之一例如下：

	高才兒童	普通兒童	低能兒童
智力商數	一五一	一〇〇	四三
年齡月數	一一七	一一七	一一六
身材吋數	五二・九	五一・二	四九・六
體重磅數	七四・〇	六三・九	五九・五

此種比較詳見霍夫人所著之天才兒童第四章，原書頁九二，朱鎮蓀譯本頁八二（朱氏譯本亦由中華書局印行，與張先生本書同）。 此上文所云於理未順之說也。

何以云證據不足？ 張先生謂北人智力弱而體力強；智力弱之一端不符張先生所搜集之證

據為然，我儕固早已承認之，而體力強之一端，則尙頗有疑問。　於南人智力強而體力弱之說，亦然。北方水旱之災特多，饑荒之淘汰力特強，故生存者之體格大率富有一種消極順應與遷就之能力，而缺之積極應付與抵抗之能力，此種消極之體格是否得以健全名之，殊難肯定。　此可疑之理由一也。　北人處北方環境，較諸南人處南方環境，其為年代也較久，故其順應之程度較深，則疾病之頻率宜若較低；南人則猶在努力適應之中，疾病率與死亡率之高，卽假定為一大事實，亦適所以示此種努力之成績，而與南北體質強弱之比較無干。　此可疑之理由二也。　北方之氣候大致較南方為佳，溫度、濕度、與夫寄生蟲及病菌之不易繁殖俱勝於南方，此固張先生所不憚煩而再三致意者；然則南人多病一端之所能證明者，不過為南方自然環境在此方面之不及北方而已，於南人體質之強弱無與焉；設以南人處北，而北人處南，安知彼此疾病與死亡之頻數，不易地皆然耶？　甚或比目前所知之統計，於北則益見其少，於南則益見其多耶？　此可疑之理由三也。　南人之身材體重，不及北人，似為一種證明之事實，然此種事實決不能引為南人體格弱於北人之證據，何則，中國民族之種族成分，至為複雜，南北體格之分別容有種族上之根據。　張先生嘗引若干外國統計，

以示中國男女青年身材體重雖不若英國青年，而視日本意大利之青年則差勝。試問日意兩國之青年，於健康上究不若中國青年乎？我敢謂張先生於此決不至作肯定之答覆。然則體格之輕重高矮，在種族不同之人，或在種族成分甚複雜之國家，初不足爲健全程度之表徵，可不辨而自明矣。此可疑之理由四也。有此四種可疑之理由，乃知張先生南北體智比較之論，在事實上亦難成立，固不僅於理未順而已。此本書理論根據不甚健全之二端也。

優生學或民族改良學之一大基礎爲選擇論或淘汰論，而選擇論又可分爲二，一曰自然之選擇，二曰文化之選擇。張先生於文化選擇或社會選擇，既隻字未曾道及；其於自然淘汰，所及亦祇片段，且所見亦欠貫切。自然選擇之途徑不一，其在中國，則最著者二，一曰饑荒，二曰疾病。於水旱之災及饑荒之淘汰力，張先生已不無相當之認識，此可於其北方民族性之討論中見之（例如頁一九一及二一三至二一五）。惟於疾病之淘汰力，則張先生不特未能認識，且有根本誤解之處，何以見之？南方氣候之濕熱、寄生蟲之充斥、疾病之頻數、死亡率之高，張先生始終認定爲南方民族所由『衰老』或『退化』之一大因緣。此不識自然淘汰者之論也。以我儕觀之，氣候與寄

生蟲二者，正自然淘汰勢力之見諸實際活動者，而疾病與死亡二者，正此種活動之結果。活動之力而不過於劇烈，使受其活動者得爲從容之應付，卽使凡屬抵抗力較强大者得因抵抗而不病不死，而病與死者悉爲本質孱弱、抵抗力薄弱之人，則其結果不但不足以促民族之『衰老』與『退化』，且適足以提高民族之活力，卽張先生所云之『生機』；卒之其所能抵抗之病菌愈多，其所能適應之氣候愈繁變，則其全般之活力或生機愈顚撲不破。此固今日一切健在之民族所嘗經歷，且至今猶在經歷之中，而無一能自外者也。中國民族來自西北，其於北方之氣候與生物環境，（包括細菌在內）固早因淘汰之作用而取得相當之位育，故宜若疾病較少而死亡率較低；其於南方之氣候與生物環境，則位育之程度尙淺，愈南則愈淺，故宜若疾病較多而死亡率較高，且亦有愈南則愈甚之勢。然在歷史期內，此種位育之程度，已提高不少。五代之際，天下雲擾，一部分避地者多以皖南徽州爲歸宿；惟時草萊初闢，寄生蟲所引起之疾病極多，而尤以瘧疾爲甚，人口之死於瘧者，不可計數；及今千年，不特自徽州移出之人口以瘧爲尋常之症，卽徽州人亦不復以毒蛇猛獸視之矣。嶺南爲瘴癘之地，以古爲烈，宋代猶然；時人有言，『春（今廣東陽春縣）循（今龍

川惠陽等縣、）梅（今梅縣、）新（今新興縣，）與死爲降高（今茂名電白等縣、）雷（今海康縣、）竇（今信宜縣、）化（今化縣，）說著也怕』名臣劉安世曾因貶遷歷七州，生還不死，當時有鐵漢之稱（說見宋稗類鈔）此種鐵漢，在今日之嶺南已遍地皆是，不足爲奇；而梅州一地，尤爲西人所稱道爲中國民族精華之客家人所移徙與生息之地，蓋不啻爲鐵漢之第一大本營也。蘇東坡自貶所還至大庾嶺上，遇土著一老翁，老翁曰：『相公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題詩謝之，有曰：『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說見吳宏獨醒雜志）今則林林總總者，嶺南固不亞於嶺北，而遷客之命運亦不復如是之惡劣矣。凡此皆位育程度日有進步之表示，亦即自然淘汰之成績也。

張先生不明此種淘汰作用，以爲南方之氣候與寄生蟲環境，於民族健康有百弊而無一利，因以坐實其南人體格必爲虛弱之成見。以我輩觀之，則事實適得其反。北人因環境之壓迫而南移，卽是證其身心兩方皆有過人之處，其南移之眼光與欲望屬諸心理方面，而南移之際所不能不具備之冒險精神與耐勞能力，則泰半屬諸體格方面；及其既南因環境之突變，疾病死亡之例，自所

在而有；然降至今日，此種死亡率必已日就降削，而生存者大率爲能與環境調洽之輩。世界民族在北緯三十三度至二十度之間者，大率呈不進步之現象，此爲地理學者若亨丁頓氏等所再三申說之事實。然亨氏嘗謂中國之南方民族爲一大例外，說詳其所作之種族之品性（參看上文第三篇）。其所以爲例外者，一半固緣民族本質之健全，而一半亦緣淘汰作用鍛鍊之力。今張先生不解此理，一壁既襲用亨氏之議論而曰：『但中國民族却在例外，我們不能不說明，』一壁却又不肯不坐實其南人體弱之論，而曰：『因爲這條鐵律對於南方民族，只發生一半的效力，那卽是南人的體力確不及北人，北人的智力確不及南人』（頁一七四——一七五）。何以一樣一條鐵律只發生了一半效力，卽何以不健全之軀體竟能包容健全之腦系與智力，竟能發爲創造文化、拓殖南洋、鼓動革命等偉大之事業，則誠令人大惑不解！祇發生一半效力，而猶稱爲鐵律，亦我儕所不省。張先生論長沙一帶氣候之惡劣時，有曰：『幸而湖南民族爲中國民族中最有生發能力及有抵抗能力之民族，否則早已聲消跡滅了；』同一爲南方民族，何以湖南人之生發能力與抵抗力特强，此種力量是否爲體格健全之表示，而此種體格何以居然未經惡劣氣候之摧殘消滅；我恐在

不明淘汰作用之張先生實無由置答，設能置答，我敢決其必不作『幸而』之論；良以湖南人體格之良好，即爲淘汰之賜予，初非幸運之所爲也。此全書根本理論不健全與不充分之例三也。

優生學或民族改良學爲一新興之學科，其範圍之大小，迄今尚不能謂有公認之定論。不佞於十一年前草優生概論一文（今亦入優生概論一書中）嘗分別爲最廣義、較廣義、與狹義三派。最廣義派以爲外界一切勢力可以直接影響後裔之治安，其於遺傳之認識，大率不顧體質與精質之分，或分而不嚴，浸淫至認一切社會改造事業爲有改良之作用，有優生之價值。約言之，即嫌優生二字看得太泛，而不了解『生』字之特殊意義。較廣義派則認清體質與精質不爲一事，而優生之『生』乃指精質的而非體質的，是以種族安全爲對象之優生，而非以個人安全爲對象之衛生，但環境中一部分之勢力足以直接影響精質，使受損傷，或傳染，因而牽動遺傳之品質者，若煙毒、酒毒、花柳病之類，則亦在研究範圍之內。狹義派則專以遺傳之遷善爲目的，以選擇的婚姻生育爲手段。其於環境中種種勢力並不注意，然僅就其選擇或淘汰作用作深切之研究。其不發生選擇或淘汰作用者姑從略焉。此三派者，不佞以爲第一派最無學理根據，所應力闢；第二派學理

根據雖不足，不無存在之價值，第三派則最爲近理，可以採納。 今張先生所見之民族健康與所主之改良方策，竊以爲頗有隸屬於第一派之嫌疑。 張先生於精質與體質之分野，全書中未提隻字。其所討論之氣候、食料、與寄生蟲等等，舍經選擇之途徑外，蓋與精質之變遷，風馬牛不相及，而此種途徑，固爲張先生所未嘗洞悉者。 然則張先生之所以備論氣候、食料、與寄生蟲等等者，亦曰若輩與民族品質前途必有相當之影響已耳，至此種影響之性質與程度，張先生固未嘗能確指也。 張先生於篇末附有民族改造實施草案及民族研究院預算草案各一種。 其所開列，蓋與普通公衆衛生之設計以及社會建設設計，無甚區別，所不同者，名目上多優生學一項而已：其故蓋亦在將民族健康之範圍看作過泛，而未解『優生』一名詞中『生』字之特殊意義。

此全書基本理論中不甚健全之第四端也。

二、評基本理論既竟，請得進而論列其它可供商榷之各節。 其一曰立論之偏與結論之驟。拉雜舉數例如下。 作者以爲南人體格之弱，與食米之習慣有因果關係；南人體格未必弱，上文已辯之矣；且南人所食，不僅爲米，其肉類之消耗，且較北人爲多；大豆之消耗，當亦不亞於北人，然則米

所缺少之化學原素，必早經彌補而有餘裕，是則卽使體格南不如北，作者之營養論亦頗有不能自圓者在，此一例也。　作者論民族性時，有曰，『北人喜食大蒜，故他們的性格是爽直而痛快；江浙人多食糖，故他們的性情狹猾而柔弱，湘蜀人喜食辣椒，故他們的火氣很高，遇事多有蠻幹的神氣』(頁一三四)　論在北緯三十三度至二十度之間之各民族時，又嘗曰：『亞拉伯人之搶刼、猶太人之鼠竊、波斯人之多疑、印度人之易惑、緬甸人之倘講、廣東人之好遊與唱高調，皆是一種浮而不沉着的現象』(頁一七六)　此種判斷，事實之根據似極不充分，且亦不類民族改造論者之口脗。民族改造論者必假定民族性爲比較不易變動之一種事實，猶之『江河易改，本性難移』之本性，今乃謂大蒜、糖、辣椒等物可以隨在左右之，則民族改造之大業豈不甚易，作者又奚必作如許危言讜論耶？　至謂亞拉伯人喜搶刼，猶太人善鼠竊，則且迹近羅織矣。　此又一端也。　日本人與湖南人血屬之分布頗相近似，施乃德氏（L. H. Snyder）稱其同屬『湖南組』，作者因曰，『日本與湖南的人，或有血統關係；也許兩方的遠祖，一支向東北海島發展，進佔現在的日本，一支向東南發展，進佔長江流域的南岸。』　此又爲結論太驟之一例。　血屬分布之近似，與血屬學者民族組之分

類，目的無非謂以各血屬分布之成分而論甲民族與乙民族同隸於一派 (type) 而已，未必同屬於一種 (race) 也；世間有同種而不同派之人，亦有同派而不同種之人，作者殆未之辨也。

三、作者搜羅之資料雖多，而參考未及者，尚復不少。人才之消長與人口移動，有極密之關係，發揮此端最力者，實爲拙作明代以前中國畫家之分布與移殖一文，見上海鴻英圖書館編印之人文月刊第二卷。社會選擇之理論與實際，不佞亦嘗草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一稿，見新月第三卷（現入人文史觀一書中，）近年以來人口論者亦頗有論及之者，如陳達（人口問題）陳華寅（統計月刊）先生等。民族性之討論，雖尚少客觀之論證，然四十年前，美國牧師明恩溥氏即有中國民族之特性一書之作（參看上文第二篇）；亨丁頓氏之種族之品性中，所論亦復不少（參看上文第三篇）；拙作民族之病象一稿，嘗先後揭登華年週刊第三卷中（參看上文第四篇）；他如沈有乾陳科美先生等，亦嘗於教育雜誌一類刊物中討論及之。至改良方策之擬訂，則不佞亦嘗有『優生之出路』一文之嘗試（參看上文第五篇）。凡此種種，作者大率未能加以參考，或參考及之而未能充分運用。例如亨氏所論之中國民族品性，即較張先生所自論者爲切實近理，

惜乎其未能斟酌損益而用得其當也。

四、最後應商榷之各點大率屬於補充或糾正之性質。先舉應補充之例。（一）作者駁丁氏人才消長之因緣論時，有曰：『文化中心不是產生人物的原因，人物卻是產生文化中心的原因』（頁三二－三三）此知一不知二之論也。文化與人才，猶之上文所云經濟發展與人才增加之關係，亦屬互為因果之兩種事物；一地既成文化中心以後，自必有其吸引他處人物來歸之力。此即文化選擇之一種，而作者未能深體者也。（二）作者謂『明朝以前，中國民族之品質，要推黃河流域為優秀』（頁三八），此論與事實不符；就事實論，靖康之變為一大關鍵，故若必作南北之比較論時，應以南宋為斷。（三）中國民族之向南移徙，最大者前後凡三次，一為西晉之永嘉東渡，二在唐末與五代之際，三即靖康之變：今作者僅舉一與三而遺其二。五代時節之移徙，拙著明代以前畫家之分布一文中，論之尚詳。（四）作者論北人體格優於南人，嘗引教育部檢查各地大學之結果為證，謂北平大學之一六三三人中，有一〇九七人列甲等，成績之佳，實在四川大學與中央大學之上。竊謂我輩應先問北平大學之學生，果有若干為南方就學之人，否則此種比較

殊無謂也。

次舉事實錯誤而應改正之例。（一）作者討論血屬分布時所引之『生物化學的種族係數』（頁一六），有可以注意者三點，一爲此種『係數』已無甚意義，可以不引，說詳施乃德一九二九年所作之血屬論一書頁一一八—一一九。二爲所引方程式有錯誤處，其母數地位之A應作B。三爲係數二字應作指數。（二）作者謂北緯三十三與六十度間之中國地域，有人口一萬萬六千萬，即有美國人口之一半（頁八六）；此亦有誤，美國人口現約一萬萬二千萬，誠如作者所云則應爲三萬萬二千萬，是必不然。（三）四川之『明江』（一三六）當是岷江之誤；明江則在廣西。（四）作者論瘧疾之分布時，謂湖南的氣候與地勢皆不宜於瘧疾之繁殖，（頁一三六）；但事實殊不然，據我儕所知，即在近年，瘧菌尚頗有繁殖之勢。猶憶前年秋季，毗連湖北江西之平江縣界，即嘗發生一度瘧疫，當時患瘧之人口，據謂『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死亡者達五萬餘人』（見是年十月一日上海大晚報及華年週刊第二卷第四十一期。）

最後應一言者爲作者行文之態度。張先生爲湖南人，自謂其火氣甚大，然以之適用於辯論，

時或不免失諸過於激烈與太不客氣。例如許丁文江氏之人才消長因緣論時，有曰『丁氏之理由，根本荒謬，不能成立』（頁三四。）又如駁朱君毅氏之環境論一則曰『這是何等荒謬絕倫之肯定！不知朱氏懂得遺傳二字之意義否？』再則曰，『這眞是盲人瞎馬，誤盡天下蒼生，』三則曰，『這豈不是笑話』（頁三六。）

總之，張先生此書，可謂爲瑕瑜互見。然就其大體而言，則終不失爲一種有價值的匡時之作品、他日再版時，如能採納上文所提出之各節，而酌量加以修正，使益臻圓滿，則甚善矣。



附錄二　第三篇原文所引參考書目

Backhouse, E. and Bland, J.O.P.,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1914.

Bashford, J. W.,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1919.

Boulger, D. C., 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1891.

Campbell, G., 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the Hakkas. 1912.

Latourette, K. 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1917.

Lee, Mabel P.,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griculture. 1921.

Lennox, Wm. G., Chinese Vital Statistics. China Medical Journal, July, 1916.

Parker, E. H., 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917.

Russell, Bertrand, The Problem of China. 1922.

Smith, A. 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

,,　　Village Life in China. 1899.

Williams, F. W., A History of China. 1901.

,,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1913.

附錄三　第三篇譯註

註一：近代人種學者大率分高加索人種爲三族。一曰地中海族（Homo Mediterranaeus）歐洲南部及西南部之人屬之。二曰阿爾卑奴族（Homo Alpinus），歐洲東部及東北部之人屬之。三曰諾迭克族（Homo Nordicus），歐洲波羅的海與北海四周諸國之人屬之；近世歐洲之向外發展，以此族人之貢獻爲多。諾迭克族史稱條頓族，三十餘年前法國人類學者拉普池（V. de Lapouge）改稱爲歐羅巴族，旋同國學者但尼干又改定今名。

註二：中國人才分布之研究，國內學者亦頗有爲之者；其所得結論亦大致與亨氏者相同。讀者興會所至，欲續加探討，可參考：

梁啓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丁文江：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科學第八卷第一期。）

傅斯年：評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

朱君毅：現代中國人物之地理教育與職業的分布（心理第四卷第一號。）

張耀翔：清代進士之地理的分布（心理第四卷第一號。）

潘光旦：武林遊覽與人文地理學（優生概論下篇。）

註三：山東民風之轉變，我國舊日學者亦早見及。顧炎武序萊州任氏族譜，有曰：『予讀唐書韋雲起之疏曰，「山東人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上罔下。」袁術之答張沛曰，「山東人但求祿利，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竊怪其當日民風即已異於漢時。而歷數近世人才，如瑯琊、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於時：何古今之殊絕也！至於官於此者，則無不變色咋舌，稱以爲難治之國；謂其齊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稅，二曰劫殺，三曰訐奏。而余往來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室之日以微，世族之日以散，貨賄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僞；盜誣其主人，而奴訐其長，日趨於禍敗，而莫知其所終。』

註四：狄克遜氏爲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於一九二三年著行一書曰，人類之種族的歷史，爲近年來人類學界名著之一。 狄氏謂人類發展之初期中共得原種八：一曰原始南方種，二曰原始內格羅種，三曰地中海種，四曰裏海種，五曰蒙古利亞種，六曰古阿爾卑奴種，七曰烏拉種，八曰阿爾卑奴種。 今日生存之各種族大率爲若干原種錯綜混合之結果。例如歐洲西北部；諾迭克人卽爲原始內格羅種、地中海種、與裏海種三者之和。 狄氏此種分類法實爲創舉，然實不無相當之科學的左證，且與澳洲雪梨大學地理教授泰雷氏(Griffith Taylor)於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所發表者大致暗合；近已漸邀人類學者之公認矣。 亨丁頓氏亦爲服膺其說之有力人物。

註五：廣東之土著，卽早年移入之華人，向認客家人爲非中華的蠻族，例如四會縣一帶稱客家人爲『犵』，與苗猺等視。 蓋完全出乎主客之成見與嫉妒而與歷史之事實不符。

註六：此人疑卽爲陳炯明，惟客家友人某爲言，陳氏爲『福老』而非客家。 殊不知福老與客家爲同出一源之中原移民，移殖之時代雖有先後，然自閩粵之『土著』視之，固同一『客』

也。無論如何，亨氏於此以「客家」爲晉代以後圖南移民之總稱。亨氏於下文中詳敍客籍人之由來，讀後自明。

註七：教育心理學稱智力薄弱者爲低能。低能又可分爲三種。最低者曰白癡，其智力商數爲二〇或二五以下；成人白癡者之智力等於普通三歲之兒童。次曰愚戇，其智力商數爲二〇或二五以上五〇以下；成人愚戇之智力等於普通三歲至七歲之兒童。又次曰朦朧，蓋低能中之最不低者，其智商在五〇與七〇之間；成人朦朧者之智力等於普通七歲至十一歲之兒童。朦朧，西文稱 moron，蓋譯音之兼及意義者也。讀者可參攷華超譯，推孟氏訂正比納西蒙智力測驗，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八：亨氏所引關於災荒之記載雖已不少，譯者猶覺其片段，不能完全表出其影響之深刻。讀者可續取三種文獻通考國用考下之賑恤一門而玩味之。

註九：譯者嘗於一九二一年赴保定迤西一帶襄助賑務，當時隨身供差遣者爲一十六七歲之青年，姓馬，父已爲災荒中之犧牲者，母已他適，自身則論年雖已成丁，論身材則猶不及通常九

歲或十歲之兒童，殆積年不得充分營養使然也。 後經國行之西人某認爲義子，西人先歸，此馬氏子則後由譯者挈返北平。 李氏所敘災區種種情狀，十九爲譯者所曾耳聞目擊者，馬氏子之發育失常不過什伯經歷之一端耳。

註十：物以類聚，本爲生物界一般原則之一，婚姻之成就亦不能超越此原則，人文生物學者因別爲一法則曰類就配偶律(Law of Assortative Mating)。 國人言婚姻，動輒講求門當戶對。 蓋即此律行施之效用也。

註十一：客語原出中州，餘杭章炳麟氏論之甚詳。 讀者可參閱章氏之嶺表三州語。

註十二：此卽爲五代十六國時閩之起點。 此段史實見於史者，大致如下。 唐僖宗中和元年(八八四)，壽州屠者王緒作亂，與妹夫劉行全，聚羣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蔡州刺史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有衆萬餘人。 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器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信用之。 後秦宗權責賦稅於光州，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今九江、南昌、贛州諸地；以光啓元年(八八五)陷

汀漳二州。同年八月，緒復發兵漳州，將攻泉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惟王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衆皆自危。行至南安，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篁竹中擒緒，反縛以徇。遂奉潮爲將軍，引兵圍泉州。光啓二年（八八六）八月，潮陷泉州。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潮進取福州，自稱留後。同年九月，朝廷以潮爲福建觀察使，陳巖先卒。乾甯三年九月，復以潮爲威武節度使。四年（八八八）十二月，潮卒，弟觀察副使審知受遺命知軍府事。及梁太祖開平三年（九〇九）梁以審知爲閩王。譯者按王氏王閩，亦爲客籍源流之一，中國論客籍者多不及之。

註十三　亨氏據艮貝爾稱客籍移徙前後凡三次，一在兩晉之際，二在唐末，三在宋末元初。惟中

國作家如鍾用龢（粵省民族考原）則認爲僅有二次，一在南晉之際，二則與趙宋南渡同時，至今梅州一帶客人『由東晉南渡，自中原播遷而來者爲先；由宋南渡，自汀漳轉徙而入者爲後。』 是則顯與閩王之後裔無干，不悉艮貝爾之論果別有何種根據也。 艮氏原文亟切不可覓得，無由覆按爲憾。

註十四：茲所云璦琿，實係黑河。 劉靜嚴君濱江塵囂錄曰：『普通人往往認爲黑河即璦琿，殊屬誤謬。 璦琿者，即前清咸豐八年訂立璦琿條約之處也。 ……光緒三十四年，設璦琿兵備道及璦琿直隸廳。 民國三年，改璦琿道爲黑河道；改璦琿直隸廳爲璦琿縣。 道尹及縣知事，於民國九年，均移住黑河。 惟縣知事在璦琿，尚有分署。 黑河居璦琿北，對岸即爲俄之布拉郭威斯臣斯克（即海蘭泡）……黑河俗名大黑河（舊稱黑河屯）今日之繁盛，已超過璦琿；就黑龍江華岸方面言，黑河則第一大埠也』（頁六八）。 然自常人觀之，璦琿與黑河距離既近，又屬同一縣行政區域，認二爲一，容非大謬耳。

註十五：亭氏盛稱東三省移民之優異，初似不易置信。 譯者於本書脫稿後，曾有三省之行；首經

大連至瀋陽繼經長春至哈爾濱，每至一地，必小作勾留，覺所得印象，與亨氏所論頗相脗合。瀋陽市政當局限三年內將市街一律放寬，今年為第三年，譯者在彼時，工作已十完七八矣。寬放街道，夫豈輕而易舉之事？不第街面須全部重鋪，沿街房屋更須逐一翻造，其他水管陰溝電桿等之敷設，尚屬餘事；而瀋陽市民竟能於短時期內，鳩工聚材，一氣呵成之，其毅力誠足多矣。試問關內任何都市有此種成績否，恐即首都之南京亦未易語此也。亨氏稱瀋陽為『今日中國都市裏最熙熙攘攘有生氣的都市』，觀此一端，可知其未為過譽。

哈爾濱之朝氣蓬勃，亦為行經其地者所公認。論者不察，往往以哈市之發達泰半歸功於俄人。實則近年來哈市發達之重心已漸自俄人經營之道裏移至華人經營之道外，主客之勢，已非昔比也。

璦琿距哈爾濱，尚有十一二日之水程，自為譯者遊蹤所不易及，亨氏之言，亦自無從加以坐實。惟黑龍江省友人某君為言，璦琿女子絕秀麗，為東省冠；果爾，則殆亦移徙之